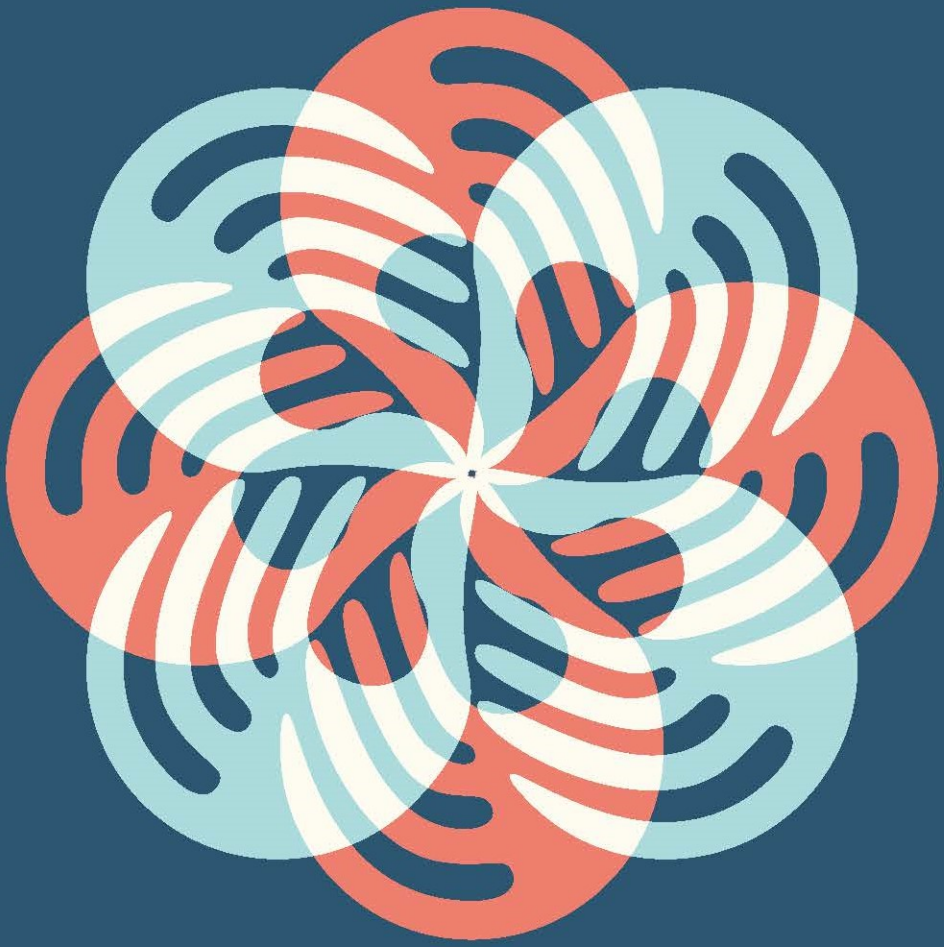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TSSCI期刊



Volume 13, Number 2, July 2023

主　　編

夏春祥／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

王孝勇／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特聘教授

林照真／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林鴻亦／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胡幼偉／文化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施琮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陳炳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編輯顧問（依姓氏筆劃）

周成蔭／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館長
美國杜克大學亞洲中東研究學系實踐副教授與故事實驗室負責人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邱皓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胡智鋒／中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唐海江／中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翁秀琪／《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世新大學新聞學系退休教授

高　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張惠晶／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榮譽學院教授

張讚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眾暨新聞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郭良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光啟特聘教授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

陳國明／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陳憶寧／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程曼麗／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黃清龍／臺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中國時報》前發行人兼總編輯

黃鈴媚／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黃懿慧／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系講座教授

劉新儀／美國德州聖道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

鍾振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英文編輯

張明傑／傑作翻譯工作室

執行編輯

張艾喆／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陳俊廷／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編輯助理

黃莉雅／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生

Editor

Hsia, Chun-Hsiang /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ddress: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Tel: +886-2-22368225 ext. 83170

Fax: +886-2-22360278

Email: chhsia@mail.shu.edu.tw

Editorial Board

Wang, Hsiao-Yung /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Lin, Chao-Che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Lin, Hong-Yi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Hu, Yu-Wei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Shih, Tsung-Je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 Ping-Hu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dvisory Board

Chow, Cheng-Yi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Duke University, USA

Lin, Fu-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Chiou, Haw-Je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Hu, Zhi-Feng / Beijing Film Academy, China

Tang, Hai-Jiang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Weng, Shieu-Chi / Mirror TV Brocasting Ltd., Taiwan

Gao, Gang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Chang, Hui-Ching /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Chang, Tsan-Kuo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Kuo, Liang-Wen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Kuo, Chen-Yu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hen, Guo-Ming /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Chen, Yi-Ning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g, Man-Li /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Huang, Ching-Lung / Taipei Trust in Democracy Association, Taiwan
Huang, Lin-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Huang, Christine Yi-Hui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Liu, Hsin-I /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Texas, USA
Chung, Jensen /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English Editor
Chang, Ming-Jay / Jay'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xecutive Editor
Chang, Ai-Che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Chen, Jiun-Ting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ial Assistant
Huang, Li-Ya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編者的話

2023 夏至溽暑，又屆出刊時節；臺、港幾本傳播核心刊物在六、七月陸續發行，各有關注。本期專題「全球新秩序的策略傳播：地緣政治與認知作戰」（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the New Global Order: Geopolitics and Cognitive Warfare），試圖回應的便是 2017 年中、美貿易戰爭、2019 年新冠肺炎、2022 年俄烏戰爭，以及 2023 年人工智能更加普及之後全球秩序的未來新面貌，尤其側重在軍事戰爭與武裝衝突上面的實質影響與具體脈絡。

在最近國內、外的傳播社群中，重視「為達成任務有目的地運用各種溝通方式」[1] 的「策略傳播」一詞不斷被提及，[2] 指涉範圍不斷擴大，這種自古便從佈局、謀略、經營角度出發的工具性想法始終是這類概念的核心基礎，爾後也在公共行政、廣告公關、整合行銷、危機與議題管理、談判說服等範疇內不斷延伸、擴展與重構。[3] 然而置於今日世局，本專題有著更為在地且與個體相關的現實關懷，以爭取全球輿論支持為目標，並與國際對抗、軍事戰爭關聯密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 年至今）以經濟力量崛起於美利堅合眾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擘劃的全球架構中，而在上世紀末（1991）解體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又在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對抗中，變成了今日俄羅斯聯邦與烏克蘭之間戰爭的主要背景。在雷同的局勢發展中，自從 2010 年力求重返亞洲／再平衡（Pivot to Asia）政策的美國，以及在 1949 年內戰中被迫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1911 年至今）便成了目前世局動盪緊張的關鍵變數：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過程中，中華民國和臺灣扮演的角色應該為何？兩者的關係又是怎樣？

感謝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胡光夏擔任本期客座主編，負責專題籌畫與審閱工作，同時撰寫了從現實到理論的系統性描述，以介紹各篇論文，請參

1　Hallahan, K., Holtzhausen, D., Van Ruler, B., Verčič, D., & Sriramesh, K. (2007). Defining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1*(1), 3-35. https://doi.org/10.1080/15531180701285244

2　以繁體中文期刊而言，香港的《傳播與社會學刊》陸續刊登過相關論文（2021, 2022）；臺灣的《新聞學研究》以「政治傳播」（2021）之名處理過相關議題，《中華傳播學刊》則於 2022 年也有過「策略傳播」的專題企劃。

3　黃懿慧、黃煜、敖頌（2021）。〈公共關係／策略傳播範式轉變和語境本土化—機遇、挑戰與思考：對話黃懿慧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56：1-24。

見導言〈21 世紀地緣政治的軍事策略傳播〉。專題共有投稿論文 13 篇，多是由任教於大學的研究者跨越學科 (包含有新聞專業、傳播研究、認知心理、政治傳播與日本研究等)、跨越國際 (包含兩岸與瑞士背景)、男女各一半的不同性別、師、生與校系 (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國防大學、交通大學、世新大學)，更包括有現任軍事統御與新聞報導的實務工作者，符合本刊對於實踐的期待，更吻合這領域對於「參與式傳播」的重視。論文均經雙匿名審查，最後錄取五篇。

首篇論文關注的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學者小牧實繁的地緣主張，並探討大眾傳媒在地緣風險中倡議與噤聲特定觀點的「宣教者」角色；其餘四篇論文，同樣關心地緣政治下的認知作戰，但兩兩成為一組，分別檢視今日此時的臺海危機與俄烏戰爭，他們各自關注臺灣社會中的報紙傳媒、社群媒體、中國大陸的網路媒體，以及烏克蘭總統社群使用中的報導與論述框架等，藉以參與式地討論這些發展中事件框架的可能影響，以召喚更多反思，去面對臺灣社會中，諸如行政院長陳建仁與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針對美國國務院公布「臺灣學人計畫」引發的「疑美論」爭議，或是引起學界討論的「臺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關於「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的公開呼籲等。

專題之外，「一般研究論文」收錄三篇文章，同樣採取文獻探討、口述訪談、文本分析等質化方法，也關注著新技術與新觀念出現後社會的未來秩序，放在本期專題主標題「全球新秩序的策略傳播」下頗為適合，只是與副標題「地緣政治與認知作戰」就有些距離。

第一篇〈內容產製與當代影視產業：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研究〉，探討的是 2019 年在美國電視劇集《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中出現的技術變革，即以 LED 幕取代藍、綠幕拍攝的方式，使得過去仰賴動畫模擬、合成後製，被稱為虛擬攝影棚的運作流程，轉化為立即成像、隨即修正調整、沉浸式演出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產製相關內容，兩者在時間與空間等文化面向上差別甚大。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黃文龍與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周成虎等兩位作者指出，目前在臺灣，這樣的技術還以廣告、MV 類型較多，對於戲劇演出的影響有限，相關影像的虛實擬真性亟待開發，以強化臺灣影視製作內容與國際競爭力。

第二篇論文是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教授賴玉釵的〈跨媒介料理：互動性敘事中迷因再製之研究〉，指出過往普遍為人們熟悉的「美食書寫」文學創作，在今日網際網路與智慧手機發展的背景下，已轉化為凸顯身體感知經驗與敘

事設計能力的「跨媒介料理」；這類跨越媒介素材的文化現象貼近日常生活，也讓菁英專屬的稀有創作，變化成常民百姓經常操演的生活技藝。作者以《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的案例，與 220 則網路圖文的多模組分析，描繪出一個互動豐富、不斷再製、虛擬混合真實的迷因（meme）世界，也在學科建制上，為臺灣傳播社群與研究者鋪陳出名稱變化的未來趨勢：在傳統名稱上添加社群媒體的關注。

最後一篇論文則是由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李佩雯撰寫，〈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揭示出今日家庭的多元樣貌，尤其是在 2019 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公布實施後；新世界並沒有直接到來，新的互動磨合仍在各個角落浮現。研究以同志家庭為主，發現臺灣社會的相關溝通議題多半發生在職場、鄰里、學校，甚且是醫院的公共場合，而在智慧手機的技術基礎下，線上社團、社群媒體也會出現很多價值衝撞的互動場合。作者指出現代多元家庭強調的是不分血緣親疏，以彈性家庭成員構成個體的物質生存組合，其間仰賴的是一種「厚交織」與「交織階序隱形」的身份認同實踐；換句話說，在女同志家庭的弱勢群體中，歧視往往可能來自群體內自己人，這是種包含複雜階序、流動交織身份的「厚弱勢」處遇，而男同志家庭的正當性則常被「小孩不能沒有媽媽」的論述質疑，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仍藉由結構性的存在滲透到每個地方。

本期出版之後，《傳播研究與實踐》的編輯團隊再次換屆，節氣則進入炎秋白露；只是，這次是主編交接。個人接手於 2019 年 2 月教授休假期間，由當時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溫偉群手中傳承。自此以後，個人及編務團隊籌劃了各類專題，「五四百年：溝通行動、媒介生態與歷史事件」(9 卷 2 期)、「再思科學傳播：在公眾參與之後」(10 卷 1 期)、「傳播、科技與文化」(10 卷 2 期)、「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11 卷 1 期，客座主編：蘇鑰機與羅文輝）、「傳播來時路：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11 卷 2 期，客座主編：蘇鑰機與羅文輝)、「文化技藝與數位影像實踐」（12 卷 1 期）、「新冠疫情與運動傳播」（12 卷 2 期，客座主編：陳子軒），以及「群落、媒介與政治溝通」（13 卷 1 期）等；感謝各位客座主編、歷任副主編、執編、校內外編輯委員，以及助理們的協助。當然，所有論文的撰寫與研究者，無論是刊出還是不適合刊登者，都是這一切繁華、熱絡的基礎，謝謝諸位的參與，大家反覆的修改、討論與堅持，都為社群的互動文化留下相互理解的具體內涵，而期刊這些日子以來的制度

化便是希望留下這一切有意義的細節。回首來時，百感交集，點滴在心。

在這趟將近五年的旅程中，我們主要完成了幾項工作。首先是期刊封面、底，及刊物品牌的徹底翻新，用色與設計則採取最新配搭，以使年輕世代願意接觸與閱讀；第二則是將期刊建立起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舍我紀念館獨立出版的運作體制，以斷絕在出版市場中難以全盤掌控、容易喪失主體價值的特殊文化，同時我們也與專業英文編譯工作室建立聯繫，使期刊的英文寫作品質可以掌握;第三項是替期刊的運作制定了有規範依循的運作交接，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將每個角色的服務期限體制化；同時第四點，我們全部動員，修正了期刊的體例規範，讓投稿人不再困惑，並著重與友刊的規則趨向一致，以便作者們在臺灣社會中書寫投稿更為便利，同時也與最新版本 APA 的國際規定保持同步，並清晰標示出每篇期刊論文的 DOI 連結；最後，在下任主編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蔡珮的協助下，我們也替《傳播研究與實踐》的數位傳播工作做了開端，強化既有臉書等社群媒體、數位網頁等平臺運作，尤其是期刊論文科學傳播專欄的設立，以及在熊其娟小姐信念一致、全力相挺的幫忙下，制度化〈傳播學任意門〉Podcast 的製作等。

在此，謹對所有辛勤付出的朋友致上深刻感謝！我們成功延續前輩們十餘年來的追求，在連續三次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中，都在最新 TSSCI 名單之上；而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的歷次名單中，《傳播研究與實踐》也多次榮獲「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刊長期傳播獎」等的肯定。而在資料庫部分，本刊除了原先的華藝數位之外，同時與聯合百科、凌網科技等簽訂合作關係，以求更多讀者可以接觸到作者們辛勤耕耘的研究成果。點點滴滴，望成巨流，目的無他，為在實踐中體現我們對傳播概念的深層追求與整體理解。

夏春祥

2023 年 07 月 31 日

目次

專題論壇／全球新秩序的策略傳播：地緣政治與認知作戰

導言：21 世紀地緣政治的軍事策略傳播／胡光夏 1

專題論文

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論媒體的宣教者角色／李世暉 9

和平或戰爭？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軍事新聞報導框架分析
／那滈、王泰俐、劉好迪 29

社群編輯如何架構第四次臺海危機？從情緒—認知框架觀點出發
／陳靜君、沈宏杰 73

民族主義啦啦隊：中國媒體對俄烏戰爭的報導及角色／鄒瞻舒、洪貞玲 111

善與「俄」：俄烏戰爭中澤倫斯基推文言說框架與戰爭傳播策略研究
／江知萱、孫復威 155

研究論文

內容產製與當代影視產業：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研究
／黃文龍、周成虎 187

跨媒介料理：互動性敘事中迷因再製之研究／賴玉釵 219

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李佩雯 263

Contents

FORUM OF SPECIAL TOPICS /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the New Global Order: Geopolitics and Cognitive Warfare

Introduction: Militar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Geopoli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 HU, Guang-Hsia 1

FEATURE RESEARCH ARTICLES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On the Media's Role as a Missionary / LI, Shui-Hui 9

Peace or War? Framing Analysis of Taiwan Media's Military News Reports on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 NA, Hau, WANG, Tai-Li, RAUCHFLEISCH, Adrian 29

How Do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An 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 Perspective / CHEN, Ching-Chun, SHEN, Hung-Chieh 73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The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by Chinese Media and the Media's Role / ZOU, Zhan-Shu, HUNG, Chen-Ling 111

The Goodness and the Wickedness: A Study of Discourse Frame and W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Zelenskyy's Tweet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 CHIANG, Chih-Hsuan, SUN, Fu-Wei 155

RESEARCH ARTICLES

Content Produc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 / HUANG, Wen-Lung, CHOW, Cheng-Hu 187

Transmedia Food: Meme Re-creation in Interactive Narratives / LAI, Yu-Chai 219

"Family" Is a Verb: A Study on External Negoti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Among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 LEE, Pei-Wen 263

導言
21 世紀地緣政治的軍事策略傳播

胡光夏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雖然和平是世人共同的願望，但武裝衝突與戰爭卻沒有因為人類文明、民主政治、與全球化而消失。領土紛爭、天然資源爭奪、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等因素都可能引發戰爭。檢視人類歷史的發展可以獲知，戰爭是「新」科技的催生者與孕育者。俄羅斯軍事學者斯里普琴科（В. И. Слипченко／英譯為 V. I. Slipchenko）依照戰爭起始年代、武器系統、能源與戰術，將戰爭型態歸類為六代：冷兵器、火氣（滑膛槍）、近代火器（線膛武器）、現代化武器（如自動武器、坦克車、戰鬥機和艦艇以及雷達和無線電通訊器材）、核戰爭、精確武器和資訊／電子戰。[1] 現代化武器戰出現於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期。第六代戰爭在 21 世紀才出現，主要是建立在高新科技的發展上，以「非核和非接觸」為特點，不再置重點於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而是以摧毀敵方經濟設施、推翻敵方政治制度為目的。高精準武器、電子資訊武器和其他新武器（如無人機）是第六代戰爭的戰場主角。

就戰爭本質與地緣範圍而言，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屬於總體戰爭（total war），而在冷戰（1947 年至 1991 年）與後冷戰（1991 年以後）時期所爆發的戰爭則屬於局部戰爭。1991 年蘇聯共產集團解體後，全球進入後冷戰時期，自由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似乎成為全球的主流，然世界和平穩定的目標仍遙不可及。地緣的局部戰爭依舊不斷發生，包括阿富汗戰爭（2001–2021）、第二次波斯灣戰爭（2003–2011）、「全球反恐戰爭」（美國在

1 張鐵華主譯（2004）。《第六代戰爭》，佛．伊．斯里普琴科（2002）。新華出版社。

* E-mail: hu@mail.shu.edu.tw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1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2001 年 911 襲擊事件後發起）、敘利亞與葉門的內戰等。

時序進入 21 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人類文明與日常生活面臨著更為艱困的挑戰。2020 年爆發的 COVID-19 疫情直到今年才獲得有效控制，而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發迄今的俄烏戰爭則未有止戰跡象。百年一見的 COVID-19 疫情，雖由世界衛生組織促成全球合作共同抗疫，但卻曾引發國際間對於疫情起源的政治角力，各種陰謀論與假訊息層出不窮，並使得一些無辜的海外「華人」被汙名化與受到歧視。

2022 年俄烏戰爭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戰略與科技等方面，都帶來了重大的衝擊。《經濟學人》在 2023 年 3 月 19 日刊登〈俄烏戰爭將決定中國如何看待世界〉一文指出，俄烏戰爭使得國際秩序洗牌， 影響著美、歐、中、俄間的勢力消長。全球新秩序的重構再度成為國際政治、全球戰略的熱門話題。早在今年 3 月 14 日，日本《日經新聞》便已發表題為〈三邊委員會稱 2023 年為世界新秩序的「元年」〉的文章。[2] 該文指出，1991 年冷戰結束後的三個十年是由美國所主導，基於一體化與自由市場的全球化模式，將被一個「分裂多極」的全球化所取代。這種轉變的核心是美國政府不再致力於基於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擴張，而是推動其經濟和關鍵行業（如晶片與人工智能科技）轉向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一系列目標，特別是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競爭。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等金磚國家經濟不斷增長與政治影響力的日益擴展，這些屬於區域強權國家將會權衡其經濟、戰略和國防利益，開拓屬於自己國家的發展路徑。

事實上，在俄烏戰爭爆發前一年，由於國際地緣政治與美中兩強的競爭加劇，國際媒體曾列舉出 5 個可能會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區，第一名是烏克蘭，臺灣則排名第二。2021 年 4 月 29 日《經濟學人》在其臉書官網上公布 5 月份第一期的封面故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這期封面是以「雷達」影像呈現在臺灣海峽上中國軍艦和軍機與臺灣東部外海的美軍對峙，藉以凸顯臺灣是美中兩國戰略角力的關鍵區域。由於美中對抗急遽升溫，一些大陸攻打臺灣的時程預測陸續浮現檯面。例如，2021 年 3 月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 Phil Davidson）在美國國會中陳述，他擔心中國最快 2027 年犯臺。

2 三邊委員會是由美洲、歐洲和日本等國所組成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是一個研究和商討世界經濟、政治問題的國際組織。三邊委員會 3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了第一次全球會議，參會者們主要討論了中國，中等強國和 ChatGPT 等問題。香港新聞網（2023 年 3 月 15 日）。〈日媒：2023 年是世界新秩序「元年」〉，《香港新聞網》。上網日期 202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www.hkcna.hk/docDetail.jsp?id=100308007&channel=2810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各種憂心臺海危機的論點相繼出爐，包括「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等。

臺海危機急遽升高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崛起」，美國意識到其全球的主導權受到威脅，因此，從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任內開始，在經貿、先進科技、外交、軍事等領域採取抑制中國發展的策略、戰術與行動。基本上，「抗中」或「圍堵中國」已成為美國與其國際盟友的主要政治意識形態與戰略目標，不僅從高科技的「四方晶片聯盟」（Chip 4，臺、美、日、韓），到非正式安全組織的「四方聯盟」（the Quad，美、日、澳、印度），並且積極打造「印太北約」，以及研議未來在日本成立北約聯絡處，籌組所謂的「亞太小北約」，全力圍堵中國在南海與印太地區的軍力擴張與威脅。由美國所主導的「抗中」聯盟，彷若重現冷戰時期的抗蘇聯集團。

長久以來，美國堅守「一中原則」，對於臺海則採取「戰略模糊」策略，然在「抗中」政策形成後，其對於臺海的戰略逐漸開始有所轉變。例如，美國高層政治人物陸續訪臺、大幅增加對臺軍售等，使得兩岸關係逐漸劍拔弩張。2022 年 8 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的到訪，正式引爆了「第四次臺海危機」。[3] 中共派遣大量軍機、軍艦在臺海周圍演習，不僅試射 11 枚彈道導彈且頻繁跨越臺海中線，演練鎖臺。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更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正式宣佈，根據臺海形勢變化組織「常態化」的軍事繞臺行動。而為了因應兩岸間的軍事緊張情勢，臺灣除了積極盤點後備戰力，實施「新式教召」，並決定將役男從原先的 4 個月役期延長為 1 年。此外，為了防止敵人搶灘登陸，甚至採購了「火山布雷系統」。

美中的博弈使得臺海危機急遽升高，臺灣已連續 10 年蟬聯接收境外認知作戰——假訊息情況最嚴重國家的榜首。然而從臺灣的民調中可以發現，民眾對於臺海軍事衝突危機的反應相對「冷靜」、「無感」。在裴洛西訪臺後，2022 年 8 月 16 日「臺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調查顯示，多達 7 成 8 的臺灣民眾不害怕中共軍演。《聯合報》在同年 9 月 22 日刊登的「年度兩岸關係大調查」，雖然調查結果偏向敵對或緊張狀態都超過 6 成，但認為兩岸開戰的可能性仍偏低（僅佔10評分中4.4分）。英國BBC曾綜合國際學者的看法，[4]

3　四次臺海危機分別是：1954 年九三砲戰、1958 年八二三砲戰、1996 年飛彈危機、2022 年鎖臺危機。前兩次是直接的軍事衝突，造成人民傷亡及財產損失。

4　BBC NEWS 中文（ 2021 年 11 月 9 日）。〈臺灣民眾「冷靜」應對軍事衝突風險的三個原因〉，《BBC NEWS 中文》。上網日期 202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9152030。

分析出臺灣民眾無感的原因包括：「不認為戰爭會發生」、「司空見慣」、「恐懼疲乏」、「回報遞減法則」等。

雖然戰爭是歷史的常數，然而中外有關軍事傳播的系統性研究一直到 20 世紀中期後才開始大量出現。「媒體與戰爭」是屬於跨學門的研究領域，除了傳播學外，還包括軍事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管理學、歷史學、資訊科學等。

20 世紀末期，軍事傳播研究出現了「新」名詞——「策略傳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策略傳播」一詞是由傳播學者 Jarol B. Manheim 在第一次波灣戰爭背景下所提出，主要用以了解軍事公關及民眾感知的日趨複雜問題。[5] 2007 年國際學術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IJSC）創刊發行，為策略傳播領域的誕生與發展奠定基礎。基本上，軍事策略傳播仍延續著越戰後， 美國國防軍事領域向學術、實務界取經的歷程。

傳播媒體是武裝衝突與戰爭中的基本要件之一。從傳播媒體的發展歷程中可獲知，在國際危機與武裝衝突的階段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包括：[6]（一）衝突前，和平談判的催化劑、和平的破壞者與戰爭的煽動者、戰爭爆發預警訊息的提供者、作為發動戰爭的輿論塑造工具；（二）衝突爆發後，戰爭的批評者、戰爭的啦啦隊、鼓動他國加入戰爭、情報蒐集與決策的參考來源、戰爭工具、戰爭平臺。

戰爭與傳播科技的發展是促成軍事傳播研究變遷的兩個最重要因素。Paul Virilio 曾指出，[7]「戰爭的歷史是一種視野快速改變的歷史。」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在 1960 年代就曾預言，未來的戰爭不再是傳統武器的地面戰，而是透過媒體所進行的影像戰。[8] 隨著「新」傳播科技的出現，人們透過「媒介」（medium）觀看與「參與」戰爭的方式也跟著改變。依照媒體的演進，可將媒體再現戰爭與民眾接收訊息的方式區分為：平面媒體戰爭（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廣播戰爭（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電視戰爭（1964–1975 的越戰）、衛星與有線電視戰爭（1991 年第一次

5 Manheim 的專研領域是媒體與公共事務和政治學。顏瑞宏、胡光夏（2022）。〈在跨際中演化：策略溝通領域的發展脈絡與現況〉，《傳播與社會學刊》，62 ：105–146。Manheim, Jarol B. (1994).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胡光夏（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7 Virilio 的專研領域是美學、科技、戰爭哲學。Virilio, Paul.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p. 7. Verso.

8 轉引自同註釋 6。

波斯灣戰爭）、電視直播與網際網路的戰爭（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社群媒體與無人機戰爭（2022 年俄烏戰爭）。[9] 基本上，俄烏戰爭在人類戰爭史上創下許多的紀錄，包括「社群媒體的抖音戰爭」、「無人機戰爭」、「人工智能與大數據運算戰爭」、「金融核武戰」、「假訊息認知作戰」等。

本專題收錄的 5 篇文章都屬於軍事策略傳播的研究範圍，分別檢視傳統大眾媒體或網路社群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與框架等議題。5 篇論文的研究方法頗為多元，包括量化的內容分析法、大數據分析法，以及質化的文本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的主題與對象則涵蓋：媒體與地緣風險 （1 篇）、臺海危機 （2 篇）、俄烏戰爭（2 篇）。

李世暉教授的論文以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中期，提倡日本地緣政治的小牧實繁為分析對象，探討其地緣思維與其所帶來的後續影響等。文章指出，國家的主政者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考慮下的媒體報導內容、戰略思維，在戰爭爆發之前是一種包括宗教、意識型態等對峙的「想像上的戰爭」。扮演著宣教者的媒體，其宣揚地緣風險的本意可能不是在鼓動戰爭，但卻可能成為合理化戰爭的思維依據，推進與擴大想像對抗走向實體的戰爭，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媒體。

李教授在文末特別提醒，國際與臺灣媒體無時差的宣傳報導「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臺灣海峽危機是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以及「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等地緣風險，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無異推升了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臺大新聞所那滈碩士、王泰俐教授與劉好迪副教授的文章，探討臺灣四家媒體在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 日中共軍演期間的相關報導，以戰爭／和平新聞學、愛國主義框架等理論為分析架構，兼採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量化內容分析法聚焦分析媒體報導的關鍵字（如受害者語言、情緒化語言）、消息來源（菁英或平民導向）、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如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和博弈）、形象描繪（好壞二分法、妖魔化語言）等差異；質化的深度訪談法則用於佐證與討論統計分析的結果。

該研究發現，臺灣媒體在報導解放軍軍演時，對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呈

9　胡光夏（2007）同前註；胡光夏、陳竹梅（2022）。〈第四章 Web 3.0 時代俄烏戰爭的社群媒體平臺大戰〉，《軍事新聞論壇第十集 認知作戰的傳播理論與實踐》，頁 61-93。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以及媒體的美中好惡立場、對國際衝突結果評判，均呈現顯著性差異。《中國時報》傾向使用和平新聞學框架；《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傾向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等框架、表達對中共的負面情緒，並認定中共無法成功犯臺；《聯合報》則在各種框架呈現上則較持平。透過記者的訪談發現，兩岸軍事新聞的最主要元素就是「衝突」。

第三篇文章由陳靜君助理教授與沈宏杰輔導長所撰寫，主要是分析臉書社群編輯如何框架第四次臺海危機、以及臉書使用者對新聞框架的情緒反應，並藉由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題模型分析來判定新聞的框架。

此一研究計有四個發現：（1）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民眾負面情緒反應普遍高於正面情緒；（2）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臺海危機中建構了七個新聞框架（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裴洛西訪臺、美中臺關係、臺海問題、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3）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大心反應，而緊張局勢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怒反應；（4）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具有高度競爭效應，且有較高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

第四篇關注中國媒體如何再現俄烏戰爭，以中國大陸網路媒體的《人民網》與《澎湃新聞》為研究對象，作者是鄒瞻舒碩士與洪貞玲教授。文章採用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取徑，藉以檢視影響中國媒體的角色和報導方式的因素、媒體所建構的他者戰爭、以及黨營的人民網與市場導向澎湃新聞的媒體報導框架與立場。

該研究發現，《人民網》與《澎湃新聞》的報導立場均維持中性、不偏袒任何一方，符合中國官方對俄烏戰爭的立場。《人民網》傾向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大幅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合理化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淡化俄羅斯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作為商業媒體的《澎湃新聞》，為了迎合資本市場的需求，在道德框架中展現更多人情趣味的深度報導。兩家媒體最常使用的主題框架是「衝突框架」。文章發現，中國網路媒體藉由戰爭新聞的再現，強化反美、反西方論述，並且積極扮演民族主義啦啦隊的角色。

最後一篇作者為江知萱政戰官與孫復威助理教授，兩位作者也採取 LDA 主題模型分析法，利用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的 Twint，對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於官方推特（Twitter）公開推文的主題及其言說策略進行研究。

此研究發現，澤倫斯基的推文有三個主題框架：人道主義迫害、 援助與

抵制、 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經兩位研究者深入探討其敘事架構後發現，澤倫斯基在善惡歸納、道德評價和行動方案等面向，彰顯戰爭歸因與烏克蘭國家／人民價值，並且表達烏克蘭訴求和利益，更藉由「口號」連結其目的與主題框架，進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基本上，策略傳播領域在傳播研究中的定位仍有待釐清與發展，現有的文獻以國外居多，華文學術社群的研究相對缺乏，期待透過本專題的 5 篇文章能夠充實軍事傳播與策略傳播的研究，使這些領域逐漸邁向成熟。

客座主編　胡光夏

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論媒體的宣教者角色 *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摘要

今日國際社會中，政府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而在此類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下，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媒體在戰爭上扮演的角色分為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以及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本研究以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中期，提倡日本地緣政治的小牧實繁為分析物件，探討其地緣思維形成、轉變、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後續帶來的影響等。結論指出，在論及媒體與戰爭的關係時，不可忽略傳播媒體在地緣風險中倡議與噤聲特定觀點的「宣教者」角色，即以地緣政治來闡述並宣揚國家利益，進而影響國民的世界觀，以及國家、社會對於戰爭的認知。

關鍵字：小牧實繁、日本、地緣政治、媒體與戰爭

---

* 本論文在思考與撰寫過程中，特別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以及編輯團隊的細心核校。
** E-mail: riseiki@gmail.com
投稿日期：2023 年 03 月 27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5 月 01 日

壹、前言

戰爭（war）一詞的語源，「可追溯到古德意志語（old high German）的werra，原意是指紛爭」（上野貴史，2016，頁 25）。在近代語詞的使用習慣上，戰爭可分為國際法上的意涵，以及軍事上的意涵。前者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狀態（喜多悅子，2005），在形式上又可區分為「正式宣戰至講和」的狀態，以及並未宣戰而逕入至「實質武力衝突」的狀態；後者則是指以軍事力量（軍隊）進行武裝鬥爭的狀態，其目的是屈服敵人、貫徹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使（Clausewitz, 1976）。此一軍事上的意涵，並非限定國家為戰爭行為主體，軍事武裝集團、組織所遂行的武力紛爭，例如內戰（civil war）、獨立戰爭（wars of independence）等，也被歸類為戰爭的一種型態。

進入到 20 世紀之後，戰爭一詞指涉的內容逐漸複雜化；許多非軍事領域的嚴重衝突，也使用戰爭一詞。例如，涉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衝突的「文化戰爭」、涉及國家間經貿利益競爭的「貿易戰爭」、涉及科學技術研發與應用對抗的「科技戰爭」等。即便戰爭一詞不再專門指涉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狀態，但在一般使用上，無論是文化戰爭、貿易戰爭或是科技戰爭，經常會被視為國家間武力衝突的前兆。而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文化、貿易衝突（戰爭）而引發全面武力衝突的歷史事件，所在多有。如十字軍東征（1096 年至 1303 年）、三十年戰爭（1618 年至 164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至 1918 年）等。

另一方面，國家遂行戰爭的動機，國際政治學領域主要是透過「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概念來理解。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國家利益的概念經常被化約為「君王意志」或「王朝存續」。當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彼此頻繁互動之後，國家利益開始被視為與國家生存發展密切相關的國家價值（李世暉，2017）。因此，「國家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務，即是以增進國家利益爲目的」（高阪正堯，1991 年，頁 2）。換言之，主導國家行為的關鍵因素，即是國家利益。

然而，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國家利益概念，是一個重要但內容相對模糊的概念。所謂的「與生存發展密切有關的價值」，其指涉的主體究竟是國家、政府還是國民？國際政治對此一價值主體的見解差異，形成強調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realism），以及追求國民利益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現實主義主張，包括戰爭在內之任何增強國家權力的政策都符合國家利益。自由主義

認為，透過合作來維持國際社會的和平，才同時符合國民與國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由人民所組成；而由此延伸出的民族、民族屬性與國族主義等概念，是在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Anderson, 2006, p. 40）。這些人造物在 18 世紀末出現，是各種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交會下，自發地淬煉出來的結果。在形態呈現上，此一人造物可以被移植到多元的社會領域，吸納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如果說民族 / 國族（nation）是一個政治性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這些想像社群的共同利益，也只能是一種「想像利益」（imagined interest）（李世暉，2017）。無論是民族還是國族，其在邊界（boundaries）所呈現的認知與認同現象，是觀察民族／國族內部互動與外部互動過程的指標。其中，主觀的心理邊界涉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根基情感聯繫（the primordial attachment）（王明珂，1997）。而客觀的物理邊界則是涉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領土完整等與地理息息相關的概念。

上述的地理區隔、「我族」（we-group）與「他族」（they-group）區別、想像利益的認知／認同，在 19 世紀時逐漸匯流成「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概念。最初的地緣政治，是將國家視為地理有機體或一空間現象，著重探討地理與應用政治學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藤沢親雄，1925）。透過媒體的出版、傳播，強調國家尋求權力的地理因素，以及分析國家生存與地理環境關係的論點，包括美國海軍將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的「海權論」，英國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的「陸權論」、德國學者豪斯霍夫（Karl E. Haushofer，1869-1946）的「生存圈」，快速地成為當時主要國家制訂戰略時的重要基礎。由此，對於國家所處地理位置的思考，也轉變為國家的地緣戰略思維。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即是一個明顯的案例。明治維新時期建立國家概念最重要的措施，是確定新國家的領土疆域。經過數年的交涉，日本以庫頁島向俄羅斯換取對千島群島的支配權，同時將原本英美控制的小笠原群島，以及屬於中國勢力範圍的琉球，劃歸明治國家的領土（李世暉，2016）。之後，日本在海權論、生存圈的影響下，一方面確立其建軍制海的國策方針，另一方面則發展出主權線與利益線的思維，進而走向太平洋戰爭。

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屬於研究論述的地緣政治，戰後一度被視為國家發動戰爭的理論基礎而受到批判。即便如此，戰後的國際政治依然無法擺脫地緣政治的影響，只是將武力衝突的戰爭概念轉變成國家安全的概念。

而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國家思考其利益對象，確認其威脅來源，實行其對應策略的主要依據[1]。然而，屬於理論層面的地緣政治，並非推動戰爭的主要因素；統治階層如何認知國家所處的地緣風險，以及如何思考因應策略，才是決定戰爭與否的關鍵。

透過上述的脈絡可以得知，國家／政府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舉例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國尋求地理上的生存圈而走向擴張主義。在接續併吞奧地利與捷克之後，德國為了在未來可能的戰爭中取得優勢，乃於 1939 年 9 月 1 日進攻波蘭，進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總動員式的戰爭，參戰各國除了武裝其軍事力量之外，也透過各種媒體「批判侵略戰爭」或「合理化戰爭」，以取得總力戰格局下的國民支持，進而贏得戰爭的勝利。

從這個角度來說，媒體所傳遞的地緣政治思維，既是發動戰爭時的理論背景，亦是合理化戰爭的思想依據。然而，地緣政治思維透過何種管道傳遞至國家的統治階層？國家的統治階層又是如何據此認知國家的地緣風險？而此一地緣政治的認知又是如何推動國家走向戰爭？這些問題，過去的研究鮮少著墨。有鑑於此，本論文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日本作為對象，探討日本的地緣認知，如何逐步把日本推向戰爭邊緣。同時，藉由分析代表性學者小牧實繁（1898-1990）的地緣思維形成、轉變，其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所帶來的影響，重新思考地緣政治、媒體與戰爭之間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般在論述媒體與戰爭的關係時，經常會從「魔彈理論」（hypodermic needle model）切入。魔彈理論緣起於 1920 年代，結合行為心理學、大眾心理學的論點，主張特定資訊可透過媒介，如同將魔彈打入大腦般地直接改變受眾的認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納粹德國，以及大日本帝國透過報紙、廣播媒體對國民進行戰爭宣傳，被認為是最明顯的例子（佐藤卓己，2022）。

1 針對安全保障，日本國際政治學者田中明彥認為，可將其意涵聚焦在保障的物件、針對的威脅與實行的政策工具等三項議題上。首先是安全保障的物件，如何從重視國家、國土與主權，轉變強調國民、經濟與文化。其次是對威脅的認定，如何從傳統的軍事、外交等威脅，轉變成非傳統的貿易、金融、能源、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全球環境變遷等威脅。最後是安全保障的政策工具，如何從過去強調軍事武力的硬實力（hard power），轉變成兼顧以經濟、文化影響為主的軟實力（soft power）（田中明彥，1997）。

而由此衍生出關於「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理論，廣泛被用來分析現代國家，特別是共產極權國家中政治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另一種關於媒體與戰爭的研究途徑，主要是透過文學的角度進行理解。古代文學對於戰爭的描述，主要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論述戰爭英雄。拿破崙戰爭之後，文學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文學與文學家被開始捲入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也就是戰爭（西川長夫，2002）。近代的戰爭文學，受到作者所處的國家社會情境與個人經歷的影響，既有反對戰爭的文學作品，也存在讚揚戰爭的作品[2]。

此外，媒體傳達戰爭訊息的方式，也是觀察媒體與戰爭關係的重要視角。一般而言，當媒體報導戰爭訊息時有三種態度，分別是站在監督立場的批判觀察者（critica1 observer）、協助政府的宣傳公關者（publicist），以及捲入意識形態與話語權的「戰場」（battleground）（Thussu & Freedman, 2003）。如果將文學視為媒體內容的一部分，結合前述媒體與戰爭關係的論述脈絡，通常可以從三個觀點來厘清現代媒體與戰爭的關係。

第一，媒體是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sympathizer）。19 世紀之後，戰爭型態逐漸從原本的限定的、部分動員的武裝衝突，轉為全面的、總動員的國家衝突。影響所及，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以及與國家、國民相關的資訊，都因為戰爭的需要而受到國家／政府的控制。在資訊控制下，國家／政府一方面透過法律限制媒體的報導內容，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媒體傳遞有利戰爭進行的特定訊息。在此情境下，媒體無法違逆限制與操控資訊的國家／政府（Wyatt, 1995）。只能被動獲得政府給的資訊，且查證能力受到法律限制的媒體，在戰爭時期容易成為戰爭的「唱和者」，宣傳特定觀點。

第二，媒體是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rooter）。當國家處於戰爭的情境時，一定期間內會出現社會輿論對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支持現象，也稱之為「聚旗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Mueller, 1973, p. 208）。此時，媒體通常會最先感受到國內高漲的愛國氛圍，一邊扮演政府的呼應者與唱和者角色，一邊則是引導輿論朝向支持戰爭的論述發展（藤田博司，2004）。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下的媒體在扮演啦啦隊的角色時，並非完全受到愛國

2　例如，針對 1904 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櫻井忠溫（1879–1965）的《肉弾－旅順実戦記》（出版於 1906 年）與水野廣德（1875-1945）的《此一戰》（出版於 1911 年），屬於強調武勇與美化戰爭的文學作品；而与謝野晶子（1878-1942）的「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出版於 1904 年，詩歌）與大塚楠緒子（1875-1910）的「お百度詣」（出版於 1905 年，詩歌），則是屬於描寫戰爭悲慘面的反戰文學作品。

主義的趨勢，有時也是市場考慮下的選擇。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報紙透過版面與標題的安排，擴大渲染戰況的理由，主要便是市場考慮。《朝日新聞》在 1931 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稱之為「滿州事變」）時，透過社論呼籲各方須避免全面衝突。而採取此一立場的《朝日新聞》，1931 年的發行量為 143.5 萬份，較上一年度減少約 15 萬份。但隨著九一八事變的擴大，《朝日新聞》的報導態度從克制轉為支持。不僅購置 5 架飛機進行事變現場的即時報導，也增加報紙新聞的篇幅。而《朝日新聞》的發行份數在 1932 年增加至 182.4 萬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 1941 年，更是大幅成長至 349.9 萬份（安田將三、石橋孝太郎，1999 年）。

第三，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resister）。在一般的情況下，媒體對於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衝突，會傾向與政府站在同樣立場。但在各個時期，均存在著具理想色彩，反對所有戰爭型態的獨立媒體，會對戰爭進行全面的批判。另一方面，是戰爭無法在短期結束，國內民眾容易出現厭戰情緒；而媒體的戰爭報導也將因為政治上的分裂而出現重大分歧。而此一反映在媒體報導態度的重大分歧，有時會對戰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例如，美國在越南戰爭後期逐漸失去持續戰鬥意圖（意志），是因為國內政治出現嚴重的分裂，而當時的媒體角色則是政治分裂的一部分（Hallin, 1989）。

上述媒體在戰爭時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圍繞著戰爭時期媒體的報導立場與態度。對於國家發動戰爭之前的媒體角色，較少有專注對此進行討論的研究。然而，如前所述，驅動國家發動戰爭的原因，是國家／政府對國家利益，以及國家所處的地緣安全風險的認知。而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認知則是一種變動的思維；會因為國家因應國際體系而隨之變動，也會受到國家內部情勢而出現改變，更會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考慮下的報導內容、戰略思維，在戰爭爆發之前是一種「想像上的戰爭」。「想像上的戰爭」原本是指武裝衝突之外的思想對峙，包括宗教的、意識型態的對峙。舉例來說，冷戰（cold war）同時涉及地緣政治與意識型態領域的競爭，而由此衍生出的公民社會、政治忠誠、（與大國的）共同體意識，大大左右了冷戰時期亞洲地區的政治、社會、文化語文學的發展樣貌，可視為一種想像上的戰爭（Sherif, 2013）。

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論點蔚為潮流的 1930 年代，透過報紙、書籍、廣播等媒體的傳遞，在國家、政府與社會形成「戰爭想像」。換言之，對地緣政治的想像，可視為一種「認知上的戰爭」。從 1930 年代的歷史來看，在

媒體影響與政府決策下，認知上的戰爭最終走向現實上的戰爭。為了進一步釐清媒體在戰爭前與戰爭期間的角色，本研究選擇了 1930 年代的日本歷史進行分析。

參、地緣風險「宣教者」的媒體

一、明治時期日本的地緣構想

明治政府的國家發展，包括對內的國土規劃，以及對外的國家戰略，一開始就受到戰爭與地緣政治的影響。在國內的國土規劃部分，日本最早的鐵路（新橋至橫濱）開業後的第五年（1877 年）發生了西南戰爭。在軍隊、物資運送的需求下，明治政府認識到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宣導下開啟了日本鐵道建設的黃金時期，而此一綿密的鐵道網路，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協助運送大量戰略物資至戰場前線（山本弘文編，1986）。

在對外的國家戰略部分，則是重新定位日本在世界的地理位置。對明治初期的日本來說，面對來自亞洲大陸的威脅，朝鮮半島是日本必須掌控的「境外」決戰之地。明治初期由西鄉隆盛（1828-1877）、板垣退助（1837-1919）、江藤新平（1834-1874）、後藤象二郎（1838-1897）、副島種臣（1828-1905）等人主張的「征韓論」，其導火線雖然是朝鮮拒收明治政府的國書，但在明治政府內部的討論過程中，以「大久保意見書」為代表的「經略」概念，逐漸凌駕於原始的「睦鄰」思維之上（吉野誠，2000）。

另一方面，四面環海的日本，也必須以海洋國家的角度思考日本的安全處境。早在明治維新之前，林子平（1738-1793）在其撰寫的《海國兵談》（出版於 1791 年）一書中，就以地理概念描述日本的安全處境如下：從江戶的日本橋到中國乃至於荷蘭，是沒有明確界線的水路。主張必須造船與鑄炮，強化海防來抵禦外敵的侵略（釈悟庵，1908）。明治中期的稻垣滿次郎則是主張，領有臺灣島，以精銳的軍艦在太平洋立足，可掌控南北中國的大權，以及香港、澳洲、巴拿馬、三藩市、溫哥華、日本乃至於上海的太平洋海域的主控權（稲垣満次郎，1891）。

此外，明治政府也同時受到馬漢的海權論影響，重視海洋軍力的建置與南洋地區的經略。馬漢於 1890 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透過海軍省周邊團體「水

交社」的翻譯，在明治政府內部形成一股「建軍制海」（李世暉，2016，頁49）的風潮。在上述地緣認知下，甲午戰爭中獲勝的日本，向戰敗的清朝索取了遼東半島與臺灣。前者是穩定與支配朝鮮半島的重要佈局，發展出日本對大東亞經略的「北進論」；後者則是制海揚威的戰略方針，發展出日本對大東亞經略的「南進論」。

1925 年，盛行于歐美國家的地緣政治研究，在藤澤親雄（1893-1962）、飯本信之（1895-1989）等學者的介紹下正式進入日本。至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日本地緣政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前期 1920 年代，中期的 1930 年代以及後期的 1940 年代（李世暉，2022）。前期的主要活動為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介紹，代表學者為藤澤親雄與飯本信之；中期的主要活動是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代表學者為小牧實繁。後期的日本地緣政治，則是在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的「日本地政學協會」[3]，以及京都地政學派主導下，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參照表1）。

表 1：戰前與戰時日本地緣政治學的發展

階段	時間	學術活動／學術觀點	代表人物／組織
前期	1920 年代	介紹西方地緣政治理論	藤澤親雄 飯本信之
中期	1930 年代	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	小牧實繁
後期	1940 年代	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	日本地政學協會 京都地政學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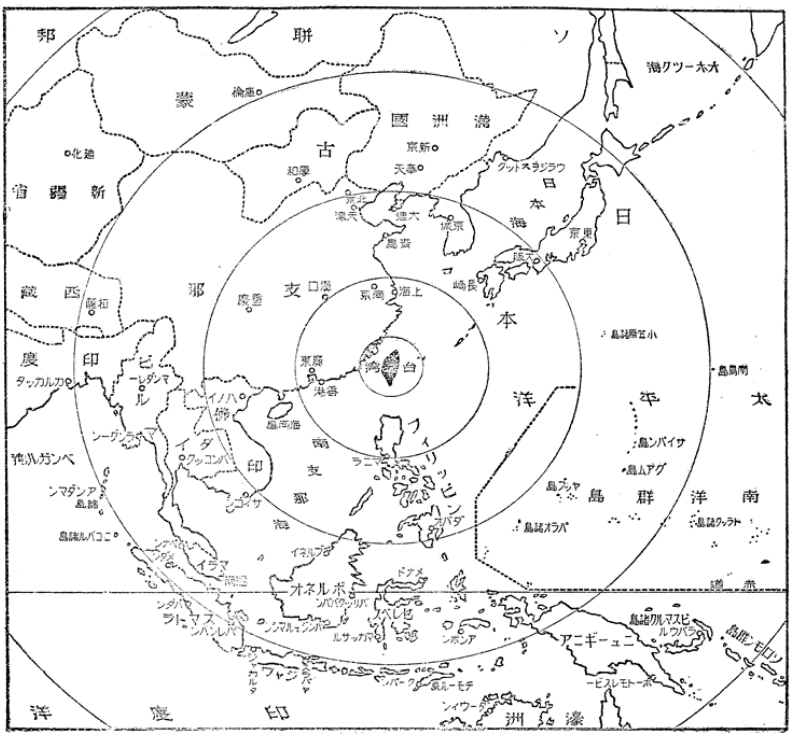
事實上，無論是「北進論」還是「南進論」，當時日本的安全保障思維，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自明治維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其地緣政治認知下不可分割的歷史連續性。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勝利，在日本國內形成一股「大日本主義」的社會氛圍。對抱持「大日本主義」的日本領導菁英階層而言，臺灣的獲取決非大日本帝國主義的終點，而是日本國力向西方（中國華南地區）與南方（南洋地區）延伸的墊腳石（李世暉，2016）。與此同時，包括竹越與三郎（1865-1950）的《台灣統治志》（1905 年）、《南國記》

3 上田良武（1878-1957）為鹿兒島縣（薩摩藩）出身的海軍將領，歷任海軍技術研究所航空研究部長、海軍航空本部技術部長，對當時日本航空戰略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1910 年），以及島津久賢（1881-1926）的《南洋記》（1915 年）、山崎直方（1870-1929）的《我が南洋》（1916 年）等與政治書寫、地理調查有關的南進觀點，在媒體出版與報紙報導的推助下，逐漸在日本形成「海國日本」的地緣政治論述主軸。而以臺灣總督府為中心，包括殖民地銀行的臺灣銀行、國策會社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內，也是當時日本南進政策的重要推手（梁華璜，2003）。在《朝日新聞》的報導內容中，臺灣不僅是日本向大東亞擴張的起點，更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參見圖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面臨到國際情勢急遽變化的 1900 年代初期，尚未發展出「日本地政學」思維，而是依循地理調查來制定國家戰略。如 1901 年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及 1907 年成立的「滿鐵調查部」，乃是透過文獻、實地訪查的方式，調查殖民地（佔領地）的法律制度、交易習慣與風土民情，以利日本在臺灣（進而擴大至華南與南洋）或滿州國（進而擴大至亞洲大陸）的經營。在調查的基礎上宣揚其建構治理典範（如滿州國的「人間樂土」），也在當時扮演相當之宣教角色。

圖 1：臺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社編（1944，頁 2）。

二、 地緣論述、媒體與戰爭

1941 年 11 月 10 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包括飯田信之（1895-1989）、江澤讓爾（1907-1975）在內的日本國內知名地理學者、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組成了「日本地政學協會」，並出版了《地政學》（地政学）雜誌。在印刷用紙嚴格管制，絕大多數地理學雜誌被迫休刊的時期，何以日本地政協會得以發行了《地政學》雜誌？從其創刊號明記的「對高度國防國家建設做出貢獻」使命，以及「建立以日本爲中心的地理學」（福嶋依子，1991，頁 2）任務，可以一窺其為地緣風險「宣教者」的媒體性質。

透過《地政學》雜誌的出版，以及地政學講習會的舉辦，「日本地政學協會」對於推動日本國內的地緣政治理解與研究，具有相當之影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日本國內戰爭氛圍。雖然「日本地政學協會」是由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陸軍大將阿部信行（1875-1953）參與的半官半民組織，但「在實際戰爭、戰略決策上卻不具明顯的影響力」（佐藤由子，1989，頁 106）。

除了官方支援色彩明顯的學術組織之外，當時的地緣政治學者也透過媒體的影響力，宣揚日本的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戰爭的正當性。其中，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學者為小牧實繁。小牧實繁以京都帝國大學地理學教授的身分，專注地緣政治的研究與發表，一開始就受到日本學界與媒體的關注。小牧實繁在 1920 年代後期高度評價英國的地理學，讚揚其兼有法國與德國的優點，以及獨自的國家目的，並將英式地理學視為值得效法的物件。當時其主要的思想觀點，是從景觀地理學（Landschaft）的角度，強調應維持固有土地景觀的秩序與調和（柴田陽一，2006 年）。

然而，進入 1930 年代之後，隨著重大國際事件的發生，包括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1933 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1937 年的中日戰爭，導致日本面臨到歐美國家的激烈批判。這讓小牧實繁意識到西洋文明的限制，並萌生強烈的東洋意識。在文明認同與愛國主義的結合下，他將固有土地景觀秩序與調和概念，逐漸轉化成堅持「本然之姿」（小牧実繁，1942a，頁 108）的地理論述，進而發展出日本地政學的思維。而其所強調的本然之姿，指的是白人侵略之前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擁有自然的住民、風土、文化，也是依循地理與歷史特殊性的神聖世界。

1930 年代後期，小牧實繁因學術調查研究的需要，曆訪當時中國的滿洲

地區，以及日本所屬殖民地臺灣等地。並於 1938 年 11 月在《京都帝国大学新聞》發表〈給有志於地理學的人〉（*地理学に志す人へ*）一文後，開始嶄露頭角。之後，小牧實繁陸續透過座談會、演講以及全國規模的廣播訪問，宣導其主張的「日本地政學」（日本地緣政治），以及以東亞為地理場域的「新秩序建設方法論」與「興亞地政學大意」[4]（小牧実繁，1938 年 11 月 5 日）。

1940 年 10 月，小牧實繁將其整理其演講與廣播訪問的主張，出版《日本地政學宣言》一書。本書內容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地緣政治，強調應建立「符合（日本）國家政策的地理學」、「眞實的、清新的實踐學說」（小牧実繁，1940，頁 143）。由於小牧實繁精通歐美的地緣政治理論，瞭解其理論的矛盾與限制；在此基礎上提出以「皇道精神」來打破地理環境限制的日本地緣政治概念，為當時處於國際孤立情勢的日本提供了政策理論上的力量（竹內啟一，1974）[5]。因此，本書出版後立即在日本學術社群與媒體社群引起一陣「日本地緣政治」的討論風潮[6]。1941 年進行了再版、三版與增補訂正版，至 1942 年共發行 5 冊不同的版本。

小牧實繁所主張的日本地緣政治，結合歷史、地理與實踐策略，認為東亞地區與日本具有地緣（多樣化氣候、廣大的稻米生產地等）的優越性，以及區域統合的基礎（如民族與文化的親近），以此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必然的發展趨勢（竹內啟一，1974）。除了在哲學面上要建立符合「皇道精神」的地緣政治理論，作為政策的指導原理之外，也在實際戰略行動上指出，日本最終勢必與「英美舊秩序的勢力」發生戰爭（小牧実繁，1940）；而實踐南方政策（南進論），對美國開戰，是解決日本地緣政治困境的唯一戰略（小牧実繁，1941a）。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爆發太平洋戰爭之後，小牧實繁的論點受到日本媒體的一致讚揚，被視為「結論正確、判斷準確」（柴田陽一，

4　小牧實繁於 1939 年 3 月 15 日，在「興亞座談會」以「新秩序建設方法論」為題進行演講；並於 1939 年 11 月 4 日的「史學研究大會」中，以「興亞地政學大意」為題進行演講。

5　從小牧實繁的思想來看，歐美地緣政治學的矛盾之處在於「捨本逐末」，只求資源物質而捨卻精神文化。他曾指出，東洋的地政學原意，源自于《管子》的「地者，政之本也」，具有經世濟民之義，才是地政學的本質（小牧実繁，1940，頁 185-186）。而追求力量、謀略的西洋地政學，則是必然面臨到發展的限制。

6　例如，山口貞雄（1906-1992，產業地理學史專家）、米倉二郎（1909-2002，東亞地理學者）、淺井得一（1919-2003，人口地理學者）、島之夫（1907-1988，滿州國地理專家）、國松久彌（1903-1986，經濟地理學者）等人，紛紛以專書、媒體書評的方式，稱讚此書的論點。而在此一風潮下，京都大學的日本地政學受到關注，也出現了以研究地緣政治為志向的中國留學生（小牧実繁，1980 年）。

2014，頁 82）的實踐性觀點[7]。

小牧實繁論點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兩個部分。第一，透過「吉田會」與當時的軍部建立合作關係。吉田會成立於 1939 年，是以京都帝國大學地理學教室的小牧實繁教授、室賀信夫（1907-1982）副教授為核心的研究會，也被視為京都地政學派的根據地。吉田會成員包括別枝篤彥（1908-1997，東南亞）、淺井得一（1919-2003，南亞）、米倉二郎（中國）、野間三郎（1912-1991，歐洲）、三上正利（西伯利亞）、朝永陽二郎（非洲）等地緣與地理專家。在軍部周邊團體「皇戰會」的支持下，吉田會每週開會一次，進行各國地理重要性的分析。而這些發表結果，則是透過「皇戰會」對日本的軍事戰略產生直接影響[8]。

當時，包括綜合地理研究會（吉田會）、世界歷史研究會、戰爭研究會等學術組織，都受到皇戰會的資金支持。其中，世界歷史研究會進一步籌辦名為「蘇美學塾」的思想教育團體，大規模舉辦講習會（共計 7,500 人參加）並出版相關書籍，在當時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蘇美學塾」講習者多為大學生、官僚、新聞記者、醫生、社團領導人等社會精英；而其使用的教材中與地理有關之論述，多來自吉田會的主張（柴田陽一，2006）。換言之，在皇戰會資金支持與組織網絡下，吉田會的研究成果獲得當時日本社會精英的理解與關注。

舉例來說，吉田會於 1940 年 12 月完成「新加坡論」，主張不應過度誇大新加坡的軍港價值，但也不應貶抑其政治價值。這是因為，新加坡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並不具備一個重要軍港的條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可視為牽制英國在東亞勢力的軍事進攻選項。由此，「新加坡論」主張透過下列三項陸軍方略來佔領新加坡。分別是陸軍進駐中南半島，與泰國簽訂軍事協定，以及以雲南作戰牽制英國軍隊（室賀信夫，2001）。在此一地緣思維的指導下，日本陸軍山下奉文大將制定「馬來戰略」，於 1942 年 2 月成功取得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控制權（村上次男，1999）。

第二，透過當時主流媒體的宣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小牧實繁獲得日本各媒體的邀請撰寫文章，其日本地緣政治論點快速地傳播至日本的政治、

7 依據小牧實繁的論點，歐美以強權主義在亞洲建立的舊秩序，隨著文化的多元展開，必然受到追求本然姿態的東亞新秩序挑戰。由此，由日本地政學宣導的「世界維新、亞洲復古」（小牧実繁，1941b，頁 4）新秩序，勢必與西方地緣政治建立以壓榨亞洲為目的舊秩序產生衝突，進而發生戰爭。而此一論點，也被《週刊朝日》、《朝日新聞》、《京都新聞》等全國與地方媒體轉載。

8 皇戰會是由日本陸軍將領高嶋辰彥（1897-1978）於 1939 年成立的組織，與參謀本部有著密切的關聯。其工作項目之一，即是以資金支持小牧實繁等人的地緣政治研究。

經濟與社會各領域。如表 2 所示，小牧實繁在戰前的出版活動（1938 年至 1945 年），不到 8 年的時間，共有 165 篇的雜誌、報紙評論與專書篇章。此一期間小牧實繁的著作活動有三大特點：第一，有 96% 的文章是在 1941 年至 1945 年間撰寫；第二，接近四成的文章是透過報紙進行傳播；第三，論點發表的媒體相對多元。值得注意的是，1942 年 12 月，小牧實繁參與「大日本言論報國會」[9] 的成立，並擔任理事，進一步強化其對當時日本地緣戰略論述的影響力。

表 2：小牧實繁的著作刊載媒體（1938 年至 1945 年）

雜誌／報紙	篇數
大阪新聞	15
古事記研究（革新國策綜合雜誌）	8
週刊朝日	8
京都新聞	8
現代	6
政界往來	6
朝日新聞	6
國民評論	5
東京新聞	5
新天地	4
大阪每日新聞	4
地理論叢	3
公論	3
改造	3
大洋	3
京都帝國大學新聞	3
日本讀書新聞	3
文藝世紀	2
讀賣新聞	2
中外商業新報	2
農大新聞	2
中外日報	2
其他雜誌	37
其他報紙	13
單行本收錄論文	12
合計	165

資料來源：參酌柴田陽一（2014，頁 83-84），作者自行整理。
註：底線黑字的媒體為報紙。

在政府的支持與媒體的配合下，小牧實繁將其對國際形勢、日本地緣風險的認知，轉化成日本社會認識國家現況的哲學基礎，以及日本政府制定與推動國家戰略的指導原則，包括回歸共同體的本然之姿、建立天皇信仰的地

9　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是由情報局第五部第三課（文化部文藝課）主導設立，網羅了主要的學者、專家與媒體評論家，是戰爭時期唯一的政治社會評論組織。

政學等。此外，當時的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ōsō Kyōkai，簡稱 NHK；英文則為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也特別將小牧實繁的演講內容與其日本地緣政治主張，透過海外廣播頻道制播「地政學上的大東亞」節目向美國、中國重慶放送。美國的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雜誌（1942 年 12 月）以及 Asia and the Americas 雜誌（1943 年 6 月），翻譯並刊載了小牧實繁演講的 6 次廣播內容，並將其視為太平洋戰爭中最能反映日本戰略的文件（Stephan, 1984）。由此可以看出，小牧實繁的日本地緣政治論點，不僅在日本國內形成風潮，也受到美國的關注（Fifield & Pearcy, 1944）。

1930 年代後期至 1940 年代中期，是日本發動與推展太平洋戰爭的時期。京都地政學派的代表人物小牧實繁，在媒體的支持下成功地宣揚其「日本地緣政治」思想。而此一日本地緣政治，包括了日本國家與國民的世界觀、大東亞建設的戰略，以及日本的精神。除了大東亞戰略涉及建立南方農業經濟、推行地理教育等政策措施之外，日本國家與國民的世界觀以及日本的精神，均與思想、宣教有關。例如，在國家的世界觀上，小牧實繁強調，必須揚棄歐美國家宣揚的「自然之姿」（景觀自然地理），重新還原亞洲的「本然之姿」（文化歷史地理）。而在國民的世界觀上則認為，歐美國家的地緣政治是扭曲的、侵略的世界觀，有必要回歸亞洲農業社會基礎的命運共同體，以正確的地緣政治世界觀啟蒙國民（小牧実繁，1942b）。而在日本的精神上，小牧實繁主張，透過淨明正直的大和心，以必勝的信念祈禱，必能帶來戰爭的勝利（小牧実繁，1944 年 7 月 21 日）。換句話說，此一時期傳達小牧實繁地緣思想的日本媒體，可視為是地緣風險的「宣教者」（missionary）。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HQ）於 10 月進駐京都大學地理學教室，要求小牧實繁重新寫出（reproduce）其為日本政府進行的軍事地理研究成果。但小牧實繁以「無相關資料」為由加以拒絕（正井泰夫、竹內啟一，1999）。同年 12 月 27 日，小牧實繁在清算戰爭責任的社會氛圍下被迫離開京都大學。直到冷戰地緣政治成形後的 1952 年，才重新以滋賀大學教授身分重返學界。重返學界的小牧實繁不再進行地緣政治的研究，而是專注滋賀縣周邊的地理與人文風土調查。然而，由其開創的「日本地政學」研究方向並未完全消失，而是由京都大學地理學的同事、學生所發起的「人文地理學會」所承繼。即便是對小牧實繁進行過嚴厲批判的美國，也於 1970 年代開始正視小牧實繁

的地緣政治思想[10]。而小牧實繁也在 1980 年著文表示，今後更將「努力於確立日本地政學」（小牧実繁，1980，頁 17）。

肆、結論

總的來說，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可以從戰前、戰時與戰後等不同階段進行觀察。而媒體在戰爭上扮演的角色，也可細分為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以及地緣風險的「宣教者」等四類。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本論文所研究的媒體宣教者角色，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已逐漸成為思考媒體與戰爭關係最重要的切入點。這是因為，國家／政府對於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的世界觀思考，比起認知他者的國家利益，傾向認知自我的地緣風險。事實上，小牧實繁在 1930 年代後期至 1940 年代中期，透過日本媒體所宣揚的日本地緣政治，就是一種確認自我認同的世界觀，而非理解他者的世界觀（柴田陽一，2014）。

在此一思維模式下，當媒體面臨到戰爭的情境時所宣教的內容，不外乎國際政治經濟現勢（世界觀）、國家處境（地緣風險）與國家目標（國家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扮演宣教者的媒體，特別是影響力較大的大眾媒體，其宣揚地緣風險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引起讀者關注者，有的是自詡為新知識的仲介者。有的時候，媒體的本意雖非鼓動戰爭，但卻會成為戰爭推進、擴大的工具（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因為媒體的批判與反抗，戰爭才得以避免或提早結束（如越南戰爭時的美國）。

地緣政治的思維，從 1930 年代至今，實質內容已出現許多改變。例如，從強調軍事安全的地緣政治，發展出重視經貿與科技安全的地緣經濟。另一方面，媒體的類型與運作方式，也從 1930 年代的報紙、雜誌、廣播為主，發展出目前的網路、電視為主。有一點不變的是，即便在戰爭頻率較低的現代國際社會，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依舊扮演著地緣風險「宣教者」的角色。過去幾年經常被國際媒體提及的「地緣風險」之一，就是臺灣。

例如，日本在 2020 年 4 月的美日首腦會談中，強調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將其載入《防衛白書》之中。之後透過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

10　例如，1975 年，一名日裔美籍的博士生 Russell Nozomi Horiuchi，於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提出題為“Chiseigaku”: Japanese Geopolitics 的博士論文，內文大量引用小牧實繁的觀點，經審查通過後取得博士學位。

晉三的媒體談話，進而發展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點。而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 CFR）於 2021 年 1 月，發佈了「預防優先次序調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將臺灣海峽危機列為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中國則是在 2022 年 9 月之後，透過政府談話與官媒報導，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臺灣海峽危機是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以及「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等地緣風險，經過各種媒體無時差的宣傳報導，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無異推升了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多次以封面報導的方式，將臺灣視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以及國際社會如何「為臺灣而戰」。之後，隨著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態勢加劇，全球的主要媒體都將臺灣海峽視為可能發生戰爭的區域。

透過媒體的報導，臺灣海峽的地緣風險正如上升氣旋般地席捲了國際社會。圍繞著臺灣問題的主要行為者，在接受了各種地緣風險訊息後，已然形成了「認知上的戰爭」。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認知上的戰爭是否會走向真正的戰爭，除了繫於周邊重要國家領導者的決策思維之外，媒體的唱和者、啦啦隊、對抗者、宣教者角色，其影響力也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

李世暉（2016）。《日本國家安全的經濟視角：經濟安全保障的觀點》。五南圖書。

_____（2017）。〈台日關係中「國家利益」之探索：海洋國家間的互動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18(3)：1-40。

_____（2022）。〈日本海洋安全保障的地緣思維：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交錯〉，蘇嘉宏（主編），《日本新安保法制與海洋政策研析》，頁 19-50。國家海洋研究院。

梁華璜（2003）。《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稻鄉出版。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Clausewitz, C. von (1976). *On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field, R. H., & Pearcy, G. E. (1944). *Geopolitics 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Ginn & Company.

Hallin, D. C. (1989).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ueller, J. E. (1973).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John Wiley & Son.

Stephan, J. J. (1984). *Hawaii under the rising sun: Japan's plans for conquest after Pearl Harbo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hussu, D. K. & Freedman, D. (2003). *War and the media.* Sage Publications.

Wyatt, C. R. (1995). Paper soldiers: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Vietnam w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rif, A.（2013）。〈想像上の戦争：文化にとって冷戦とは何か〉，《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14：49-63。

小牧実繁（1938 年 11 月 5 日）。〈地理学に志す人へ〉，《京都帝国大学新聞》，5 版。

_____（1940）。《日本地政学宣言》。弘文堂书房。

_____（1941a）。〈南方政策の確立〉，《日本教育》，1(1)：11-14。

_____（1941b）。〈「大东亜戦争」宣言〉，《周刊朝日》，12 月 28 日号：4-5。

_____（1942a）。《地政学上より見たる大東亜》。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_____（1942b）。〈大東亜必勝の強味―日本地政学より観たる大東亜共栄圏〉，《大陸科学》，1(4)：14- 19。
_____（1944 年 7 月 21 日）。〈いま起たざれば！〉，《毎日新聞》，4 版。
_____（1980）。〈戦前，戦中，戦後〉，《湖国と文化》，12：16-17。
上野貴史（2016）。〈ロマンス語語彙におけるゲルマン語の通時的影響：10 世紀までのロマンス語語彙と古英語〉，《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論集》，76：17-40。
山本弘文編（1986）。《交通・運輸の発達と技術革新―歴史的考察》。东京大学出版会。
山崎直方（1916）。《我が南洋》。広文堂書店。
田中明彦（1997）。《安全保障：戦後 50 年の模索》。読売新闻社。
正井泰夫、竹内启一编（1999）。《続・地理学を学ぶ》。古今书院。
竹内启一（1974）。〈日本におけるゲオポリティクと地理学〉，《一橋論叢》，72(2)：169-191。
竹越与三郎（1905）。《台湾統治志》。博文館。
_____（1910）。《南國記》。二酉社。
安田将三、石桥孝太郎（1999）。《朝日新聞の戦争責任》。太田出版。
吉野诚（2000）。〈明治 6 年の征韓論争〉，《東海大学紀要－文学部》，73：1-18。
西川長夫（2002）。《戦争の世紀を超えて》，平凡社。
村上次男（1999）。〈日本地政学の末路〉，《空間・社会・地理思想》，4：50-56。
佐藤由子（1989）。〈飯本信之が語った地政学〉，《地理》，34(10)：105-107。
佐藤卓己（2022）。〈戦争報道のメディア論〉，《メディア展望》，731：1-11。
室賀信夫（2001）。〈シンガポールの軍事地理的考察〉，《空間・社会・地理思想》，6：98-106。
高坂正堯（1991）。〈冷戦後の新世界秩序と日本の『貢献』」〉，《国際問題》，379：2-16。
島津久賢（1915）。《南洋記》。春陽堂。
柴田陽一（2006）。〈小牧実繁の「日本地政学」とその思想的確立：個人史的側面に注目して〉，《人文地理》，58(1)：1-19。

_____（2014）。〈思想戦と「日本地政学」：小牧実繁のプロパガンダ活動の展開とその社会的影響〉，《人文學報》，105：69-116。
釈悟庵（1908）。《林子平言行录》。内外出版协会。
喜多悦子（2005）。《紛争時、紛争後におけるメンタル・ヘルスの役割》。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协力総合研修所。
朝日新聞社編（1944）。《南方の據點・台湾：写真報道》。朝日新闻社。
稲垣満次郎（1891）。《東方策 第 1 編・第 2 編》。活世界社。
福嶋依子（1991）。〈地理学の方法論的反省と地政学〉，《お茶の水地理》，32：1-8。
藤田博司（2004）。〈戦争報道とメディアの役割：ジャーナリズム論の視点から〉，《国際安全保障》，32(3)：109-130。
藤沢親雄（1925）。〈ルドルフ・チェーレンの国家に関する学説〉，《国際法外交雑誌》，24(2)：49-69。

本文引用格式

李世暉（2023）。〈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論媒體的宣教者角色〉，《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9-28。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2

Li, S. H. (2023).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On the media's role as a missiona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9-28.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2 [Text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9-28, July 2023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On the Media's Role as a Missionary

LI, Shui-Hui*

Professor, Program in Jap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erception of security risks in geopolitics by countries and governments determines whethe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peace or war. In the current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the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ral, the roles of the media in war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ympathizer" under information control, "the rooter" under patriotism, and "the resister" against conflict and w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opolitical thinking of Saneshige Komaki, who was an advocate of Japanese geopolitics from the mid-1930s to the mid-1940s, and discusses it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how it interacted with the media, and the impact it brough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war, the media also plays the role of "the missionary" of geo-risk. The role of the media as a missionary is to promote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geopolitic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eople's worldview and the country's perception of war.

Keywords: Saneshige KOMAKI, Japan, geopolitics, media and war

* E-mail: riseiki@gmail.com
Received: 2023.03.27; Accepted: 2023.05.01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和平或戰爭？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軍事新聞報導框架分析 *

那滴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王泰俐 **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劉好迪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 2020 年 8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臺軍事演習為案例，借徑國際衝突常見的戰爭／和平新聞學及愛國主義框架等理論，從四家主流媒體的消息來源、關鍵詞、描繪形象等面向，探究報導內容分歧，及對臺海衝突議題的態度與立場傾向。量化研究發現，臺灣四家媒體對國際衝突中母國與敵國的好惡表達，及認定臺、美能否阻止中共武力犯臺，報導立場與使用框架皆有顯著差異，而消息來源使用和報導數量則相反。《中國時報》使用和平新聞學，《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傾向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等框架、表達對中共政府的負面情緒，認定中共無法成功犯臺；《聯合報》在各種框架呈現上則較持平。本文也以質性分析闡釋、討論，並在末尾提出探討限制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和平新聞學、軍事新聞、新聞框架、臺海衝突、戰爭新聞學

---

* 本文為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部分內容經大幅修改且增加質性分析資料而寫成。作者群由衷感謝編輯團隊以及審查委員提供本文詳盡的修改意見。

** 通訊作者，E-mail: tailiw@nt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01 月 21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6 月 11 日

壹、問題意識：中國軍演是現在進行式

2022 年 8 月 2 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成為近 25 年美方來訪最高層級（FitzGerald, 2022, August 14）。此事引發中國當局不滿，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稱解放軍）於 8 月 4 日至 7 日在臺海展開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訪臺期間，她發表演說，宣稱要「清楚表達」（unequivocally clear）美國絕不會背棄承諾；同時間中共強硬回覆，稱「美國必將為裴洛西訪臺付出代價」，使臺灣成為中、美兩國衝突加劇的導火線（Tan & Molloy, 2022, August 3）。臺海衝突再度成為影響印、太和平的重要議題，並引發全球關注（Blanchette et al., 2022, August 15）。

事實上，臺灣身處亞太地區交通與戰略位置，加上複雜的政治與歷史背景，使其成為阻擋中國發展為亞太軍事強權的重要力量（林海清，2005），中共因此始終重視對臺統一問題。當今中共經濟、軍事實力皆為世界強權，軍事預算 2020 年已達 2520 億美元（世界第二），佔全球軍事支出的 13%（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1] 形成對臺灣國土的最大威脅。

中共為加強對臺恫嚇，近幾年共機繞臺飛行已漸常態化（薛中鼎，2018 年 6 月 1 日）。美國國防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簡稱 USDOD）（2021）、中國大陸國臺辦旗下媒體《中國臺灣網》（2020 年，12 月 5 日）明確指出，中國大陸武力統一臺灣的可能性持續提高，只要臺灣社會秩序稍有變動，就可能引發臺海戰爭。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 EIU）（2021）就將兩岸衝突列在全球十大風險事件之一，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簡稱 AP）（Rising, 2021, October 14）也指出，臺灣當前局勢如同中、美兩國間的「火藥庫」（powder keg）；若中、美兩國持續無法取得共識，隨時可能觸動戰爭。中共官方背景的軍事雜誌《艦船知識》（美國之音，2021 年 7 月 6 日）也發布文章和影片，描述武力攻臺的具體步驟。

在此情勢下，臺灣民眾對於兩岸可能的軍事衝突以及全球戰略或國際局勢的認知，卻顯得起伏不定，擺盪於「樂觀」和「悲觀」之間。臺灣民意基金會曾進行調查，發現有 74.1% 的受試民眾不同意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臺灣」，僅 15% 民眾同意；但同一基金會於 2021 年 10 月進行調查時，卻剩下

1 本刊編輯註：此機構名稱，中文譯為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簡稱 SIPRI。

64.3% 民眾不同意，同意比例則升至 28.1%，幾乎翻倍（陳煜，2021 年 11 月 2 日）。

由於臺灣在政治上國際處境孤立，經濟和軍事實力又與中國大陸懸殊，因此在兩岸衝突中，臺灣能否得到國際援助與支持也是國安的重要議題，但國人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態度也隨著國際局勢不時擺盪。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曾詢問民眾「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有 65% 民眾同意、28.5% 不同意（陳煜，2021 年 11 月 2 日）；2022 年 3 月民意則呈現 34.5% 同意、55.9% 不同意，一來一往差距約 30%。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指出，相關結果前後迥異，很可能是因 2022 年 2 月俄烏戰爭爆發，烏克蘭方孤軍處境對臺灣民意產生重大影響（陳煜，2022 年 4 月 26 日）。

可見臺灣民眾對於身處環境的安全意識，深受國際局勢影響。學者指出，媒體對於國際局勢的描繪很可能加劇衝突本身 (Arno & Dissanayake, 2019)。隨著兩岸關係越加緊張，研究臺灣新聞媒體以何種方式報導國際局勢與兩岸衝突，也成為重要議題。這也是本文選擇 2020 年 8 月解放軍對臺軍演做為案例，探究臺灣媒體以何種框架呈現兩岸軍事新聞的契機。

貳、文獻探索

一、臺海危機

臺灣自 2016 年政黨輪替以來，中國和民進黨政府在國家主權、國際關係上缺乏共識，加上中、美貿易戰，臺海兩岸關係益發緊張，臺、美國防關係則越加親近。2016 至 2023 年，的美國對臺軍售總額超過 400 億美元，約是陳水扁、馬英九兩任前總統 16 年總和（程嘉文，2023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臺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和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背棄市民承諾、參選總統的背景下，民進黨再度勝選，蔡英文總統甚至拿下史上最高的 817 萬多票。

兩岸關係自此更加緊張，中共外交部、國臺辦等政府單位頻繁公開批評臺灣政府，內容多與主權、意識形態和接受美國軍售有關，而具體的軍演和共機擾臺情形也大增。媒體彙整中華民國國防部資料顯示：2019 年 3 月共機首次進入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有 10 架次，2020 年則增加到 380 架次，2021 年 961 架次、2022 年 1727 架次（中央社，2023 年 1 月 2 日），呈直線上升。

2020 年 8 月 5 日，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 AIT）突然宣布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艾薩（Alex Azar）將訪臺（陳韻聿，2020 年 8 月 5 日），成為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41 年來少見中央層級的訪臺官員。8 月 9 日艾薩抵臺，中國大陸強勢回應。先是在 8 月 11 日出動殲 11、殲 10 戰機飛越海峽中線，（近 20 年內僅有 3 次飛越），緊接著解放軍 8 月 13 日發表聲明，宣布隔天（8 月 14 日）開始至 9 月 1 日約 3 週時間內，將在臺灣海峽南、北段執行海、陸、空及火箭軍的綜合軍事演習。聲明中也批評艾薩訪臺事件損及中國主權和國安：

> 近來個別大國在涉臺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訊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游凱翔，2020 年 8 月 13 日）。

這在當時被視為自 1996 臺灣海峽飛彈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兩岸衝突（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面對緊張的國際情勢，臺灣各家媒體對軍演事件均有大量新聞，但不同媒體之間報導的歧異相當大。以平面報紙四家主流媒體為例，在政治傾向上不同的媒體，相同的新聞事件似乎有截然不同的報導框架與態度。

普遍被認為親民進黨（綠營）的《自由時報》，當時有許多戰爭傾向、持愛國主義立場、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並相信美國軍事上會協防臺灣，以同樣報導中國大陸軍方對臺的動作而言，《自由時報》報導曾稱：「喊攻臺是假象，根本打不了」、「龐皮歐（美國時任國務卿）指美國不會坐視中國犯臺，鄭運鵬：國內親中人士可以閉嘴了！」（自由時報，2020 年 10 月 7 日）。而立場親國民黨（藍營）且向來支持兩岸統一的《中國時報》則在同時有許多和平傾向、不持愛國主義立場、對政府作法持負面態度，不相信美國軍事上會協防臺灣的報導，如「臺海兩年內必開戰？美國學者爆驚人預測」、「臺海開戰美軍不會幫？專家爆：在國會親耳聽到」（李俊毅，2020 年 10 月 6 日）。

媒體引述消息來源並按照自身立場撰寫新聞，會形成特定的報導框架，進而影響民眾對國際與國安局勢的了解。而媒體間對兩岸衝突歧異的報導框架與態度，不但影響民眾感知，也會造成不同媒體閱聽人之間的民意分化。

為了驗證不同媒體對臺海衝突報導的歧異，本研究以 2020 年 8 月這場臺海周遭最重要的中共軍事演習為例，擬分從「消息來源」、「戰爭新聞學框架」、「和平新聞學框架」與「媒體態度」等角度切入研究。

受限於特殊政治環境且臺灣已長年未經戰事，對於臺灣媒體如何報導與自身切身相關的軍事衝突的相關研究，相對匱乏。本研究因此從傳播者（新聞媒體）的報導形式出發，除了分析媒體透過哪些消息來源獲取軍事報導資訊外，也援引國外相關研究經常使用的「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框架」等新聞框架概念，嘗試分析臺灣不同立場的媒體如何以特定新聞框架，引導閱聽人對臺海局勢形成不同的感知與了解。

挪威社會學家 Johan Vincent Galtung[2] 首先提出「和平新聞學」概念，主張媒體使用提倡和平的形式，對戰爭和國際衝突進行報導。他也在之後的研究中陸續發展出「和平新聞學」以及「戰爭新聞學」的相關研究指標（Galtung, 2002）。後續研究者受 Galtung 的啟發，也發展出另一個框架概念，稱為「愛國主義新聞學」框架（patriotic journalism），意指媒體在國際衝突中堅定支持其母國的報導方式（Ginosar, 2015; Kellner, 1992; Rojecki, 1999）。

本研究因此以「戰爭或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新聞學框架」為理論基礎，針對臺灣媒體對兩岸軍事衝突的報導，分別從媒體消息來源、報導框架及對衝突結果的態度等研究角度，進行探究。

二、 框架理論

框架（framing）理論最初被英國人類學家 Gregory Bateson（1904-1980）用以解釋詞彙的多義性；他從心理學研究的角度指出，同一個詞彙含有很多不同的定義與解釋角度，即為不同的框架（Bateson, 1955）。美國社會學者 Erving Goffman（1922-1982）則借用 Bateson 的心理學觀點解釋人類對社會真實的主觀認識。Goffman 指出，社會事件本身是獨立的，相互事件之間並無歸依，人們透過符號轉換，使之成為具有關聯意義的主觀認知。而轉換符號的過程，即是框架（Goffman, 1974）。可見框架是人們把「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關鍵。而在爬梳、整理並吸收訊息的過程中，框架的存在無可避免（臧國仁、鍾蔚文，1997）。

讀者在閱讀與理解新聞報導時，會有屬於自己的框架，而傳播者（媒體）在生產新聞報導時，卻同時受到兩種框架的影響：第一種是了解新聞議題、

2　新左翼的代表性學者，出生於挪威奧斯陸，在挪威與美國任教；1959 年奧斯陸和平研究所（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簡稱 PRIO）的主要創始人，也於 1964 年創辦了《和平研究期刊》，今日通稱的「和平學」（peace research）由此蘊生。

採訪消息來源的過程中，傳播者把「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框架；第二種則是媒體在產製新聞時，將「主觀思想」轉化成新聞文本的框架。這層框架被稱為「新聞內容的中心組織」，意指媒體通過選擇、強調和排除來凸顯某些特殊議題（Tankard et al., 1991）。

美國電視媒體與政治學者 Robert Entman（1949-）稱這個動態過程為框架化（framing），Entman（1993）指出，框架化即選擇和強調現實中的某些特徵，進而從中定義問題（define problems）、解釋原因（diagnose cause）、道德評估（make moral judgment）並建議處理方式（treatment recommendation）。這些訊息會體現在文本中的關鍵詞、描繪形象、消息來源，和文中主題相關的事實評判。

在框架化過程中，「定義問題」先以特定詞彙和概念讓文本指涉的問題限定在一特定範圍內，以利解決；「診斷原因」會分析和解釋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道德評估」以價值觀評判問題所涉及的人們是否符合社會期望；「提出解決方案」則是呈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Entman, 1993），以便閱聽人能理解和記憶（Entman, 2004）。

新聞媒體作為提供社會大眾時事資訊的主要力量，其文本的框架化過程影響著社會主流意見，框架更可能構建閱聽人腦中的圖像（map），讓他們對新聞議題產生特定認知和態度（Gamson, 1992）。例如 Gamson 指出，冷戰[3]期間美國外交新聞對「冷戰」的框架，就凸顯了整個時代背景下的新聞事件；西方主流新聞報導先是定義冷戰作為特定問題，並將全球各國的共產主義叛亂解釋為其原因。在道德上，媒體將共產主義評估為無神論對於西方文明的侵略，並讚揚特定的解決方案，即 1956 年美國通過國會法案將「我們信仰上帝」確立為美國官方格言。

而檢視兩岸關係新聞議題，以前述《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在 2020 年 8 月中共軍演期間的報導為例，兩岸衝突升溫已顯然被主流媒體視為特定問題。透過 Entman（1993）的「框架化」，本文希望進一步剖析這些問題如何被主流媒體討論。在原因解釋上，媒體如何定義問題主因？是中共對臺的武力威懾，還是臺灣政府「抗中親美」的立場？在道德上，媒體傾向認定中

3 冷戰（Cold War, 1946-1991），指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蘇聯這兩個世上綜合國力最強國家之間的國際競爭。從國家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延伸到軍備和經濟、科技實力競賽。由於美蘇雙方都握有大規模殺傷核武，因此從未有過直接軍事衝突。但雙方的盟國間發生過許多規模較小的常規戰爭「熱戰」，如：韓戰、越戰、臺海危機。冷戰在 1980 年代蘇聯陷入經濟和產業結構危機後逐漸式微，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

共武統野心不符道德，還是將臺灣政府的臺獨立場視為應被譴責的「分離主義」？而解決方案的面向上，是臺灣政府應透過政治上親美、增加美國對臺軍售，還是應主動向中共展示友善姿態？

本研究將探討「框架化」過程在兩岸關係議題中，如何引導社會大眾對議題形成的腦中圖像，並分析軍事新聞議題的媒體分歧。

三、 消息來源與框架

前述 Entman（1993）提到，新聞的消息來源與文本中的關鍵詞、描繪形象等元素影響著新聞的框架化過程。而消息來源是新聞素材的主要提供者，媒體對消息來源的選擇對新聞立場與意見具有重大的影響。記者在取捨（報導）材料時，就已經展現出了主觀意志（闕志儒，2011）。

以政治與國際新聞而言，常出現媒體大量引用少數特定消息來源的情況，其中又以官方消息來源（政府官員、國家軍事單位首長）最為關鍵。原因在於官方消息來源掌握了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的資訊，而媒體很難從其他管道獲得這些資訊。Gans（1979）就指出，新聞媒體不能單獨決定新聞價值，重要的是特定消息來源所提供資訊是否有用，需依賴雙方固定而良好的關係。Weaver & Wilhoit（1986）更直言：在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消息來源是伙伴關係，導致記者過度依賴消息來源。Perloff（2014）也發現，即便社會上同時存在著政府、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言論，但主流媒體在最後報導時只會留下並呈現政府和社會菁英的聲音。

此外，新聞工作的性質也導致了媒體過度依賴來源。由於新聞工作屬於「非常規性工作」（non-routine work），新聞工作者每天需面對大量預期之外的狀況（Tunstall, 1971）。為了解決此情況，新聞工作者必須將新聞產製流程常規化（routinized）才能更有效率且穩定的產出新聞（Shoemaker & Reese, 1996）。其中最重要的新聞常規就包括「守線」，意指新聞工作者必須時刻保持（通常是每日）與報導議題相關的官方機構、民間組織等消息來源聯繫。這也導致新聞經常被批評偏重官方及權威的消息來源（臧國仁，1998）。

Peake（2001）研究指出，美國政府官員一直以來都會利用身為新聞來源的角色，藉由媒體報導來宣傳自身外交政策。而 Gans（1979）更直接將新聞從業人員與固定消息來源間的關係形容為共舞，意指雙方只是在舞臺上一起向閱聽人演一齣戲。

在與消息來源「共舞」的關係，新聞工作者很難獲取並揭露對這些官方消息來源不利的新聞資訊，Entman（2004）就批評媒體在與官方消息來源的互動中「過於屈從於政府」。他也指出，從記者在報導中所選擇的消息來源、所描述的社會秩序和情境，就可反映出新聞中的社會權力。

消息來源對新聞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政治與國際新聞中的官方消息來源更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消息來源的數量及消息來源屬性也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之一。

四、 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與框架

戰爭／和平新聞學報導方式是學者 Galtung 提出一套分類媒體如何報導國際衝突的報導框架，媒體可能傾向用鼓吹國際衝突的方式報導（戰爭新聞學）或傾向訴求和平（和平新聞學）。而觀察媒體是否有這些報導傾向，可以透過分析媒體強調國際衝突的哪些面向、對戰爭的反應、是否以菁英消息來源為主（Galtung, 1986）。本文作者認為以上概念可呼應 Entman（1993）在框架化過程提到的「消息來源、關鍵詞、描繪形象」等元素，也認為戰爭新聞學的這些框架分析面向，足以推動新聞框架化的過程。

在新聞報導中，衝突元素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也是新聞框架的重要元素。Shoemaker et al.（1991）就指出，用以辨識一事件是否值得報導的「新聞價值」（news value）本身最重要的元素，就包含衝突、聳動、異常和重要。

de Vreese et al.（2001）也很重視衝突元素在新聞框架中扮演的角色。他們指出，幾乎所有新聞都無法脫離一些新聞常見基本元素，如：「衝突框架」（conflict frames）、「人情趣味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s）、「道德框架」（morality frames），以衝突框架最常見。

「衝突框架」能用以反映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各類型衝突和分歧（Neuman et al., 1992），而 de Vreese et al.（2001）更指出，衝突框架本身就在強調「個人、團體、機構或國家之間的衝突」，且被普遍使用。而越是嚴肅的媒體，衝突框架在報導中出現越頻繁。

Putnam & Shoemaker（2007）則說明，衝突框架會引起人們關注對立、緊張、分歧和不相容的情緒。Schwalbe et al.（2008）研究 2003 年美伊戰爭的美國新聞報導，發現媒體先後分別使用過衝突框架、支持美軍的愛國主義框架（Patriot Frame），到戰爭後期才慢慢轉向人情趣味框架，以展現美軍

部隊和當地平民的友好互動。而 Evans（2010）分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對以色列軍隊在 2002、2007 年兩次中東軍事行動的報導，發現多數報導都使用衝突框架，軍事衝突事件不但最有新聞價值，也最吸引政治決策者和媒體的關注。Fawcett（2002）研究愛爾蘭媒體對於國際衝突的報導也發現，媒體認為衝突框架遠比提倡和平解決國際衝突的調解框架（Conciliation Frames）更具吸引力。

對於上述衝突與調解兩種戰爭或軍事新聞框架，挪威社會學者 Galtung 於 1970 年代首先提出了「戰爭新聞學」（War Journalism）與「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兩種新聞報導方式，分別鼓吹加劇國際衝突與倡議和平解決國際緊張（Galtung, 2002; Lynch, 2006）。

正如衝突框架受到新聞媒體廣泛使用，戰爭新聞學也是媒體報導衝突新聞時，傳統上採用的主要方式（Aslam, 2011）。Galtung（1998）指出，傳統的新聞媒體普遍存在一種價值觀：戰爭發生當下是國家、民族的存亡之際，公平與對錯並不重要。因此面對涉及母國的國際衝突，媒體在報導角度上，會追求對「己方」政府的支持，並且較關注屬於「我們」陣營這一方的事務。

Lynch & Mcgoldrick（2005）認為，戰爭新聞學的報導方式隱含著暴力取向，不但讓國際間「暴力循環」形成的結構性因素失焦，更會阻止衝突中各國政府為了避免暴力發生而做出努力。Galtung（1998）為此十分重視和平新聞學，並主張和平新聞學是這時代更重要的報導方式，媒體應如實報導戰爭與和平情況，並促成戰爭過程公開透明。

按照 Galtung 最初的分類，分辨一則新聞報導的主要敘事方式更偏向戰爭新聞學還是和平新聞學，涉及到十三個指標。其中包括十個報導方法指標和三個報導語言指標。透過內容分析法，研究者能以上述指標在一新聞報導文本中含有的數量分佈，判斷報導較傾向戰爭新聞學，還是和平新聞學。

這十個報導方法的指標包括有：（1）對戰爭的反應（reactivity）；（2）戰爭影響能見度高（visible effects of war）／戰爭影響能見度低（invisible effects of war）；（3）菁英導向（elite orientation）／人民導向（people orientation）；（4）強調（敵我）差異（differences）／強調解決爭端（solution）；（5）關注衝突當下現場（focus on here and now）／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causes and consequences）；（6）好壞二分法（good, bad dichotomy）／避免好壞標籤化（avoid labeling of good, bad）；（7）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party involvement）／不站在特定一方立場（non-party involvement）；（8）

偏袒（戰爭中）一方（partisanship）／無偏袒傾向（non-partisan）；（9）視戰爭為零和博弈（zero-sum）／視戰爭存在雙贏可能（win-win）；（10）報導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reports）。而三個與報導語言相關的指標則包括（1）報導是否使用妖魔化的語言（demonizing）、（2）是否使用受害的語言（victimizing）；（3）是否使用情緒化的語言（emotive）（Galtung, 1986）。

自 1990 年代至 21 世紀以來，和平新聞在概念和專業性上不斷成長、變化（Becker, 1982; Hackett et al, 2000）。許多後來的學者都對原先的架構進行了批評，例如：指標太過於二分法 （Hanitzsch, 2007）、缺乏經驗基礎研究支持模型有效性（Peleg, 2007）。Lee & Maslog（2005）改良上述指標，讓許多項目都有了更具體的描述，例如將「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不站特定一方立場」，改為「偏好衝突中的一、二方（framing preferences for one or two parties）／多方框架偏好（multi-party framing preference）」。Kempf（2002）也發展了一套分析衝突事件報導的框架，共包含七個面向，例如報導將衝突概念化與否、報導對戰爭各方權利和意圖的評估、報導是否在衝突中加入情感元素等。

本文認為，以上學者陸續提出的戰爭／和平新聞學更迭的框架內容分析指標，如能與 Entman 的「框架化」理論結合，將能更完整地建構研究軍事新聞報導的新聞框架。

Entman 在框架化過程中的「定義問題」涉及到媒體對戰爭的反應、認定戰爭影響能見度高低，也涉及媒體是否將衝突概念化。而媒體定義問題的嚴重程度、如何定義問題，又分別與媒體的新聞報導數量、如何使用消息來源（菁英或人民導向）高度相關。其中菁英消息來源包含了一國政府官員、軍事組織、專家學者等官方或明顯具權威的機構與個人（Galtung, 1986）。

「原因解釋」與報導是否較關注衝突當下現場（或較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有關，也關乎報導對戰爭各方權利和意圖的評估。而「道德評估」與報導是否好壞二分法、偏袒或站在戰爭中任一方立場有關。「提供解決方案」與報導強調（敵我）差異或強調解決爭端有關，也決定媒體是否會視戰爭為零和博弈（或存在雙贏可能）。而透過框架化中的要素如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消息來源，除了能判斷報導中是否使用妖魔化、受害、情緒化的語言（或是在衝突報導中加入情感元素），也進一步確認報導中的「道德評估」。

許多國際衝突與戰爭的相關研究都採用上述幾種軍事報導常用的框架與報導取向；眾多研究則普遍指出，戰爭新聞學框架更常被主流媒體用於報導

國際新聞，也對大眾更具吸引力（Forgette & Morris, 2006; Garrison, 1991）。

例如 Hussain & Siraji（2018）就發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的媒體都傾向於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報導當地內戰衝突；Lee & Maslog（2005）比較八家亞洲媒體對世界各地衝突的報導，發現它們多數對亞洲地區的衝突事件（例如中印克什米爾領土爭議、斯里蘭卡獨立運動、印尼亞齊省內戰）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Chungs et al.（2014）則觀察北韓核彈試驗造成國際關係緊張的新聞報導，發現美國媒體更傾向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馬來西亞學者 Fong & Koon（2019）則研究馬國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星報》（The Star）對南海爭端的報導，發現報導以戰爭新聞框架為主，但報導對中國的喜好則持中性態度。

總結而言，以衝突元素為核心的戰爭新聞學框架是主流新聞媒體報導國際衝突時的主要框架。而當新聞媒體母國參與國際衝突時，媒體勢必也難置身事外，由戰爭、和平新聞學相關理論衍伸出所謂的「愛國主義框架」。

五、 愛國主義框架

愛國主義（patriotism）源於拉丁語中「祖國」（patria）一詞（Flowerdew & Leong, 2007）。愛國主義屬於人類的基本情感之一，因它講述了一個將不同人們聯繫在一起的故事（Sennett, 2003）。而人們也傾向於認為培育自己且感到熟悉的人、地方與制度是對的（Schaar, 1981）。

基於以上理由，許多學者認為主流媒體使用愛國主義也相當司空見慣。（Kellner, 1992; Rojecki, 1999）指出，媒體在報導國際衝突時容易持有國內主流觀點並配合政府的說法，採取愛國主義立場。Ginosar（2015）直言愛國主義新聞是現代民主國家菁英、主流媒體在本國面臨軍事衝突、恐怖主義或國家安全受威脅時，廣泛採取的報導手法。

國家與民族間的衝突，往往會導致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上揚（Moshe, 2004）。而國家面臨危機時，媒體也常因害怕自己看起來不愛國（Graber, 2003）而不敢表達異議，甚至不敢報導非主流意見（Brody, 1991）。

愛國主義常體現在強調媒體母國強大與正當性中。例如 Schwalbe et al.（2008）指出，美國新聞媒體在構建伊拉克戰爭時，會優先考慮美國觀點（而非伊拉克觀點），並強調勝利、自由等主題和美國的英雄主義，而不是討論戰爭帶來的損失、失敗和破壞；Reynolds & Barnett（2003）也指出，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社會菁英等消息來源為了替美國受襲擊後的軍事反擊和國家團結提供正當性理由，於是發布各種類似於「美國受到攻擊」的頭條新聞，建立了一套對國內形成愛國共識的框架。

上述情況也都是媒體過度引用官方消息來源的結果。衛報記者 Katharine Viner（2016, July 12）就曾表示，多數的媒體報導，經常會表現出對現狀的偏見和對權威的尊重。Decillia（2018）也指出，媒體就是過於倚賴菁英消息來源，導致記者想要挑戰國家官方對於軍事行動正當性的種種說法時，顯得非常無力。他研究新聞媒體報導加拿大軍隊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發現媒體封面、標題上都優先呈獻政府、軍方消息。即便有些記者會對軍方的說法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但因官方訊息太過碎片化，導致報導無法對官方說法提出有力的質疑。

這些觀點與前述官方消息來源對國際政治新聞擁有極高影響力的說法一致。Nossek（2004）指出，愛國主義和新聞專業價值觀並不相容，原因是和官方接觸的新聞工作者，在報導國家利益方面，常使用官方給定的消息內容。

這種含有愛國主義的新聞報導有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例如 Baker & Oneal（2001）認為，只要夠高比例的媒體和政治團體有共同的愛國主義言論，不論正確與否，仍會直接導致大多數的民眾支持相關政治議題。而 911 事件後，哈佛大學學者 Alex Jones 也曾警告媒體與社會，國內出現大量情緒化、社論式且支持美國方的報導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若不對新聞內容保持警惕和批判，將喪失媒體對新聞工作標準的忠誠（Rutenberg & Carter, 2001）。

媒體的愛國主義，也體現在對外（或敵國）的排斥。Schudson（2003）研究發現，持愛國觀點的記者，會將愛國主義的新聞框架強加於事實之上，並公開將「自己」描繪成全國公民的「我們」以增加民族歸屬感；Thetela（2001）也發現，國家或民族間的衝突，媒體常作為重要推手，使議題被社會價值與準則「個人化」，進而引發政治極化。民眾會對不同意己方國家利益者出現「我者」與「他者」的認同或排斥。

愛國主義框架中另一個常見的元素是排斥敵對國家。例如將特定國家的政府或軍隊「妖魔化」（demonizing）。Dutta-Bergman（2006）指出美國主流媒體在 2003 年美伊戰爭中，充當「美國政府的公關代理人」，透過對伊拉克政府的醜化與負面評論，達到為美國入侵辯護的目的。Anderson（2015, October 7）也分析，2011 年爆發敘利亞內戰時，美國主流媒體使用大量的修辭排斥並醜化敘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Brewer 則發現，

美國媒體經常順應美國政府的論述框架，將與美國外交政策不一致的外國領導人，例如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 1941-2006）、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 1937-2006），在報導中描繪成邪惡的存在（Brewer, 2006; Nelson et al., 1997）。

透過本節內容可以發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程度，與消息來源是否為政府與菁英關係匪淺。而愛國主義框架體現的方式包括媒體展示母國「己方」的強大、媒體闡述母國對軍事行動擁有的正當性、在報導中試圖分化出「我者」與「他者」間的差距，以及展現出對「敵國」的排斥態度。本研究將參考以上文獻的愛國主義元素，並將之納入本研究，與媒體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的情形一併進行分析與判斷。

而綜合愛國主義框架的上述觀點，本文作者也將其體現在兩岸衝突的報導面向並歸納成以下幾個面向，而這些面向也能呼應 Entman 的框架化過程。

在「定義問題」方面，媒體在愛國主義的框架下，會試圖指出兩岸衝突來自某國政府，而受到愛國主義框架影響，媒體試圖定義問題根源來自何者（某人、某國政府），也就如同 Schudson（2003）所提到的「我者」與「他者」、Thetela（2001）的「認同或排斥」。

同時，在「原因解釋」方面，受愛國主義影響，媒體會將某國在政治上姿態的不友好作為造成兩岸危機的主要原因，並傾向援引接近特定國家政府官方說法的。這與 Kellner（1992）、Rojecki（1999）等學者提到是否以「我國為中心」的報導方向有關。

在「道德評估」方面，不同媒體會分別傾向於指責中共當局、臺灣政府在面對兩岸軍事衝突時解決方式不恰當，這對應到 Dutta-Bergman（2006）等學者所言：是否在在衝突中強調己方政府的正當性。

而媒體對於「解決方案」出現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是否應該以對立（或友善）的姿態面對中共軍事演習。Brewer（2006）所提到醜化、排斥與我國對立的軍事政治實體相關。

綜合本節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一）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媒體報導類型、消息來源使用上是否出現差異，以及各媒體依賴官方消息來源的狀況。

（二）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媒體使用戰爭或和平新聞學框架的傾向，並探究各媒體在框架使用上

的差異以及其意義。

（三）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是否出現愛國主義框架，並探究各媒體在此框架的使用上的差異以及其意義。

（四）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的態度，包括是否展露對國際衝突中各方政府、軍事力量好惡，以及是否推斷衝突可能導致的戰爭結果。

參、研究方法

為了能具體且明確分析報導內容，本研究選擇使用內容分析法，以量化類目分析出新聞報導中的關鍵字、消息來源、形象描繪等差異。研究樣本為臺灣平面媒體中具代表性的四個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在 2020 年 8 月至 9 月中共軍演期間，對於兩岸軍事議題的相關報導。新聞文本來自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的「臺灣新聞智慧網」，以及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中的紙本報紙。

本研究蒐集了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 日中共軍演期間，臺灣四大平面新聞媒體對兩岸所有軍事新聞的相關報導。除了搜集中共軍事演習的報導，只要報導中涉及軍事，例如美國對臺軍售、兩岸衝突兵推、各國智庫或政界軍界人物分析或評論兩岸軍事情況的報導，都涵蓋其中。

而為了深入了解各家媒體的框架使用與立場，研究樣本也包括了報紙中的新聞分析稿件、社論與專欄部分，分析單位則使用新聞稿則數。所有註明獨立標題與作者的新聞文本，計為「一則」新聞。

研究資料類目包括三部份：（一）報導基本資料類目；（二）消息來源類目；（三）媒體框架與態度類目。

這三個類目分別對應框架化理論的不同部分。如前述 Entman（1993）所指，消息來源引用、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文中主題相關的事實評判顯示出媒體不同的框架化過程。本研究報導的基本資料類目先呈現出媒體用了多少篇幅以及何種報導形式對兩岸衝突報導；消息來源類目呈現媒體在報導兩岸衝突時，使用了哪些類別、哪些國家別的消息來源；而媒體框架與態度類目，則是包含了報導中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所形成的新聞框架和媒體立場。

（一）報導基本資料的類目包括報導媒體、報導數量與報導形式。本研究將報導形式分為四類：純淨報導、新聞分析、專欄以及社論。純淨報導指直接報導客觀事實的新聞文本，屬於最傳統的新聞文體；新聞分析是媒體對於特定新聞事件的分析，結合了媒體與作者的新聞調查、解釋能力；專欄指媒體分配給特定專家或作者的報導欄位；社論是媒體讓各方讀者對報紙投稿進行評論與觀點陳述的欄位。專欄與社論的內容都會比新聞分析更具有主觀性，也能觀察出報社的立場。

而（二）消息來源類目則包括消息來源類別和消息來源國籍。本研究將消息來源類別分為五大類，分別是官方消息來源、領域專家消息來源、媒體與網路媒體機構、民間消息來源和其他消息來源。消息來源國家別則按照消息來源國籍或其代表組織單位的國籍進行分類。「無法歸類的消息來源」則是完全匿名、也沒有標示出國家別的消息來源。

至於（三）媒體框架和態度類目則包括報導中出現的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框架傾向、愛國主義框架傾向，和媒體態度。以下是筆者根據文獻檢閱內容，所整理出的媒體框架和態度類目指標：

本研究參考 Galtung（1986）、Lee & Maslog（2005）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框架的內容分析指標，提出以下十個指標，用以分析臺灣四家主流媒體 2020 年 8 月中國大陸軍事演習的相關報導：

（一）消息來源菁英導向／消息來源人民導向。
（二）強調（敵我）差異／強調解決爭端。
（三）關注衝突當下現場／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
（四）好壞二分法／避免好壞標籤化。
（五）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不站在特定一方立場。
（六）偏袒（戰爭中）一方／無偏袒傾向。
（七）視戰爭為零和博弈／視戰爭存在雙贏可能。
（八）報導是否使用妖魔化語言。
（九）報導是否使用受害者語言。
（十）報導是否使用情緒化語言。

本研究另參考 Reynolds & Barnett （2003）和 Schudson（2003）等人的研究，提出四個研究指標，用以判斷報導中愛國主義框架是否顯著：

（一）較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較強調共軍的強盛。
（二）強調國軍正當性／並未強調國軍正當性。

（三）在報導中使用「我」們／未在報導中使用「我」們。
（四）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並未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

最後，本研究參考前述對於新聞報導態度的相關文獻，提出下列兩個究指標，以判斷報導中涉及衝突各方的主觀好惡程度：

（一）認定共軍對臺構成威脅／認定共軍對臺不構成威脅。
（二）對中共持負面、質疑態度／對臺、美持負面、質疑態度。

除以上述指標進行量化的內容分析外，本文也在樣本中挑選出具代表性的案例數則，進行框架的質性分析，以深入探討軍事報導框架在新聞文本脈絡中如何運作。

同時，本研究訪問兩位臺灣新聞媒體中負責報導國際政治、軍事新聞的記者（記者 A、記者 B），以驗證研究中對框架的假設和推論是否符合實務現況。兩位記者的背景資料（表 1）和訪問問題（表 2）如下：

表 1：受訪者背景資料

	媒體產業	負責新聞業務	從業經驗
記者 A	電視新聞媒體	國際政治、軍事外交、播報口譯	約 3 年
記者 B	電視新聞媒體	國際政治、軍事外交	約 4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的訪問問題如表 2，問題內容主要立基於兩個基礎。一是 Entman（1993）對框架的詮釋「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是否足以解釋新聞媒體處理新聞議題的工作流程；二是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幾個研究問題與相關結果進行提問，包括：報導方式、消息來源、戰爭／和平新聞學、愛國主義和媒體在報導中顯現出的立場。

表 2：訪問問題列表

訪問問題一	你認為平面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導形式（純淨報導、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等）差異，會如何影響媒體對兩岸衝突議題的新聞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二	你認為框架化理論中的「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是否可以解釋媒體兩岸衝突報導中的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三	你認為媒體對消息來源的使用，如何影響兩岸衝突新聞報導中出現的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四	你在新聞工作中，是否感受到戰爭（衝突）、愛國主義等元素，和媒體立場有強烈關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研究結果

一、四報報導數量、消息來源、框架數量的統計

研究信度檢驗方面，本研究邀請新聞業界的外電編譯一位，作為編碼員。研究者與編碼員對隨機抽樣的 20 則研究文本（占總樣本數 404 則約 5%）進行內容分析前測。根據 Krippendorff Alpha 檢定結果的 Kalpha 值，若研究類目 Kalpha 值高於 0.67 則認為可信性適當，得以作為初步研究結果（Beckler, et al., 2018; Carletta, 1996），研究者會將該類目予以保留；未達此值的類目則代表其代表性不足，予以修改或刪除。

前測結果顯示，包括戰爭／和平新聞學框架（五個指標，包括菁英或人民消息來源、強調敵我差異或解決爭端、關顧衝突現場或衝突原因、好壞二分法或避免標籤化、以及零和博弈或雙贏）、愛國主義框架（四個指標）、媒體對中共是否持負面態度（一個指標）以及媒體是否認定美軍會協防臺灣（一個指標），上述十一個指標的 Kalpha 值均高於 .67，其中八項 Kalpha 高於 .80。而所有項目的相互同意度都在 0.85 以上，信度也都在 0.93 以上。整體相互同意度達到 0.89，信度達 0.95，研究者認為符合研究信度要求，因此採用以上分析類目進行內容分析。

作者得出所有統計結果後，除以文獻檢視各表格的結果之外，為了加強此研究與新聞實務界的連結，也訪問業界國際、軍事新聞記者，解讀部分表格數字的意義。

第一個研究問題探究中國軍演報導的類型和消息來源的差異。首先概述報導篇數。軍演新聞報導共計 404 篇。其中《中國時報》以 145 篇（佔 35.9%）最多，數量最少是《聯合報》，僅有 75 篇報導（佔 18.6%）（表 3）。

表 3：各報報導篇數統計

報別	報導則數	所佔百分比（%）
聯合報	75	18.6
中國時報	145	35.9
蘋果日報	86	21.3
自由時報	98	24.2
總數	404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3 報導則數可以直觀地反應出新聞媒體對中國軍演新聞事件的重視報導，也直接反映出新聞媒體試圖「定義問題」。報導數量和篇幅都可以定義並呈現出媒體所關注的問題，並預示閱聽人「哪些問題重要」，因此從報導數量可看出媒體定義問題的輕重。本研究新聞文本收集的時間僅兩周，各報的報導總數突破 400 則，這顯示出兩岸衝突新聞被主流媒體定義為非常重要的新聞。

在報導類型方面，各報的報導形式與分佈比例顯示，中共軍演多數為純淨新聞報導，共有 245 篇，佔總數的 60.6%；其次是社論 88 篇，佔 21.8%；專欄共 43 篇佔 10.6%；而數量最少的是新聞分析，共有 29 篇，佔 7.1%。《聯合報》的社論總數最少（75 篇），而純淨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73.3%（55 篇）；純淨報導比例最低的是《自由時報》，共佔 53%（52 篇）。新聞分析是各報都較少見的報導形式，佔比 6.9%（28 篇）。《聯合報》的新聞分析比例最高，佔 10.7%（8 篇），其次為《中國時報》7.6%（11 篇）、《自由時報》7.2%（7 篇），《蘋果日報》則佔比最少 2.3%（2 篇）。專欄比例最高的是《蘋果日報》，佔 16.3%（14 篇），最低為《自由時報》2%（2 篇）。社論最多的是《自由時報》佔 37.8%（37 篇），《聯合報》5 篇最少，僅 6.7%（表 4）。

即便多數媒體報導都以純淨新聞為主，但各家媒體的報導數量仍有差異：《聯合報》高比例的純淨新聞報導比例，加上其較低的報導則數，顯示其在問題定義上未將兩岸衝突定義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反觀報導數量最多的《中國時報》使用了大量的新聞分析、專欄、社論（共 43.5%）報導新聞議題，可見其不但將兩岸衝突看作重要的議題，其定義問題的主觀性也強，報導數量第二多的《自由時報》也有明顯相似的傾向。

表 4：各報報導類型統計

報別	純淨報導	新聞分析	專欄	社論	各家媒體加總
聯合報	55（73.3%）	8（10.7%）	7（9.3%）	5（6.7%）	75（100.0%）
中國時報	82（56.5%）	11（7.6%）	20（13.9%）	32（22.0%）	145（100.0%）
蘋果日報	56（65.1%）	2（2.3%）	14（16.3%）	14（16.3%）	86（100.0%）
自由時報	52（53.0%）	7（7.2%）	2（2.0%）	37（37.8%）	98（100.0%）
總數	245（60.6%）	28（6.9%）	43（10.6%）	88（21.8%）	404（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4]

4 本刊編輯註：依本刊體例，小數點數字採四捨五入；本篇各表（包括從表 4 起至表 10）數值為研究者提供，總數略有出入，不一定完全吻合 100%，特此說明。

表 4 的各報報導類型，訪談主跑軍事的記者 A。A 表示，不同報導類型關乎媒體如何討論其所報導的議題，而越是想要「帶風向」或影響意見輿論市場的報導就會使用越多的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

> 換成是電視或多媒體新聞也一樣！只是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會被改成新聞在螢幕上的敘事邏輯，和一些新聞評論、政論節目（記者 A）。

而另一家媒體的軍事記者 B 則指出，專欄和社論都是媒體採納較符合報社立場、較激進的特定人士言論所形成的版面，因此使用這些報導比例越高代表媒體的主觀性越強。他還指出，即便媒體使用純淨報導，仍可發揮上述定義問題等作用，只是力道較輕微，但仍可透過報導中只呈現「部分真實」的內容達到相同的目的。

在消息來源類型方面（表 5），各家媒體的消息來源都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經卡方檢定，不同媒體與消息來源類別的使用沒有顯著的相關性（χ^2 = 20, df = 16, p > .05），顯示四個媒體均高度仰賴官方消息來源，佔消息來源總數的 53.5%。其中以《聯合報》最重視官方消息來源，佔其消息來源總數的 62%（145 位）；《蘋果日報》最少，49.1%（130 位）。

表 5：各報消息來源類型統計

報別	官方消息來源	領域專家消息來源	媒體與網路媒體機構	民間消息來源	不可辨識或其他
聯合報	145（62.0%）	43（18.4%）	33（14.1%）	7（3.0%）	6（2.6%）
中國時報	229（51.7%）	106（23.9%）	70（15.8%）	27（6.1%）	11（2.5%）
蘋果日報	130（49.1%）	73（27.5%）	48（18.1%）	10（3.8%）	4（1.5%）
自由時報	140（53.4%）	89（34.0%）	23（8.8%）	6（2.3%）	4（1.5%）
總數	644（53.5%）	311（25.9%）	174（14.5%）	50（4.2%）	25（2.1%）

X^2= 20, df = 1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領域專家消息來源佔所有消息來源 25.9%（311 位），是第二多的消息來源。《自由時報》34%（89 位）佔比最多，《聯合報》18.4% 佔比最少（43 位）。

媒體與網路媒體機構佔全部消息來源的 14.5%（174 位）。《蘋果日報》18.1%（48 位）比例最高，《自由時報》8.8%（23 位）最低。

民間消息來源佔全部消息來源 4.2%（25 位），是可辨識消息來源中最少的。《中國時報》6.1%（27 位）最多，《自由時報》2.3%（6 位）最少。

不可辨識或其他消息來源佔 2.1%（25 位），在各家媒體的佔比都最少，最多的是《聯合報》2.6%（6 位）。對消息來源使用的分析，將會在下方（表 6）一併討論。

以消息來源國家別而言（表 6），來自臺灣的消息來源佔最多，約達所有消息來源的一半，經卡方檢定，媒體別與消息來源國家別之間的關聯性並不顯著（$\chi^2 = 12, df = 9, p > .05$）。臺灣消息來源佔 50.5%（608 個）；其次中國和美國的消息來源數量，都佔總數的 22.6%（272 個）；其他消息來源國家則佔 3.5%（42 個），主要來自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無法歸類消息來源僅佔 0.8%（10 個）。

臺灣消息來源的使用中，以《自由時報》57.3%（150 個）佔比最高，《中國時報》最少 48.1%（213 個）；中國消息來源中，以中國時報 26.2%（116 個）最高，《自由時報》16%（42 個）最少；而美國消息來源在《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都佔 22.9%（64 個）最多，《聯合報》21.4%（50 個）最少。

媒體使用的消息來源是媒體在框架化過程中定義問題、原因解釋的重要依據。不同身份別、國家別的消息來源，會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定義問題，尤其是在原因解釋上，將形成問題的根源指向消息來源母國的敵對國家。

表 6：各報消息來源國家別統計

報別	臺灣	中國大陸	美國	其他或無法歸類
聯合報	116（49.6%）	55（23.5%）	50（21.3%）	13（5.6%）
中國時報	213（48.1%）	116（26.2%）	98（22.1%）	16（3.6%）
蘋果日報	129（48.7%）	59（22.3%）	64（22.9%）	13（5.0%）
自由時報	150（57.3%）	42（16.0%）	60（22.9%）	10(3.8%)
總數	608（50.5%）	272（22.6%）	272（22.6%）	52（4.3%）

$\chi^2 = 12, df = 9,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針對表 5、6（消息來源類型與消息來源國及別），記者 A 進一步解讀，媒體報導時展現出對議題的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都會與消息來源觀點高度一致。因此，媒體站在「哪一類人」（消息來源類型）和「衝突中哪一國」（消息來源國及別）角度看問題，與報導會呈現出的框

架、立場偏差至關重要。

> 有時候國際衝突可引用的消息來源寥寥無幾，通常本就都是官方機構才可能有第一手資料，因此消息來源在類型和國家別上，各媒體確實可能差異不至於太大（記者 A）。

這可呼應本研究中各媒體間的消息來源差異，也確實都呈現不顯著的差異。

至於記者 B 則指出，自己經驗中記者撰寫的內容八成以上都來自消息來源，尤其是純淨報導更幾乎通篇都是消息來源陳述的內容。因此使用哪些類型、國家別消息來源對於媒體報導的角度有決定性的影響。

> 消息來源本身就能用自己的傳播技巧，向記者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以及解決方案。即便記者試圖僅部分採納其言論，但手上握有的報導材料也有限，在截稿時間等外界壓力下，必然還是會妥協（記者 B）。

第二個研究問題則分析四個媒體的戰爭或和平報導框架差異。經卡方檢定，媒體別與戰爭新聞學 / 和平新聞學的使用關聯性達顯著水準（χ^2 = 99.877, df = 3, p < .05），各媒體使用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的框架有顯著差異。在 404 則有效樣本中，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報導佔 66.3%（268 篇），和平新聞學則佔 33.7%（136 篇）。《聯合報》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達 65.3%（49 篇），和平新聞學則有 34.7%（26 篇）。而《中國時報》的戰爭新聞學框架有 37.2%（54 篇），和平新聞學框架則高達 62.8%（91 篇），是四報中唯一使用和平新聞學框架多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媒體。《蘋果日報》採用戰爭新聞學框架 89.5%（77 篇）、和平新聞學 10.2%（9 篇）；《自由時報》戰爭新聞學框架 89.8%（88 篇）、和平新聞學框架 10.2%（10 篇），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傾向在各報中最為明顯（表 7）。

表 7 中呈現的戰爭新聞學 / 和平新聞學框架，可謂與戰爭新聞學指標與 Entman（1993）的框架化理論元素高度符合。兩相對照下：這些指標包含了新聞中的關鍵詞（是否強調敵我差異、受害者語言、情緒化語言）、消息來源（消息來源菁英或平民導向）、描繪形象（是否好壞二分法、妖魔化語言）、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是否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和博弈）等，也可見戰爭新聞學的指標足以判定框架化過程如何在國際衝突中運作，而兩岸軍事新聞最主要的元素確實就是『衝突』。

表 7：各報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框架

報別	戰爭新聞學	和平新聞學
聯合報	49（65.3%）	26（34.7%）
中國時報	54（37.2%）	91（62.8%）
蘋果日報	77（89.5%）	9（10.5%）
自由時報	88（89.8%）	10（10.2%）
總數	268（66.3%）	136（33.7%）

$\chi^2 = 99.877$, $df = 3$,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 我們常要搜尋衝突兩方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的立場上鮮明對立的說法，這樣的火藥味會讓新聞變得簡單明瞭，也才會吸睛（記者 B）。

戰爭新聞學的指標確實足以對應到框架化過程中涉及的元素，而很多框架指標正可以從報導中的關鍵字尋找並定義。例如《自由時報》報導〈共軍才嗆臺海軍演　美艦現東沙〉（涂鉅旻、呂伊萱，2020 年 8 月 17 日）中，強調中國與臺灣間的敵我差異、好壞二分法、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和博弈等元素，都體現在其對中方的描述和用字如「共軍『嗆』臺海軍演」、「利用民主體制打擊民主」等。而文中試圖展現臺灣和美國友好的文字「臺美關係升溫之際」、「白宮推文『挺臺』」、「臺灣在美國與冠狀病毒對抗之際，給予『慷慨支持與合作』」等關鍵字與描繪形象，也同樣在加深這些衝突與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國內外調查報告（黃紀，2021；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22）均顯示與臺灣其他媒體相較，《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傾藍的政治立場。而表 7 呈現出《中國時報》有超過六成（62.8%）的報導傾向以和平新聞學的框架報導臺海軍事衝突，顯現出中時在臺海衝突報導中強調菁英消息來源、解決兩岸爭端、避免報導衝突現場、避免好壞的標籤化、以及強調雙贏等。而《聯合報》在臺海衝突報導中則超過六成（65.3%）傾向以戰爭新聞學的框架報導臺海戰爭，與過去的調查顯示出的既定印象有所不同。

第三個研究問題分析各媒體的愛國主義框架。404 個有效樣本中，愛國主義框架明顯的報導佔 56.7%（229 篇），而不明顯則佔 43.3%（175 篇）。卡

方檢定結果顯示，各媒體採用愛國主義框架報導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各報在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上差異很大（$\chi^2 = 138.935, df = 3, p < .05$）（表 8）。

《聯合報》有 44%（33 篇）的報導明顯使用愛國主義框架，56%（42 篇）則不明顯，是兩種框架傾向較為接近的媒體。《中國時報》愛國主義框架明顯者佔 23.4%（34 篇）、不明顯則高達 76.6%（111 篇），整體而言可謂高度傾向不採用愛國主義框架進行報導。而《蘋果日報》明顯者佔 87.2%（75 篇）、不明顯 12.8%（11 篇）；《自由時報》明顯者則達 88.8%（87 篇）顯著、不顯著 11.2%（11 篇），這顯示出《自由時報》是中共軍演新聞報導中，戰爭新聞學和愛國主義框架都是最顯著的媒體。關鍵詞、描繪形象、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構成了研究中對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框架的類目。

表 8：各報愛國主義框架差異

報別	愛國主義框架明顯	不明顯
聯合報	33（44.0%）	42（56.0%）
中國時報	34（23.4%）	111（76.6%）
蘋果日報	75（87.2%）	11（12.8%）
自由時報	87（88.8%）	11（11.2%）
總數	229（56.7%）	175（43.3%）

$\chi^2 = 138.935, df = 3,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8 所呈現的愛國主義框架，可謂與戰爭新聞學的指標高度相關，例如對媒體母國敵對勢力的「不正當」觀點可對應到戰爭新聞學中的「妖魔化」。這些指標在框架化過程中對於「敵我」間的描繪形象、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有明顯的著墨，藉以深化媒體各自的主觀立場。

記者 B 進一步指出，以軍事報導而言，愛國主義的新聞報導方式本來理應存在於所有新聞媒體中。即便愛國主義框架使用比例最低的《中國時報》也依然如此。

> 這與此媒體認定的「國」爲何高度相關。可能《中國時報》認定自己才是「愛國」，只是愛的國並非「臺灣」而是中華民國、中國。但在框架指標中，他們「愛國」的報導形式無法被辨識出，或至少他們是質疑民進黨政府的。但反面而言，他們會認爲質疑民進黨政

府是在指出錯誤的政策，這也是愛國主義（記者 B）。

以《中國時報》（76.6%）與《聯合報》（56.0%）的報導而言，此結果也顯示出在臺海衝突的報導中這兩個媒體並不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也未在報導中經常使用「我們」的主體召喚、並較為強調共軍的正當性等框架。

第四個研究問題探討媒體在報導軍演新聞時，是否會對涉及到臺海衝突的各方國家、政權、政要人物與其軍隊展現出主觀好惡或負面態度？以臺海軍事衝突為例，本研究發現，各媒體對「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的報導出現明顯差異（χ^2 = 93.505, df = 6, p < .05）。44.3%（179 篇）的報導認為臺灣能在臺海戰爭中有效防衛，而 35.4%（143 篇）認為臺灣無法有效防衛。約有 2 成（20.3%，82 篇）報導沒有針對這個問題表態。

對此問題態度最明顯的是《中國時報》，有 61.4%（89 篇）認為臺灣不能在軍事上有效防衛，僅 21.4% 的報導（31 篇）認為臺灣可以。態度較持平的是《聯合報》，其中 34.7%（26 篇）認為可以有效防衛、37.3%（28 篇）認為不能，不能有效防禦的比例略高有能力防禦（表 9）。

表 9：各報對「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

報別	認定國軍、美軍能在兩岸衝突中有效防衛臺灣	認定不能有效防衛臺灣	無法判定
聯合報	26（34.7%）	28（37.3%）	21（28.0%）
中國時報	31（21.4%）	89（61.4%）	25（17.2%）
蘋果日報	58（67.4%）	10（11.6%）	18（21.0%）
自由時報	64（65.3%）	16（16.3%）	18（18.4%）
總數	179（44.3%）	143（35.4%）	82（20.3%）

χ^2 = 93.505, df = 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至於媒體是否對中共或臺灣或美國政府展現負面態度？研究結果顯示（表 10），絕大多數（92.3%，佔 373 篇）的報導均顯露出對特定國家的態度，經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不同媒體顯露的態度差異達到顯著水準（χ^2 = 174.343, df = 6, p < .05）。其中對中共表達負面態度報導佔多數（達 54.4%，220 篇），37.9%（153 篇）對臺灣或美國政府表達負面態度，7.7% 的報導（31 篇）則無法判定。

《自由時報》有高達 90.8%（89 篇）展現對中共的負面態度，僅 6.1%報導（6 篇）對臺灣或美國政府呈現負面態度。《中國時報》對臺、美政府負面態度則高達 69.7%（101 篇），居全部媒體之冠，而對中共負面或質疑態度則僅有 19.3%（28 篇），是全部媒體最低者。

表 9（媒體認定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與表 10（媒體對中共 / 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是針對臺灣獨有的國際情境和軍事新聞報導環境所設計。本文認為因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統獨問題，且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衝突潛在處，因此美國對於臺灣的軍售、戰爭援助，甚至是對於發生戰爭後中、美的動作，都成為判斷媒體立場分歧的重要指標。其中「媒體對中共、臺、美政府與軍隊是否持負面或質疑態度」，攸關框架化過程的定義問題、道德評估，「媒體是否認為美軍會協防臺灣？」則較傾向框架化的原因解釋、解決方案。

表 10：各報是否對中共／對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報別	對中共政府與軍隊 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對臺、美政府與軍隊 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無法判定
聯合報	28（37.3%）	40（53.3%）	7（9.3%）
中國時報	28（19.3%）	101（69.7%）	16（11.0%）
蘋果日報	75（87.2%）	6（7.0%）	5（5.8%）
自由時報	89（90.8%）	6（6.1%）	3（3.1%）
總數	220（54.4%）	153（37.9%）	31（7.7%）

$\chi^2 = 174.343, df = 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記者 B 補充指出，兩岸衝突議題存在太多複雜的歷史因素，加上中美在經濟和軍事政治上爭霸的背景，導致表 9、10 中的兩個問題成為不同立場媒體間必然出現分歧的議題：

> 舉例而言，在兩岸衝突問題上「原因解釋」不同，造成偏統派、藍營媒體通常認定美國是兩岸關係的源頭，也就是混亂製造者，因此對美國採負面和質疑態度，也認定美國不可能在兩岸出現大型衝突時介入導致國家利益受損；相對的，偏臺灣主體性的媒體則會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並認定美國會協防臺灣。即便這些媒體本身不一

定相信美國會協防臺灣，但在媒體報導上仍會試圖灌輸其讀者類似觀念（記者 B）。

另外，表 10 研究的雖是 2020 年 8 月的中國解放軍軍演，但本文作者以及受訪記者觀察 2022 年裴洛西訪臺之後中國頻繁對臺軍演，國內主流媒體對臺海未來萬一發生戰爭，美軍是否會援臺的報導立場，與本文的研究結果相去不遠。親藍媒體仍呈現出明顯的所謂「疑美論」，而親本土立場的媒體則仍持續相信美國。

二、 軍事報導框架的質性分析

除了以統計結果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之外，本研究也試圖根據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的框架特徵，選取實例進行質性分析，以進一步佐證統計分析的結果。

以《聯合報》8 月 13 日的報導〈1995、96 年臺海危機以來，緊張再現，共軍挑明對臺軍演〉為例（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可以觀察到明顯的戰爭新聞學框架。

以消息來源而言，本篇報導非常側重菁英消息來源，包括大陸環球網、前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蘇貞昌、北京大學海洋研究所、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暉、美國太平洋艦隊等。上述六個消息來源包含特定國家政府、國防軍事單位、研究機構、專家學者與媒體，沒有一般人民。

而此報導的消息來源引用非常強調兩岸衝突，例如引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指出：

> 近來『個別大國』（暗指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轉引自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1 版）。

一方面也同時嚴厲批評臺灣大陸事務委員會的說法：

> 共軍近期對臺針對性的軍演，是破壞臺海和平，危害臺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挑釁行徑，我方絕不妥協。（轉引自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1 版）。

這段內文明顯強調軍演事件的衝突性。

報導中也重視零和博弈的概念，例如明確引用中共和臺灣官方在國防上不退讓的堅定說法，也引用解放軍說法指出：「臺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演習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同時引用臺灣國防部指出「我方絕不妥協」、「有效確保臺灣國家安全、捍衛臺灣主權」，皆顯示零和博弈特質的報導方式大於存在雙贏可能的報導方式。

不過另一方面，此報導也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例如文中指出美國衛生部長「阿查爾來臺，中共不滿」，是造成此次中共軍事演習的原因。文章開頭也把觀察國際衝突的時間軸拉長，指出「這是自一九九五、九六年臺海危機以來，共軍少見直接宣布的對臺軍事演習」。可見本篇報導仍有嘗試從和平新聞學的角度進行報導。

在貼「好壞標籤」的面向上，Galtung（2002）的研究曾指出，媒體是否對國際衝突中特定一方貼上「好壞標籤」是判斷戰爭或和平新聞學的重要指標，標籤能用以指出一方為邪惡製造者或問題核心（胡光夏，2008）。本篇報導（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並沒有明確使用好壞二分法對中、美臺任何一方政府進行評價，但報導中「（美國）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引用了中共的官方說法指責臺灣和美國政府，也引用了臺灣國防部說法指責中共「破壞臺海和平」、「危害臺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挑釁」等話語，可見報導者試圖平衡地指出雙方皆是問題製造者，以避免直接進行好壞的標籤化。

本研究經過內容分析發現《中國時報》是四個媒體中使用和平新聞學框架最多者，以 8 月 14 日的報導為例〈陸美對抗升級　旺旺中時民調顯示年輕人高達 7 成 2 贊同　加強兩岸交流　躍主流民意〉（朱真楷、趙婉淳，2020 年 8 月 14 日），和平新聞學的傾向就非常明顯。

首先，本篇報導消息來源也偏向菁英消息來源，來源包括旺旺中時民調、國民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暉。

而報導中呈現顯著的和平戰爭框架，強調解決爭端。例如報導中指出：「高達 5 成 8 的民眾認爲當前兩岸應『加強交流』」、「在 20～29 歲的年輕人，有高達 72.4%認爲應『加強交流』」。

此報導中也同樣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例如提到此次軍演的國際情勢背景：「陸美關係風雲激盪，兩岸政治僵局持續對立」、「面對當前詭譎多變的陸美軍事較量與敏感的臺海變局」，但文章通篇沒有關注衝突當下現場的敘

事出現。

不過此報導並未對共軍進行好壞二分法，也沒有顯露出對共軍的負面情緒，反而較偏向指責媒體母國政府，例如指出「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兩岸政治關係持續降溫」。

此外，報導中明確顯示出兩岸存在雙贏的可能性，例如「海峽兩岸以和爲貴」、「應該『交往對話』才能化解對立」、「使用武力只會加深裂痕，製造仇恨」、「臺灣主流民意仍是期待兩岸加強交流與對話」，都一再試圖凸顯兩岸還有談判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空間，並非一定要持續走向軍事衝突。

但《蘋果日報》同日的報導〈又武嚇！共軍宣布臺海南北兩端實戰演練〉（王炯華、陳培煌，2020 年 8 月 14 日）則呈現不同的樣貌，戰爭新聞學的傾向明顯。例如報導關注衝突當下現場，著重軍演事件當下的兩岸敵對態度。在好壞標籤的面向上，報導則具有明顯的好壞二分傾向，明確以「武嚇」形容共軍軍事演習。

而在零和博弈的面向上，報導對兩岸的態度描述也顯現出零和博弈的氛圍，例如稱臺灣國軍「有能力也有決心捍衛國家安全」，而解放軍機越過海峽中線則是對「對阿薩爾訪臺的『清晰回應』」。

而類似《蘋果日報》的報導，《自由時報》的報導也顯現出明顯的戰爭新聞學框架。例如〈共軍叫囂臺海軍演，我軍方：恐嚇大於實質〉（吳書緯、鍾麗華，2020 年 8 月 14 日），報導強調兩岸衝突，先後分別引用解放軍發言人說法，稱要「在臺灣海峽及南北兩端連續組織實戰化演練」；接著又引用臺灣國防部稱國軍「對於臺海周邊情勢以及海、空域動態，均有嚴密掌握」，皆強調兩岸的衝突面向。

此報導也關注衝突當下現場，報導中提及臺灣國軍「對於臺海周邊情勢均有嚴密掌握」，較為關注衝突當下現場，但未提及造成衝突的地緣政治與長遠的國際關係。

另外，此報導中的好壞標籤二分法相當明顯，例如稱中共的軍演行為是「恐嚇」，同時也引用國防資深官員稱中共「宣傳做很大」，意指中共意圖虛張聲勢，是衝突中邪惡的一方，也是製造問題的一方。

除了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的框架分析，本研究在內容分析時也發現上述框架經常伴隨軍事報導中的愛國主義框架同時出現。試舉以下幾個例子做進一步的分析。

以各報對於同一事件的報導而言，例如 8 月 24 日各報對「AIT 處長參

與金門 823 公祭」的報導為例，各報報導中，《聯合報》的愛國主義框架使用狀況較為持平，而《中國時報》的愛國主義框架則非常不顯著，但《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則是十分顯著。

以《聯合報》8 月 24 日報導〈蔡赴金門追思 823　AIT 處長陪祭〉為例（程嘉文，2020 年 8 月 24 日），此報導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引用總統府發言人說法:「感謝美國友人參與，共同爲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努力」，指出「國軍有信心也有能力迫使敵人犯臺失敗」，一方面也展示臺美關係緊密以致軍事能力強盛。此外更直言國軍本身已做好軍事防禦的準備。在強調國軍或美軍正當性的面向上，報導中「感謝美國友人共同爲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努力」、「國軍迫使敵人『犯臺』失敗」、「當年浴血奮戰，今天的『民主自由』」，都在在強調國軍和美軍在歷史上（823 砲戰）和當下的正當性。報導也意指國軍的軍事行動、與美方的軍事合作都是基於維護區域和平、臺灣民主的作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報導中未使用「我們」，而是使用「我」一詞，是引述蔡英文總統說法中所使用。「我」指的是蔡總統本人，而非「我國」或「我軍」，顯示出《聯合報》對此事件的報導，並未強調軍事新聞中的我者（我軍）與他者（敵軍），也未試圖召喚國家人民的歸屬感。

《蘋果日報》同日報導〈囂張！共機趁蔡返臺挑釁 3 小時〉（蘋果日報，2020 年 8 月 24 日），則呈現明顯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稱美國「告誡北京別盲動」，甚至稱共軍演習「之前就傳出讓美方很火大」。文章還引用兩位臺灣學者，分別稱「美國支持臺灣，雙方的關係十分緊密」、「美方正極力提升臺灣防堵中共擴張的戰力」，明顯強調美軍的強盛。另外也強調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例如報導標題首先就使用共軍「囂張」、「挑釁」等字眼。內文也強調美國（AIT）是臺灣的「眞朋友」，並指責共機繞臺和軍演，更直言臺灣國軍派出戰機飛至外島，其正當性在於「確保（臺灣總統）專機安全」。

報導中有使用「我」以及「我們」，包括引用 AIT 說法「美臺安全合作讓『我們』引以爲傲」、「中國人民解放軍昨中午疑似派偵察機在『我』防空識別區」繞行，並直接引用空軍司令部稱蔡總統專機為「我總統專機」，皆可顯見報導中對己方國家人民歸屬感的召喚。

在《自由時報》報導〈金門紀念 823　AIT 處長首出席 酈英傑悼『聯臺抗中』殉職美軍〉（呂伊萱、吳正庭，2020 年 8 月 24 日）一文中，也可觀察到明顯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報導臺灣國軍或美軍的強盛，回顧了 823 炮戰

時，臺灣在美援下成功守衛金門、連江地區，試圖強調國軍和美軍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與綜合軍事實力強盛，有能力聯手抗中。同時也引述臺灣國安幕僚，稱中共軍演後：

> 傳出美方很火大，甚至在中國宣傳加大對臺威脅時刻，美軍就輪番在南海與東海進行大規模軍演（轉引自呂伊萱、吳正庭，2020年8月24日，1版）。

同時，報導則排斥與臺灣國軍對立的事物，如報導標題就稱美國要「聯臺抗中」，並在內文使用「抵禦」和「防守」等詞，排斥共軍。

此則報導也凸顯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將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形容為「真朋友，真進展」，並指出當年有美軍士兵曾「與臺灣同袍一同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下來的臺美軍演、聯合防守和分工合作等發展將值得期待」。這些報導語彙都顯示出臺美的軍事動作是為了「抵禦」侵略、「防守」國土與主權。

然而《中國時報》的報導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在〈陸學者稱AIT姿態性演出 非官方〉（許依晨，2020年8月24日）此篇報導中，強調共軍的強盛。報導引用大陸學者的說法，強調美軍對臺灣的友好動作只是「黑幫老大罩著小弟」、讓臺灣「增加安全感」。即便其對美軍的強盛並未否定，但明顯不看好臺灣國軍的強盛、以及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臺灣的援助。

此外，報導中並未承認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卻大量引用中方立場指責美國與臺灣外交關係，如稱「AIT處長酈英傑『姿態性』參加活動」、「民進黨現在又回到62年前，做出重新走向對抗的舉措」等。報導中也幾乎沒有引用國軍或美軍的說法，明顯並未排斥與臺灣國軍對立面的人事物。報導中未使用「我」一詞，引述的消息來源也多數是大陸學者。

伍、研究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發現，臺灣的主流平面媒體在報導軍事新聞時，對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呈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以及媒體對中美的好惡立場、對國際衝突結果評判，均出現顯著的差異。唯有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各媒體不論是消息來源類型還是消息來源國家別均未呈現顯著差異。

本研究以量化以及質性研究印證，戰爭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框架盛行於多數主流媒體的軍事報導，與過去 Chungs et al.（2014）、Fong & Koon（2019）、Hussain & Siraji（2018）、Lee & Maslog（2005）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多數主流媒體經常採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進行軍事報導，並對假想敵國持負面態度，且站在愛國主義、與其母國政府相近立場。同時，臺灣主流媒體的軍事新聞報導中戰爭新聞學和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兩者經常伴隨出現。主要的例外出現在《中國時報》的新聞報導，在兩岸軍事衝突中經常強調和平新聞框架，且在報導中很少凸顯愛國主義框架。

臺灣身處於全球最重要的軍事衝突潛在地區，卻因複雜的政治因素和媒體立場，讓國內主流媒體的報導出現歧異的報導框架、報導方式以及報導的態度。這樣的結果也令人關切，臺灣不同族群的閱聽人所接收到的軍事資訊是否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感知和理解。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同為前蘇聯加盟國的烏克蘭。這不但深刻影響中美貿易戰以來越來越壁壘分明的全球國際關係格局，也讓與中共之間有複雜歷史、國家主權關係的臺灣，再度成為國際焦點。2022 年 8 月 2 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更超越前述的美國衛生部長艾薩和國務助卿 Keith Krach，成為近六十二年訪臺最高層級的美國官員。

面對此情況，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但立刻於 8 月 4 日至 7 日舉行完全包圍臺灣島的實彈軍事演習活動，規模遠超過本研究中 2020 年軍演的案例，更被許多媒體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林新輝，2022 年 8 月 3 日；湯名暉，2022 年 8 月 6 日）。中共東部戰區更直言此後會「常態組織臺海方向戰備」相關軍演。此演習讓兩岸議題再度成為全球焦點，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在 9 月的專訪重申「美軍將出兵協防臺灣」（Tan & Molloy, 2022, August 3）。

越來越詭譎的世界新地緣政治，使臺灣的經濟、國安和國際話語權，都更受到美中等大國左右。而媒體是人民感知戰爭和國安的重要管道。過去臺灣傳播研究對臺灣涉入其中的國際軍事衝突研究極為有限，本研究希冀以實證研究具體呈現出主流媒體軍事報導框架存在的差異。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提供媒體從業人員未來對臺灣國際衝突相關報導的參考，並提供社會大眾一起思考如何面對臺海軍事衝突的媒體報導差異以及此差異可能造成民眾之間的資訊落差與分歧。

本研究最大的研究限制之一來自文獻收集的困難。因為兩岸分治七十年，所幸尚未發生重大軍事衝突，但也導致相關研究文獻極為有限，亦缺乏

軍事對峙、武裝衝突或戰爭新聞相關文獻作為發展分析類目的參考。本文的研究概念多參照自國外文獻，這與臺海的軍事衝突脈絡有所差異，也使得本研究的量化編碼以及分析架構可能未臻完善。例如有關戰爭與和平框架的論述，本文作者並無將其二分法的意圖。然而受限過去臺灣相關實證研究文獻的缺乏，本研究擬先就臺灣媒體的軍事報導進行一系統性的鳥瞰分析，各類目的建構修正自國外文獻以及以臺海軍事衝突現況，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初探性質。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採用語意分析量表進行分析，設法將國外文獻中戰爭新聞學與和平新聞學框架整合成成為一連續性的語意量表，或可更適切地呈現和平新聞學的概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研究主流平面媒體（或其網路電子報），長期以來均研究《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以及《中國時報》。然而《蘋果日報》在 2022 年 8 月 1 日已經停刊，如今易主改為「臺蘋」。相較於其它三個媒體，過去研究或輿論普遍認為《蘋果日報》的政治傾向較為中立。如今「臺蘋」與過去《蘋果日報》的報導立場有何差異？特別是攸關臺灣安全的軍事新聞報導的報導，相信也是未來研究關切的焦點之一。

在質性分析方面，受限於研究人力與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研究未能深入語意層面，對各報的語句結構或用字遣詞層面進行更進一步的文本分析，也建議未來研究能往此方向進行。

最後，框架研究除了媒體的框架研究外，也存在閱聽眾的接收框架。臺海衝突是未來幾年內重大的國際新聞焦點之一，也攸關臺灣國土的安全。閱聽人在接收媒體報導框架之後，對相關新聞議題所產生的觀點與態度也是傳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索。

而在 2022 年 8 月中共環臺軍演時，各媒體對臺灣民眾反應的觀察也出現兩極：臺灣民意基金會指出約 78% 民眾表示不害怕中國軍演，其中更有 45%「一點也不害怕」（吳紹瑜，2022 年 8 月 16 日）；但《遠見雜誌》稍晚公佈的民調卻表示「63.6%民眾憂兩岸開戰、65.4%減少對政府信任度」（林讓均，2022 年 9 月 1 日），調查結果依然有截然相反、兩極的情況出現。知名國際媒體如 CNN 或路透社（Reuters）則觀察臺灣民眾對中共軍演反應「超淡定」（臺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8 日）。究竟兩岸衝突的報導框架可能以何種方式影響閱聽人？或因哪些機制引導閱聽人心中的圖像？這個攸關臺灣安全意識的議題，均亟待未來的研究探索。

參考文獻

中央社（2023 年 1 月 2 日）。〈法新社：2022 年中共擾臺軍機數量激增　逾 1700 架次〉，《中央社》。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01020183.aspx

中國臺灣網（2020 年，12 月 5 日）。〈和平統一希望有多大？兩岸專家提有壓力下“以武促統”〉，《中國臺灣網》。上網日期：2020 年 12 月 5 日，取自 http://www.taiwan.cn/xwzx/la/202012/t20201205_12309551.htm

王炯華、陳培煌（2020 年 8 月 14 日）。〈又武嚇　共軍宣布臺海南北兩端實戰演練〉，《蘋果日報》，4 版。

朱真楷、趙婉淳（2020 年 8 月 14 日）。〈旺旺中時民調顯示　加強兩岸交流 躍主流民意〉，《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814000516-260102?chdtv

自由時報（2020 年 10 月 7 日）。〈龐皮歐指美國不會坐視中國犯臺　鄭運鵬：國內親中人士可以閉嘴了！〉，《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13903

吳書緯、鍾麗華（2020 年 8 月 14 日）。〈共軍叫囂臺海軍演　我軍方：恐嚇大於實質〉，《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2991

吳紹瑜（2022 年 8 月 16 日）。〈7 成 8 國人無懼中共軍演　游盈隆：臺灣人不是被嚇大的〉，《TVBS 新聞網》。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878590

呂伊萱、吳正庭（2020 年 8 月 24 日）。〈金門紀念 823 AIT 處長首出席　酈英傑悼『聯臺抗中』殉職美軍〉，《自由時報》，1 版。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24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4988

李俊毅（2020 年 10 月 6 日）。〈臺海開戰美軍不會幫？專家爆：在國會親耳聽到〉。《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06000778-260407

林海清（2005）。〈臺灣海權的發展戰略－從海洋政策層面分析（下）〉，《海軍學術月刊》，39 (1)：4-20。

林新輝（2022 年 8 月 3 日）。〈裴洛西來臺兩岸緊張？一表看懂「四次臺海

危機」背景及影響〉，《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 年 8 月 3 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6508635

林讓均（2022 年 9 月 1 日）。〈遠見調查／軍演危機好揪心！ 63.6％民眾憂兩岸開戰、65.4％減少對政府信任度〉，《遠見雜誌》。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3638

美國之音（2021 年 7 月 6 日）。〈習近平誓言完成統一大業，官媒配合描繪「攻臺三步驟」〉，《風傳媒》。上網日期：2021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796422

胡光夏（2008）。〈衝突與戰爭報導的另類典範初探－和平新聞學〉，《復興崗學報》，92：213-243。

涂鉅旻、呂伊萱（2020 年 8 月 17 日）。〈共軍才嗆臺海軍演　美艦現東沙〉，《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7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393605

許依晨（2020 年 8 月 24 日）〈陸學者稱 AIT 姿態性演出　非官方〉，《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24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824000387-260118?chdtv

陳言喬、林汪靜、洪哲政（2020 年 8 月 13 日）。〈1995、96 年臺海危機以來　緊張再現　共軍挑明對臺軍演〉，《聯合報》，1 版。

陳　煜（2021 年 11 月 2 日）。〈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中共遲早發兵攻臺？最新民調：民進黨支持者最不信〉，《風傳媒》。上網日期：2021 年 11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023390

_____（2022 年 4 月 26 日）。〈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俄烏戰爭衝擊統獨板塊！統派意外淪為「最大輸家」〉，《風傳媒》。上網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304625

陳韻聿（2020 年 8 月 5 日）。〈美國衛生部長將訪臺　1979 年以來層級最高〉，《中央社》。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8055002.aspx

游凱翔（2020 年 8 月 13 日）。〈共軍：多軍種近日在臺海及南北兩端實戰演練〉，《中央社》。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08130168.aspx

湯名暉（2022 年 8 月 6 日）。〈「第四次臺海危機」——習近平對國內外反應的測試〉，《上報》。上網日期：2022 年 8 月 6 日，取自 https://

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0979

程嘉文（2020 年 8 月 24 日）。〈蔡赴金門追思 823　AIT 處長陪祭〉，《聯合報》，4 版。

程嘉文（2023 年 7 月 1 日）。〈軍備看似壯觀　國防策略卻待商榷〉，《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7270424

黃　紀（2021 年 3 月 17 日）。〈2016 年至 2020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1/4)：2017 年面訪抽樣調查案 (D00167)〉，《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17 日，取自 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67-1

臧國仁（1998）。〈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傳播研究集刊》，3：1-102。

臧國仁、鍾蔚文（1997）。〈框架概念與公共關係策略——有關運用媒介框架的探析〉，《廣告學研究》，9：99-130。

臺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8 日），〈中國軍演臺灣人「超淡定」，外媒記者驚訝〉，《臺視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 年 8 月 8 日，取自 https://news.ttv.com.tw/news/11108080027000N

薛中鼎（2018 月 6 月 1 日）。〈共機繞臺的歷史聯想〉，《海峽評論》，330：58-59。

闕志儒（2011）。〈新聞客觀性是否顛撲不破？一種來自網際網路的衝擊〉，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蘋果日報（2020 年 8 月 24 日）。〈囂張　共機趁蔡返臺　挑釁 3 小時〉，《蘋果日報》，4 版。

Anderson, T. (2015, October 7). The dirty war on Syria: Barrel bombs, partisan sources and war propaganda.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Retrieved October 7, 2015, from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dirty-war-on-syria-barrel-bombs-partisan-sources-and-war-propaganda/5480362

Arno, A., & Dissanayake, W. (2019).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outledge.

Aslam, R. (2011). Peace journalism: A paradigm shift in traditional media

approach.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7*(1), 119-139.

Baker, W. D. & Oneal J. R. (2001). Patriotism or opinion leadership?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the "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5), 661-687. Retrieved August 11, 2016 from https://www.jstor.org/stable/3176318

Bateson, G. (1955).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Psychiatric Research Reports, 2,* 39-51.

Becker, J. (1982). Communication and peace.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lation between two categories in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3), 227-240.

Beckler, D. T., Thumser, Z. C., Schofield, J. S., & Marasco, P. D. (2018). Reliability in evaluator-based tests: Using simulation-constructed models to determine contextually relevant agreement thresholds.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8, 141. Retrieved February 17, 2020, from https://doi.org/10.1186/s12874-018-0606-7

Blanchette, J., Edel, C., Johnstone, C. B., Kennedy, S., Cha, V., Kim, E., & Poling, G. B. (2022, August 15). Speaker Pelosi's Taiwan visi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trieved August 15, 2022, from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peaker-pelosis-taiwan-visit-implications-indo-pacific

Brewer, J. D. (2006). Memory, truth and victimhood in post-trauma societies. In G. Delanty & K. Kumar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pp.214-224). Sage Publications.

Brody, R. A. (1991). *Assessing the president: The media, elite opinion, and public suppo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rletta, J. (1996). Assessing agreement on classification tasks: The kappa statistic.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2* (2), 249-254.

Chungs, M.Y., Lessman, J. R., & Fan, M. (2014). Framing the nuke: how news media among countries in the six-party talks framed north Korea's nuclear test. *North Korean Review, 10*(1), 22-38.

de Vreese, C. H., Peter, J., & Semetko, H. 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07-122.

DeCillia, B. (2018). "But it is not getting any safer!": The contested dynamic of framing Canada's military mission in Afghanista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51*(1), 155-177. https://doi.org/10.1017/S0008423917000634

Dutta-Bergman, M. J. (2006).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A critical cultural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0*(2), 102-124. https://doi.org/10.1177/0196859905285286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21) EIU Risk Outlook 2022.10 scenarios that could impact global growth and inflation.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1, from https://primo-nederland.eu/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10/risk-outlook-2022-new-verkleind.pdf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_____(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vans, M. (2010). Fram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edia coverage of fighting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 6*(2), 209-233.

Fawcett, L. (2002). Why Peace Journalism Isn't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3*(2), 213-223.

FitzGerald, J. (2022, August 14). US Taiwan: Congress team follows Pelosi with second high-level visit in a month. *BBC.* Retrieved August 14, 2022,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541750

Flowerdew, J., & Leong, S. (2007). Metaphors i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the case of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reform debate. *Discourse & Society, 18*(3), 273-294.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07075476

Fong, Y. L., & Koon, J. H. G. (2019).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war/peace journalism: A framing analysis of a Malaysian newspaper. *KO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Communication inquiry, 7*(2), 17-36.

Forgette, R., & Morris, J. S. (2006). High-conflict televisio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3), 447-456.

Galtung, J. (1986).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worldwide security and peace. *Peace and Communication, 12*(4), 249-266.

_____(1998). *Peace journalism: What, why, who, how, when, wher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TRANSCEND, Taplow Court, UK.

_____(2002). The USA, 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research agenda for peace. *Development*, *45*, 65-67.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development.1110352

Gamson, W.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Story suitability. *Society, 16*, 65-77.

Garrison, D. R. (1991). Critical thinking and adult education: A conceptual model for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adult lea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10*(4), 287-303.

Ginosar, A. (2015). Understanding patriotic journalism: Culture, ideology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30*(4), 289-301.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ber, D. (2003).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Beyond myths and stereotyp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139-160.

Hackett R. A., Gruneau, R., & Gutstein, D. (2000). *The missing news: Filters and blind spots in Canada's pre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Hanitzsch, T. (2007). Situating peace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studies: A critical appraisal.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6*(2). Retrieved May 6, 2021, from https://regener-online.de/journalcco/2007_2/pdf/hanitzsch.pdf

Hussain, S., & Siraj, S. A. (2018). Coverage of Taliban conflict in the Pak–Afghan pr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1*(4), 305-326.

Kellner, D. (1992).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dentities. In S. Lash & J. Friedm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pp.141-177). Blackwell.

Kempf, W. (2002). Conflict coverag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In W. Kempf & H.

Luostarinen (Eds.), *Journalism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 Vol II studying war and the media* (pp.59-72). Nordicom.

Lee, S. T., & Maslog, C. C. (2005). War or peace journalism? As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confli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2), 311-329.

Lynch, D. J. & McGoldrick, A. (2005). *Peace Journalism*. Hawthorn Press.

Lynch, D. J. (2006). Motivational Factor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s Predictors of Course Grade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0* (2), 423-428.

Moshe, M. (2004). Between national and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framing financial patriotic discourse. *Journalism Studies, 5*(4), 497-509.

Nelson, L. J., & Moore, D. L., & Olivetti, J. & Scott, T. (1997). General and personal mortality salience and nationalistic bi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8), 884-892. Retrieved June 5, 2018,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8008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ssek, H. (2004). Our news and their news: The rol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verag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ism, 5*(3), 343-368.

Peake J. S. (2001) Presidential agenda setting i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1), 69-86.

Peleg, S. (2007). In defense of peace journalism: A rejoinder.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6*(2), 1-9.

Perloff, R. M. (2014). *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series) (4th ed.). Routledge.

Putnam, L. L., & Shoemaker, M. (2007). Changes in conflict framing in the news coverage of a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2007*(1). Retrieved October 9, 2015, from https://scholarship.law.misso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27&context=jdr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22). Digital News Report 2022.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June 15, 2022,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2

Reynolds, A., & Barnett, B. (2003). "America under attack": CNN's verbal and visual framing of September 11. In S. Chermak, F. Y. Bailey, & M. Brown. (Ed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September 11* (pp.85-102). Praeger.

Rising, D. (2021, October 14). Taiwan tensions raise fears of US-China conflict in Asia. *Associated Press.* Retrieved October 14, 2021, from https://apnews.com/article/lifestyle-business-taiwan-beijing-holidays-2028102f8502ed809848e8a147d0413c

Rojecki, A. (1999).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Antinuclear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in the Cold War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utenberg, J., & Carter, B. (2001, November 15). The media business; ABC and CBS discuss sharing of news costs.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01,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01/11/15/business/the-media-business-abc-and-cbs-discuss-sharing-of-news-costs.html

Schaar, J. H. (1981). *Legitimac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W. W. Norton & Company.

Schwalbe, C. B., Silcock, B., & Keith, S. (2008). Visual framing of the early weeks of the U.S.-led invasion of Iraq: Applying the master war narrative to electronic and print imag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3), 448-465.

Sennett, R. (2003). A nation's narrative. *Index on Censorship*, *32*(3), 32-34.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 Longman.

Shoemaker, P. J., Danielian L. H., & Brendlinger N. (1991). Deviant acts, risky business and U.S. interests: The newsworthiness of world ev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8*(4): 781-79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IPRI Publishing. Retrieved April 25, 2022, from https://milex.sipri.org/sipri

Tan, Y., & Molloy, D. (2022, August 3). Taiwan: Nancy Pelosi meets president Tsai to Beijing's fury. *BBC*. Retrieved August 3, 2022,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398029

Tankard, J., Hendrickson, L., Silberman, J., Bliss, K., & Ghanem, S. (1991, August). *Media frames: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osto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1).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trieved November 3, 2021, from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Nov/03/2002885874/-1/-1/0/2021-CMPR-FINAL.PDF

Thetela, P. (2001). Critique discourses and ideology in newspaper reports：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press reports on the 1998 SADC'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esotho. *Discourse & Society, 12*(3), 347-370.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Constable.

Viner, K. (2016, July 12). How technology disrupted the truth. *The Guardian.* Retrieved July 12, 2016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jul/12/how-technology-disrupted-the-truth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那滈、王泰俐、劉好迪（2023）。〈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軍事新聞報導框架分析—以 2020 年 8 月解放軍軍演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29-71。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3

Na, H., Wang, T. L., & Rauchfleisch, A. (2023). Peace or war? Framing analysis of Taiwan media's military news reports on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29-71.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3 [Text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29-71, July 2023

Peace or War? Framing Analysis of Taiwan Media's Military News Reports on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NA, Hau

Graduate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NG, Tai-Li *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AUCHFLEISCH, Adrian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August 2020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military exercise against Taiwa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discrepancies,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leanings of the four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in Taiwan regarding cross-strait conflict issues. Using the theories of war/peace journalism framework and patriotism framework, the study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choices of news sources, the uses of keywords, and the portrayals of events among different media. Quantitativ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verage of four different media in Taiwan in terms of the expressions of favorability towards the home country or the adversar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positions adopted in reporting on whether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de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and the uses of reporting framework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erms of choices of news sources and the number of news ite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hina Times tended to use peace journalism frameworks. The Liberty Times and the Apple Daily leaned towards war journalism frameworks and patriotism framework, tended to express negative sentiments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elieved that China cannot successfully invade Taiwan by force. The United Daily News, in comparison,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neutral stanc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ere included to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U CRP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世新大學 謝然之 舍我 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interpret the findings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Key Words: Peace Journalism, Military News, News Framing,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Military Journalism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iliw@ntu.edu.tw
Received: 2023.01.21; Accepted: 2023.06.11

社群編輯如何架構第四次臺海危機？從情緒—認知框架觀點出發 *

陳靜君[**]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陽明交通大學應用藝術所傳播藝術與科技組博士生

沈宏杰

海軍官校上尉輔導長

摘要

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探討社群編輯如何形塑第四次臺海危機及其框架效應。收集臉書新聞粉絲專頁社群編輯貼文，共 6,145 筆，透過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題模型分析判定新聞框架。研究發現：第一，臉書社群編輯建構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裴洛西訪臺、美中臺關係、臺海問題、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七個新聞框架；其次，裴洛西訪臺和緊張局勢框架分別引起最高比例的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第三，裴洛西訪臺框架具有高度競爭效應，同時有較高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本研究貢獻在於拓展框架者、框架效應的意涵，並運用真實世界的臉書後設資料，發展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填補框架理論的研究缺口。

關鍵字：社群編輯、框架理論、情緒可供性、臺海危機、臉書情緒反應

---

* 本文最初發表於 2022 年第 16 屆軍事新聞暨計算傳播研討會，特別感謝徐振興助理教授提供寶貴的修正建議。同時，也感謝審查委員們用心審視，提供專業且具體的意見，讓本文更加完善。
** 通訊作者，E-mail: ilovejinbo@gmail.com
投稿日期：2023 年 01 月 11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4 月 22 日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壹、前言

中共對臺軍事威脅不僅是兩岸的臺海議題，更是全球關注的國際議題。尤其，中共對臺的軍事威脅在 2022 年 8 月初升高至前所未有的狀況，被國內外媒體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後文統一稱之）。2022 年 8 月 2 日美國國會眾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此行是自 1997 年至今睽違 25 年首度有美國國會重大領袖來臺，被視為臺美關係的一大進展，認為美國對臺可能從戰略模糊轉變為戰略清晰，直接衝擊中美臺的三角關係（公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11 日 a）。對中共而言，裴洛西訪臺為美國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是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的挑釁行為，將此行稱之為「裴洛西竄臺」，同時為表達堅決立場，中共升級軍事手段，以包圍臺灣的方式舉行長達數日的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形同變相封鎖臺灣（公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11 日 b），許多國內外媒體擔心戰爭一觸即發，將此次事件稱之為「第四次臺海危機」，認為這是繼 1954 年九三砲戰、1958 年八二三炮戰、1996 年飛彈危機後臺海緊張局勢最白熱化的時刻，歷次臺海危機相關資訊請見表 1（曾筠淇，2022 年 8 月 3 日；Suorsa & U-Jin, 2022）。

表 1：歷次臺海危機說明表

臺海危機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時間	1954 年	1958 年	1996 年	2022 年
別稱	九三炮戰	八二三炮戰	飛彈危機	鎖臺危機
起因	共軍執行奪臺作戰	中共逼蔣介石放棄金門，達收復目的	中共不滿 1995 年李登輝訪美，並有意阻止李參選總統大選	中共不滿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率團訪問臺灣
內容	中共於 1954 年 9 月 3 日向金門發起炮戰，在 12 小時內發射 6 千枚炮彈	中共於 1958 年 8 月 23 日對金門發起炮戰，在 85 分鐘內發射 3 萬餘發炮彈	中共於 1996 年 3 月對臺進行導彈試射演習	中共於 2022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對臺周邊進行軍事演習，形同鎖臺

資料來源：曾筠淇（2022 年 8 月 3 日）。

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新聞媒體的報導將影響身處於危機情境下臺灣民眾的態度與看法，尤其，社群媒體對民眾的影響不容小覷。Iannarino et al.（2015）指出針對複雜且重大的危機事件，由於民眾難以第一手親身接觸，將會由新聞媒體來定義事件的意義、價值與原因，並協助閱聽人瞭解新聞事件與提供道德判斷的觀點。同時，在新聞使用行為方面，《路透社》2022

年《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22*）（Newman et al., 2022）指出全球 46 個國家（含臺灣）的民眾新聞使用行為與趨勢有幾個特徵，如民眾主動迴避新聞、網路和社群媒體已取代傳統新聞媒體，且臉書為主要的新聞來源。因應社群媒體的普及與民眾的媒體使用習慣的改變，衍生了一個新的新聞職位—社群編輯（劉昌德，2020；劉慧雯，2020；Neilson & Gibson, 2022），負責將新聞放置到社群媒體，兼具守門者與行銷者的角色（Ferrer-Conill & Tandoc Jr, 2018; Lischka, 2021），但目前卻很少研究聚焦於新聞框架者的角色（劉慧雯，同上引；Wasike, 2013）。因此，本研究將關注臉書的社群編輯如何影響臺灣民眾對於第四次臺海危機的態度與認知。

基於框架理論，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發展「情緒—認知框架」（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概念，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對使用者、使用者間的框架效應。以下針對社群編輯在新聞學、危機情境的角色定位、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方法的創新應用，以及臉書情緒反應如何拓展框架理論等三個面向發展研究問題。

貳、文獻探討

根據 De Vreese（2005）的框架整合過程模型（integrated process model of framing），框架包含兩階段的過程，分別為新聞媒體的框架建構（framing-building），與對個人或社會的框架設定效應（framing-setting）。

前者關注新聞媒體怎麼說，相關文獻常將此類新聞框架定義為新聞媒體透過強調或排除某些關鍵字、詞彙、刻板印象、圖像、新聞來源、暗喻、舉例、引用等方式，來詮釋特定新聞事件本身（Valenzuela et al., 2017）。換言之，新聞框架透過選擇、強調和呈現等方式來建構新聞事件；後者則關注閱聽人怎麼想，即新聞媒體對閱聽人的框架效應。研究指出新聞框架會影響人們對議題或事件的了解、評估、詮釋、態度，但框架效應是新聞框架與個人先前知識、傾向、經驗的互動結果（Carfora et al., 2021; De Vreese, 2005）。

因此，對本研究而言，臉書社群編輯為新聞框架者，而臉書使用者則是被框架者，臉書使用者對新聞框架的情緒反應為框架效應。

一、 以情緒為發文導向的社群編輯

社群編輯（social media editors），或稱社群經營者（social media managers），在臺灣的社群編輯則被暱稱為「社群小編」，或簡稱「小編」（後文統一稱「社群編輯」）（劉昌德，2020；劉慧雯，2020；Neilson & Gibson, 2022），其主要的工作是挑選新聞，發布至新聞組織所經營的社群媒體帳號，在發布的過程中，會針對新聞報導添加標題、引言、摘要、眉批或是標籤，以吸引使用者點閱、互動、留言，並導流至自身的新聞網站，角色類似傳統新聞中「守門人」、「框架者」的角色，對使用者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理解上有潛在的影響力（劉昌德，同上引；劉慧雯，同上引）。

然而，許多研究者指出，社群編輯並非傳統的新聞工作者，他深受社群媒體運作邏輯影響，經常面臨新聞專業與商業行銷的壓力與矛盾（劉昌德，2020；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因應社群媒體的社交特性與演算法機制，社群編輯需時時掌握社群媒體的各種互動或參與指標，如點閱數、分享數、按讚數、留言數等，同時也要了解演算法的變化與趨勢，這些數據不僅成為經營社群媒體方針，也間接影響新聞產製的方向（Neilson & Gibson, 同上引）。此外，社群編輯雖然不是第一線採訪新聞，但卻是第一線與社群媒體使用者互動的人，其經常透過擬人化、親切、有個性的方式，來經營社群粉絲，因此社群編輯扮演著以閱聽人為導向（audience-oriented）、數據導向的「行銷者」、「公關人員」、「社群創建者」的角色。

情緒訴求是社群編輯最常採取的方式。以臺灣媒體環境為例，劉昌德（2020）探討社群媒體如何轉化新聞專業，發現社群編輯在內容報導與專業上與傳統的新聞專業價值背離，社群編輯普遍改寫標題，在內容上更重視情感互動、去政治化、行銷導向，軟性新聞高於硬性新聞，尤其，臉書的新聞貼文在「情緒或互動型」的標題數量上遠高於新聞網站與通訊軟體。此外，從心理學的負面偏見觀點而言，許多研究發現負面的新聞內容，更容易驅動社群媒體的各種指標，如分享、評論、按讚等，尤其政治相關的新聞更是如此（De León & Trilling, 2021; Heiss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以觸發使用者情緒作為發文策略的社群編輯，在面對國家危機情境時，其發文策略對使用者情緒的影響。

在國家危機情境下社群編輯的情緒導向策略，將影響使用者對於危機的認知解讀與情緒反應，凸顯在新聞專業取向與商業行銷取向的兩難與取捨。

Li, X.（2007）指出新聞媒體在國家危機情境中，具有事實傳達、現況分析、提供安撫與情緒支持、指引行動方針等功能，尤其在政治、公眾安全與反恐議題上，會避免引起不安的報導。換言之，對於新聞專業取向而言，社群編輯要考量到媒體的社會功能。然而，劉慧雯（2020）的研究卻發現，雖然社群編輯在處理硬新聞（如公共安全、國際關係）較會遵守新聞既有框架，採取新聞一致詞彙的程度較高，但同時也傾向在硬事實上加上更情緒化的詞彙，尤其，社群媒體所使用的詞彙數、總字數遠低於新聞，在使用者注意力有限的情況下，這些具有提示性、情緒化的詞彙將具有強大的框架效應。雖然該研究未進一步探討社群編輯框架對使用者的影響，但卻凸顯在國安情境中，社群編輯的發文策略對使用者情緒、認知上的影響力。

目前多數社群編輯相關研究關注其角色定位的問題（劉昌德，2020；Ferrer-Conill & Tandoc Jr, 2018；Lischka, 2021；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僅少數探討社群媒體的框架效應（劉慧雯，2020；Wasike, 2013）。如 Wasike（同上引）探討社群編輯如何透過 140 個字的推文來與使用者互動，並使用那些新聞框架，而劉慧雯（同上引）則是探討社群編輯的發文框架和新聞報導框架差異。延續 Wasike（同上引）和劉慧雯（同上引）的研究，本研究將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如何在危機情境中作為新聞框架者來形塑第四次臺海危機。

二、 臉書社群編輯在危機情境下建構的新聞框架

本研究探討臉書社群編輯作為新聞框架者，如何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建構新聞框架，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臉書使用者的瀏覽習慣凸顯出臉書社群編輯具有潛在的框架影響。根據眼動追蹤瀏覽臉書新聞的研究，發現每篇新聞平均停留約 6 秒鐘，其中以標題、臉書社群編輯寫的內容停留時間最高（Dvir-Gvirsman, 2019），只有當新聞內容與其態度一致及來源可信度較高時，才會進一步點閱新聞連結（Sülflow et al., 2019），可見標題與社群編輯貼文比其他資訊更能在短暫的時間對使用者造成影響。其次，過去研究指出相較於軟性新聞，臉書社群編輯在硬性新聞的處理上，由於較難取得另類新聞來源，雖然仍會在貼文中加入情緒性用語，但與新聞原文的一致性高，較遵守新聞既有框架（劉慧雯，2020），而本研究所探討第四次臺海危機屬硬性新聞，讓社群編輯難有改作或重置重點的空間，因此，透過臉書社群編輯

的做摘要及下註解，前者可以一窺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後者則可以了解其對使用者情緒的影響。第三，臉書社群編輯作為新聞框架者，其對於新聞事件擁有較大的話語權，且其框架將影響臉書使用者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情緒。劉慧雯（同上引）指出臉書社群編輯貼文的位階高於一般使用者的留言，在新聞臉書粉絲專頁上，只有臉書社群編輯有權限可以發文且被所有使用者看見，而一般使用者的意見都被集中於留言區，當留言越多，則越稀釋一般使用者的話語權力量；尤其，臉書社群編輯經常從新聞原文摘要出較短、較強烈、較情緒性的詞彙來為使用者「劃重點」，在使用者注意力有限的情形下，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建立使用者對特定新聞事件的認知與態度。

在框架理論研究中，探討框架者所建構的認知框架時，研究者關注新聞媒體如何描述新聞事件，例如強調和弱化新聞事件中某些議題或面向的重要性，或是透過不同的語法架構、來源、例子、論述方式等，其認為這些新聞框架的方式足以影響閱聽人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解讀（Feng et al., 2012; Iannarino et al., 2015; Kühne et al., 2015）。由於認知框架取徑關心框架者怎麼說，因此，研究者從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s）或特定議題框架（issue-specific frames）的分類來檢視新聞框架（De Vreese, 2005）。De Vreese（同上引）指出特定議題框架是針對特定主題或事件所建構的新聞框架，如該新聞媒體從哪些面向報導特定主題，其優點在於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該主題或事件的特殊性與細節。相對而言，通用框架則是不受主題限制，較能進行跨時間、跨文化的比較，然而，De Vreese（同上引）彙整過去研究時，卻發現不同學者對通用框架的內涵定義不同，有的從新聞價值的角度定義通用框架、有的關注政治議題如何運用策略框架，將策略框架視為通用框架、有的則將通用框架區分為衝突、經濟影響、人類利益、道德、責任等五類新聞框架。由上可知，雖然 De Vreese（同上引）認為通用框架較具有複製性、推論性，但卻隨著不同學者的定義而有所不同，間接降低了其推論範圍，而特定議題框架則更貼近反映新聞事件的特殊性（De Vreese, 同上引 ; Valenzuela et al., 2017）。由於本研究關注臉書社群編輯如何形塑人們對第四次臺海危機的認知，因此，將採取特定議題框架的方式，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如何國家危機期間強調或弱化哪些議題或面向。提出研究問題一：

RQ1: 針對第四次臺海危機的新聞貼文，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及各框架的關鍵詞為何？

三、 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評估指標

臉書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ons），是臉書為了讓使用者得以用新穎、簡單的方式來與臉書發文者、內容或其他使用者進行情緒互動，在原本按讚（like）的功能上進行擴充，加入了多種類似表情符號的情緒反應按鈕，於 2016 年新增大心（love）、哈（haha）、哇（wow）、嗚（sad）、怒（angry），並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又再新增加油（care）情緒反應，目前共計七種情緒反應（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值得一提的是，臉書情緒反應不同於表情符號（emoji），臉書情緒反應是臉書平臺預設的功能，讓使用者得以與內文、其他使用者互動，而表情符號則是可以使用者自由編輯加入文字訊息中，提供協助表達情感、強調訊息、調節語調的功能（同上引）。

許多學者對臉書情緒反應的不同稱呼，凸顯出臉書情緒反應的特殊性，如 Carr et al.（2018）將之稱為「一鍵回饋線索」（one-click feedback cues），Eberl et al.（2020）稱為「帶有情緒標籤的反應」（emotionally labeled responses），Sturm Wilkerson et al.（2021）則從可供性的觀點，將之稱為「情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從上述的不同稱呼可知，臉書情緒反應可提供類似語言的數位功能（paralinguistic digital affordance），使用者可以透過一個極為簡單的按鈕進行回饋，相較於留言，是認知付出較低、輕度參與的互動行為；同時，一鍵也反映出情緒間的互斥性，使用者只能擇一種最為貼切的情緒，讓人們得以表達更為細緻的情緒，而非意義較為鬆散的按讚或是多元選擇。這些情緒反應不僅讓使用者、平臺、社群行銷經營者得以了解臉書使用者更細緻的情緒變化，對於研究者而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早期研究多關注留言、分享行為，按讚數被視為互動參與度指標的一環（Mocanu et al., 2015; Rauschnabel et al., 2012）；然而，隨著臉書情緒反應的擴充，許多研究者回應「新聞學向情緒轉」（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的呼籲，從情緒的觀點探討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領域上的可能性與潛力（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本研究將臉書情緒反應的相關研究歸納為三個取徑：第一種是從文本內容或語法結構探討引起臉書情緒反應的因素，此類研究多以臉書爬蟲所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如 Sturm Wilkerson et al.（同上引）基於情商理論（the 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收集 2016 年美國選舉期間偏左、偏右超政黨臉書新聞粉絲專頁的 4,236 則貼文，探討政治主題、修辭、風格、情緒訴求如何引起不同的情緒反應。第二種研究取徑則是

探討臉書情緒反應對於使用者態度或行為的影響，如 Masullo & Kim（2021）透過網路實驗法，探討不文明更正訊息上的按讚數和按怒數是否會影響人們對於更正訊息的可信度與更正效果。第三種研究取徑則從臉書使用者的角度，探討其使用不同臉書情緒反應的原因，如 Scott et al.（2020）透過問卷調查法探討五大人格特質理論與自戀人格如何影響人們使用不同的臉書情緒反應。

然而，臉書情緒反應包含讚、大心、哈、哇、嗚、怒、加油等七個情緒反應，並非所有情緒反應都是研究者分析的目標。研究者指出在臉書情緒反應中，大心反應可確切歸類為正面情緒，且怒、嗚反應可明確歸類為負面情緒（De León & Trilling, 2021; 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2020）；哈、哇反應則可能被用於正面或負面（如諷刺）的表達，因此，較難以歸類（Jost et al., 同上引）；而讚則是使用原因模糊性最高的臉書情緒反應，Gerlitz & Helmond（2013）指出按讚可能是表達不同的情緒反應，如興奮、認同、同情、了解或諷刺，因此，除了早期探討臉書按讚經濟或是互動參與率，在探討情緒研究中較少將讚反應納入研究。

尤其，近年社群媒體被視為挑起網路論戰、民粹主義、態度極化、同溫層、假新聞的溫床，因此，許多政治傳播相關研究特別關注「怒」與「大心」臉書情緒反應在政治情境中的作用，以呼應憤怒與喜悅情緒，或負面與正面的情緒（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2020; Muraoka et al., 2021）。Eberl et al.（同上引）研究發現貼文內容的正、負面價性與臉書情緒反應相關，正面內容會引起較高的大心反應，而負面內容會影響較多的怒反應。也就是說，當在危機情境中，如果媒體在報導戰爭、恐怖主義或犯罪等負面事件時，事件本身就容易引發負面情緒，但若能透過報導傳達熱情或是希望的正面訊息，便能提高民眾的正面情緒。因此，本研究以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的新聞貼文作為分析文本，以臉書情緒反應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作為情緒指標，分析臉書社群編輯在國家危機期間的貼文如何影響臉書使用者的正、負面情緒趨勢，藉以觀察臉書社群編輯在危機情境下在新聞專業倫理與行銷上的矛盾定位。本研究認為雖然國家危機本身為負面事件，可能會產生較高的負面情緒，但臉書社群編輯是否也會試圖報導正面訊息，安撫民眾、引起希望、喜悅的正面情緒。故將透過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評估指標，針對臉書社群編輯在國家危機期間的角色，提出研究問題：

RQ2: 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貼文引起（a）大心反應；（b）怒反應的情緒趨勢為何？

四、 臉書使用者因應危機的情緒－認知框架效應

將臉書情緒反應應用於框架效應時，本研究整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效應，提出「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來探討臉書使用者的框架效應，其包含臉書社群編輯與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關係、以及臉書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關係。Sturm Wilkerson et al.（2021）指出臉書情緒反應具有情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代表「可以表達情緒，同時也可以被情緒影響」（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換言之，其認為臉書情緒反應不僅讓臉書使用者得以透過臉書預設的情緒按鈕來針對內容表達不同的情緒，同時，也是一種影響他人被情緒影響的線索，進而激發更多的情緒。

首先，在臉書社群編輯與使用者的框架互動關係方面，許多研究者指出框架效應不僅是認知過程的影響，其更應考量情緒評估的過程（Kühne et al., 2015; Lee & Chen, 2021）。Kühne et al.（同上引）指出情緒的評估理論很適合用來解釋新聞框架如何影響情緒，其認為情緒的評估可能藉由有意識的認知評估或衡量，產生情緒反應，也可能透過無意識的狀態下，因新聞框架自動活化了個人過去情緒經驗，而產生情緒反應，這兩種途徑凸顯出框架效應具有認知和情緒的雙重特性。誠如 Nabi（2003）所言，某些特定的詞彙、圖像經常和某一組情緒相連結時，這個連結就會形成一種穩定的「情緒—認知結構」（affective-cognitive structure），導致人們直覺的對某些詞彙產生相連結的情緒反應。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情緒—認知框架」（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定義為「臉書使用者對於不同的認知框架會因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心理途徑產生情感反應，可反映出該情感反應的認知結構」。由於本研究關注大心反應與怒反應，其在政治傳播中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意涵，大心反應是針對訊息、議題或發文者表達極度正面的情緒，而怒反應則是表達不滿、對抗的強烈情緒（Eberl et al., 2020），因此，透過情緒—認知框架效應，本研究透過分析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所產生怒反應與大心反應，即可推知正面情緒的使用者在想什麼、負面情緒的使用者在想什麼。因此，提出研究問題：

RQ3: 引發（a）大心反應；（b）怒反應的第四次臺海危機之主要情緒—認知框架為何？

其次，本研究認為情緒—認知框架可用來檢視臉書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關係。不同於過去研究僅探討框架者與被框架者間的關係，本研究認為社群媒體的特性提供使用者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讓使用者不再是被動接收的框架者，也可能成為主動的框架者，如 Siapera et al.（2018）指出社群媒體的可供性讓使用者們得以透過集體行為來共同架構論述框架，稱為網絡化框架（networked framing），因此，其研究推特上使用者關於難民議題的推文，來探討使用者們如何共構網絡化框架。然而，當前研究多關注社群媒體上的發文、留言、標籤等文字類型的框架效應（Siapera et al., 同上引 ; Zhao & Wang, 2022），卻忽略臉書情緒反應亦是意見表達的一種形式（Pang et al., 2016）。臉書情緒反應可被作為一種策略性的使用與意見表達（Masullo & Kim, 2021; 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同時，臉書情緒反應也可以作為一種捷思性思考的影響線索（Masullo & Kim, 同上引）。因此，本研究認為臉書情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可作為透過一鍵表達意見，作為一種宣稱，換言之，怒反應與大心反應不僅是對媒體認知框架表達意見，同時也是在對其他臉書使用者表達意見，試圖引起其他使用者的情緒反應，導致怒反應和大心反應的使用者產生一種框架競爭的效應。故提出研究問題：

RQ4: 針對不同的第四次臺海危機情緒—認知框架，引發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程度是否有差異？

RQ5: 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第四次臺海危機之情緒—認知框架的互動關係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 資料收集

本研究使用由臺灣意藍公司所開發的 Opi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進行資料收集，該資料庫收錄 12 萬個以上的頻道內容（包含社群網站、討論區、新聞網站、部落格、問答網站等），透過 24 小時不間斷地爬文，獲取較全面性

的網路輿情資料，可提供文字探勘研究所需的資料來源（意藍資訊，n.d.）。因此，本研究透過該資料庫收集臉書新聞頻道與第四次臺海危機的相關貼文，使用關鍵字檢索與設定媒體頻道的功能，以「裴洛西、佩洛西、波洛西、共軍、解放軍、軍演、軍事演習、軍事訓練、臺海、兩岸」為關鍵字，收集由 2022 年 7 月 20 日 8 月 20 日一個月期間臉書粉絲專頁的新聞貼文與互動指標數據（如臉書情緒反應數、分享數、留言數等），蒐集來自 443 個媒體頻道共 26,781 筆臉書貼文。接著，在 443 個媒體頻道中篩選有超過 100 萬粉絲數的新聞媒體，以代表我國臉書平臺上的主要新聞媒體（見附錄），最後，獲得來自 18 個粉絲專頁共計 6,145 筆臉書貼文，作為本研究分析資料。

本研究資料收集時間界定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一個月，以了解第四次臺海危機前、中、後不同時期的變化。近年來，中共持續強化對臺的軍事威脅，透過解放軍共機擾臺與軍艦繞臺巡航等行動，持續加深兩岸局勢的緊張，然而，8 月 2 日至 8 月 3 日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訪臺（公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11 日 a），觸發中共發起 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的鎖臺軍事演習與 8 月 8 日至 8 月 10 日中共東部戰區演習活動（同上引，2022 年 8 月 11 日 b），讓兩岸間軍事衝突危機升高到前所未有的景象，戰事一觸即發，國內、外媒體將此次事件稱之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曾筠淇，2022 年 8 月 3 日；Suorsa & U-Jin, 2022），因此，本研究將 7 月 20 至 8 月 1 日、8 月 2 日至 8 月 10 日、8 月 11 日至 8 月 20 日區分為危機前、中、後階段，以檢視危機不同階段框架效應的變化。

二、 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臉書社群編輯的貼文定義為「臉書社群編輯針對新聞事件所撰寫的標題、引言、摘要、眉批或是標籤，以吸引使用者點閱、互動、留言」，換言之，本研究關注臉書社群編輯如何透過自身的語言在貼文上描述第四次臺海危機，而非是其所引用或轉貼的相關連結或是新聞正文。由於 Opi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所爬取的臉書貼文內容中會註記「以下為轉貼文章」做為區隔，因此，本研究將刪除含「以下為轉貼文章」的後方內容。同時，針對未完整抓取的貼文內容，透過 Python 爬蟲的方式進行爬取與整理，以確保資料分析的完整性。

其次，針對臉書社群編輯的貼文進行資料前處理，以正規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進行文字前處理，篩選掉網址、停用詞等雜訊，接著使用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所開發的 CKIP Tagger 開源中文處理工具來進行斷詞（Li, P. H. et al., 2020），在斷詞時使用 n-grams，進行多詞的匹配，以確保內容斷詞的正確度。

三、 分析策略

針對研究問題一，為了解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建構的新聞框架，本研究將採用自動化主題模型分析中的 LDA 主題模型分析，來探討臉書社群編輯的新聞框架。LDA 主題模型分析是一種非監督式的機器學習，電腦會根據文本中詞彙的分布來辨識某一組詞彙經常共同出現（co-occurrence）的模式，透過電腦自動運算，可判別整體文本的潛在主題分類、各主題的共現詞彙與各則文本的主題權重（傅文成等人，2021；Jacobi et al., 2016）。Jacobi et al.（同上引） 指出相較於傳統由人工編碼的內容分析，LDA 主題模型分析是能快速分析出大量新聞文本新聞內容主題與趨勢的有效工具。以框架研究而言，框架是透過強調或排除某些的關鍵字、詞彙等方式，來詮釋特定新聞事件本身（Valenzuela et al., 2017），而 LDA 結果可呈現某個特定主題如何反覆強調特定詞彙的組成與共現，形塑民眾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同時，根據 Nabi（2003）情緒—認知結構的觀點，特定一組詞彙的共現也經常與某一種情緒相連結，因此，LDA 所產生的主題屬於特定議題框架，貼近該新聞事件的特殊性，且 LDA 所產生的主題結果不僅可用來檢視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亦可進一步檢視對使用者所產生的情緒—認知框架效應。本研究在執行 LDA 主題模型分析時，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庫中 Gensim 套件（Řehůřek, 2022），進行主題模型分析（McCallum, 2002），以判斷臉書社群編輯貼文所建構的新聞框架，同時，為了解各框架的關鍵詞，則透過機器分類各主題後，列出權重前 15 個關鍵詞，以了解社群編輯在該框架最常使用的用語。

針對研究問題二，為了解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貼文引起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情緒趨勢，本研究將採用 Muraoka et al.（2021）方式，計算每則臉書社群編輯貼文的大心反應比例和怒反應比例，並以每日為單位做平均分析，計算當日的情緒反應值，以此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例如，有一則貼文獲得 15 個讚、2 個大心、4 個哈、6 個哇、8 個嗚、10 個怒、5 個加

油，則該貼文獲得的大心反應比例為 2 ／ 50，而怒反應比例為 10 ／ 50；接著計算當日的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情緒值，假設當日有 5 則貼文，其大心反應比例分別為 0.2、0.3、0.4、0.5、0.6，而怒反應比例分別為 0.5、0.6、0.7、0.8、0.9，則當日的大心反應值和怒反應值分別為 0.4 和 0.7。此外，將援引 Muraoka et al.（同上引）所發展的情緒極化指標（emotional polarization），其運用臉書情緒反應中大心反應和怒反應間的對比差異，來凸顯該則貼文所引起的情緒極化程度。當情緒指標小於 1 時，代表大心反應高於怒反應，而當情緒指標大於 1 時，則怒反應高於大心反應。同樣的，在檢視情緒極化趨勢時，情緒極化值亦以每日為單位做平均分數計算。情緒極化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text{情緒極化指標} = \frac{\text{怒反應比例}+1}{\text{大心反應比例}+1}$$

針對研究問題三，為了解引發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第四次臺海危機之主要情緒—認知框架，本研究將「情緒—認知框架」操作型定義為「伴隨不同臉書情緒反應程度的新聞框架」，故透過計算每個主題的怒反應數（或大心反應數）佔整體怒反應數（或大心反應數）的百分比，即可得知臉書使用者對於不同新聞框架的怒反應（或大心反應），不僅可以得知哪個新聞框架是引起最高怒反應和大心反應，同時，也可推知怒反應和大心反應的使用者對於不同新聞框架的負面情緒與正面情緒情形。

針對研究問題四，為了解不同的第四次臺海危機情緒—認知框架，引發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程度是否有差異，本研究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個別新聞框架在大心反應數與怒反應數是否有顯著差異。

針對研究問題五，援以雙歧態度的公式來探討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互動關係。雖然雙歧態度公式多用於分析個人同時擁有高度正面與高度負面的雙重情緒（張卿卿，2017；Thompson & Zanna, 1995），但本研究認為亦可適用於探討個別新聞框架中怒反應與大心反應間的互動關係。首先，計算每個新聞框架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平均值，接著使用雙歧態度公式計算出每個新聞框架的情緒雙歧值。因此，當新聞框架的情緒雙歧值大於 0 且正值越大時，代表該新聞框架同時有許多使用者透過怒反應和大心反應在表達情緒、競爭意見；若情緒雙歧值等於 0，代表該新聞框架沒有使用者回饋怒反應和大心反應；若情緒雙歧值低於 0 且負值越大時，代表該新聞框

架由單一情緒（怒反應或大心反應）所主導，沒有另一情緒出現。計算公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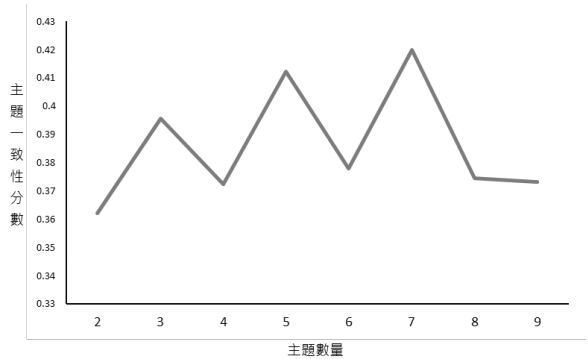
$$\text{新聞框架情緒雙歧值}=\frac{（\text{新聞框架大心反應數平均值}+\text{怒反應平均值}）\div 2}{|\text{新聞框架大心反應數}-\text{怒反應數}|}$$

肆、分析結果

一、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建構的新聞框架

針對研究問題一，本研究以 LDA 主題分析模型來檢視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首先，為決定新聞框架數量，透過 Gensim 套件中 Mallet LDA 工具來優化主題模型計算過程，經過迭代計算 2 至 9 個主題數量的主題一致性分數，發現模型一致性分數最高者為 7 個主題（見圖 1），因此，以 7 個主題分類作為新聞框架。

圖 1：主題一致性分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根據框架理論中強調框架的概念，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如何呈現不同的新聞面向，並如何強調特定新聞框架，可透過 LDA 主題分析的結果來說明。檢視各主題的前 15 個共現關鍵詞與對應的新聞貼文內容來決定新聞框架命名（見表 2）。依據新聞框架的貼文數量凸顯臉書社群編輯愈強調的新聞框架的重要性，依序說明如下：

表 2：各主題／新聞框架的關鍵詞

新聞框架	貼文數量（百分比）	關鍵詞
主題一 解放軍軍演	1160（18.9%）	‘0.097*“軍演” + 0.075*“共軍” + 0.035*“解放軍” + 0.024*“國防部” + 0.019*“國軍“ + 0.018*“飛彈” + 0.013*“美軍” + 0.013*“演習” + 0.008*“軍艦” + 0.007*“空軍” + 0.007*“戰機” + 0.007*“持續” + 0.007*“海軍” + 0.006*“共機” + 0.006*“海域”’
主題二 緊張局勢	1115（18.1%）	‘0.027*“中共軍演” + 0.016*“綠豆糕” + 0.014*“民眾” + 0.014*“快訊” + 0.014*“真的” + 0.014*“波洛西” + 0.012*“瑪格麗特” + 0.012*“曝光” + 0.011*“中國大陸” + 0.008*“抗議” + 0.008*“路摸思編” + 0.007*“蘋果解煩憂解無聊” + 0.007*“緊張” + 0.007*“夏立言” + 0.007*“粉紅”’
主題三 裴洛西訪臺	963（15.7%）	‘0.263*“裴洛西” + 0.021*“蔡英文” + 0.013*“美國眾議院議長” + 0.013*“行程” + 0.009*“直播” + 0.009*“小時” + 0.008*“live” + 0.007*“南韓” + 0.006*“nancy_pelosi” + 0.006*“關注” + 0.006*“總統府” + 0.006*“胡錫進” + 0.006*“裴洛西 Pelosi nancy” + 0.005*“今晚” + 0.005*“晚間”’
主題四 美中臺關係	812（13.2%）	‘0.073*“美國” + 0.022*“北京” + 0.014*“回應” + 0.011*“訪問” + 0.010*“拜登” + 0.010*“臺北” + 0.010*“白宮” + 0.009*“總統” + 0.008*“警告” + 0.008*“訪問臺灣” + 0.008*“政治” + 0.008*“挑釁” + 0.008*“民主” + 0.008*“報導” + 0.007*“習近平” ’
主題五 臺海問題	730（11.9%）	‘0.081*“中共“ + 0.032*“臺海“ + 0.029*“大陸“ + 0.023*“兩岸“ + 0.014*“專家“ + 0.013*“軍事“ + 0.010*“政府“ + 0.010*“威脅“ + 0.008*“危機“ + 0.007*“臺灣“ + 0.007*“臺海危機“ + 0.007*“封鎖“ + 0.006*“海峽中線“ + 0.006*“關係“ + 0.006*“和平“ ‘
主題六 經濟影響	692（11.3%）	‘0.061*“中國” + 0.044*“臺灣” + 0.019*“日本” + 0.012*“影響” + 0.011*“臺積電” + 0.010*“國際” + 0.008*“新聞” + 0.008*“全球” + 0.008*“世界” + 0.007*“臺股” + 0.007*“引發” + 0.007*“未來” + 0.006*“第一” + 0.006*“網友” + 0.006*“制裁”’
主題七 各界反應	673（11.0%）	‘0.130*“臺灣” + 0.037*“中國” + 0.031*“佩洛西” + 0.015*“支持” + 0.015*“外交部” + 0.011*“國家” + 0.008*“掌上明珠” + 0.008*“國民黨” + 0.008*“擔心” + 0.006*“軍方” + 0.006*“中國大陸” + 0.005*“民進黨” + 0.005*“代表” + 0.005*“希望” + 0.004*“外界”’

註：‘0.097*“軍演”表示「軍演」在該主題內佔比為 9.7%，依此類推。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臉書社群編輯最主要強調的新聞框架為主題一，共有 1,160 則貼文（18.9%），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中共軍演的活動動態，故本文將主題一的新聞框架命名為「解放軍軍演」。關鍵詞包含軍演、共軍、解放軍、國防部、國軍、飛彈、美軍、演習、軍艦、空軍、戰機、持續、海軍、共機、海域，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對於大陸持續的軍演，美軍也是持續警戒＃軍演＃共軍＃美軍＃雷根號（TVBS 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9 日）」。

第二個新聞框架有 1115 則貼文（18.1%），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

此主題強調裴洛西訪臺造成兩岸情勢緊張且不斷更新現況，故本文將主題二的新聞框架命名為「緊張局勢」。關鍵詞包含中共軍演、綠豆糕、民眾、快訊、真的、波洛西、瑪格麗特、曝光、中國大陸、抗議、路摸思編、蘋果解煩憂解無聊、緊張、夏立言、粉紅，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美眾議長裴洛西將抵臺 臺海危機再起？該害怕嗎？（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2 日）」。值得一提的是，在「緊張局勢」新聞框架中的關鍵詞出現三個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如「綠豆糕」《三立新聞》、「路摸思編」《三立新聞》、「蘋果解煩憂解無聊」《蘋果即時新聞》，進一步檢視其發文內容與風格，發現其善用隱喻、誇張、情緒性用語，且以擬人化的方式與網友互動，如「#綠豆糕：眞的是穿粉紅嗆小粉紅嗎？那小粉紅不就要玻璃心碎滿地了#裴洛西#穿搭（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4 日）」、「兩岸緊張、藍營訪中引民怨　藍青年連署 10 多人喊停#路摸思編：自家青年都挺不起來…（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11 日）」。

第三個新聞框架有 963 則貼文（15.7%），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裴洛西訪臺的現場與相關活動，故本文將主題三的新聞框架命名為「裴洛西訪臺」。關鍵詞包含裴洛西、蔡英文、美國眾議院議長、行程、直播、小時、live、南韓、nancy_pelosi、關注、總統府、胡錫進、裴洛西 Pelosi nancy、今晚、晚間，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LIVE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今晚抵臺蘇貞昌最新說明〉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亞洲行深受各界矚目，據了解，她將於今天（2 日）晚上 22 時 20 分抵達松山機場，並投宿於君悅酒店，預計明天（3 日）下午離開臺灣。 #裴洛西#蘇貞昌#眾議院（中時新聞網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2 日）。

第四個新聞框架有 812 則貼文（13.2%），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美中臺關係如何因裴洛西訪臺產生變化，故本文將主題四的新聞框架命名為「美中臺關係」。關鍵詞包含美國、北京、回應、訪問、拜登、臺北、白宮、總統、警告、訪問臺灣、政治、挑釁、民主、報導、習近平，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拜習通話：美國總統拜登臺北時間 28 日晚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 2 個多小時通話，兩人 4 個月來的首次對話，背

景是臺灣問題再度讓美中對峙升溫。面對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可能造訪臺灣，北京當局不斷升高警告（天下雜誌臉書粉專，2022 年 7 月 30 日）。

第五個新聞框架有 730 則貼文（11.9%），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本次軍演在兩岸關係歷史上的定位，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故本文將主題五的新聞框架命名為「臺海問題」。關鍵詞包含中共、臺海、大陸、兩岸、專家、軍事、政府、威脅、危機、臺灣、臺海危機、封鎖、海峽中線、關係、和平，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完整收聽專家如何看臺海危機？-- 從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經過兩天一夜的旋風式訪臺後，中國『氣到跳腳』，宣布在臺周圍 6 海域啓動大規模的實彈軍事演習，一連串恫嚇動作不斷，也讓人回想起 1996 年臺海危機，甚至有學者專家直言，此次危機恐怕還超越當年（今周刊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19 日）。

第六個新聞框架有 692 則貼文（11.3%），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中共軍演對我國與國際的經濟影響，故本文將主題六的新聞框架命名為「經濟影響」。關鍵詞包含中國、臺灣、日本、影響、臺積電、國際、新聞、全球、世界、臺股、引發、未來、第一、網友、制裁，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臺積電劉德音：戰爭下沒有贏家〉

拜習第五次通話，臺灣議題再度成爲全球焦點。關鍵時刻，8 月 1 日臺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接受《CNN》專訪，中國是否可能武力犯臺，以及臺積電領先全球的秘密。《遠見》整理三大重點一次看。?? 重點一：若中國侵臺，晶片就不再是重點 ?? 重點二：中國和臺灣在供應鏈上緊密，未必是壞事 ?? 重點三：臺灣和臺積電受益於和平與人才（遠見雜誌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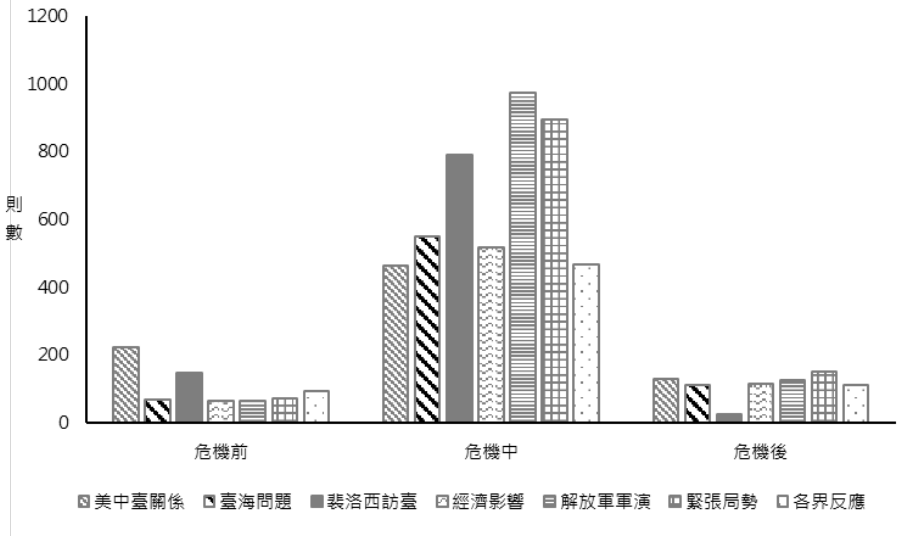
貼文則數最低的新聞框架僅有 673 則貼文（11.0%），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各界針對裴洛西來臺的擔憂與反應，故本文將主題七的新聞框架命名為「各界反應」。關鍵詞包含臺灣、中國、佩洛西、支持、外交部、國家、掌上明珠、國民黨、擔心、軍方、中國大陸、民進黨、代表、

希望、外界，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小英要大家別擔心，但事實就是別的國家已經開始擔心了＃菲律賓＃撒僑＃兩岸＃民進黨（中時新聞網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8 日）」。此外，在此新聞框架中的關鍵詞亦發現一個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為「掌上明珠」《三立新聞》，此社群編輯的特色在於善用引用政治人物談話內容來為使用者劃重點，如「＃掌上明珠：吳釗燮提到，現在能做的就是向中國展現臺灣的毫無畏懼！（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8 日）」、「＃掌上明珠：安倍名言：『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倍＃日本（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9 日）」。

綜上所述，臉書社群編輯所強調的認知框架依序為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裴洛西訪臺、美中臺關係、臺海問題、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共七個新聞框架，由此可知，在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聚焦於軍演動態、緊張局勢與裴洛西動態，凸顯出其能在危機期間扮演告知重要訊息的角色，同時，也善用動態更新發布的功能，持續發布最新情況與動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關鍵詞中出現許多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如緊張局勢框架中的「綠豆糕」《三立新聞》、「路摸思編」《三立新聞》、「蘋果解煩憂解無聊」《蘋果即時新聞》、各界反應框架中的「掌上明珠」《三立新聞》，檢視這些包含臉書社群編輯暱稱的發文內容與風格，發現其善用隱喻、引用名人、誇張、情緒性用語等特色，且以擬人化方式與網友互動，尤其是《三立新聞》特別明顯。

此外，進一步檢視在危機不同階段的新聞框架（見圖 2），研究發現在危機前階段，以美中臺關係框架（221 則）最高，裴洛西訪臺框架次之（148 則），其餘的框架均未達 100 則，可見危機前期多聚焦於裴洛西來臺的可能性與行程安排，並將因此造成美中臺關係的變化；在危機中階段，以解放軍軍演（973 則）、緊張局勢（895 則）、裴洛西訪臺（790 則）的新聞框架為主，其他新聞框架均未高於 500 則，由此可見，在危機中期聚焦於裴洛西訪臺的行程，同時，也因裴洛西實際造訪臺灣而引起中共對臺實施軍演，造成緊張局勢、牽動經濟影響、興起臺海問題歷史上的第四次臺海危機、引發各界擔心開戰的可能性；在危機後階段，除了裴洛西訪臺框架（25 則），其他相關框架仍持續關注，均高於 100 則，其中以緊張局勢框架最高（150 則），可見在危機後期雖然裴洛西已離開臺灣（裴洛西訪臺框架最低），但卻造成國人反思兩岸軍事層面上的緊張局勢應該如何因應。

圖 2：危機各階段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的情緒反應趨勢

針對研究問題二，本研究探討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貼文引起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情緒趨勢。首先，以第四次臺海危機前、中、後為期一個月來檢視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情緒反應趨勢，根據圖 3 可知，以情緒為發文導向的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引起的怒反應比例普遍高於大心反應比例，換言之，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所引起的負面情緒高於正面情緒。其中，怒反應比例較高的時間點分別為 7 月 24 日與 8 月 10 日，檢視貼文，發現 7 月 24 日聚焦於推測裴洛西訪臺可能會升高中共對臺軍事威脅，而 8 月 10 日則聚焦於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於中共軍演期間訪中。雖然整體情緒趨勢為負面，但卻發現在 7 月 29 日、8 月 12 日、8 月 17 日三日，大心反應比例高於怒反應比例，檢視貼文，發現 7 月 29 日聚焦於討論裴洛西訪臺的可能性、8 月 12 日聚焦於國際對中共的制裁、8 月 17 日聚焦於國防院民調指出半數國人認為美國未來會出兵助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整體趨勢怒反應比例高於大心反應，但是，在整體的臉書情緒反應中的比例並不高（大心反應比例介於 .004 至 .014；怒反應比例介於 .008 至 .028），因為多數民眾仍以按讚為主

（讚反應比例介於 .222 至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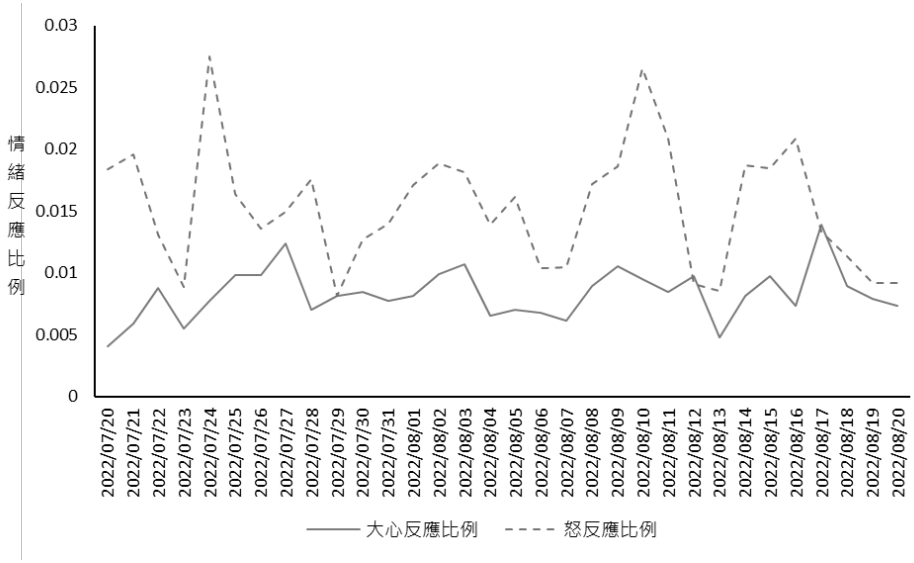
其次，進一步檢視危機不同階段，臉書社群編輯貼文所引起的情緒極化程度趨勢。根據圖 4 可知，無論是危機前、中、後階段，臉書社群編輯貼文所引起的情緒極化均大於 1，代表怒反應均高於大心反應；然而，本研究也發現相對於危機前和危機後階段，危機中的情緒極化程度相對較高，只是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示臉書社群編輯在危機中引發較高的負面情緒。

三、 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與臉書情緒反應描述性統計

在分析研究問題三至研究問題五之前，表 3 為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與其臉書情緒反應的描述性統計。在所有的新聞框架中，每則貼文的讚反應平均數介於 469.84 至 1139.18 個之間，大心反應平均數介於 3.59 至 20.71 個之間，怒反應平均數介於 4.82 至 15.56 個之間，嗚反應平均數介於 1.47 至 2.72 個之間，哇反應平均數介於 8.30 至 17.79 個之間，哈反應平均數介於 109.75 至 235.65 個之間。由此可見，在所有的情緒反應數中，以每則貼文獲得的讚反應平均數最高，其次為哈反應，第三為哇反應，接著才是本研究關注的大心反應與怒反應。雖然大心和怒反應平均數不如讚、哇、哈反應，但學者指出讚反應為模糊性最高的臉書情緒反應（Gerlitz & Helmond, 2013），哈、哇反應也難以歸類（Jost et al., 2020），因此，目前情緒反應的相關研究，尤其是政治傳播，仍關注大心與怒反應，代表正面與負面情緒（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同上引 ; Muraoka et al.,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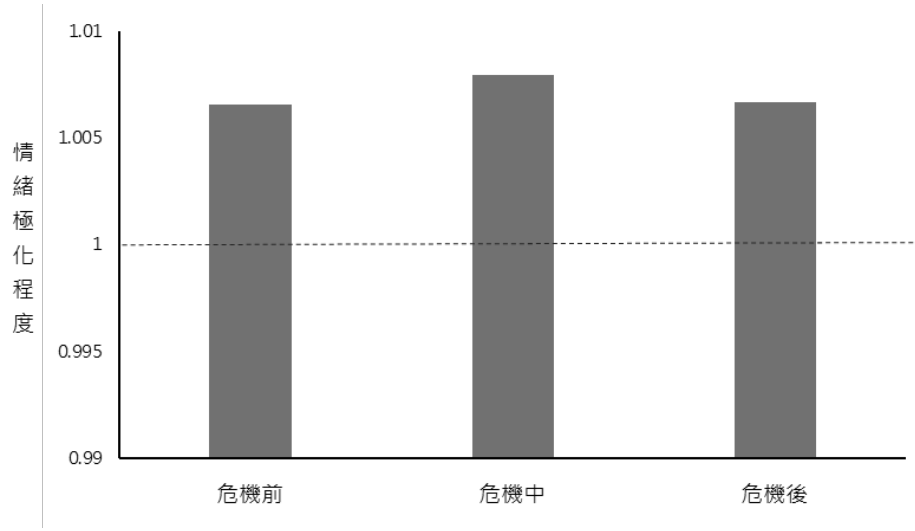
此外，從表 3 可知，平均每則貼文獲得 717.72 個讚、7.33 個大心、9.66 個怒、2.09 個嗚、13.07 個哇、181.92 個哈，換言之，每則貼文約有 931.79 個使用者提供不同的情緒反應，呼應近年研究臉書情緒反應的學者們（De León & Trilling, 2021; Jost et al., 2020; Muraoka et al., 2021）強調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方法上的優勢，也凸顯臉書情緒反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圖 3：危機期間當月的情緒反應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危機各階段的情緒極化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各新聞框架與其臉書情緒反應的描述性統計

新聞框架	新聞則數	讚	大心	怒	嗚	哇	哈
解放軍軍演	1160	661.49	4.24	8.29	2.34	17.13	174.65
緊張局勢	1115	910.96	5.88	15.56	2.72	17.79	235.65
裴洛西訪臺	963	1139.18	20.71	12.08	2.06	12.83	179.05
中美臺關係	812	498.22	4.73	8.67	1.47	8.30	175.78
臺海問題	730	492.96	4.08	4.82	1.93	9.54	109.75
經濟影響	692	469.84	3.59	5.76	1.83	9.34	186.62
各界反應	673	654.89	6.40	9.25	1.82	12.02	190.36
整體平均數		717.72	7.33	9.66	2.09	13.07	181.92

註：各情緒反應數值代表該新聞框架每則貼文的情緒反應平均數，計算方式：新聞框架中所有新聞貼文數量的該情緒反應數量加總後，再除以新聞則數。粗體字代表整體的情緒反應平均數。

四、 情緒—認知框架效應：臉書社群編輯與臉書使用者的框架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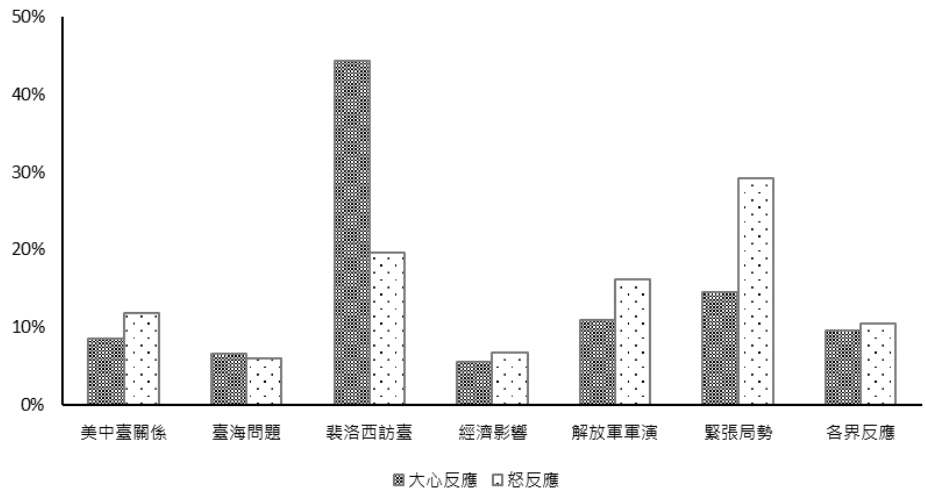
針對研究問題三，本研究認為透過分析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所產生怒反應與大心反應，即可推知怒反應的使用者在想什麼、大心反應的使用者在想什麼。本研究發現引起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依序為緊張局勢（29.22%）、裴洛西訪臺（19.59%）、解放軍軍演（16.20%）、美中臺關係（11.86%）、各界反應（10.48%）、經濟影響（6.71%）與臺海問題（5.93%）。然而，引起大心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則有所不同，依序為裴洛西訪臺（44.28%）、緊張局勢（14.55%）、解放軍軍演（10.93%）、各界反應（9.57%）、美中臺關係（8.53%）、臺海問題（6.62%）與經濟影響（5.51%）（見圖 5）。因此，回應研究問題三，引發大心反應的主要情緒—認知框架為「裴洛西訪臺」框架；而引起怒反應的主要情緒—認知框架為「緊張局勢」框架。進一步檢視所有貼文，發現裴洛西訪臺框架大心反應數較高的貼文為「裴洛西會晤蔡英文 英籍男於總統府外舉牌大喊：Taiwan is a country（# 蘇大俠）（即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3 日）」（大心反應數：2521），可見此框架引發臉書使用者正面情緒的可能原因在於裴洛西帶來的臺美友好關係與重大進展。相對而言，在緊張局勢框架中，引起怒反應數較高的貼文為：

> # 路摸思編：新黨 30 多人集結在君悅飯店外抗議　裴洛西將抵臺！新黨集結抗議高喊：滾出去　遭警舉牌警告（三立新聞臉書

粉專，2022 年 8 月 2 日）。（怒反應數：817）

可見此框架引起臉書使用者負面情緒的可能原因是裴洛西來臺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與軍事方面的緊張局勢。由此可見，在危機期間有兩派不同的意見，抱持正面情緒的使用者認為裴洛西訪臺是個正面事件，能對臺灣帶來正面影響；然而，抱持負面情緒的使用者則對於觸發的社會與兩岸軍事緊張感到不滿。

圖 5：臉書社群編輯引起使用者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 情緒—認知框架效應：臉書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

以下將從兩個面向來檢視正、負情緒使用者間的情緒—認知框架互動效應。首先，針對研究問題四，本研究試圖了解在不同新聞框架上，使用者們如何透過臉書情緒反應來表達相左的意見並試圖主導意見，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見表 4。結果發現怒反應數和大心反應數的平均值分別在美中臺關係（$t(811) = -3.35, p < .01$）、裴洛西訪臺（$t(962) = 2.45, p < .05$）、經濟影響（$t(691) = -2.54, p < .05$）、解放軍軍演（$t(1159) = -2.54, p < .001$）、緊張局勢（$t(1114) = -2.47, p < .01$）、各界反應（$t(672) = -2.01, p < .05$）等新聞框架上有顯著差異。

其中，除了裴洛西訪臺的新聞議題大心反應數平均值高於怒反應數平均值，其餘的新聞框架均是怒反應數平均值高於大反應數平均值。進一步檢視裴洛西訪臺框架在不同危機階段的情緒反應（見表 3），發現主因是危機中裴洛西如期訪臺，意味臺美重大外交進展，該階段的大心反應平均數（23.74）遠高於怒反應平均數（13.04），尤其貼文「裴洛西會晤蔡英文 英籍男於總統府外舉牌大喊：Taiwan is a country（# 蘇大俠）（即新聞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3 日）」，獲得裴洛西訪臺框架中獲得最高大心反應數，同時也是所有新聞框架中獲得最大心反應數的貼文。相較而言，其他新聞框架大多數的貼文則是負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高於正面情緒使用者，可見在美中臺關係、經濟影響、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各界反應的新聞框架上，則是負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高於正面情緒使用者，凸顯對社會、外交、經濟、軍事等面向上的不滿。

表 4：大心反應與怒反應在不同新聞框架的差異 *t* 檢定

新聞框架	大心反應數	怒反應數	自由度	*t* 值	*p* 值
	平均數（標準差）				
美中臺關係	4.73 (14.22)	8.67 (33.14)	811	-3.35**	.001
臺海問題	4.08 (11.08)	4.82 (11.48)	729	-1.36	.174
裴洛西訪臺	20.71 (116.80)	12.08 (27.28)	962	2.45*	.015
經濟影響	3.59 (12.73)	5.79 (20.89)	691	-2.54*	.011
解放軍軍演	4.24 (7.49)	8.29 (30.19)	1159	-4.76***	.000
緊張局勢	5.88 (29.47)	15.56 (131.06)	1114	-2.47*	.014
各界反應	6.40 (27.34)	9.25 (26.66)	672	-2.01*	.045

註：*p < .05, **p < .01,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針對研究問題五，檢視大心反應和怒反應使用者在情緒—認知框架上是否出現相互競爭的情形（見圖 6）。研究發現新聞框架情緒反應雙歧值依序為：裴洛西訪臺為 7.77、各界反應為 4.98、臺海問題為 3.71、美中臺關係為 2.76、經濟影響為 2.50、解放軍軍演為 2.22、緊張局勢為 1.03。這代表在裴洛西訪臺的新聞框架上同時有較高的大心反應數與怒反應數，凸顯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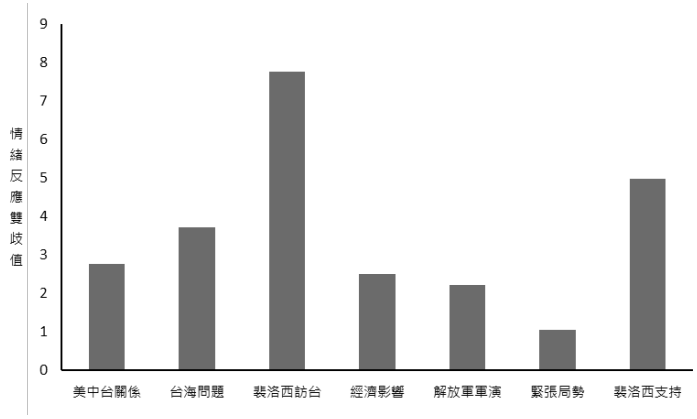
面和負面兩派情緒使用者在相互競爭聲量，進一步檢視情緒反應雙歧值較高的貼文為：

〈LIVE ／裴洛西舉行媒體互動會！美日臺 3 國記者提問〉

美日臺 3 國記者提問媒體們會問裴洛西什麼內容呢？一起來關心互動會的最新情況！（# 瑪姬麻吉）【相關新聞】表彰裴洛西挺臺、提升臺美交流　蔡英文頒「特種大綬卿雲勳章」……（ETtoday 新聞雲臉書粉專，2022 年 8 月 3 日）。（大心反應數：226；怒反應數：212）

代表在裴洛西訪臺框架的貼文同時有較高的大心反應數與怒反應數，凸顯出正面和負面兩派情緒使用者在相互競爭聲量，裴洛西訪臺對於國人來說是個爭議性最高的新聞框架；相反的，緊張局勢則是情緒反應雙歧值最低的新聞框架，怒反應數明顯高於大心反應數，突顯出在緊張局勢的新聞框架上，多數使用者展現較一致的負面情緒。

圖 6：正、負面臉書使用者對不同新聞框架的情緒反應雙歧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結果與討論

為探討社群編輯如何形塑第四次臺海危機，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發展「情緒—認知框架」概念，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對使用

者、使用者間的框架效應。收集國內主要臉書新聞粉絲專頁於 2022 年 7 月 20 至 8 月 20 日的貼文，共計 6,145 筆。

透過 LDA 主題模型分析判定新聞框架，主要研究發現有四：第一，危機期間民眾負面情緒反應普遍高於正面情緒；第二，臉書社群編輯建構七個新聞框架，依貼文則數高低來凸顯社群編輯對於第四次臺海危機所強調和弱化的面向，依序為「解放軍軍演」（強調中共軍演的活動動態）、「緊張局勢」（強調裴洛西訪臺造成兩岸情勢緊張且不斷更新現況）、「裴洛西訪臺」（強調裴洛西訪臺的現場與相關活動）、「美中臺關係」（強調美中臺關係如何因裴洛西訪臺產生變化）、「臺海問題」（強調本次軍演在兩岸關係歷史上的定位）、「經濟影響」（強調中共軍演對我國與國際的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強調各界針對裴洛西來臺的擔憂與反應）；第三，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大心反應；而緊張局勢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怒反應；第四，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具有高度競爭效應，同時有較高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本研究貢獻在於拓展框架者、框架效應的意涵，並運用真實世界的臉書後設資料，發展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填補框架理論的研究缺口。

首先，本研究運用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測量指標來檢視第四次臺海危機前、中、後不同階段使用者的情緒反應，發現整體的怒反應比例高於大心反應，代表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的貼文引起民眾的負面情緒高於正面情緒。此結果呼應過去研究指出新聞媒體具有負面偏見（De León & Trilling, 2021; Heiss et al., 2019），新聞媒體偏好報導負面訊息吸引閱聽人的注意，尤其是政治相關新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臉書社群編輯的獨特定位，雖然是新聞組織發布新聞的人，但卻以行銷商業邏輯，採取情緒導向的發文策略（劉昌德，2020；Lischka, 2021；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尤其，研究發現在新聞框架的關鍵詞中出現臉書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或標語，如「綠豆糕」《三立新聞》、「路摸思編」《三立新聞》、「蘋果解煩憂解無聊」《蘋果即時新聞》、「掌上明珠」《三立新聞》，檢視其貼文內容，發現其善用隱喻、引用名人、誇張、情緒性用語，呼應過去研究（劉昌德，同上引；劉慧雯，2020）。進一步檢視貼文內容，雖然臉書社群編輯偏好情緒性用語來挑動民眾開心或憤怒的情緒，但從研究問題三的結果可知，民眾的正面情緒（大心反應數高）主要是因為裴洛西帶來的臺美友好關係與重大進展，而負面情緒（怒反應數高）則主要是因為裴洛西來臺所產生的社會混亂與軍事緊張，因此，本研究推論民眾正、負面的情緒是因為本次危機期間的不同

事件所導致，至於臉書社群編輯情緒性用語的影響仍有待未來研究。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臉書社群編輯發揮社會功能，包含即時傳達第一手資訊（如告知裴洛西抵臺的即時訊息）、現況分析（如分析裴洛西訪臺如何影響兩岸未來發展）、安撫民心（如釋出美國將協防臺灣的訊息）、及提供指引方針（如提供軍事緊張局勢的買房策略），綜上所述，雖然劉昌德（同上引）憂心臉書社群編輯可能對媒體第四權與民主政治造成衝擊，但從本研究結果可知，臉書社群編輯仍發揮社會公器角色，尤其是當代民眾習慣將社群媒體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管道（Newman et al., 2022），當人們難以獲得第一手危機資訊時，社群編輯在商業行銷邏輯與新聞專業邏輯的拉扯下，讓民眾有便利、即時的管道獲得最新的危機資訊，實屬不易。

其次，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分別探討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與不同情緒使用者的情緒—認知框架。本研究發現臉書社群編輯建構七個新聞框架，並以「解放軍軍演」為主要的強調框架，在所有貼文中佔將近兩成的報導比例，相對而言，報導比例最低的是「各界反應」框架，凸顯出雖然臉書社群編輯最強調中共軍演的活動動態，但也試圖弱化各界擔心可能開戰的論述，以降低國人的恐慌；然而，「裴洛西訪臺」為正面情緒的使用者的主要框架，在所有大心反應中佔約四成五比例，檢視貼文，推論引發臉書使用者正面情緒的原因在於裴洛西帶來的臺美友好關係與重大進展；「緊張局勢」則為負面情緒的使用者的主要框架，在所有怒反應中佔約三成比例，檢視貼文，推論引發臉書使用者負面情緒的原因在於裴洛西來臺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與軍事方面的緊張局勢。

由此可知，框架建構者的臉書社群編輯和被框架的使用者並沒有一致的框架認知，這個結果呼應 Kühne et al.（2015）將情緒的評估理論應用於框架理論的觀點，其認為新聞框架會透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心理途徑與個人過去的情緒經驗產生互動，進而對新聞框架表達出不同的情緒評估，也就是說，臉書社群編輯雖然可以建構臉書使用者對第四次臺海危機的認知結構，但使用者卻會因為不同的情緒評估而產生不同的情緒—認知框架，並且因情緒來決定特定新聞框架的重要性。此外，也呼應 Nabi（2003）情緒—認知結構的論述，凸顯出框架者試圖建構的情緒—認知結構會因人而異，因此，未來研究在探討情緒—認知框架的形成時，應考量個人先前態度與情緒經驗。

第三，本研究運用情感可供性概念，延伸出使用者間將透過情緒—認知框架來表達意見與相互爭取話語權的現象。發現使用者對於裴洛西訪臺的新

聞框架，雖然正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顯著高於負面情緒使用者，是正面情緒使用者的主要框架，但此框架同時也具有高度競爭效應，正面與負面情緒皆高的情形，進一步檢視此框架的貼文，發現民眾開心裴洛西如期訪臺，尤其，當貼文中強調臺美重大外交進展、臺灣主權受國際重視時，會激起較高的正面情緒，但是，當貼文僅強調裴洛西訪臺行程，未同時強調此行程帶來的正面效益時，正、負面情緒的聲量便會較相近，凸顯出正面和負面兩派情緒使用者在相互競爭聲量，裴洛西如期訪臺對於國人來說是個爭議性最高的新聞事件；然而，在美中臺關係、經濟影響、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各界反應的新聞框架上，則是負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高於正面情緒使用者。由此可知，裴洛西訪臺對國人而言，具有極高的爭議，雖然凸顯普遍支持裴洛西來臺的氛圍，但仍出現支持和反對者相互對峙的景象，而反對者則是在美中臺關係、經濟影響、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各界反應的新聞框架上佔上風，凸顯出反對者不滿裴洛西來臺引起社會、外交、經濟、軍事等問題。

本研究貢獻在於拓展框架者、框架效應的意涵，並運用真實世界的臉書後設資料，發展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填補框架理論的研究缺口。首先，在框架者的部分，本研究因應媒體環境的變化，關注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過去研究多關注傳統新聞媒體，然而，對於因應社群媒體發展所新設的社群編輯框架研究仍相當有限（劉慧雯，2020；Wasike, 2013），尤其是當前研究指出社群編輯在本質上兼具新聞守門與商業導向的雙重特性，與堅守新聞價值的傳統新聞記者不同（劉昌德，2020；Lischka, 2021；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且其經常以畫重點、做摘要與情緒渲染的方式發布新聞（劉昌德，同上引；劉慧雯，同上引），產生的框架效應必然與傳統新聞報導全文有所不同，因此，關注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框架，能拓展框架者的意涵。

其次，從臉書情緒反應的情感可供性為觀點，擴充框架效應的研究內涵。情感可供性強調人們可透過臉書情緒反應表達情緒，同時，也會被他人情緒影響，產生更多情緒。因此，本研究認為探討框架效應時，不僅要探討新聞媒體對使用者的影響，也應該探討使用者間如何相互影響。事實上，過去研究探討框架效應時，較常關注新聞媒體對閱聽人的框架效應（De Vreese, 2005），忽略了閱聽人已不在是被動的新聞消費者（consumers），而是主動創造資訊的產製消費者（prosumers）（Khang et al., 2012），應該要進一步探討使用者如何主動建構框架，甚至使用者如何運用情緒—認知框架來進行互

動。當前關注閱聽人主動建構框架的研究以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產製的文字類型的訊息為主（如推文）（Siapera et al., 2018），忽略臉書情緒反應亦是意見表達的一種形式（Pang et al., 2016）。本研究呼應一鍵回饋線索、策略性的意見表達、影響捷思性思考的線索等概念（Carr et al., 2018; Masullo & Kim, 2021; 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將之應用於框架效應，強調透過本研究所發展的情緒—認知框架概念，便可得知使用者間如何運用臉書情緒反應來表達意見，並且進行框架競爭，拓展了以往對於框架效應的影響範疇。

最後，本研究應用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測量指標，發展出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在理論與方法上深化框架理論意涵，並填補當前研究缺口。事實上，過去研究多採取量化內容分析來探討新聞媒體所建構的框架（Iannarino et al., 2015; Wasike, 2013），但卻無法探知新聞框架對閱聽人的影響；另一派則是使用實驗法來檢視強調不同面向或是引起特定情緒的新聞框架對閱聽人的影響（Carfora et al., 2021; Kim & Cameron, 2011; Kühne et al., 2015），但這類的研究多數缺乏真實世界的效度，而本研究則首度將框架者的框架建構與被框架者的框架效應一起探討，以真實情境驗證 De Vreese（2005）提出的框架整合過程模型，以第四次臺海危機作為研究背景，同時探討新聞媒體的建構框架與使用者的框架效應，彌補過去研究缺口。不僅呼應 Jost et al.（2020）和 Muraoka et al.（2021）將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評估指標，更進一步將臉書情緒反應應用於框架理論，發展出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深化框架理論的意涵。

雖然本研究致力應用臉書情緒反應來深化框架理論，但本研究仍有以下幾點限制。首先，本研究關注臉書的情緒反應符號，並非所有社群媒體都有，導致本研究所發展情緒—認知框架在應用上會有所受限。其次，本研究利用 LDA 主題模型分析來判定的新聞框架屬於議題特定框架，雖然較能呼應新聞事件，但 De Vreese（2005）指出通用框架能超越新聞主題、時間、文化背景的限制，故建議未來研究探討通用框架與臉書情緒反應所形成的情緒—認知框架，以利提高推論性。第三，每則貼文約有 931.79 個使用者提供不同的情緒反應，呼應近年研究臉書情緒反應的學者們（De León & Trilling, 2021; Jost et al., 2020; Muraoka et al., 2021）強調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方法上的優勢，也凸顯臉書情緒反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本研究呼應過去研究，關注怒反應與大心反應，並將之對應於負面情緒與正面情緒（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同上引 ; Muraoka et al., 同上引），但由於怒反應（M =

9.66，*SD* = 60.85，*Range* = 0-4141）與大心反應（*M* = 7.33，*SD* = 49.79，*Range* = 0-2521）的數量遠低於讚反應（*M* = 717.72，*SD* = 2153.13，*Range* = 1-85573），因此，對本研究的結果仍應謹慎推論。

第四，本研究使用臉書後設資料，基於隱私規定，無法獲得使用臉書使用者相關背景資料，因此，難以得知個人政治立場或先前態度對於其使用臉書情緒反應的影響，然而，本研究仍可補捉使用者的整體概況。第五，本研究在探討臉書社群編輯所形塑的新聞框架時，關注的是其如何強化、弱化某些面向，而較少關注臉書社群編輯所使用的語法架構、來源、例子、論述方式等，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檢視修辭結構對於新聞框架的影響。最後，基於臉書使用者的瀏覽習慣（Dvir-Gvirsman, 2019）、臉書社群編輯硬新聞處理與內文一致性較高、臉書社群編輯比其他留言者更具有話語權（劉慧雯，2020）等原因，本研究在探討臉書社群編輯的新聞框架效應時，僅探討臉書社群編輯的貼文內容對臉書使用者情緒反應的影響，未將新聞內文納入考量，導致可能產生過於將因果關係簡化為臉書社群編輯對臉書使用者的影響的偏誤，建議未來研究在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對使用者的框架效應時，除了臉書貼文外，亦可將新聞內文納入研究範疇，進一步探討臉書社群編輯貼文與內文一致性的差異與其影響。

參考文獻

公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11 日 a）。〈睽違 25 年 裴洛西臺灣行【不斷更新】〉，《公視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news.pts.org.tw/live/62e8e4bbb4de2cbd74468b2b

公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11 日 b）。〈裴洛西結束臺灣行 共軍 4 日起圍臺軍演 3 天〉，《公視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news.pts.org.tw/live/62eb469078380ff91edcf29c

張卿卿（2017）。〈政黨雙歧不確定的糾結：成因、決策過程、媒體接收與行為意向〉，《中華傳播學刊》，32：167-202。https://doi.org/10.6195/cjcr.2017.32.05

傅文成、黃瑎戩、顏瑞宏（2021）。〈以資料科學方法輔助民意趨勢分析：戰略及戰爭風險感知的網路民意研究〉，《新聞學研究》，149：1-49。https://doi.org/10.30386/MCR.202109.0020

曾筠淇（2022 年 8 月 3 日）。〈一張表看懂「4 次臺海危機」 共軍預告將繞臺 3 天……進行實彈演習〉，《ETtoday 新聞雲》，上網日期：2022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803/2308197.htm

意藍資訊（n.d.）。〈Opview 介紹〉，《Op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上網日期：2022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opview.com.tw/product-insight

劉昌德（2020）。〈新聞學：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如何轉化新聞專業〉，《新聞學研究》，142：1-58。https://doi.org/10.30386/MCR.202001_(142).0001

劉慧雯（2020）。〈從新聞到粉絲團：社群重構公共話語現象的初探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54：161-192。https://doi.org/10.30180/CS.202010_(54).0007

Carfora, V., Pastore, M., & Catellani, P. (2021). A 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to explain message framing effects: Reducing meat consump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583209

Carr, C. T., Hayes, R. A., & Sumner, E. M. (2018). Predicting a threshold of perceived facebook post success via likes and reactions: A test of explanatory mechanism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35*(2), 141-151. https://doi.org/10.1080/08824096.2017.1409618

De León, E., & Trilling, D. (2021). A sadness bias in political news sharing? The role of discrete emotions in the engag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news on facebook. *Social Media + Society, 7*(4).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211059710

De Vreese, C. H. (2005). News framing: Theory and typology.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 Document Design, 1*(13), 51-62. https://reurl.cc/Y8Q72x

Dvir-Gvirsman, S. (2019). I like what I see: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ity cues on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news s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2), 286-305.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7.1379550

Eberl, J. M., Tolochko, P., Jost, P., Heidenreich, T., & Boomgaarden, H. G. (2020). What's in a post? How sentiment and issue salience affect users' emotional reactions on Facebook.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17*(1), 48-65. https://doi.org/10.1080/19331681.2019.1710318

Feng, M., Brewer, P. R., & Ley, B. L. (2012). Framing the Chinese baby formula scanda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Chinese news coverag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3), 253-269.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2.662517

Ferrer-Conill, R., & Tandoc Jr, E. C. (2018). The audience-oriented editor: Making sense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sroom. *Digital Journalism, 6*(4), 436-453.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18.1440972

Gerlitz, C., & Helmond, A. (2013). The like economy: Social buttons and the data-intensive web. *New Media & Society, 15*(8), 1348-1365.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2472322

Heiss, R., Schmuck, D., & Matthes, J. (2019). What drives interaction in political actors' Facebook posts? Profile and content predictors of user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actors' reac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0), 1497-1513.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8.1445273

Iannarino, N. T., Veil, S. R., & Cotton III, A. J. (2015). Bringing home the crisis: How US evening news framed the 2011 Japan nuclear crisi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3*(3), 169-181. https://doi.

org/10.1111/1468-5973.12068

Jacobi, C., Van Atteveldt, W., & Welbers, K. (2016).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arge amounts of journalistic texts using topic modelling. *Digital Journalism, 4*(1), 89-106.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15.1093271

Jost, P., Maurer, M., & Hassler, J. (2020). Populism fuels love and anger: The impact of message features on users' reactions on Faceboo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 2081-2102.

Khang, H., Ki, E. J., & Ye, L. (2012).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1997–2010.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9*(2), 279-298.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12439853

Kim, H. J., & Cameron, G. T. (2011). Emotions matter in crisis: The role of anger and sadness in the publics' response to crisis news framing and corporate crisis respon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6), 826-855.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0385813

Kühne, R., Weber, P., & Sommer, K. (2015). Beyond cognitive framing processes: Anger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responsibility framing on the preference for punitive measur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2), 259-279. https://doi.org/10.1111/jcom.12151

Lee, Y. H., & Chen, M. (2021). Emotional framing of news on sexual assault and partisan user engagement behavio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8*(2), 504-52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20916434

Li, P. H., Fu, T. J., & Ma, W. Y. (2020). Why attention? Analyze BiLSTM deficiency and its remedies in the case of NER. *Proceedings of the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34*(05), 8236-8244. https://doi.org/10.1609/aaai.v34i05.6338

Li, X. (2007). Stages of a crisis and media frames and functions: U.S.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9/11 incident during the first 24 hou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1*(4), 670-687.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0701626578

Lischka, J. A. (2021). Logics in social media news making: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marry the Facebook logic with journalistic standards. *Journalism,*

22(2), 430-447.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8788472

Masullo, G. M., & Kim, J. (2021). Exploring "angry" and "like" reactions on uncivil Facebook comments that correct misinformation in th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9*(8), 1103-1122.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20.1835512

McCallum, A. K. (2002). Mallet: MAchine learning for languagE toolkit. *Mallet.*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22, from http://mallet.cs.umass.edu.

Mocanu, D., Rossi, L., Zhang, Q., Karsai, M., & Quattrociocchi, W. (2015). Collective attention in the age of (mis) inform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1*, 1198-120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1.024

Muraoka, T., Montgomery, J., Lucas, C., & Tavits, M. (2021). Love and anger in global party politics: Facebook reactions to political party posts in 79 democracie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Digital Media, 1*, 1-38. https://doi.org/10.51685/jqd.2021.005

Nabi, R. L. (2003). Exploring the framing effects of emotion: Do discrete emotions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olicy prefer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2), 224-24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02250881

Neilson, T., & Gibson, T. A. (2022). Social media editors and the audience funnel: Tensions between commercial pressures and professional norms in the Data-Saturated newsroom. *Digital Journalism, 10*(4), 556-578.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21.2004553

Newman, N., Fletcher, R., Robertson, C. T., Eddy, K., & Nielsen, R. K. (2022).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2*.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22,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2-06/Digital_News-Report_2022.pdf

Pang, N., Ho, S. S., Zhang, A. M. R., Ko, J. S. W., Low, W. X., & Tan, K. S. Y. (2016). Can spiral of silence and civility predict click speech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4*, 898-905.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07.066

Rauschnabel, P. A., Praxmarer, S., & Ivens, B. S. (2012). Social media marketing:

How design features influence interactions with brand postings on Facebook. In Eisend, M., Langner, T.,& Okazaki, S. (Eds), *Advances in Advertising Research* (Vol. III) (pp. 153-161). Gabler Verlag Wiesbaden.

Řehůřek, R. (2022). Topic modeling for humans. *Gensim.*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22, from https://radimrehurek.com/gensim/

Scott, G. G., Conlon, L. J., & Wilson, C. (2020). Facebook reactions: How are they used and which personality factors predict their use? *The Journal of Social Media in Society, 9*(2), 190-213.

Siapera, E., Boudourides, M., Lenis, S., & Suiter, J. (2018). Refugees and network publics on Twitter: Networked framing, affect, and capture. *Social Media + Society, 4*(1).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8764437

Sturm Wilkerson, H., Riedl, M. J., & Whipple, K. N. (2021). Affective affordances: Exploring Facebook reactions a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hyperpartisan political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9*(8), 1040-1061.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21.1899011

Sülflow, M., Schäfer, S., & Winter, S. (2019). Selective attention in the news feed: An eye-tracking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and selection of political news posts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1*(1), 168-190.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8791520

Suorsa, O. P., & U-Jin, A. A. (2022). Crossing the Line: The makings of the 4th Taiwan strait crisis?The PLA response to Pelosi's Taiwan visit represents the riskiest and most intense challenge to the median line to date. *The Diplomat*.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22, from https://reurl.cc/NqD6Kx

Thompson, M. M., & Zanna, M. P. (1995). The conflicted individual: Personality‐based and domain specific antecedents of ambivalent soci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3*(2), 259-288.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95.tb00810.x

Tsuriel, K., Dvir Gvirsman, S., Ziv, L., Afriat-Aviv, H., & Ivan, L. (2021). Servant of two masters: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balance between mass media logic and social media logic. *Journalism, 22*(8), 1983-2000.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9849417

Valenzuela, S., Piña, M., & Ramírez, J. (2017). Behavioral effects of framing on

social media users: How conflict, economic, human interest, and morality frames drive news shar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5), 803-826. https://doi.org/10.1111/jcom.12325

Wasike, B. S. (2013). Framing news in 140 characters: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 the news and interact with audiences via Twitter. *Global Media Journal -- Canadian Edition, 6*(1), 5-23.

Zhao, X., & Wang, X. (2022). Dynamics of networked framing: Automated fram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media and the public on Weibo with pandemic big data.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00*(1), 100-122.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211072508

本文引用格式

陳靜君、沈宏杰（2023）。〈社群編輯如何架構第四次臺海危機？從情緒—認知框架觀點出發〉，《傳播研究與實踐》，13（2）：73-110。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4

Chen, C. C., & Shen, H. C.(2023). How do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An 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73-110.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4 [Text in Chinese]

附錄

編號	臉書新聞粉絲專頁名稱	粉絲數（單位：萬）
1	ETtoday 新聞雲	561
2	東森新聞	500
3	Yahoo! 奇摩新聞	399
4	蘋果新聞網	368
5	大紀元 epochtimes.com	294
6	udn.com 聯合新聞網	256
7	TVBS 新聞	249
8	壹週刊寶庫	247
9	三立新聞	236
10	即新聞	168
11	蘋果即時新聞	161
12	中時新聞網	151
13	天下雜誌	144
14	遠見雜誌	144
15	聯合報	128
16	商業周刊（商周 .com）	123
17	今周刊	107
18	BBC News 中文 (繁體)	100

註：臉書粉絲專頁粉絲數的查詢日期為 2022 年 9 月 8 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73-110, July 2023

How Do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An 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 Perspective

CHEN, Ching-Chu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SHEN, Hung-Chieh

Chief Counselor, R.O.C Naval Academy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affective affordance and integrated process model of framing,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d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the associated framing effects. The study collected 6,145 related news postings on Facebook and used LDA topic modeling to identify news fram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even news frames wer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editors. The frames include "military exercise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eightened tensions,"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 "Taiwan Strait issues," "economic impact of the visit," and "responses to Pelosi's visit." Furthermore, the frames of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and "heightened tensions" elicit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love reactions and angry reactions, respectively.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frame of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elicited both a higher number of love reactions and angry reactions,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effects of framing contests. The current study contributes to framing theory by extending the concepts of frame builders and framing effects. Moreover, the study fills the research gap in framing theory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 developed from the analysis of real-world metadata from Facebook.

Keywords: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ing theory, affective affordance,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Facebook emotional reactions

---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ilovejinbo@gmail.com
Received: 2023.01.11; Accepted: 2023.04.22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世新大學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民族主義啦啦隊:
中國媒體對俄烏戰爭的報導及角色

鄒瞻舒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洪貞玲*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摘要

俄烏戰爭引發全球關注，研究聚焦於與俄、烏兩國交好的中國，如何報導這場戰爭？媒體如何透過戰爭新聞反映國家與市場利益？研究採用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探討中國網路媒體——《人民網》、《澎湃新聞》如何再現俄烏戰爭。結果發現，分屬黨營與市場導向的兩家媒體，在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內容框架上存在差異，但報導中性、不偏袒任一方，符合官方立場。相關主題，則以「衝突框架」最常使用；其餘框架則包括「責任歸屬」、「經濟影響」、及「道德」等類型。而結合框架化、推理等裝置，以及潛在的文化背景現象，發現中國媒體藉由戰爭新聞，強化反美、反西方論述，扮演民族主義啦啦隊的角色。

關鍵字：反美、民族主義、俄烏戰爭、框架包裹、戰爭新聞

* 通訊作者，E-mail: clhung@nt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03 月 12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6 月 11 日

壹、前言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全球震驚，媒體也日夜報導。戰地實況透過網路及各式媒體即時傳遞，不論遠近，閱聽人在各自的媒體空間中共同見證、參與戰爭，並透過紛雜的資訊形成不同的觀點與解讀。

戰爭議題具備高度衝突性，且牽一髮而動全身，俄烏戰爭不只影響區域和平、資源取得與經濟運作，更牽動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俄烏戰爭給予國際強權何種啟示？相較於美國與民主國家譴責俄羅斯入侵行動，與俄羅斯長期交好的中國則態度曖昧，而處在兩大強權夾縫中的臺灣也步步為營，處境受到國際關注。戰爭議題的衝突性與影響力，具備高度新聞價值，因此戰爭發生後，媒體如何報導及詮釋，受到國家利益及市場趨力影響，相當程度左右閱聽人對於遠方事務的理解（Pan & Kosicki, 1993 ; Topoushian, 2002）。

本研究關注中國媒體如何再現俄烏戰爭。作為他者，中國並非參戰國，但與俄、烏兩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加之媒體組成和言論管制等結構性因素，使中國媒體再現俄烏戰爭的圖像，迥然不同於西方世界。首先，從中俄兩國領導人交換意見的文章中，可看出中國官方表面抱持「中立」的態度；再者，觀察中國官媒的網路言論，主要引用俄羅斯官方論述甚至普丁的表態，例如以「特別軍事行動」取代「戰爭」或「侵略」的字眼，消息來源不言而喻。

初步觀察中國媒體的報導，與官方立場一致，試圖維持中立，但也傾向給予入侵的俄羅斯更多發言機會，似乎代表中國媒體的戰爭報導以國家利益至上，也受到中國與俄羅斯、烏克蘭兩國的外交及經貿關係牽動。

回顧歷史，冷戰結束後，中美雙邊關係紛爭不斷，而中俄間則日益融洽。2001 年 7 月，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強調平等互利、不結盟和綜合安全等意涵，成為兩國關係重要指標。該條約加強中俄關係穩定，從而對美國形成地緣政治壓力，試圖平衡冷戰之後、美國獨大的國際局勢。

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擁有強大軍工複合工業技術卻又有經濟危機，因此成為中國獲取技術產業外援的大好目標。對中國而言，軍事外交合作轉向價格低廉的烏克蘭，同時可緩和對俄國的軍事依賴及戰略安全問題，是有利作法。故俄烏關係越不和睦，漁翁得利的便是中國，而中國在俄烏間的角色，以不損害自身利益下保持中立（林穎佑，2014；顏建發，2015；Moore, 2014, May 21）。

因此，在複雜的國際政治外交動態中，媒體如何再現遠方的戰爭事件，至關重要。本研究試圖探討，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中的報導方式與角色為何，是否受到中國媒體管制及國家利益之影響？中國的媒體如何建構他者的戰爭？以及中國的媒體結構，是否會使不同定位的媒體在報導框架及立場上有所差異？

貳、文獻回顧

為了解中國媒體如何報導俄烏戰爭，有兩大領域需要進一步認識。一方面是中國民族主義與媒體管：，作為理解中國媒體報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另一方面則是戰爭新聞再現的研究，有助於形成本文的分析角度與架構。

一、 中國民族主義與媒體管制

李金銓（2004）指出，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取徑，包括民主國家的自由多元模式與共產國家的激進馬克思主義。前者以市場取向為主，透過不同媒體產權及競爭，形成多元資訊及觀點，但也導致娛樂化與商業偏差；後者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至上，透過國有產權的安排及國家控制，致使媒體服膺黨國利益與指導，並強化社會秩序。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度指數排名，在評比的 180 個國家中，中國排名向來與北韓、越南等亞洲威權國家相當，2023 年排名第 179 名，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新聞媒體及記者的自由空間日減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3)。誠然，中共威權政體要求媒體高度服從黨國，不以新聞自由為優先價值。傳播媒介被定位是集體的鼓勵者、宣傳者，以及建設共產主義的教育者。首先，媒體是為黨國服務、為黨國擁有的宣傳工具（王毓莉，1999）；並在資本作用下，從洗腦工具化身為「黨的公關公司」，媒體任務是宣揚黨國正面形象，淡化不協調的聲音 （He, 2000）。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依據毛澤東思想打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一方面以《新華社》、《人民日報》為主建立黨媒喉舌，一方面管控《文匯報》、《大公報》等民主派媒體，使其必須遵從黨國指令。在意識形態建構上，媒體一方面推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另方面則批判資本主義以及美帝

霸權。1978 年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後，新聞管制經歷寬鬆時期，並逐步放寬允許民間資本介入，但對新聞內容的管控仍透過法規、指導、處罰等方式恩威並濟（何清漣，2006）。

改革開放後的媒體市場結構，產生了競爭的態勢。以市場層級而言，形成全國性市場、區域性市場和地方性市場；以市場化程度而言，分成準市場化報紙，如各級黨報，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如晚報和都市報（宋建武等人，2015）。中國報業市場中的黨報，肩負社會效益目標，必須配合政策宣導，內容偏向政治化與枯燥無味；至於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則貼近群眾生活，吸引民眾自費訂報（王毓莉，2010）。

然而，自由多元主義所預期的市場化與媒介多元的關係，並未在中國實現（戴瑜慧，2019）。中國政府控制下發展市場機能，出現三種特色：新聞自由仍居世界之末；商業化媒體在黨國與市場之間搖擺不定；放棄鼓吹政治改革，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整體而言，黨國控制的市場化媒體面臨巨大限制，為了爭取閱聽人而在新聞風格及市場策略上推陳出新，但在政治上則避免踩到意識形態地雷（李金銓，2004）。

另一方面，網路科技帶來言論自由的許諾，在中國也是一大疑問。1990 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推動新聞業的發展、新聞媒體開始向網際網路進軍，傳播內容和對象也隨之改變；新興網路媒體影響力日增，也促成民間思潮壯大，形成與國家話語權相對獨立的個人言論空間。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仍不斷透過強制性的國家權力，對媒體乃至網路空間進行管制，「政治正確」的限制與需要，使官方話語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何清漣，2006）。

整體而言，中國政府將管理傳統媒體的方式延續到網路空間。習近平「新時代」下對傳播內容以防火長城、金盾工程、綠壩網路過濾軟體和網路員警等措施進行治理和干預，建構出嚴密且有效的網路內容防火牆，形成科技威權主義（王信賢，2018）。由於網路新聞和言論涉及中共政權穩定性，因此經濟發展也未能阻擋政府的嚴密控制，如法輪功事件，官方對新聞報導採取一致定調，並有高達三萬名網路警察在其中巡邏，即時刪除、屏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及內容（何舟，2008；高頡，2014；Zhao, 2008）。

習近平任內強調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領導的雙軌並進，十八大以後積極強化新聞輿論。2016 年 2 月 19 日在北京主持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2016 年 2 月 20 日）；習近平要求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導向。因此不管新舊媒體、各類型內容，「國內新聞報導要講導向，國際新聞報導也要講導向」，以達成「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同上引）。

中國政府高度控管媒體，使得它主動、被動配合國家政策，對於攸關重大國家利益的議題，不敢越雷池一步。共產黨建國以降，歷經冷戰以至於全球化變局，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向外對抗、向內整合的主要意識形態，更是在媒體的各式報導中表露無遺，並進一步動員人民加入民族主義的集體陣營。

李金銓（2002）指出，冷戰後的中國傳播媒介處於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的拉扯之中，共存且競爭的關係不斷影響著中國的媒介生態和意識形態塑造。他認為，民族主義多半是由國家政權所界定，而中國政府透過兜售民族主義，聚焦「他者」以淡化國家內部的不滿情緒，利用與外來勢力（臺海關係、美中關係）的對抗，塑造一致對外的民族情緒，並經由媒體製造反美、反西方的話語浪潮，以此展示中國強烈的民族自豪和國家認同，並從中迎合資本市場需求，獲取利潤。因此，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反美思潮，雖始於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卻在市場化之後變本加厲。市場化媒體在利之所趨之下，主動成為民族主義的啦啦隊。

汪宏倫（2014）從制度和情感結構、認識框架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發現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認同，由於過去被西方侵凌的歷史悲情，與國際秩序不公的現實悲情間相互作用，進而在當今轉化為「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對外基本一致，支持一個強大的國家或政府，輸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爭之框」。中國的普通公民被廣泛地涉入、動員到此框架之中，透過對外建立主體意識，對內鞏固政權來區分敵我，形成國民全體理解和詮釋戰爭的統一認知框架；其間，傳播媒介至關重要。

習主政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為召喚，多使用歷史傷痛來體現中國國家發展的得之不易，進而追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施正鋒，2016）。並在此基礎上談及中國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年 7 月 17 日）。可見，習近平執政方針仍以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維護國家統一，作為對內維穩的基礎，對外形成統一戰線的框架。

近年來中國崛起，帶動新一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1980 年代

鄧小平南巡帶動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並成為世界工廠，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高度整合進全球經濟體系。美國等西方世界抱持樂觀全球化思維，與中國積極進行經貿往來，一方面獲取自身經濟利益，一方面也認為中國經濟成長將帶來政治民主化。然而，中國成為經濟和軍事大國的同時，對內強化政治領導威權，與美國從合作轉化成軍事及經貿的競爭關係，區域政治的風險不斷攀升。

習近平在 2012 年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從貧窮走向富強的光明遠景。

>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9 月 1 日）。

伴隨中國夢的民族主義，即是動員中華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美貿易戰白熱化之際，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發展壯大面臨的一個重大威脅：美國」（Bradsher，2023 年 3 月 8 日），因為：

> 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同上引)

西方媒體認為，這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喜聞樂見的。綜合上述，在美中戰略競爭下，中國的新聞報導以黨國絕對領導為政策核心，塑造中國形象和話語權，並在處理對外關係，尤其是美中關係時，強化恐美、仇美的情緒，形成意識形態分割（李金銓，2002；汪宏倫，2014）。

二、 戰爭新聞報導與媒體角色

綜觀媒體與戰爭研究，主要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分析媒體與國家的關係，是否存在官方消息來源依賴，並進一步分析媒體再現戰爭的主題和框架。

首先，就媒體角色而言，媒體可能促成國際社會的交流和了解，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Fortner, 1993）；但在戰爭之際，傳播也可能帶來衝突和暴亂。胡光夏（2007）分析認為，戰爭爆發前，媒體角色多樣、載舟

覆舟，媒體可能是和平談判的催化劑，也可能是和平的破壞者及戰爭的煽動者，甚至是發動戰爭的輿論塑造工具。

對於衝突發生時的媒體角色，Thussu & Freedman（2003）分為主要三種：批判戰爭的觀察者（critical observer）、宣傳者或公關人員（publicist）、戰場（battleground）或決策執行的場域。他們認為，媒體本身便是現代衝突的手段與工具，二者已密不可分。胡光夏（2007）綜合相關觀點，將媒體之角色分為六種：戰爭的批評者、戰爭的啦啦隊、鼓勵他國參加戰爭、情報蒐集與決策之參考來源、戰爭工具、戰爭平臺。

由於戰爭涉及國際間的武力衝突，攸關交戰雙方的國家利益及國際社會秩序，因此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勢必涉及戰爭議題中的媒體與國家關係。以 Chomsky（2002）為首的批判學者提出宣傳模式，認為新聞媒體是政府的喉舌，即使高度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戰爭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是複製領導者政經框架的啦啦隊（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Chomsky, 同上引）。也有主張媒體在戰爭中是中立角色的理論，認為新聞不全然會成為政府操縱民意的工具，媒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導，但不能作為政客的替罪羔羊（Berry, 1990）。

Nimmo & Combs（1980）指出，媒體不可能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如同 Lasswell（1927）所言，媒體是政府戰爭宣傳（propaganda）的工具，透過操縱符號控制輿論，達成影響他人思想和態度的目的。Knight（2003）也指出，有關戰爭的事實，會因政府的政治意志介入和干擾而被扭曲，記者在獲得真實和全面資訊的過程變得困難重重，使得媒體在戰爭新聞中的角色無法中立客觀。

國家利益進一步左右媒體的消息來源與報導框架。McChesney（2004／羅世宏等人譯，2005）指出，美國專業新聞學中過度依賴官方或專家作為正當新聞的消息來源，導致戰爭新聞會因官方消息來源的影響，而呈現較為符合國家意識形態之報導框架。因專家也幾乎取自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和政府官員、公眾人物一樣，其言論存在強烈的主流偏見，導致政府透過媒體設定報導的議題及框架，尤其在涉及外交或軍事行動時格外頻繁。

Dimitrova（2001）研究 CNN 對於科索沃戰爭的報導，指出 CNN 主要透過外交政策、軍事行動、難民災難、證據四種敘事框架，描述戰爭中的暴行。報導內容傾向表明美國政府採取行為之正當性；其消息來源大都取自美國國內的二手證據，而非來自戰爭所在地區的一手資料。Dimitrova &

Strömbäck（2005）對比美國《紐約時報》與瑞典的 Dagens Nyheter，[1] 發現美國報紙大量依賴官方或軍方的消息來源，並較多採用軍事衝突的報導框架，而瑞典報紙則較多使用責任擔當與反戰抗議的框架。

有關兩次波斯灣戰爭之相關研究，研究者比較不同國家之媒體在報導同一衝突事件時所採取的框架，研究結果大同小異，不同國家會對相同事件採取不同的報導框架。大眾媒體透過選擇和排除社會真實中的內容，進而建構符合自身框架的故事（Pan & Kosicki, 1993）。Topoushian（2002）將兩家阿拉伯報紙和兩家北美的報紙有關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進行框架分析，透過微觀和宏觀層面比較，結果發現不同國家對於戰爭的詮釋有所不同，其政治立場經由報導框架體現在報紙上，反映各國的歷史文化和戰爭中的政治利益、外交策略等。

戰爭新聞的相關研究，更進一步檢視媒體如何再現戰爭與衝突。在報導主題上，戰爭新聞傾向於戲劇化、情緒化與衝突化。Hallin & Gitlin（1993）研究波灣戰爭的電視新聞報導中戲劇化的成分，發現戰爭新聞相較於其他政治事件報導有更多的情感參與，其中有許多與戰爭相關的參與性之政治活動，戰爭已不再是簡單的新聞事件。Wolfsfeld（2004）同樣認為，媒體在報導戰爭新聞時，慣用的運作模式是報導緊張、衝突和暴力，包含更多情緒化甚至狹隘的內容，反而沒有發揮促進和平的角色。

諸多研究採取框架分析，探討戰爭新聞的再現，並關切衝突與和平框架的使用。Neuman et al.（1992）稱戰爭的新聞框架為兩極化勢力的拉扯，是全世界爭奪政治影響力的方式，同時也是吸引讀者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因為衝突事件對於新聞守門人而言是最具新聞價值之一的報導類型。他們分析美國新聞報導中常用框架類型，如經濟框架、衝突框架、無能為力框架（powerlessness frame）、人類影響框架（human impact frame）、道德框架等，並發現美國媒體在報導個人、團體、組織間的分歧時，普遍優先使用衝突框架。

但也有反證指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美國媒體報導強調自我美化（self-glorification）的框架，對於戰爭以團結、榮耀、驕傲的姿態進行報導，儘可能避免有關傷亡、破壞等新聞，並對國內有異議的輿論或政客污名化及指控（Kelman, 1995）。An & Gower（2009）及 Semetko & Valkenburg（2000）

1 本刊編者註：此為 1864 年 12 月 23 日發行於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報紙，一般中譯為《每日新聞報》；其言論立場經歷人員變動與版權變更有多次更迭，在 20 世紀 60 年代，發行量為瑞典日報中首位，21 世紀初發行量約為三十六萬餘份。

針對媒體報導危機新聞進行研究，發現媒體組織在報導危機議題時所採取的框架類型，其優先順序為：責任歸屬、經濟後果、衝突、人類利益、道德。

整體而言，Galtung（2000, 2003）針對戰爭新聞提出和平新聞框架和戰爭新聞框架，即指兩種相反的報導戰爭之模式，他將與戰爭相關的新聞分為四種取向的框架：一、和平／衝突和戰爭／暴力，前者關注衝突的形成，後者更聚焦在戰場上；二、真相和宣傳；三、人民和菁英；四、解決方案（solution）和勝利（victory）。他認為戰爭新聞應更傾向於和平新聞的報導框架，而不是過度報導暴力和利用戰爭作為政府宣傳的武器。

關於衝突與人道立場的報導趨勢，近年研究也得出不同的觀察。Schwalbe & Dougherty（2015）以戰爭視覺化報導為切入點，針對美國三本雜誌有關黎巴嫩戰爭的報導進行視覺框架分析，發現大部分內容集中在軍事衝突框架上，不過隨著衝突的發展，有關人類利益框架的報導逐漸增加。

Aday（2010）探討美國兩家媒體對伊拉克戰爭報導框架的轉變。研究發現，因新聞內容過度反映參戰國的負面訊息而造成民眾的反彈，人們開始對政府行為感到不滿，反戰菁英形成的反框架（counterframe）勢力，挑戰過去白宮對戰爭議題的權威報導框架。Luther & Miller（2005）則聚焦於美伊戰爭的示威運動，對比兩類黨派的報導框架，研究指出，美國媒體在支持或反戰的兩類立場中，傾向於報導反戰團體的意見。上述研究，證明美伊戰爭中存在所謂反框架之報導。

綜合前述文獻，媒體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多元，可能是中立的批判者，也可能是鼓吹的啦啦隊，甚至是戰爭工具。多數情況下，媒體再現戰爭受到國家利益的影響，也傾向於受官方消息來源左右。不論居於主動或是被動，媒體扮演複製國家利益與政經啦啦隊的角色鮮明。細究戰爭報導的框架，在衝突與和平的兩端，媒體經常重現衝突場景；而在經濟框架、責任框架、影響框架、道德框架等議題的複雜牽動下，可能也會出現人道與反戰的立場。

參、研究方法

依據文獻回顧結果，本文認為中國媒體政策經歷不同時期的演變，形成黨國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兩種類型，在報導取材與市場需求上，發展出不同風格；但在意識形態及媒體角色上，則受到黨國控制並服膺社會主義與國家利益。尤其戰爭與國際議題的報導，往往與國家利益高度相關，因此不同類型

媒體呈現的報導立場空間或許有限。探討兩種類型媒體對於俄烏戰爭報導的異同，有助於理解當前中國媒體的角色與樣貌。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動機起源於對於俄烏戰爭的關切，以及對中國媒體管制以及媒體角色的好奇，回顧上述文獻之後，形成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一）黨營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如何報導俄烏戰爭？進一步的問題為：有關俄烏戰爭之新聞的報導形式與報導主題為何？引用哪些消息來源？呈現哪些報導框架？採取何種立場？兩家媒體間是否存在差異？

（二）兩類媒體所使用的框架包裹有何異同？進一步的問題為：所使用的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為何？反映了何種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整體而言，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報導中所扮演的媒體角色為何？

二、 資料蒐集與取樣

本研究選取「人民網」（people.cn）、「澎湃網」（thepaper.cn）[2] 兩家網路媒體，分別代表黨營喉舌媒體、黨營商辦媒體。

《人民網》發源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為傳統媒體背景的衍生網站，並且作為八大國家級重點新聞網站，其影響力和權威性不可小覷，許多特定議題都需要透過該網頁的報導，才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曾繁旭，2009）。因此，他可作為中共官媒政治論述的重要研究指標，其有關俄烏戰爭之相關報導，即反映中國政府對於這場戰爭的建構模式與立場態度。

《澎湃新聞》（或稱《澎湃》）係官辦的國資新媒體項目（綜合新聞網站），隸屬於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的上海報業集團，其內部結構和人員組成已實現從傳統官方紙媒到媒體融合後的採編、管理新模式之轉型（陳昌鳳，2015），因此可將《澎湃新聞》基本定義為隸屬官方的商業媒體。分析指出，《澎湃》新聞傾向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2 本刊編輯註：《澎湃新聞》，是一家中國綜合新聞網站，以「澎湃新聞 -The Paper 簡」自我標示，本處考量本研究案例兩個網站的一致性，故以填入網頁搜尋的小寫網址為主，特此說明。

擺脫行政命令的報導形式，實現新聞產業化之特點，重視閱聽人需求（趙子忠、崔卓宇，2014）。因此本文假設，《澎湃新聞》的媒體定位、報導風格和取向均有別於純官媒性質的《人民網》，可以做為參照。

本研究以俄烏戰爭為特定事件，透過內容分析與新聞框架分析，根據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框架、立場方向五個層面，結合任教於魯汶天主教大學的比利時學者 van Gorp（2007）框架包裹的方式，兼具質化、量化過程，包含歸納和推理兩個階段，觀察中國官方媒體《人民網》，與隸屬官方的商業媒體《澎湃新聞》如何建構他國的戰爭——俄烏衝突，並討論背後的文化現象。

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22）發布的《2021 中國網絡媒體發展報告》，網路媒體排行以官媒《人民網》居榜首，市場導向的《澎湃新聞》位居第五。報告指出，中國的網路媒體以官媒佔據主流權威優勢，並引導商業媒體共同打造以愛國情懷、家國一體及人文關懷為主的網路媒體氛圍。

本研究聚焦於網路上的新聞內容和言論，因此網路新聞網站選擇《人民網》、《澎湃新聞》，其中後者為聚合平臺，有大量用戶生產之內容，本研究僅針對媒體組織編採的原創內容進行分析。因此有關《澎湃新聞》的數據蒐集，選取內文標注「來源：澎湃新聞」之報導。

由於俄烏戰爭相關新聞數量龐大，以及戰事仍在進行中，無法全面涵蓋，研究者根據重要戰事發生時間，選擇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作為時間範圍，使用《人民網》和《澎湃新聞》網站的內建搜尋引擎，以關鍵字「俄烏衝突」進行搜索，對兩個網站之抽樣，排除重複樣本，並根據以下篩選標準進行新聞樣本抽取：

（一）排除未將俄烏戰爭作為論述主體之相關新聞；
（二）排除影音新聞、多媒體新聞、查證類型的文章；
（三）排除週期性的新聞大事記。

根據上述篩選原則，本研究蒐集到《人民網》181 則，《澎湃新聞》380 則，共計 561 則新聞報導。

三、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的類目建構必須要根據研究問題使用最適當的方法，最常用的便是依據理論、過往研究結果進行類目建構，另一種則是由研究者自行建構（楊國樞等編，1989）。研究者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發展適用於本研究之類目，分析單位為「則」，以一則新聞或一則文章作為基本的單位進行歸類，新聞內容方面，主要根據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框架、立場方向進行整理。

本研究類目建構，包括以下項目：

（一）報導形式

1. 純淨新聞：一般新聞報導，只陳述客觀事實，不加以任何評論成分。
2. 專題、深度報導：新聞記者針對俄烏戰爭事件所撰寫的深度剖析之報導、調查，較不受時效性限制。
3. 評論、社論：評論性報導或文章，針對俄烏戰事發表評論、看法，存在一定立場或意見態度，通常由媒體工作者或專家學者撰寫。
4. 外電：來自國外的報導，通常為翻譯國際通訊社的內容。
5. 微信自媒體公眾號推文：多為代表作者個人立場的評述類文章。

（二）報導消息來源（選擇單一消息來源，以佔據較大篇幅的內容為主要依據）

1. 中國消息來源
   （1）官方：政府機構、人士或新聞媒體；
   （2）非官方之人士：學者、專家；
   （3）一般民眾。

2. 國外消息來源
   （1）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2）烏克蘭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3）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委員會等；
（5）外國一般民眾。

3. 無消息來源（新聞媒體自身觀點、評論類報導，如人民日報的國際評論欄目「鐘聲」、報內評論員等）

（三）新聞的報導主題

1. 戰事相關情況，如戰爭現場、戰爭行為等；
2. 俄烏兩國談判；
3. 戰爭造成的經濟影響；
4. 戰爭造成的人權問題；
5. 戰爭對世界格局造成的影響；
6. 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行為；
7. 參戰國一般公民的態度、行為；
8. 其他。

（四）新聞的報導框架

參考 Neuman et al.（1992）、Galtung（2000, 2003）等研究，以及俄烏戰爭的特性，本研究將報導框架區分為以下四種，並以每則新聞的主要內容作為判斷依據：

1. 衝突框架：涉及到因戰爭引發的區域、國家、組織間的分歧、對抗、軍事行動，雙邊或多邊關係的問題。
2. 責任歸屬框架：包含以下四個次框架
   （1）俄羅斯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2）烏克蘭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3）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4）中國在戰爭中的自我美化。
3. 經濟影響框架：包含以下三個次框架

（1）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
（2）對俄羅斯經濟影；
（3）對烏克蘭經濟影響。

4. 道德框架：反對戰爭的抗議行為，或涉及公平、正義、公共利益、人權等問題。

（五）新聞報導的立場方向；

按照研究所需，將立場方向類目闡釋為兩家媒體的報導內容對參戰國所呈現的立場，包括：

1. 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2. 對烏克蘭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3. 中性，主要為對參戰國沒有明顯立場，或平衡報導的新聞。

建構完內容分析編碼表之後，抽取 10%-25% 的樣本進行信度分析（Wimmer & Dominick, 1991）。本研究在 586 則樣本中隨機抽樣選取 63 則進行前測，由兩位新聞傳播研究生進行編碼，依照 Holsti（1969）的信度公式計算：

1. 相互同意度=2M/(N1+N2)；
2. M=編碼員結果一致性的項目個數；
3. N1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4. N2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5. 信度係數=(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N為編碼員總數。

經計算，本研究前測結果總體信度為 93%，各項介於 0.89-0.95 之間，均高於 0.8 信度係數標準。

四、 框架包裹法

媒體對於事件的陳述可以左右公眾輿論，戰爭新聞的報導框架尤為重要（Neuman et al., 1992），無論是符合政府或是挑戰權威的框架，都體現媒體對於戰爭的詮釋和立場。而在實際對新聞文本進行框架分析時，應發現研究對象明確且明顯的框架裝置，了解其講述事件的大致方向，在此基礎上再考察其隱含框架，最後則是不同框架的分佈狀況（李子甜、徐美苓，2020）。

本研究依循過往對於框架包裹和框架矩陣的研究取徑（潘忠黨，2006；van Gorp, 2007），透過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對樣本進行拆解和分析，以框架矩陣的表格化形式呈現，並針對部分報導進行潛在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

框架包裹主要有三個層面：首先觀察新聞文本中用字的選擇、譬喻、例證等框架化裝置內容；其次根據問題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估、解決建議四類取徑歸納新聞的推理裝置；最後分析新聞報導背後是否蘊含文化背景現象，其反映的意識形態為何。

研究歸納出四大類俄烏戰爭的新聞框架：「衝突框架」、「責任歸屬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其中「責任歸屬框架」和「經濟影響框架」包含若干個次框架；以框架包裹的分析方法對篩選後的樣本進行剖析，根據框架化裝置和推理裝置，推導新聞報導背後蘊含的社會文化現象，並檢視中國媒體在建構俄烏戰爭時，是否服膺政府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媒體角色。

肆、 研究發現

一、 內容分析

本節從量化的角度，呈現並分析兩類媒體在俄烏戰爭的新聞／文章之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內容主題、內容框架、立場方向的分配情況。

表 1 的結果可看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報導俄烏戰爭新聞時，均以「純淨新聞」的報導方式為主（分別占 76.2% 和 84.2%）。兩家媒體在報導形式上存在顯著差異（X^2=23.279, $^{***}p < .001$）。

《澎湃新聞》相對《人民網》會採用「專題、深度報導」的形式呈現新聞（分別占 4.7% 和 0.0%），而《人民網》「評論」類的報導比例要遠高於《澎湃新聞》（分別占 22.1% 和 9.7%），二者採取外電的比例都低。

表 1：《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報導形式分配

報導形式	人民網	澎湃新聞
純淨新聞	138（76.2%）	320（84.2%）
專題、深度報導	0（0.0%）	18（4.7%）
評論	40（22.1%）	37（9.7%）
外電	3（1.7%）	5（1.4%）
總和	181（100.0%）	380（100.0%）

X^2=23.279,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 2 可看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消息來源的引用上存在顯著差異（X^2=34.202, ***p < .001）。前者有關俄烏戰爭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為「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4.3%），其次為「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3.7%），兩者比例相去不遠；《澎湃新聞》則高度引用「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30.0%），其次才是「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1.6%）。若比較俄羅斯及烏克蘭的消息來源比例，《人民網》相對偏重俄羅斯消息來源，卻只給烏克蘭消息來源不到 10% 的比例；《澎湃新聞》給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消息來源比重較為平衡（分別佔 21.6% 和 18.2%）。以中國消息來源的使用，《人民網》引用的比例高於《澎湃新聞》不少（分別佔 12.7% 和 5.5%）。

表 2：《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消息來源分配

消息來源	人民網	澎湃新聞
中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或新聞媒體	23（12.7%）	21（5.5%）
中國非官方人士	4（2.2%）	9（2.4%）
中國一般民眾	1（0.6%）	0（0.0%）
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4（24.3%）	82（21.6%）
烏克蘭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17（9.4%）	69（18.2%）
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3（23.7%）	114（30.0%）
國際組織	19（10.5%）	51（13.4%）
外國一般民眾	1（0.6%）	10（2.6%）
無消息來源	29（16.0%）	24（6.3%）
總和	181（100.0%）	380（100%）

X^2=34.202,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體而言，可看出《人民網》依循官方消息來源依賴、偏好俄羅斯消息來源的傾向明顯；《澎湃新聞》取用交戰兩國雙方的消息來源則較為平衡，且較少使用中國官方消息。一方面，數據顯示出官媒與商業化媒體在消息來源使用上的差別；但兩者同時都極少以一般民眾作為消息來源。

表 3：《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報導主題分配

報導主題	人民網	澎湃新聞
戰爭情況	23（12.7%）	101（26.6%）
俄烏兩國談判	22（12.1%）	21（5.5%）
經濟影響	29（16.0%）	54（14.2%）
人權問題	1（0.6%）	10（2.6%）
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5（2.8%）	14（3.7%）
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及行為	97（53.6%）	158（41.6%）
參戰國公民態度	0（0.0%）	10（2.6%）
其他	4（2.2%）	12（3.2%）
總和	181（100.0%）	380（100.0%）

X^2=30.025,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表 3 的報導主題分配上，結果顯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報導主題上仍存在顯著差異（X^2=30.025, ***p < .001）。與過往研究較為不同的是，兩家媒體重視「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及行為」，佔比最高（分別為 53.6%、41.6%），前者主題排序分別為「經濟影響」（16.0%）和「戰爭情況」（12.7%），其次是「俄烏兩國談判」（12.1%）；《澎湃新聞》主題排序則為「戰爭情況」（26.6%）、「經濟影響」（14.2%）及「俄烏兩國談判」（5.5%）。後者用少數篇幅呈現「參戰國公民態度」(2.6%)、「人權問題」(2.6%)，但《人民網》在此兩類主題上幾乎付之闕如。

表 4 結果顯示，兩造有關俄烏戰爭的內容框架存在顯著差異（X^2=55.388, ***p < .001）。兩家媒體均常使用「衝突框架」，而且商業化的《澎湃新聞》使用比例 (59.5%) 高出《人民網》甚多（40.9%）。採用「衝突框架」不僅強調戰爭行為本身，同時含括國家／區域／組織的衝突、多邊問題等，因此在戰爭新聞中屬於最常被使用的報導框架。

除「衝突框架」外，《人民網》也高度使用「責任歸屬框架」(32.0%)，尤其偏重「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26.0%），雖然《澎湃新聞》「責

任歸屬框架」的比例（9.7%）遠低於《人民網》，但其中「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仍在此主框架下占較高比例（7.6%）。二者均較少將戰爭責任歸屬至參戰國任何一方，反而強調美國或北約在此衝突中的責任，如在報導中直指美國是戰爭的始作俑者；或是在「責任歸屬框架」下，使用「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呈現中國面對此戰爭時負責任、有擔當的態度。

表 4：《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內容框架分配

內容框架	人民網	澎湃新聞
衝突框架	74（40.9%）	226（59.5%）
責任歸屬框架	58（32.0%）	37（9.7%）
-- 俄羅斯負責	2（1.1%）	3（0.8%）
-- 烏克蘭負責	0（0.0%）	1（0.3%）
-- 美國 / 北約負責	47（26.0%）	29（7.6%）
-- 中國自我美化	9（5.0%）	4（1.0%）
經濟影響框架	33（18.2%）	78（20.5%）
-- 對國際、非參戰國	25（13.8%）	40（10.5%）
-- 對俄羅斯	8（4.4%）	26（6.8%）
-- 對烏克蘭	0（0.0%）	12（3.2%）
道德框架	16（8.8%）	39（10.3%）
總和	181（100.0%）	380（100.0%）

χ^2=55.388,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相對於責任歸屬，市場化媒體更重視「經濟影響框架」，為佔比第二高的主框架（20.5%），與《人民網》正好相反；在經濟影響主框架下，《人民網》和《澎湃新聞》同樣以「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為主（分別佔比 13.8% 和 10.5%），內容以討論戰爭對各國經濟的影響為主。

《人民網》與《澎湃新聞》使用「道德框架」的比例差別不大（分別占 8.8% 及 10.3%），主要強調戰爭背後所引發的公共利益、人權問題，如《澎湃新聞》採訪戰爭爆發後各國難民們遭遇的不公平對待。

表 5 為立場方向的分配情況，可看出《人民網》和《澎湃新聞》並無顯著差異（X^2=2.717, p > .05），均以中性的平衡報導為主（分別佔 92.8% 及 95.3%），《人民網》較《澎湃新聞》對烏克蘭的同情態度更為積極（分別占 6.6% 和 3.7%），但二者都較少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前述消息來源

分析指出，《人民網》高度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但是並未因此對於俄羅斯採取同情立場。對參戰雙方維持中立立場，不論是商業媒體或官媒並無明顯差異，符合中國媒體管制下對於重要新聞事件「定調」的型態。

表 5：《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立場方向分配

立場方向	人民網	澎湃新聞
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1（0.6%）	4（1.0%）
對烏克蘭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12（6.6%）	14（3.7%）
中性、無立場	168（92.8%）	362（95.3%）
總和	181（100.0%）	380（100.0%）

X^2=2.717, p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框架包裹

根據 van Gorp（2007）的「框架包裹」之研究取徑，本文利用框架矩陣拆解和分析研究樣本，分別從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對新聞文本進行質化歸納。

根據上述的內容框架分析結果，歸納出四大類框架：「衝突框架」、「責任歸屬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其中「責任歸屬框架」和「經濟影響框架」包含若干個次框架。以下將依序對《人民網》和《澎湃新聞》有關俄烏戰爭之新聞文本進行框架矩陣分析，舉例討論兩家媒體在此事件中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與意識形態，以及媒體所扮演之角色。

（一）衝突框架

前述量化分析結果可知，衝突框架是兩家媒體對於俄烏戰爭新聞中最常使用的報導框架，符合過往戰爭新聞的主流研究結果。該框架內容主要針對俄烏兩國相關議題而引發的區域或組織、國家之間的衝突，同時包括雙邊或多邊問題，在樣本中常見的有：俄烏兩國戰爭的即時情況及戰爭行為、國與國或組織之間因戰爭而變動的關係等。該框架最核心的內容及意涵為，因俄烏兩國的衝突導致利害關係人間的意見分歧、對立，甚至衝突及戰爭行為。

雖衝突背後常涵蓋歸責或對另一方的指責，但這屬於「責任歸屬框架」中，透過報導內容對戰爭行為的責任進行歸屬的部分，不在「衝突框架」的討論範疇之內。

「衝突框架」多出現在純淨新聞報導，其框架裝置分析，首先考量低層次的用字，字彙選擇上通常都與衝突、軍事行為有關，用於描述戰爭情況，常見的用字如下：「特別軍事行動」、「緊張」、「衝突」、「入侵」、「保衛」、「襲擊」、「對峙」、「譴責」、「斡旋」等等。並且，《人民網》及《澎湃新聞》都引述俄羅斯官方說法，將此戰爭行為稱為「特別軍事行動」，如「俄羅斯總統普京 24 日清晨發表電視講話說，決定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黃河等人，2022 年 2 月 24 日）。

其次，衝突框架中常聚焦於事件當事者之間的不同論述，如俄烏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針對布查事件各執一詞。《澎湃新聞》喜用此類議題，且在遣詞用字上更加情緒與煽情：

>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費表示，俄羅斯每天都在做出人道主義努力，相反是烏克蘭方面蓄意阻撓。涅邊費說，烏克蘭的極端分子利用平民作爲人盾，卻將他們的遇害歸咎於俄羅斯軍隊。
>
> 近日，烏克蘭媒體播出據稱是在基輔市西北部郊區布恰鎮拍攝的視頻，稱俄軍在占領當地期間殺害了數百平民。俄羅斯駁斥烏克蘭方面的指控，稱烏克蘭公布的所謂照片和視頻材料「都是演的」（澎湃新聞，2022 年 4 月 6 日）。

這篇報導同時引述俄、烏雙方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敘事方式，透過用字選擇呈現俄烏互相指責對方所形成的對峙衝突，俄羅斯指出布查事件是烏克蘭「極端分子」所為，並且烏方所提供之證據「都是假的」，俄方不斷為「人道主義」努力，並未如烏方所言「殺害平民」。同時，報導也高度引用俄羅斯駁斥訊息，似有為俄羅斯澄清的傾向。

包括在戰爭爆發初期，有關烏克蘭如何面對俄羅斯進攻的報導中，也可透過用字看出對於戰事以及雙方衝突的敘述，直指烏克蘭與俄羅斯實力懸殊，將烏軍譬喻為「無頭蒼蠅」，面對俄軍的突擊「無招架之力」，僅有「挨打」的份。市場化媒體的敘述方式高度戲劇化，也不看好烏克蘭處境。

> 這次軍事衝突，俄羅斯發動的網絡戰和電子戰也值得關注……

電子戰同樣重要，干擾對方的雷達、通信，可以讓對方「聽不到、看不見」，像無頭蒼蠅一樣。

對於俄軍的聯合火力突擊，烏軍看起來幾乎是無招架之力，大部分重要軍事目標都被打了，這也正常，俄烏軍事實力差距太大了……加上烏軍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是蘇聯時期的產品，對於俄軍來說再熟悉不過，性能怎麼樣，有什麼缺點，了如指掌，烏軍只有挨打的份了（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5 日 a）。

在框架推理上，「衝突框架」指因俄烏戰事使國際和不同地區的緊張局勢升級（問題定義），主要涉及各方利益所引發的多邊問題、意見不合，甚至衝突，不僅是俄烏兩國的關係，還包括參戰國與各國或國際組織間的關係、中美關係、多邊關係等等（因果解釋）。並有相關報導指出衝突行為（軍援、制裁等）並不利於緩解局勢（道德評估），應儘早停息戰火、和平談判（解決建議）。

在報導模式上，首先是中、東歐國家與美國應對烏克蘭危機的方式實有分歧，或由於制裁俄羅斯的行為，所引發歐洲內部乃至世界之危機，如：

〈歐洲人頻頻穿梭，美國人怒目相向〉

自 2021 年 10 月出現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之間就出現了顯著差異。美國總統拜登明確支持烏克蘭未來加入北約。隨著俄羅斯愈加頻繁地向俄烏邊境調兵遣將，對烏克蘭虎視狼顧，拜登政府和北約架構向烏克蘭提供了眞眞切切的物資與裝備援助，而不像德國的朔爾茨政府那樣僅僅意思一下，象徵性地提供了幾千頂頭盔……雖然拜登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從未公開批評或貶低歐洲人，但他們不僅堅持對俄羅斯怒目相向，而且對歐洲人的斡旋行動冷眼旁觀，沒有做出任何明確或積極的回應（忻華，2022 年 2 月 25 日）。

上述報導中便談及美國與歐洲在對俄採取制裁時行為的不一致，造成美國對歐洲「斡旋」、「冷眼旁觀」態度的「怒目相向」。

其次是因戰事引發的中、美關係問題，兩造常就對參戰國的立場或行為，產生分歧與對峙，公開指責對方的行為只會加劇危機升級，中方的媒體在此推理裝置中，常描述美方捏造假新聞抹黑中國，如：

> 趙立堅：「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14 日已經否認俄羅斯曾請求中方提供軍事援助。美方不時製造和傳播虛假信息，既不專業，也不道德，更不負責任。這樣做只會使美國進一步失信於世界。」
>
> 美方應該做的，是深刻反思自身在烏克蘭危機發展演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眞正爲推動烏克蘭局勢緩和做些實事……（人民網，2022 年 3 月 15 日）。

上述報導為中國譴責美方相關報導中常見的起手式，以引述俄方消息來源為論述依據，先對美方在俄烏問題中所採取之行為進行批判，並指出美國在其報導中的抹黑，進而帶出中國的立場，體現兩國關係在此衝突中形成的對峙與分歧。

最後是國際組織對俄羅斯的態度及行為，主要描述國際組織採取的措施，形成與俄對峙的情形，如：

> 歐洲委員會表示，暫停俄方代表權的決定只是臨時措施，各方仍可以通過溝通渠道解決俄烏衝突。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已接近通往不歸路的臨界線。」（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8 日）。

上則新聞引述俄官方論述，俄羅斯對歐洲委員會的行為表示不滿，指出歐洲委員會作為國際組織，不應成為西方制裁俄羅斯的工具，並以「通往不歸路」形容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關係。

透過「衝突框架」呈現潛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現象，最明顯之處便是兩家媒體均引述俄羅斯說法，將此戰爭稱為「特別軍事行動」，顯見中俄兩國的歷史互動及友好關係、加上中國政府對此戰爭的立場，影響中國媒體對於俄羅斯行為的定調，並以官方說法作為新聞來源。

在此主框架下，常涉及多邊關係的議題，因此新聞常將議題延伸至中美關係，呈現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報導模式，進而不斷提出中國呼籲和平的立場。由此可見此框架背後的潛在價值觀，即使官方呈現中立的態度，但仍在報導中引用俄羅斯對自身戰爭行為的定義，凸顯中國在兩邊不得罪的原則上仍親俄的意識形態。

此外，透過此框架的報導模式可知，中國媒體在形塑「衝突框架」時，

不斷強化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立之報導立場，如反對西方軍事援助將造成俄烏衝突升級等角度，進而在國際衝突中形塑中國有擔當的大國形象。建構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社會認知框架，體現中國政府將此事件的闡述與國家利益高度連結，透過兜售一致對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塑造中國社會一致信仰和反美的刻板印象之文化現象。

（二）責任歸屬框架

兩類媒體在使用「責任歸屬框架」時有所差異，這是《人民網》第二常使用的框架，《澎湃新聞》相對較少使用。此框架圍繞在討論此次戰爭，以及戰爭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是由於哪個國家所導致的，或強調在此戰爭下國家的行為承擔了何種責任。可再細分為四個次框架：「俄羅斯負戰爭的主要責任」、「烏克蘭負戰爭的主要責任」、「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中國自我美化」。特別的是，兩家媒體鮮少提出交戰兩國應負的責任，反而將報導或評論重心放在美國與國際社會。因此，以下針對「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中國自我美化」分別進行討論。

1. 「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

「美國負責」次框架主要核心意涵為美國或北約是此次戰爭的始作俑者，在「責任歸屬」主框架下，兩家媒體使用此框架的比例都較高，尤其是《人民網》，使用「美國負責」次框架的比例明顯高於《澎湃新聞》。

在框架化裝置上，包含字彙、譬喻和敘事三個面向。字彙選擇常見的有：「骯髒」、「大國欺負小國」、「危害世界」、「霸權霸凌」、「橫行霸道」、「不擇手段」、「拱火澆油」、「煽風點火」等，在報導中以負面的詞彙指責美國或北約激化俄烏矛盾，是戰爭的始作俑者，並且在戰爭爆發後仍不斷拱火。

譬喻方面常使用污名化的譬喻，如：「吸血鬼」、「偽道士」、「製毒師」、「絕命毒師」、「黑客帝國」、「幕後黑手」、「毒瘤」，例如以下報導：

〈破壞國際秩序的唯我獨尊者 —— 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

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公道，不要霸道；要合作，不要對

抗。這是國際社會共同願望，但有個別國家不這樣想。烏克蘭危機步步升級直至俄烏衝突爆發，這個國家既是始作俑者，又是推波助瀾者。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長期奉行唯我獨尊的霸權政策，四處煽風點火、製造動亂。爲維護霸權，美國不遺餘力拉幫結派搞對抗，一系列做法破壞國際秩序，威脅人類和平，美國霸權成爲人類社會最大毒瘤（張遠，2022 年 4 月 7 日）。

〈漫評美式霸權之三：全世界瘋狂斂財的「吸血鬼」〉

美國不斷挑起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所有人都爲此付出了代價，只有控制著美國政客的軍工複合體贏了——他們以他國生靈塗炭換來了自己的盆滿缽滿。美國是名副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瘋狂斂財的「吸血鬼」（陳籽，2022 年 4 月 8 日）。

吸血鬼、黑手、毒瘤等名詞都有其原先意涵，但在上述新聞中被挪用至形容美國行為的污名化比喻，對其貼標籤，以黑手譬喻美國是戰爭乃至世界亂局背後的操縱者，以吸血鬼譬喻美國透過發起戰爭斂財的行為，又如〈美國是製造傳播生物病毒和精神病毒的「絕命毒師」〉（唐彥林、李蒙佐，2022 年 4 月 13 日），其中引用俄羅斯的消息來源說明美國在烏設立生物實驗室，並以影視劇名稱譬喻美國為「絕命毒師」，稱其為「毒瘤」，指責美國在全球製造瘟疫和民族分裂，形成意識形態對立而獲取霸權。並使用例證方式，舉生物實驗室的影像資料、俄軍方公開的病毒檢測等資料作為美國進行軍事生物活動的證據。

其次，兩家媒體均使用敘事、舉例的方式說明美國如何影響各國經濟，攪亂世界格局。

美國大搞金融恐怖主義，肆無忌憚地在全球「薅羊毛」「割韭菜」，加劇了全球貧困和不平等。歷史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經濟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等，背後都有美國金融霸權在作祟……如今，美國通過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等手段，再次野蠻

地把國際金融正常運作的規則變成了其肆意掠奪的工具（人民網，2022 年 4 月 6 日）。

或是舉當下例子說明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制裁俄羅斯系列行為之意涵，並將戰爭責任歸責於美國，如〈海外網評：在美國眼裡，烏克蘭不過是拖垮俄羅斯的炮灰〉（聶舒翼，2022 年 5 月 10 日），其中指出美國與西方形成聯盟共同反俄，並自克里米亞事件後便長期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以烏國苦難換取戰爭。

在推理裝置上，「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意指美國的一系列行為催發了戰爭（問題定義），因美國在其間不僅能夠獲取利益，還能穩定霸權地位（因果解釋），把世界經濟、國計民生武器化、工具化，終將會擾亂世界秩序（道德評估），應該要做和平的穩定器而非衝突的鼓風機（解決建議）。

在此報導框架下，常出現「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系列報導，及此類型的寫作模式，主要強調美國攪亂世界格局，推進北約東擴、同時策動烏克蘭發起顏色革命，是這場戰爭的幕後黑手，以此為論點論述數篇有關美國在此衝突背後的所作所為，指出美國應對戰爭負責，從以下一系列標題中便可看出此範例的框架類型：〈挑動俄烏衝突的煽風點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一〉（張遠，2022 年 4 月 7 日）、〈破壞國際秩序的唯我獨尊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劉健，2022 年 4 月 8 日）、〈不擇手段斂財的趁火打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三〉（吳寶澍，2022 年 4 月 8 日）、〈揮舞制裁大棒的橫行霸道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四〉（吳寶澍，2022 年 4 月 10 日）、〈秘密軍事生物活動的幕後操縱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五〉（朱瑞卿，2022 年 4 月 11 日）、〈劣跡斑斑的人權「偽道士」——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六〉（朱瑞卿，2022 年 4 月 12 日），均是透過論述和列舉美國的行為，形成將戰爭責任歸屬於美國的報導框架。

換句話說，中國在面對俄烏戰爭議題時，若涉及美國或北約方面，必將連結美中的對峙關係，媒體在其間透過報導構建意識形態對立，將現有的戰爭歸責於美國，高度呈現抗美、仇美的情緒，甚至連帶舉證過往事件，如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將美國形塑為攪亂世界格局、「毒瘤」之形象，建立中國國民對兩國關係的整體理解、詮釋俄烏戰爭的一致認知框架，達到媒體報導和政府言論管控目的，高度符合大國對峙下，中國政府透過媒體製造

反美的話語浪潮，呈現反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框架。

常見報導類型，如《人民網》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系列報導，以及量化結果均可得知，無論是官方媒體論述，或是商業媒體的評論性文章，包括過往文獻都指明，與反美情緒相關的報導架構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媒體塑造的意識形態分割，已然成為中國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

2. 「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

「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主要意指中國官方在面對戰爭議題時，表現出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形象，核心意涵在於中國面對戰爭、衝突或多邊關係問題時呼籲和平，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的形象。《人民網》作為官方媒體，相較《澎湃新聞》更常使用此框架。

其間消息來源多以中國政府官方為主，因此在框架化裝置中的字彙選擇上，多數使用褒義辭彙，如：「負責任大國」、「勸和促談」、「維護和平」、「平等對話」、「客觀公正」、「光明磊落」、「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等，以表示中國的大國擔當和自我美化，或回擊美國指控。

> 作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上負責任大國，中國將繼續發出聲音、提出倡議、採取行動、付出努力。中方願與各方保持溝通、止戰促和，切實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李志偉，2022 年 3 月 16 日）。

> 趙立堅表示，我們已經多次就烏克蘭問題闡述中方的立場。老實說，中方的立場的確同少數國家的立場不一樣。中國的立場光明磊落、公正客觀，無可非議。眞正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些自以爲贏得冷戰，可以獨霸天下的國家；是那些無視他國關切、持續五輪推進北約東擴的國家；是那些四處對外發動戰爭，卻又指責別國好戰的國家；是那些我聽說對俄羅斯的貓、俄羅斯的狗、俄羅斯的樹都要制裁的國家（于瀟清、劉棟，2022 年 3 月 17 日）。

從上述新聞的報導字彙可以知道，中國不僅在責任歸屬方面美化自身國際形象，表現中方在俄烏戰事上有責任、有擔當的態度，同時回應他國指控，甚至將矛盾指向美方。

框架推理部分，「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意指中國面對烏克蘭問題時，彰顯有責任、公正客觀的立場與態度（問題定義），與少數國家不同，中國不會破壞國際秩序（道德評估），並且由於各國應休戚與共、相互關聯（因果闡釋），因此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將會繼續採取行動，維護世界和平（解決建議）。

此框架的潛在現象與上一框架存在雷同，中國政府在面對俄烏戰爭之中方立場時，常將西方國家劃分為「他者」，以此「一捧一踩」地區分敵我，透過反對霸權主義、宣揚愛國主義展示中國的大國擔當與強大民族自信，進而塑造中國形象和話語權。媒體在其間作為政府意識形態的啦啦隊，以黨的領導作為傳播的核心價值，兜售民族主義以淡化中國內部不滿情緒，假借國際事件、對外關係議題，在新聞報導中塑造一致對外的反美情緒，達到對內維穩，對外形成統一戰線的目的。此為中國宣揚社會統一信仰，輸出中國價值觀的常見方式。

（三）經濟影響框架

「經濟影響框架」是兩家媒體在報導俄烏戰事新聞時較常使用的框架之一，其中《澎湃新聞》相較《人民網》在數量佔比上略高。此框架的主要描述內容為俄烏戰爭導致的經濟影響，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對國際或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對交戰雙方的經濟影響，並以此分為三個次框架：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對俄羅斯的、對烏克蘭的經濟影響等。

1. 「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

首先是「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最為常見，因為影響層面深遠，且互有關連，其框架化裝置主要為字彙和例證，字彙選擇上常涉及金融相關詞彙，如：「跳水」、「跌幅」、「瘋漲」、「經濟制裁」、「滯脹」、「通脹」、「物價飆升」等，主要以負面詞彙形容俄烏衝突對國際金融、全球市場造成的影響，包括引發一系列能源、糧食等危機。

> 世界貿易組織 12 日發布的全球貿易年度預測報告認爲，俄烏衝突危及本就脆弱的全球貿易復甦……報告認爲，2022 年獨聯體

> 地區（不包括烏克蘭）的產出預計將大幅下降 7.9%，該地區的進口將萎縮 12.0%（澎湃新聞，2022 年 4 月 12 日）。

舉相關金融組織或股市的大盤數據，以實際報告及數字說明戰爭對國際經濟造成的直接影響，其間明確點出俄烏衝突波及全球貿易，甚至導致全球食品價格飛漲，如〈糧農組織：3 月全球食品價格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創新高〉（賀飛，2022 年 4 月 9 日），標題便指出戰爭對於國際糧農的影響。

在推理裝置上，該框架指出俄烏衝突導致各國乃至全球的經濟受到波動和影響（問題定義），由於俄烏兩國作為食品、能源等基本商品的主要供應商（因果解釋），而停止貿易或制裁行為將會對低收入國家造成更大影響（道德評估），因此各國政府和多邊組織應共同努力促進貿易（解決建議）。

2. 「對俄羅斯經濟影響」次框架

其次為「對俄羅斯經濟影響」次框架，其核心意涵為戰爭對俄羅斯經濟造成的影響。在此框架下的消息來源，以他國或國際組織和俄羅斯官方為主，報導內容大多談及國際間對俄羅斯的制裁行為，同樣也有新聞引述俄羅斯對於自身經濟波動的闡述。

在框架化裝置上使用字彙和例證，字彙上多屬於經濟層面，如：「收入減少」、「出口暴跌」、「通脹飆升」、「經濟制裁」、「盧布堅挺」、「西方團結」等，但在報導處理上與上一個框架有所不同，如：

> 俄羅斯央行官網當天發表聲明說，俄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仍然充滿挑戰，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金融穩定風險仍然存在，但在俄政府採取控制資本流動等措施後，其上升態勢目前得到遏制……俄方隨即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將基準利率從 9.5% 大幅上調至 20%，以應對西方制裁、穩定金融市場、提振市場信心。俄羅斯莫斯科交易所最新數據顯示，盧布匯率已回升至俄烏衝突前水平（黃河，2022 年 4 月 8 日）。

上述報導中的官方消息來源，指出俄羅斯雖受到戰爭和西方制裁影響，但俄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已使盧布匯率回升，金融風險得到遏制，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效果並不明顯，如：

主要源於俄羅斯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並不怕制裁……因俄羅斯對其他國家的制裁是有預判的，所以做了一些準備，抗壓能力較強（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5 日 b）。

以及引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發言，指出「在面對西方制裁時，盧布展現出很強的穩定性。」（南博一，2022 年 4 月 6 日），此框架主要圍繞國際制裁手段以及俄羅斯的反制手段展開，例證則多引用俄國央行、財政部、莫斯科交易所等的數據佐證。

在推理裝置上，此框架針對國際制裁對俄羅斯造成的經濟影響，以及俄羅斯的反制手段進行分析（問題定義），由於俄羅斯有一定的反制裁能力，西方聯盟對其的制裁效果有限（因果解釋），短期內俄政府將天然氣與盧布掛鉤，並與黃金脫鉤，使盧布與物價穩定（道德評估），但長期下去不是辦法，俄羅斯必須刺激國內經濟（解決建議）。

3.「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

最後是「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此框架報導數量較少，甚至《人民網》樣本中沒有使用此框架的新聞，因此以下論述以《澎湃新聞》為主。其核心意涵為俄烏衝突對烏克蘭經濟造成的影響，報導內容傾向於陳述烏克蘭經濟損失，或國際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等。

框架化裝置層面，同樣使用字彙和例證，常見字彙有「萎縮」、「下降」、「損失」、「國防援助」、「資金援助」、「極為嚴峻」、「重創」等形容經濟負面的詞彙；例證方面多舉烏克蘭央行或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報告，佐證烏國經濟受到戰爭之影響程度。此外，有報導針對美國對烏的援助進行分析，在框架化裝置上使用了譬喻：

〈新聞分析　美國送烏克蘭的到底是「救命錢」還是「送命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很難說這是「保命錢」，這就是「送命錢」或者是讓烏克蘭某些人的「賣命錢」。其實這個背後和「租借法案」一樣，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利己的算計……美方事實上還是拱火、澆油這麼一個態勢，以便實現它

> 的利潤最大化，損害俄羅斯最大化這麼一個狀態（澎湃新聞，2022年5月11日a）。

上述報導將美國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譬喻為「送命錢」和「賣命錢」，並將援助背後邏輯比作「租借法案」，稱其行為是「拱火澆油」。租借法案原為美國國會在二戰初期通過的一項法案，以不捲入戰爭為前提，為盟國提供戰爭物資，而拱火澆油原意應是烹飪時的動作，這則新聞將「租借法案」的概念挪用至俄烏戰爭中的美國立場，並以「拱火澆油」形容美國行為將對烏克蘭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有關推理裝置，「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意指烏克蘭受到戰爭影響而引發一系列國內乃至世界的經濟連鎖效應（問題定義），由於烏克蘭作為糧食出口大國，將連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一步影響全世界（因果解釋），但有報導指出軍事援助可能使戰爭更加激烈（道德評估），應以資金援助支持烏政府提供基礎服務，並及時幫助烏克蘭重建（解決建議）。

綜合上述，「經濟影響框架」中使用數據作為事實依據，證明戰爭帶來的經濟影響。在處理俄國及烏克蘭所受影響時，面對各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媒體傾向使用俄方數據以佐證戰爭並未撼動俄國經濟，並敘述俄羅斯的反制手段，兩家媒體明顯站在親俄角度進行報導。但涉及國際經濟、美國議題，兩家媒體則再次呈現打美、反美的一貫態度，批判美國對烏的援助行為，凸顯在中美角力環境下，媒體見縫插針地顯現排外與反美的意識形態。

（四）道德框架

最後為「道德框架」，凸顯反戰、正義、公共利益或人權議題的報導，《澎湃新聞》使用此框架的比例略高於《人民網》；後者的報導以中國呼籲和平談話及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為主，但《澎湃新聞》除中方表態的報導外，更多呈現戰爭背後人情味的故事，引述許多外國民眾的意見作為消息來源，包括對各國難民的報導，透過對民眾的採訪回顧城市的歷史等。

框架化裝置上，首先使用字彙，常出現的字彙選擇有：「和平解決」、「全力保護」、「苦難」、「背井離鄉」、「庇護」、「千瘡百孔」等，如：

> 2月27日，俄烏戰事進入第四日，衝突不斷升級。平日裡安靜美麗的烏克蘭城市，不得不面對呼嘯而過的導彈，面對不斷響起

的空襲警報，面對被炮擊後千瘡百孔的樓房。人們無助、哭喊、驚恐……（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7 日）。

相對著重事件客觀報導的官方媒體《人民網》，《澎湃新聞》則以形容詞描繪戰爭，尤其在「道德框架」下對戰爭環境進行渲染，並圍繞著戰爭下的小人物進行報導。因此其使用的另一框架裝置為敘事，透過對小人物故事的敘述，對身處衝突下的人們進行採訪，以小見大地還原戰爭樣貌。

那天回答老師問題時，我聽到窗外劇烈的「咣當」一聲。俄軍襲擊了敖德薩當地一個軍用物資儲存地，發生爆炸。我看向窗外，隔著冬日稀疏的樹枝，遠處一團灰霧呈擴散狀態，伴隨黑煙冒出（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7 日）。

這方式還使用例證，舉聯合國難民署、美國國務院、德國內政部、人道主義走廊數量等數據作為有關難民接收、人道主義救援的論述依據。

「道德框架」主要有三種報導類型，首先是「呼籲和平」，這為《人民網》經常使用的報導起手式，以純淨新聞方式，引用中國官方及國際社會呼籲和平的宣言、各國的人道救援作為內容核心，如〈聯大主席呼籲俄烏通過對話解決爭端〉（王建剛，2022 年 2 月 25 日）、〈國際社會繼續呼籲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俄烏衝突〉（唐霽等人，2022 年 2 月 28 日）。

其次是「何以為家」，報導內容除陳述難民情況的純淨新聞外，《澎湃新聞》比《人民網》更多報導各國難民的遭遇，並且以深度報導形式呈現，如〈全球城市策略丨爲難民而規劃〉（澎湃新聞，2022 年 3 月 14 日），從「何以為家」、「何以為生」、「何以為民」三個角度，討論難民的安置、謀生、基本權利保障等問題；抑或是討論邊緣國家難民的何去何從，如〈俄歐邊緣中的摩爾多瓦：難民沼澤、戰爭疑雲與脆弱的平衡〉（喻曉璿、鄭江涵，2022 年 3 月 14 日）。《澎湃新聞》此類型範圍不僅限於俄烏兩國，更多地講述在此戰爭中邊緣族群之人權議題。

較為不同的是，《人民網》有關難民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報導角度以譴責西方「雙重標準」為主，指出第三國公民在尋求援助時受到種族歧視。

基於種族、族裔、國籍或移民等身份而選擇性地給予人道主義援助是不可接受的，它與人道主義精神格格不入。所以，西方國家以帶有偏見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選擇性方式開展人道主義援助時，

> 不僅會削弱人道主義精神所蘊含的善良與力量，還會讓世人更加認清西方國家對待人道主義和人權的「雙標」與僞善（毛俊響，2022年4月8日）。

而《澎湃新聞》則是透過對人物的實際採訪，呈現在波蘭擔任難民志願者的感受，如〈連線／志願者：在波蘭，烏難民受到最慷慨接待，非烏裔或遭冷落〉（南博一、林宇軒，2022年3月17日），文中還引述《衛報》等外國報導之內容，以此角度展現非烏克蘭裔難民遭遇的人道主義問題。

第三類則是「城市的悲鳴」，《澎湃新聞》有數則與俄烏兩國歷史、地緣政治相關的專題報導，爬梳歷史脈絡，透過人物故事串起社會變遷痕跡，如〈特稿／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上）、（下）〉（汪倫宇、喻曉璿，2022年5月11日;澎湃新聞，2022年5月11日b），以頓涅茨克人的成長經歷、國族認同等方面展開敘述，呈現兩國政治變動，影響、融入當地生活的種種痕跡。

推理裝置的部分，「道德框架」意指因戰爭引發的人道主義災難或公共利益之問題（問題定義），兩國地緣政治悲劇導致許多人道危機（因果解釋），當事方應遵守國際人道法，保護平民、減少傷亡，確保人員撤離和人道通道的安全順暢（道德評估），兩國應立即停火，透過對話和談判化解危機（解決建議）。

「道德框架」潛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現象與前文分析一致，《人民網》作為官方媒體，相比《澎湃新聞》較少以人情趣味、深度報導的形式呈現此框架，更強調呼籲和平的純淨新聞，彰顯中國立場與大國擔當，甚至再次批判西方「雙重標準」以劃分敵我，呼應官方的意識形態，完美充當政府喉舌；而《澎湃新聞》因其商業媒體定位，則在遵從黨國對事件詮釋的領導權威下，開拓深度報導的空間，講述災難背後的人物故事及人權議題等，迎合資本市場需求。

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量化及質化分析，呈現中國兩家網路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報導。結果發現，黨營的《人民網》與商業化的《澎湃新聞》，在俄烏戰爭中扮演的角色相近，與胡光夏（2007）、Thussu & Freedman（2003）的研究發

現有幾點雷同。首先，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新聞報導中充當了戰爭的批評者、批判戰爭的觀察者之角色，雖然不公開譴責交戰兩國，但兩家媒體在報導內偶有呼籲和平，反對戰爭的立場。

然而，不同於過往研究指出部分媒體介入戰爭，成為戰爭的工具或平臺，中國媒體並未積極扮演此次戰爭的啦啦隊，或鼓勵他國參加戰爭之角色，反而對交戰兩國的立場保持高度節制，為俄國說話同時，又同情烏克蘭。然而，中國媒體卻成為另一場意識形態戰爭的平臺，透過遠方烏克蘭的實體戰爭，為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增添火力，處處呈現中美兩國的角力。也就是說，中國的媒介平臺上，透過俄烏戰爭的報導形塑反美情緒，強化其民族主義。

戰爭新聞的再現受到媒體與國家關係的高度影響。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 的宣傳模式指出，即使是標舉新聞自由的美國，媒體報導戰爭新聞仍高度受到國家左右。威權國家的媒體更難脫離黨國力量的指令，中國媒體長期以來作為複製領導者政經框架的啦啦隊，在有關俄烏戰事、中美關係的議題上，不斷為中國的立場吶喊助威，加強民族自信、宣揚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並且見縫插針地將戰爭責任歸咎於美國、批判美國，與其形成意識對立。回應過往相關研究理論，在中美角力的環境下，中國政府利用「黨的公關公司」——新聞媒體，將其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在戰爭的責任歸屬聚焦於美國，進而在此議題中不斷塑造一致對外的民族情緒，彰顯中國形象（李金銓，2002；汪宏倫，2014）。

細究戰爭報導框架，過往文獻指出，在衝突與和平兩端中，媒體經常重現衝突場景；本文分析結果證實此論點，衝突框架是《人民網》和《澎湃新聞》最常採取的報導框架。而在經濟框架、責任框架、道德框架等議題的複雜牽動下，則出現人道、反戰的想法 。在責任框架下，雖然不輕易究責於俄羅斯，卻反而主打反美牌，認為美國及北約要為戰爭負責，譴責民主盟國的經濟制裁行動，並抨擊美國從俄烏衝突中牟利。

從媒體屬性來區分，《人民網》和《澎湃新聞》在報導主題與消息來源上呈現差異。《人民網》傾向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高度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合理化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淡化俄羅斯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澎湃新聞》作為商業媒體，其報導走向和立場雖然不能偏離國家利益，但也形塑與官方媒體有所差異的報導風格，如以其他國家或人民作為消息來源，在道德框架中展現更多人情趣味的深度報導，盡可能迎合資本市場的需求，從中獲取利潤。此研究結果符合王毓莉（1999）、何清漣（2006）等人對於市場化

媒體的分析方向。

綜合觀察，中國媒體在建構俄烏戰爭新聞時，依循與俄烏兩國外交關係以及經濟利益的基礎，盡可能不得罪交戰兩國，但在新聞中仍頻繁引用俄羅斯官方消息來源作為報導依據，對戰爭的定義採用俄羅斯的官方用法，稱其為「特別軍事行動」。並且，兩家媒體在此事件的報導中，除使用過去研究發現所指出戰爭新聞常見的衝突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外，頻繁使用「美國應對戰爭負責」的責任歸屬框架，尤其是以《人民網》為例的官方媒體，以對美國的戰爭咎責作為最主要的報導框架之一。

本文分析中國網路媒體所建構的俄烏戰爭，及其背後凸顯的民族主義。研究結果顯示，傳播作為中國政府「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之主要途徑，誠如汪宏倫（2014）所言，中國媒體對外一致支持一個強大、維護世界和平的政府，建立主體意識，對內自上而下地動員普通民眾，以仇美、反霸權的「戰爭之框」劃分敵我，形成意識形態分割。從框架包裹分析結果可看出，此類新聞建構方式，已然形成詮釋俄烏戰爭的主要認知框架，並不斷以自我美化的方式塑造中國「除暴安良」的國際形象。

因此，不同於過往戰爭新聞研究，本文發現，中國媒體在實體戰爭的再現之外，積極建構一場虛擬的戰爭，動員民族主義情緒，為中美兩大強權角力增添柴火。亦即，中國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新聞報導，醉翁之意不在酒，實則利用俄烏戰爭，建構反美、反西方、反霸權的言論戰場平臺，媒體成為複製政府意識形態的啦啦隊，對內以「中國自我美化」宣揚民族主義，對外以「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形成批判美國的統一戰線。

參考文獻

Bradsher, K.（2023 年 3 月 8 日）。〈習近平罕見公開批評美國對華採取遏制措施〉，《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30308/china-us-xi-jinping/zh-hant/

人民網（2022 年 3 月 15 日）。〈外交部：美國毫無資格自詡所謂「人權燈塔」〉，《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315/c1002-32375598.html

_____（2022 年 4 月 6 日）。〈將經濟武器化必將反噬其身（鐘聲）——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⑥〉，《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 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06/c64387-32392108.html

于瀟清、劉棟（2022 年 3 月 17 日）。〈烏克蘭局勢發展讓中方越發陷入尷尬？外交部回應〉，《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62685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9 月 1 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01/c40531-25581189.html

_____（2015 年 7 月 17 日）。〈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17/c397563-27322291.html

_____（2016 年 02 月 20 日）。〈 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0220/c64094-28136289.html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22）。《2021 中國網絡媒體發展報告》。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上網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4-27/doc-imcwiwst4217752.shtml

毛俊響（2022 年 4 月 8 日）。〈俄烏衝突暴露西方人道主義「雙標」〉，《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848.html

王信賢（2018）。〈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展望與探索月刊》，16（5）：111-127。

王建剛（2022 年 2 月 25 日）。〈聯大主席呼籲俄烏通過對話解決爭端〉，《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5/c1002-32359881.html

王毓莉（1999）。〈中共傳播改革之研究〉，《東亞季刊》，30（1）：19-38。

_____（2010）。《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的考察》。揚智文化。

朱瑞卿（2022 年 4 月 11 日）。〈秘密軍事生物活動的幕後操縱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五〉，《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1/c1002-32396012.html

_____（2022 年 4 月 12 日）。〈劣跡斑斑的人權「偽道士」——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六〉，《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2/c1002-32397124.html

何　舟（2008）。〈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路向〉，《新聞大學》，2：34-36。

何清漣（2006）。《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黎明文化。

吳寶澍（2022 年 4 月 8 日）。〈不擇手段斂財的趁火打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三〉，《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9/c1002-32395159.html

_____（2022 年 4 月 10 日）。〈揮舞制裁大棒的橫行霸道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四〉，《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0/c1002-32395437.html

宋建武、羅贇、董鴻英、楊樂、王靜（2015）。〈2014 全面推動媒體融合〉，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梅寧華、宋建武（編），《媒體融合藍皮書：中國媒體融合發展報告（2015）》，頁 1-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忻　華（2022 年 2 月 25 日）。〈俄軍“閃擊”烏克蘭：中東歐國家膽寒，歐洲內部正醞釀危機〉，《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50504

李子甜、徐美苓（2020）。〈《人民日報》霧霾新聞框架建構（2011－2017）〉，《新聞學研究》，142：59-109。

李志偉（2022 年 3 月 16 日）。〈中國駐美大使刊文闡述關於烏克蘭問題立場〉，《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22/0316/c1002-32375860.html

李金銓（2002）。〈中國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74：104-118。

_____（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牛津大學出版社。

汪宏倫（2014）。〈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19：189-250。

汪倫宇、喻曉璿（2022 年 5 月 11 日）。〈特稿｜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下）〉，《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8014528?from=

沈聿德譯（2021）。《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野人文化。（原書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Books.）

林穎佑（2014）。〈烏克蘭事件後的中俄政經關係〉，《臺俄經貿》，16：38-45。

南博一（2022 年 4 月 6 日）。〈歐盟外交官：歐盟不想卷入俄烏衝突，西方制裁之下盧布堅挺〉，《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480356

南博一、林宇軒（2022 年 3 月 17 日）。〈連線｜志願者：在波蘭，烏難民受到最慷慨接待，非烏裔或遭冷落〉，《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64510

施正鋒（2016）。〈中國的民族主義〉，《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2 (2)：41-71。

胡光夏（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與「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五南。

唐彥林、李蒙佐（2022 年 4 月 13 日）。〈媒體刊文：美國是製造傳播生物病毒和精神病毒的“絕命毒師”〉，《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89508

唐霽、邢建橋、許正、劉宗亞、薛飛、卞卓丹、王建剛、高文成（2022 年 2 月 28 日）。〈國際社會繼續呼籲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俄烏衝突〉，《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8/c1002-32361728.html

高　頡（2014）。〈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權性質的探討〉，《中國大陸研究》，57 (3)：1-38。

張　遠（2022 年 4 月 7 日）。〈挑動俄烏衝突的煽風點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一〉，《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7/c1002-32393543.html

陳昌鳳（2015）。〈媒體融合中的全員轉型與生產流程再造——從澎湃新聞的實踐看傳統媒體的創新〉，《新聞與寫作》，9：48-50。

陳　籽（2022 年 4 月 8 日）。〈漫評美式霸權之三：全世界瘋狂斂財的「吸血鬼」〉，《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478.html

黃河、盧懷謙、黃澤民、劉芳、何麗麗、劉春燕、郝亞琳、王麗麗、華迪（2022 年 2 月 24 日）。〈綜述：俄烏衝突風險驟升　全球主要市場動蕩加劇〉，《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4/c1002-32359182.html

黃　河（2022 年 4 月 8 日）。〈俄央行下調基準利率至 17%〉，《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929.html

喻曉璿、鄭江涵（2022 年 3 月 14 日）。〈俄歐邊緣中的摩爾多瓦：難民沼澤、戰爭疑雲與脆弱的平衡〉，《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7107460?from=sohu

曾繁旭（2009）。〈社會的喉舌：中國城市報紙如何再現公共議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6 (3)：93-100。

賀　飛（2022 年 4 月 9 日）。〈糧農組織：3 月全球食品價格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創新高〉，《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9/c1002-32395230.html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1989)。《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東華。

趙子忠、崔卓宇（2014）。〈新媒體時代時政新聞如何突圍——也談澎湃新聞的競爭策略〉，《新聞研究導刊》，12：7-12。

劉　健（2022 年 4 月 8 日）。〈破壞國際秩序的唯我獨尊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410.html

潘忠黨（2006）。〈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1：17-46。

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5 日 a）。〈圓桌　「閃擊」烏克蘭首日，俄軍展示「混合戰爭」新戰力〉，《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842058&from=kuaibao

_____（2022 年 2 月 25 日 b）。〈觀察　美歐多國制裁對俄羅斯經濟到底影響幾何？〉，《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16858930&from=wifiKey#

_____（2022 年 2 月 27 日）。〈沒有人會代替我們戰鬥，我們將以自己的力量對抗任何敵人〉，《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6880636?from=sohu

_____（2022 年 2 月 28 日）。〈歐洲委員會暫停俄代表權，俄外交部：已淪為西方政治工具〉，《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884004&from=kuaibao

_____（2022 年 3 月 14 日）。〈全球城市策略　為難民而規劃〉，《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7099606&from=kuaibao

_____（2022 年 4 月 12 日）。〈世貿組織年度報告：俄烏衝突危機全球貿易復蘇〉，《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7581155?from=

_____（2022 年 4 月 6 日）。〈聯合國安理會審議烏克蘭局勢，俄烏圍繞布恰事件各執一詞〉，《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480369

_____（2022 年 5 月 11 日 a）。〈新聞分析　美國送烏克蘭的到底是「救命錢」還是「送命錢」？〉，《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8032052&from=kuaibao

_____（2022 年 5 月 11 日 b）。〈特稿　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上）〉，《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

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7997320&from=kuaibao

戴瑜慧（2019）。〈意識形態娛樂化：習近平新時代下的政治與流行文化雙重奏〉，《中華傳播學刊》，36：195-235。

聶舒翼（2022 年 5 月 10 日）。〈海外網評：在美國眼裡，烏克蘭不過是拖垮俄羅斯的炮灰〉，《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510/c1002-32418732.html

顏建發（2015）。〈烏克蘭危機與中國的戰略處境和選擇〉，《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1（2）：51- 72。

羅世宏、魏玓、馮建三、唐士哲、林麗雲、王菲菲、王賀白譯（2005）。《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巨流。（原書 McChesney, R.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21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Aday, S. (2010). Chasing the bad news: An analysis of 2005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 coverage on NBC and Fox News Chann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1), 144-164.

An, S. K., & Gower, K. K. (2009). How do the news media frame cris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risis news coverag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5*(2), 107-112.

Berry, N. O. (1990).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ess an analysi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U.S. foreign policy.* Greenwood Press.

Chomsky, N. (2002).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2nd ed.). Seven Stories Press.

Dimitrova, A. K. (2001). Nightmares in the nightly news: CNN covers atrocities in Kosovo.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35*(1), 1-46.

Dimitrova, D. V., & Strömbäck, J. (2005). Mission accomplished? Framing of the Iraq war in the elite newspapers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67*(5), 399-417.

Fortner, R. S. (199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Galtung, J. (2000). The task of peace journalism. *Ethical perspectives, 7*, 162-167.

_____(2003). Peace journalism. *Media Asia, 30*(3), 177-180.

Hallin, D. C., & Gitlin, T. (1993). The Gulf War as popular culture and as

television dram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411-424.

He, Z. (2000).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112-151).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olsti, O. 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ddison-Wesley.

Kelman, H. C. (1995). Decision making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Gulf War: An assessment of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assumption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2), 117-130.

Knight, A. (2003). The Hollywoodisation of war: The media handling of the Iraq war. *Global Media Journal, 2*(3), 1-10.

Lasswell, H. D. (1927).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Knopf.

Luther, C. A., & Miller, M. M. (2005). Framing of the 2003 US-Iraq war demonstrations: An analysis of news and partisan tex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1), 78-96.

Moore, G. J. (2014, May 21). China's stake in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iplomat*. Retrieved January 10, 2023,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chinas-stake-in-the-ukraine-crisis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immo, D. D., & Combs, J. E. (1980). *Subliminal politics: Myths & mythmakers in America.* Prentice-Hall.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1), 55-75.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3). Asia-Pacific Sclerotic one-party regimes and media control by oligarchs. Retrieved July 10, 2023, from https://rsf.org/en/region/asia-pacific

Schwalbe, C. B., & Dougherty, S. M. (2015). Visual coverage of the 2006 Lebanon War: Framing conflict in three US news magazines. *Media, War & Conflict, 8*(1), 141-162.

Semetko, H., & Valkenburg, P.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93-109.

Thussu, D. K., & Freedman, D. (2003).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Sage.

Topoushian, M. (2002). *Interpreting the constructed realities of the 1991 Gulf War: A 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two Arab and two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s.* Concordia University.

van Gorp, B. (2007).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60-78.

Wimmer, R., & Dominick, J. R. (1991).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3rd ed.). Wadsworth Pub. Co.

Wolfsfeld, G. (2004). *Media and the path to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本文引用格式

鄒瞻舒、洪貞玲（2023）。〈民族主義啦啦隊：中國媒體對俄烏戰爭的報導及角色〉，《傳播研究與實踐》，13（2）：111-154。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 2005

Zou, Z. S., & Hung, C. L. (2023).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The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by chinese media and the media's ro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111-154.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 2005 [Text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111-154, July 2023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The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by Chinese Media and the Media's Role

ZOU, Zhan-Shu

Master of Art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NG, Chen-Ling*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ussia-Ukraine war has been attracting global media attention. In China, a country that has good relations with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how did Chinese media outlets report this war? How were did national and market interests of China reflected by Chinese media through war news? Using van Gorp's framework wrapping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wo Chinese online media outlets, People's Daily (Renmin ribao) and The Paper (Pengpai xinwen), represented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in their report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reports by the two media outlets, one run by the party and the other market-oriente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forms of repor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reporting themes, and content frameworks. However, consisting with China's official position, their reporting stances were both neutral without biasing towards either Russia or Ukrain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among the four commonly-seen thematic frameworks, the conflict framework was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the two media outlets. The other frameworks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framework, the economic impact framework, and the ethical framework. After combined analysis of framing devices, reasoning devices, and underly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 war new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by reporting the news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the Chinese media outlets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anti-American and anti-Western discourses and played the role of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Keywords: Anti-America, nationalism, the Russia-Ukraine war, frame package, war journalism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lhung@ntu.edu.tw
Received: 2023.03.12; Accepted: 2023.06.11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善與「俄」：俄烏戰爭中澤倫斯基推文言說框架與戰爭傳播策略研究

江知萱

陸軍專科學校學員生指揮部政戰官

孫復威*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從框架理論與敘事分析出發，探討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於官方推特（Twitter）公開推文的主題及其言說策略。資料蒐集時間為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11 月 13 日，總計 447 則推文。經隱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簡稱 LDA）主題模型分析後發現，澤倫斯基推文的主題框架可分為：1. 人道主義迫害、2. 援助與抵制、3. 與烏克蘭同一陣線。進一步檢視其敘事架構後發現澤倫斯基在善惡歸納、道德評價和行動方案等面向，彰顯戰爭歸因與烏克蘭國家／人民價值，並且表達烏國訴求和利益，更藉由「口號」連結其目的與主題框架，進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關鍵字：社群媒體、俄烏戰爭、框架理論、敘事分析、隱含狄利克雷分布

* 通訊作者，E-mail: fuweisun5@gmail.com
投稿日期：2022 年 11 月 02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4 月 01 日

壹、緒論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與網路的普及，現代戰爭型態亦隨之轉變，除了過往傳統熱戰外，也包括了認知戰、資訊戰等層面。其中最大的差別，即在於如何透過媒體與資訊的傳遞，說服目標受眾支持其軍事行動，達成戰略目標（方鵬程等人，2016）。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宣佈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去軍事化」及「去納粹化」等原因，闡述其受到烏克蘭軍隊威脅，並表示在收到頓內次克（Donetsk）及盧甘斯克（Lugansk）兩親俄地區領導人的請求後才開始以維和部隊名義派遣俄軍穿越邊境，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及多個城市發起攻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2 年 2 月 24 日）。此舉不僅代表著俄烏兩國在政治與軍事衝突對立的全面升級，亦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所爆發的最大規模戰爭。

隨著兩國戰爭的爆發，戰爭中的傳播現象同時成為關注焦點。在《戰爭傳播》（*War Communication*）一書中，國內學者方鵬程（2007）曾以「4CI」－Command（指揮）、Control（控制）、Communication（通訊）、Computer（電腦）、Intelligence（情報），以及宣傳戰與心理戰所處的「第二戰場」為基礎，提出戰爭傳播是以宣傳和說服為手段，目的在於爭取國內外的民意支持、輿論認同與行動參與，以期獲得友邦聯盟、打擊敵人民心士氣的政治行為。這也表示，衝突期間的媒體使用與訊息傳遞常是有計劃的策略展現，在面對戰爭威脅下，如何妥慎擬定並運用傳播策略便成為取得戰略優勢的重要一環。而這樣的資訊戰之所以特別，除了是專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較量外，更是從大眾媒體主導到社群媒體參與的一種轉變，從而影響了今日俄烏戰爭主流價值觀的形塑。

以往的戰爭衝突中，政府在傳播與相關資訊處理常處於被動，但烏克蘭這次面對俄軍的步步進逼卻積極地面對處理，務求對外、內能夠建立有效的溝通及傳播，除利用政府統一發佈重要資訊，也透過各種渠道呼籲民眾跟隨官方消息、快速回應各類謠言，以阻止虛假消息在民間散播。例如，有俄議長宣稱烏總統在戰事進行期間早已逃出基輔，而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及其幕僚則在當地知名歷史建築物前自拍，迅速上傳社交網路加以澄清與反擊（楊駿宗，2022 年 2 月 26 日）。此外，烏克蘭在戰爭中充分利用社群媒體平臺－－推特（Twitter）推文的快速傳散特性，做為軟實力的延伸，以框架及敘事手法有意圖、目的性的影響國際社會對於戰爭歸因及責任承擔

對象的看法，將烏克蘭的受苦形象配合人道主義救援，以「幫助烏克蘭」鏈結社會期許，甚至藉由標籤「#StandWithUkraine」、「#StopRussia」進行支持烏克蘭、阻止俄羅斯等行動，使得口號不再只是口號、標籤也不只是標籤，而是能連結人們及改變認知的重要關鍵。

身處戰事之中，面對巨大威脅的烏克蘭，如何憑藉推特取得網路話語權、爭取支持，使國際社會與烏克蘭站在譴責俄羅斯的同一陣線，其社群言說策略值得深思與探究。因此，本研究以烏克蘭國家領導人推特社群作為主要研究平臺，藉由框架與敘事之觀點，運用資料探勘方式蒐集與分析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中的推文架構，檢視其如何透過有意識的過濾、排除與強調所選擇的訊息以及推文內容研訂，爭取國際支持，形成對己有利局面。

貳、 文獻探討

一、 俄烏戰爭與社群媒體

在俄烏戰爭進程中可觀察到，社群媒體的應用影響了民意與輿論走向，也成為左右戰爭的關鍵，其中俄羅斯擅長使用「駭客戰／網路戰」之資訊作戰手段進行攻擊，阻截烏克蘭地區網路，企圖使政治、經濟及社會運作網絡失能，並搭配訊息操弄、假消息進行「心理戰」；而烏克蘭則利用社群媒體及大眾輿論的影響力進行「心理戰」及「認知戰」（曾柏元，2021；詹祥威，2022 年 4 月 14 日）。俄羅斯是最早在軍事領域利用網路空間的國家之一，長期重視研發以提高在該領域的網路攻擊能力（黃郁文，2022）。從莫斯科 2008 年對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發動軍事打擊前，就遭指控對喬國發動網路攻擊，造成該國網路癱瘓及重大損失；到 2014 年烏克蘭東部地區戰爭，俄羅斯支持的駭客組織多次對烏軍進行電子與網路攻擊，以癱瘓其系統。2015 年起，烏克蘭已多次遭遇駭客攻擊，導致上百萬居民斷電，甚至在冬天導致首都基輔供電、供暖遭斷。

2022 年俄烏戰爭前，亦利用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1] 癱瘓烏國外交、內政、國防及銀行金融等網站，造成內政停擺。在此次戰爭中，俄羅

1　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簡稱 DDoS）攻擊，為駭客在短時間內利用大量發送網路封包或服務請求，使得受害系統主機因網路頻寬超出負荷或耗盡資源而癱瘓，無法提供正常服務予一般使用者（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2022 年 9 月 6 日）。

斯的戰略仰賴具進攻性的「駭客戰」配合其軍事行動，在開始軍事攻擊前，先行破壞對手的資訊基礎設施、民用及軍用通信，造成網路癱瘓、指揮管理系統失效。除了利用駭客戰進行網路資訊的截斷與癱瘓之外，在心理戰方面，俄羅斯則藉由網路攻擊竊取烏軍士兵個人資料及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簡稱 IP）資訊，發送「快離開，不然就等死！」的簡訊，或傳訊息給士兵家屬「你的兒子（丈夫）已經死了」，等家屬急於回撥時，便打電話到士兵手機佔線、或馬上砲擊手機訊號所在位置，企圖使軍、民心渙散（黃郁文，2022）。

面臨俄羅斯以資訊作戰手段攻擊烏克蘭的挑戰時，烏國政府則善用社群網路的擴散影響力，進行「輿論戰」、「心理戰」與「認知戰」，呼籲世界一同抵制侵略者俄羅斯，號召全球反制俄羅斯（張玲玲，2022 年 10 月 14 日）。例如烏克蘭副總理費德羅夫（Mykhailo Fedorov）身兼「數位轉型部長」招募網路自願者協助組建「IT 軍隊」，並以網路安全公司「Cyber Unit Technologies」為核心，組織國內外駭客一同反制俄羅斯的資訊作戰攻擊。不僅保護國內基礎設施不再受駭客攻擊外，甚至針對俄羅斯軍隊進行情報搜集與反擊，連全球最大駭客組織「匿名者（Anonymous）」都響應召集，在推特上宣布正式對俄國展開網路攻擊。除了組織志願駭客反制俄軍，烏國總統澤倫斯基及其政府也利用推特的平臺效應，拉攏民間企業投入修復烏克蘭軍、民網路通訊，如「馬薩爾科技（Maxar Technologies）」出動商用衛星影像，曝光俄國軍事動態。

再者，由於烏國網路設施屢遭破壞，造成民眾通訊受阻，「SpaceX」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即宣布旗下星鏈（Starlink）衛星寬頻網路服務供給烏克蘭，幫助當地因戰火而阻斷的網路仍能繼續提供資訊流通；影音平臺 YouTube 也於 3 月 1 日宣布封鎖「今日俄羅斯」與「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宣傳頻道；而 Facebook、Google、微軟亦跟進封鎖、下架及調整演算法，使得俄羅斯對外宣傳不再被看見，進而失去效用。從上述烏克蘭反制俄羅斯資訊作戰的手段中可以瞭解，烏國面對具有軍事優勢的俄羅斯，利用社群媒體推特進行全球性的認知作戰回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贏得國際支持，多次透過推文與他國領袖視訊和發布宣言影片，呼籲國際加強制裁俄羅斯，並指責俄軍侵略下的各種「罪狀與暴行」，使俄軍儘管在網路戰及軍事武力層面相較烏軍佔優勢，但在認知戰、輿論戰、心理戰或宣傳戰等廣義資訊作戰領域上，其表現卻弱於烏國（黃郁文，2022；馮建三，2022）。

隨著傳播媒介科技的進步，當前媒體外交已是一個國家布局國際戰略甚至是戰爭行動的關鍵要素，在外交活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顏瑞宏、傅文成，2022）。過去 Cohen（1986）將媒體、外交與公眾之間的關係與功能區分為：（1）媒體為外交決策者和公眾獲得的資訊來源；（2）媒體可作為國家之間外交溝通的平臺；（3）透過媒體可爭取到國內外對公共政策的支持。而 Gilboa（1998）則將媒體外交定義為僅限於媒體與外交間所行構的關係，意即決策者在特定情況下通過媒體訊息的傳播，與國家政府或非國家行為主體建立信任關係，或施予壓力、動員公眾支援談判，從而推動協議簽訂等。因此在當代的傳播環境下，國與國之間得以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互動，推動此類平臺在資訊戰的背景下被廣泛運用，更具影響人們的意見與感知。

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政府即運用推特進行該國的戰爭傳播，也因為社群媒體的影響力與擴散力，使訊息能夠短時間內在全球傳散，從而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幾乎能夠同步地參與全球事件（Agarwal et al., 2022, August; Pohl et al., 2022）。由於此次戰爭利用網路空間進行輿論宣傳是過去前所未聞，也從無現任總統如此依賴社群媒體進行國內外交流，甚至建立烏克蘭國家品牌，使得戰爭傳播在新場域的應用提升到了另一種新興戰爭型態的層次（Chen et al., 2022; Serafin, 2022）。以政治外交的角度來看，現今媒體宣傳的時代，運用網路媒體或社群進行的公共外交，可稱為基於網路的數位外交（digital diplomacy）。Bjola & Holmes（2015）在其編著的《數位外交：理論與實踐》（*Digital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書中，將數位外交作為國際政治管理的一種革新形式，認為國家使用數位媒體（如社群）達到外交目的方式，已經改變過去外交訊息管理議程、公共外交、戰略規劃及國際談判的做法，這也同時代表對於新世代的戰爭傳播，可以運用含括更廣泛的社群媒體進行說服溝通，使受眾與影響層面擴展至全球。

從 Alden & Chan（2021）的研究中亦可發現，國家為何、如何有目的性的使用社群媒體平臺作為宣傳管道。研究中提及中國官方推特帳戶自新冠肺炎 COVID-19 流行爆發後，活動量直線升高，而中國積極選擇社交媒體作為數位外交的原因包含了：（1）推特提供有針對性的外展能力，利用標記與主題標籤能快速有效地接觸國際受眾；（2）可以監控與衡量國際輿論；（3）透過推文的議題管理可以轉移公眾注意力，如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利用美國社區種族構成聲明來轉移對新疆人權議題的批評。從這之中亦可得知，國家在藉由選擇特定媒介進行公共外交的發言時，通常帶有宣傳意

涵，且具主題性與目的性。

由於社群媒體的傳播特性與數位環境使然，烏克蘭在俄烏戰爭中能充分利用社群媒體作為外交中的傳播角色，不僅資訊提供更即時、溝通管道更直接，亦能避免媒體機構的干預，使組織本身所建構的框架避免被二次傳播的媒體機構所破壞，更可藉由推文進行戰略溝通敘事，使主體組織策略的運用與傳播能夠直接傳遞予受眾。本研究依此分析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推文，欲瞭解面對戰爭威脅，烏克蘭領導人如何利用框架設定與敘事策略，塑造對己有利的象徵，達到符合戰略目標的戰爭傳播。

二、 新媒體時代下的戰爭衝突框架

框架作為一種認知架構，其理論（framing theory）已被廣泛解釋及運用於各種領域，以瞭解人們如何認知與理解世界，並依此進行訊息分類與解釋（Goffman, 1974; Pan & Kosicki, 1993; Scheufele & Tewksbury, 2007）。根據 Entman（1993）的說法，框架是個體選擇如何感知現實，使它們在文本中更加突出，以促進特定問題的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價和行動建議。換言之，框架是透過有意識的選擇、排除與強調建構者結構化地篩選、省略或突出某些訊息的方式（de Vreese et al., 2001; Entman, 1993）。過往的框架理論研究著重於分析主流媒體如何影響公眾對世界的看法，例如新聞框架如何影響人們對事件解釋的方式（Neuman et al., 1992; Tuchman, 1978）。此外，框架也被理解為一種試圖影響世界感知的權力象徵（Entman, 2004），亦有學者針對權利菁英和新聞記者如何創造傳播框架進行探討（de Vreese, 2005; De Vreese et al., 2001; Yang, 2003; Zhou & Moy, 2007）。簡單來說，框架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動態過程，其涉及框架構建（框架如何創建）與框架設置（框架與受眾的傾向或相互作用）等面向。

而政府作為權力精英的組織，利用框架的形式構建訊息，期望媒體以積極、正向的態度向公眾展示政策，對於政府來說是常見的手段之一，在外交政策和戰爭領域上的運用亦是屢見不鮮（Entman, 2004）。例如 Douai & Moussa（2013）的研究運用框架分析推特上有關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政治革命推文，發現民眾對於社會變革的訴求與理念能夠在社交媒體中獲得共鳴與支持。透過社群媒體，人們不僅能夠尋找、關注實時資訊，更能夠實際參與「公共對話」，形塑公眾價值。當社群媒體與現實能夠有所

連結，線上的發言或傳播行為亦具備影響線下真實生活之潛力（Enjolras et al., 2013）。而 Hemphill et al.（2013）針對美國政治範疇所作的相關研究中，也可發現美國國會議員會積極的透過推文與標籤功能建構框架、引導公眾討論其所選擇的政治議題，進而影響公眾的意見與行為。相似地，Dunning（2018）的研究探討社群媒體運用於政治宣傳之效果，以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為例，檢視其如何運用推文應對媒體與大眾，進行傳播與說服，並形塑政治框架與公共話語權，結果發現川普將推特作為其主要政治宣傳管道之一，搭配極具個人特色的政治風格與框架敘事，能夠影響受眾對於其發布議題（如發展盟友、宣傳議程、回應批評、定義自我等）的看法，甚至信任推文者提出的政治敘事。

在戰事衝突領域中，Manor & Crilley（2018）的研究發現，在 2014 年加沙戰爭（2014 Gaza War）期間，以色列外交部於推特上制定出 14 種框架策略，如強調哈瑪斯（Hamas）綁架以色列青少年事件、對以色列城市發射火箭、以色列軍隊行動合理性等，主要目的在使以色列的各項決策合法化，當中甚至加入圖像以強化訊息，使推文中的框架與以色列的整體戰略敘事產生共鳴，達到說服目的。相似地，Khan & Pratt（2022）的研究檢視巴基斯坦軍方使用社交媒體（Facebook）所進行的傳播策略，除了促進軍民對話與公眾參與，更隨著局勢變換 4 種不同的訊息框架（即動機框架：為公眾提供支持軍方打擊恐怖主義的理由與驅力；資訊框架：反恐戰爭的討論與倡議；預測框架：提供大眾反恐的合理行動方案；診斷框架：打擊敵對陣營）發布訊息，以維持公眾對反恐戰爭的支持。

檢視上述研究發現，在戰爭、衝突或政策宣傳中的訊息發布或傳播溝通，軍隊、政府通常具有目的性的說服策略，而這些發布在媒體或社群的訊息多隱含著符合戰略目標的說服框架，且隨著局勢變化，會以不同框架來達到最佳說服目的，甚至影響現實局勢。然而各項衝突或戰爭均有其特殊且複雜的歷史背景、糾葛與考量面向，其傳播框架策略研擬無法一概而論。以俄烏戰爭來說，烏國總統澤倫斯基面對俄國的強勢進逼所採取的戰爭衝突框架為何，為本研究關注重點之一。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1: 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運用社群媒體平臺推特所傳達的訊息框架為何？

三、 社群媒體戰爭衝突敘事

承前所述，現今科技與網路的快速發展，政府或國家領導人在面對戰爭衝突時發布相關訊息不再只能仰賴傳統媒體轉達，而是可以直接將社群媒體作為渠道進行戰爭傳播（黃柏欽，2020）。其使用者廣泛、關係網路緊密、成本低與傳播速度快的特點，讓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遞仰賴社群媒體，也讓社群媒體成為操縱戰爭衝突輿論走向的新場域（胡光夏，2019）。其中，相當重要的關鍵與受到關注及討論的面向即為戰略溝通敘事（Roselle et al., 2014）。因此，框架通常藉由敘事手法進行，而敘事常透過影響意圖的事件、演員和行動表示。根據 Miskimmon et al.（2014）的說法，敘事具有 3 個核心要素，首先敘事不是自然出現的，而是由具有特定意圖的政治家精心製作的；其次，敘事具有時間維度，它們援引過去來理解現在和預測未來；第三，敘事提供了過去和現在的共同意義，因為它們定義了「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想要什麼樣的世界。敘事有助於創造共同身份，而其不同於框架的主要特徵在於它們賦予過去、現在和未來實現政治目標的意義與方式（同上引）。

Dimitriu（2012）的研究指出，資訊時代下的戰爭相比於實際戰術行動結果，更看重的是如何運用戰略溝通敘事，引導公眾輿論看待衝突。該研究主要在分析阿富汗戰爭期間美（聯）軍的戰略溝通敘事，認為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若可以解釋事件並說服受眾時，便能獲得對於戰爭的合法性與支持，也反映出戰略溝通敘事如何實質影響民意，以及民意、輿論對於戰事發展的重要影響性。Entman（2004）則透過分析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 911 事件後的評論，展示了其國家領導人如何構建符合戰略目標的敘事框架；該研究發現，小布希總統在面向美國人民的演說時表示，此襲擊對美國而言是種戰爭行為，美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進行善與惡的鬥爭（懲惡揚善），並設定了框架、定義問題（攻擊）、解釋因果（戰爭）、評價道德（善與惡）和行動方案（解決）。相似地，孫秀蕙（2005）亦以符號與敘事結構分析方式，發現 911 事件後小布希總統國會演講稿的說服框架為要求美國人民與世界各國支持美國政府，表明對阿富汗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其敘事結構原則包括了指名受眾、定義事件（如自由受到攻擊）、說明歸（原）因、提供行動方案等；並將此文本與十字軍東征時的教宗講話稿進行對比，發現兩者皆利用將對立極致化的衝突論述方式，以修辭隱藏真實，說服受眾。

綜整上述政府、軍隊與政治領導者在戰爭衝突中發言的相關研究可以發

現，為了說服受眾，官方發布的訊息經常被包裝成符合該國的戰略目標，即戰爭傳播框架；而其敘述架構亦會利用敘事手法隱藏部分訊息與事實，從而強調、突顯對己有利的訊息和故事。儘管框架和敘事存在些許差異，但常被使用於相似目的，即試圖通過刻板印象、歷史類比和通俗的文化框架來吸引群眾透過共享感而進行傳播（Barthes, 1978）。此部分亦為本研究探討重點，意即檢視烏克蘭總統在俄烏戰爭中對外的推文言說策略，以敘事角度分析烏國總統如何試圖影響國際社會對戰爭的價值觀，創建共享身份感。據此，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RQ2: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推特傳達的訊息框架，其運用的敘事結構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 樣本取得與資料蒐集時間

本研究目的為檢視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中推文的訊息框架及其敘事策略。首先，本研究利用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的 Twint[2] 對其發布內容進行爬文，蒐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官方帳號：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ZelenskyyU（網址：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推文，時間範圍選擇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開戰至 11 月 13 日烏克蘭收復南部重鎮赫爾松止，以此階段性的戰略成果作為觀察俄烏戰爭事態的蒐集區間，共計 903 則推文。

二、 資料篩選與過濾

澤倫斯基總統推文態樣多以內容相同的烏克蘭語與英語並行，輔以立場相似的國家語言（如法文、中文、西班牙文等）。本研究欲瞭解烏國領導人對外社群言說框架及其敘事手法，故以能夠被廣泛傳散的國際主流語言－英語推文為主，據此篩選條件下，過濾後總計 447 篇推文作為研究分析樣本。

2　Twint 為 Python 程式語言編寫的 Twitter 抓取工具，可以擷取特定帳戶公開推文或主題標籤等相關內容（Twint, n.d.）。

三、 資料分析步驟與方法

資料蒐集及篩選完成後，本研究首先以 Twint 搜集文本資料，利用 Twitter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 API）與使用者之個人資料金鑰（token）取得授權進行爬文，並參考過去探討推特主題框架的相關研究方法（如 Khan & Pratt, 2022; Manor & Crilley, 2018），利用工具包 Gensim 進行 LDA 主題模型資料分析。其分析架構為基於 mallet 工具包之吉布斯分佈（Gibbs）進行運算，參數設定為 alpha = 50、iterations = 1000、topic_threshold = 0.0。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為主題建模演算法，可將文本內容分類成不同主題，進行內容框架的探索（Barna & Knap, 2022; Heidenreich et al., 2019; Hubner, 2021; Yang et al, 2021）。該模型分析方法具有兩個前提：（1）每篇文件都是由數個主題（topic）所形成；（2）每個主題都可以使用數個重要的字詞（word）來描述，且相同用詞可以同時出現在不同主題之間。

LDA 的模型分析可以將資料依配適度高低分類調整為最適當的主題數目，並利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3]方式，找出資料文件背後所隱含的主題框架結構（Steyvers & Griffiths, 2007）。再者，LDA 模型利用吉布斯分佈的分配方式，將文本內經常出現的詞彙歸納成關鍵詞彙，依此快速標定文本內容，進行分類，並運用字詞權重檢視文本之於主題的歸屬是否正確，故本研究採非監督式文本分類，在開始運行程式前並無文本主題預設立場，而是視字詞與文本形成的最適主題分類。

在 LDA 主題模型分類完後，本研究依其分析結果，針對各主題所運用的框架結構和敘事手法進行解析，檢視澤倫斯基總統在戰爭衝突期間的推文態樣，及其如何透過社群言說展現烏國價值、需求與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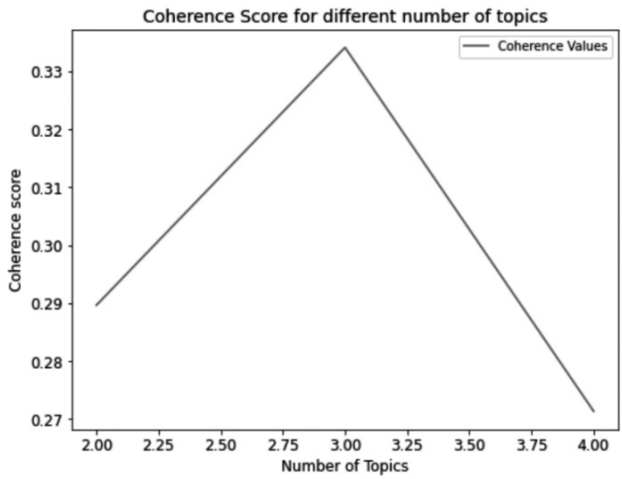
3 非監督式機器學習其概念為初始不設定主題，直接交由機器判別，計算出在一定範圍內的最適分配；反之，監督式學習為初始即設立主題並標註主題內容，使機器在分類文本時依先前所設定的主題進行分類，惟此一方式容易造成機器強制將所有文本分類，即便該文本不符合原先設立之主題內容（Banerjee & Basu, 2007, April; Materna, 2012）。

肆、研究結果

一、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的主題模型分析

在運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方式觀察 LDA 一致性分數後的結果顯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社群媒體上的推文框架建議分為 3 群（如圖 1），再檢視各主題關鍵字，依詞性進行分類與歸納後從中探索各主題意義，進而為後續主題命名提供參考（如表 1）。

圖 1：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社群媒體推文主題一致性分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1：主題模型分群與關鍵詞整理

主題分群	關鍵詞
主題 1 (158 則)	主題詞：aggression（侵略）、security（安全）、situation（局勢）、humanitarian（人道主義）、war（戰爭）、crimes（罪行） 行為詞：talks（會談）、dialogue（對話）、countering（反擊）、discussed（討論）、thanked（感謝）、informed（知情）、held（舉行） 稱謂詞：UA（烏克蘭）、EU（歐盟）、Russian（俄羅斯）、Russia（俄羅斯）、president（總統）、aggressor（侵略者）
主題 2 (149 則)	主題詞：conversation（對話）、financial（經濟）、country（國家）、common（共同）、coalition（聯合）、military（軍事） 行為詞：support（支持）、defense（防禦）、phone（電話）、sanctions（制裁）、assistance（援助）、talked（交談）、joint（聯合）、discussed（討論） 稱謂詞：Ukraine（烏克蘭）、Prime（總理）、Minister（部長）

主題 3 （140 則）	主題詞：people（人）、international（國際）、world（世界）、cooperation（合作）、peace（和平）、pressure（壓力）、relations（關係）、security（安全）、missile（導彈）、grateful（感激）、important（重要）、global（全球）、eve（前夕） 行為詞：decision（決定）、solidarity（團結）、strengthening（加強）、supporting（支持） 稱謂詞：UA（烏克蘭）、US（美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 推文主題框架

經由 LDA 主題模型分析後，本研究將澤倫斯基對於戰爭衝突期間的推文框架區分為 3 個主題，分別為「人道主義迫害」框架 158 則、「援助與抵制」框架 149 則，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 140 則：

(一) 「人道主義迫害」框架

觀察澤倫斯基的社群媒體推文後可發現，澤倫斯基將俄烏戰爭的後果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損失命名為「人道主義迫害」，從關鍵字如 aggression（侵略）、humanitarian（人道主義）、war（戰爭）、crimes（罪行）可見端倪；而在行為詞上的 talks（會談）、dialogue（對話）、countering（反擊）、discussed（討論）、thanked（感謝）則可看出澤倫斯基積極地對外進行協商與討論、尋求合作與援助，而將給予支持的國家或組織行動，上升到對「人道主義的援助」，而非僅是單純的「幫助烏克蘭」。客觀來說，俄羅斯的入侵行動造成許多後果，包含烏克蘭主權受到侵害、烏克蘭國土遭到入侵、經濟重創、民主體制受到威脅等，人民的傷亡只是其中一個結果，然而，在如此多種類型的傷害與損失之下，澤倫斯基在論述時卻選擇「人道主義」做為俄羅斯侵略行動的結果，更以此作為主要訴求，將烏克蘭平民傷亡、人民必須逃離家園列為人道主義受迫害的實證例子，藉此呼籲國際援助與支持。

此外，國際社會或組織提供的支持行動也以多元角度呈現。從其推文中可發現，除了人道走廊設立、提供人民醫療援助等在事實上屬於人道主義幫助外，其它對於俄羅斯的反擊、打壓與制裁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援助、討論讓烏克蘭加入歐盟等，其實並非實質人道主義援助範疇。然而，這些合作行為在澤倫斯基的推文中卻與「人道主義救助」進行了連結與強調。訴諸於人道主義是樞紐、是象徵的重要性，它連結著「俄羅斯」與「惡」，亦連結著「國際社會援助」與「善」。澤倫斯基以人道主義為烏克蘭現況下註解，

定義烏克蘭所受到人道主義迫害，是弱勢、受害者的一方，並將矛頭直指：加害者是誰？俄羅斯。俄羅斯不僅是發動戰爭的罪犯、是烏克蘭的侵略者，更代表著邪惡方，甚至是「人道主義的踐踏者」。

另一方面，澤倫斯基利用人道主義，將「援助烏克蘭」等同於「維護人道主義」的行為進行串連，如其他國家與組織對於烏克蘭所提供的經濟、軍事與聲援，甚至抵制俄羅斯的行為（包括停止進出口商品、服務），亦都被納入「維護與捍衛人道主義」的旗幟下，是善的舉動。因人道主義作為世界共同追求的人權保障，彰顯崇高與美好品德，也代表心向光明與善良。因此，澤倫斯基將烏克蘭的受創以人道主義受迫害作為代表，使用「人道主義災難」、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statements as genocide of UA people）等敘述手法，將焦點放在人民的受難上，呈現俄羅斯入侵行動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人民，進而塑造以人民為本的形象角色，為後續呼籲的國際支援合作，皆是為了人民，而非為了國家利益與反擊（攻擊）行動作為奠基（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2）。

圖 2:　「人道主義迫害」框架推文範例

(作者翻譯：與BG總理 @KirilPetkov 進行了建設性對話。瞭解反擊RU侵略的過程。討論了UA村鎮所發生的危急人道主義局勢。 我們必須共同制止人道主義災難！)

（作者翻譯：感謝今天有機會在 PACE 上發言。請求關注 UA。讚揚今天通過的 PACE 決議，將 RF 的當前政權指定為恐怖分子。這向國際社會和俄羅斯發出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即對犯罪的懲罰是不可避免的！）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在「人道主義迫害」框架中，澤倫斯基在對戰爭的結果敘述中並非著重在量化的損失，而是以善與惡的道德標準來進行歸因；並非計算失去多少國土面積，重創幾億元的烏克蘭經濟，而是將人們對於戰爭的看法轉換到善惡認知層面，並將其他戰爭結果省略，積極以人道主義為主軸進行連結，將烏克蘭國家損失提升至世界共通的人道主義價值遭受迫害，將俄羅斯定義為俄烏戰爭的「因」與「惡」。而在框架所連結的「援助烏克蘭」等同於「援助人道主義」的行動上，則賦予解釋「烏克蘭為了因應俄羅斯的惡」所要求的援助動機，推動世界共同抵制俄羅斯或尋求它國經濟與軍事武器援助等訴求變得合理，並依此延伸到第 2、3 的主題框架。

（二）「援助與抵制」框架

前述「人道主義」框架中，澤倫斯基將兩國做了強烈的對比，將俄羅斯定義為「踐踏人道主義價值的惡」；烏克蘭則是「人道主義受迫害的象徵」。為了對抗惡，世界應當選擇「善」，且給予支持。因此，在第二主題框架中可以發現，澤倫斯基提供給選擇「善」的國家與組織有效的行動方案，也就是期能與烏克蘭共同抵制對俄羅斯在經濟和軍事的合作事務。此框架經常出

現的 conversation（對話）、support（支持）、defense（防禦）、security（安全）、financial（金融）、military（軍事）等字詞，將澤倫斯基努力爭取外援或尋求合作等行為，都列為基於人道主義考量，而受幫助的主體為 Ukraine（烏克蘭），感謝的對象為它國 Prime（總理）和 Minister（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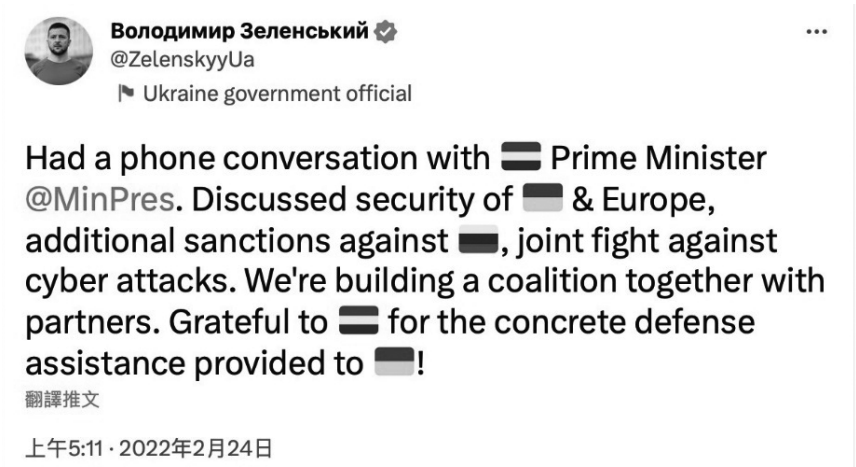
其中經濟上的援助包含了善用難民安置、物資採購、設施修復和國防武器添購等軍事項目，或是直接請求它國派送武器等軍事援助等。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在此主題框架中，對於烏克蘭來說，即使同樣使用於戰爭的殺傷性武器，其能立基於「抵禦入侵家園的外敵」與「收復家園」的立場產生自我保護的傳播訴求，而不會落入它國在金援戰爭行為中的道德討論，產生負面影響力。透過這樣傳播建構過程有助於它國對於烏克蘭的經濟支持是被「讚賞」的作為，代表對「人道主義象徵烏克蘭」的感謝，也是維護「人道主義」的舉動（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3）。

澤倫斯基藉由不斷宣揚前述「人道主義迫害」框架與善惡歸因的連結，以揚善於世的價值觀刺激世界「他者」做出支持行動。此外，澤倫斯基在「援助與抵制」框架中提供行動方案如（1）支持烏克蘭：對烏克蘭進行人道救援與提供武器等；（2）終止與俄羅斯的合作：停止服務與經濟制裁等。而當國家或組織按照這樣的方式行動時，澤倫斯基便會利用社群媒體告昭國際「某國／某組織表示一同制裁俄羅斯——代表善」，除了站在善的立場進行了感謝，亦以樹立「善的榜樣」和高道德標準讓國際社會得以參考。因此在此框架的行動建議上，除了呼籲抵制俄羅斯外，也提供了支持烏克蘭的實質選項與參考，進而連結到後續第 3 框架。

（三）「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

除了前述與人道主義連結的善惡歸因、提出援助／抵制行動方案等框架外，澤倫斯基在此主題框架中將推文範圍延伸至訴諸世界各國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聯合抵制侵略者框架。即俄羅斯迫害烏克蘭人民，便是破壞人道主義，是「惡」，因此若國際社會組織與俄羅斯的合作，或是提供服務予俄羅斯，就是「同流合污」。藉由此論述，呼籲國際一同制裁俄羅斯，與烏克蘭站在同一線，對於俄烏戰爭的「善惡」陣營做出選擇。從澤倫斯基的推文內容中可發現，此框架主題詞聚焦於 war（戰爭）、cooperation（合作）、peace（和平）、relations（關係）、security（安全）、solidarity（團結）。換言之，

圖 3：「援助與抵制」框架推文範例



（作者翻譯：與 NL 總理 @MinPres 進行了電話交談。討論了 UA 的安全性；歐洲，對 RU 追加製裁，聯合打擊網絡攻擊。我們正在與合作夥伴一起建立聯盟。感謝 NL 為 UA 提供的具體防禦援助！）

（作者翻譯：與歐盟委員會主席 @vonderleyen 進行了電話交談。盡快討論了 #EU 宏觀金融援助的分配。強調需要準備第 8 套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羅斯公民發放簽證。）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澤倫斯基訴求發動戰爭的俄羅斯為道德的惡，而烏克蘭為和平訴求的善；若選擇支持俄羅斯，便是選擇惡；若要選擇善，便要支持烏克蘭。因此，支持和平即代表「與烏克蘭同一線」。

在此類框架中，澤倫斯基藉由概念抽換的方式來解釋俄烏戰爭的支持問題，並將此提升到道德選擇的層級，使得國際社會組織若要符合道德標準，便不得與俄羅斯合作，或是與俄羅斯有所往來。此外，道德的善惡選擇亦影響了俄烏戰爭的支持問題，若不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選擇一邊，即使旁觀不發聲，也就代表著對惡的視而不見，便是支持殘暴入侵行為的兇手。在這樣嚴重的指控下，國家、企業或組織為了不落入「支持戰爭」或「支持血腥暴力」的道德期許範疇裡，便會選擇支持烏克蘭，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4）。

圖 4:　「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推文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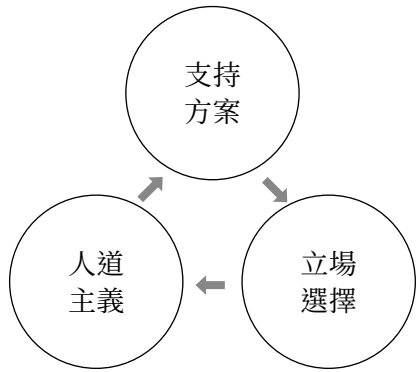
（作者翻譯：俄羅斯因為討厭自由而在 UA 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但這也讓世界看到了俄羅斯所造成的破壞。UA 捍衛了自由、尊重、與生活。這就是為什麼 @ZelenskaUA 創建了這個基金會－ @Zelenska_FND。這是一項極其崇高的事業；我鼓勵你們所有人加入）

（作者翻譯：現在不能作「半」決定或「半調子」！只有黑與白，善與惡！你要麼是為了和平，要麼是支持血腥的俄羅斯侵略者殺害烏克蘭兒童和婦女。@Microsoft @Oracle @SAP，停止在俄羅斯供應您的產品，停止戰爭！）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總括來說，前述「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抵制」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主題框架，顯示了澤倫斯基如何利用推特在面對戰事相關問題上進行歸因，並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善惡立場的選擇，進而促使國際具體付諸行動展現表態支持烏克蘭並抵制俄羅斯。因此，此 3 個主題框架之間並非完全互斥，而是呈現互補延伸之關係（如圖 5）。

圖 5：框架互補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敘事架構

整體來說，透過檢視烏國總統推文的敘事架構可以發現，澤倫斯基利用「人道主義」進行「俄羅斯＝惡」的歸納，而後再利用「善惡選擇」迫使國際社會表態，將國際立場區分為二－－非黑即白／非善即惡，藉此選擇可靠的盟友；而當盟友確立後，則透過多次「談話」努力，爭取到「對烏支持／

對俄制裁」之目的（推文範例如圖 6）。而在澤倫斯基推文架構上可發現他經常使用的形式多為動詞在前，省略主詞，並藉由標記人物為第一部分表述，句型結構為：「（我）已經與（@人物名稱）完成談話」，代表身為國家領導人能夠放下身段，積極尋求他國或外在可靠勢力協助烏國度過危機。同時，他亦強力表述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放棄國家、也沒有放棄人民的信念，而是為了尋求外援而積極的行動著，請公眾相信「我」（澤倫斯基）有能力帶領大家度過戰事威脅。

推文第二部分則通常為敘事框架主體，句型結構為：「（我們）談論了關於_____（主題），（我）非常感謝（對方）所提供的支持（抵制）模式_____」。此處則依照上述主題框架主要區分為「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抵制」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等 3 類。此 3 類主題是層層相遞的互補概念，可以從敘事結構判斷出以下特徵：當談論戰爭下的人道主義相關議題時，後續所尋求到的便是對於烏克蘭難民的支持；若是已經在支持烏克蘭／抵制俄羅斯的主題框架下，則會更進一步對烏克蘭經濟及軍事上提供援助支持或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當前述行動方案確立時，推文內容除了會感謝與烏克蘭（善）站在同一陣營外，也告訴了世界何者為正確的選擇，進行善惡立場的表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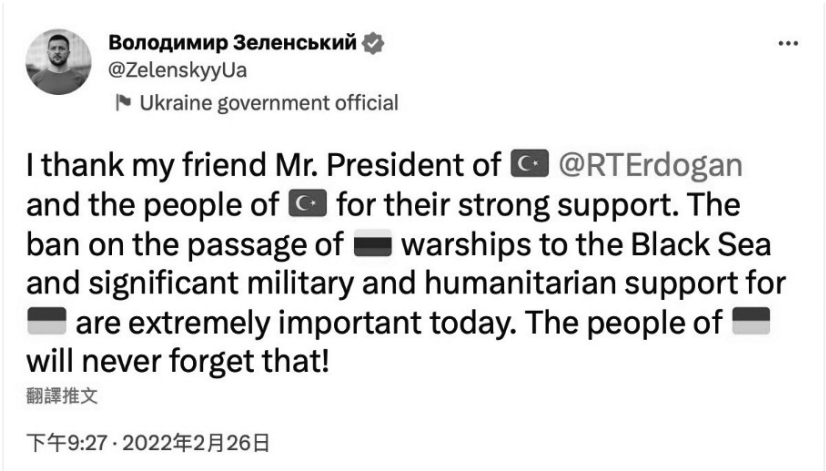
最後一部分為標記（#hashtag）功能的運用，在此次資料中，以 #StandUpForUkraine、#StandWithUkraine 和 #StopRussia 等為主要的主題標籤，可概分為「支持烏克蘭」與「阻止俄羅斯」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而這兩類標籤除了加強語氣外，更藉由社群媒體平臺的特性，以口號方式將事件與主題框架連結。因此，大眾或可藉由 Hashtag 所表達的意思（多為祈使句，代表簡潔有力的發願、疾呼），將現實世界的判斷標準套入社群網路標籤所形塑出的善惡框架中，進而與俄烏戰爭的歸因進行聯想。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貢獻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其發展與動向受到了全球關注，雖然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強勢進逼，在硬體及武裝力量上趨於劣勢，但其總統澤倫斯基在面對如此不利情勢下，仍設法藉由社群媒體推文框架建構與敘

圖 6：敘事架構推文範例



（作者翻譯：感謝我的朋友TR @RTErdogan總統先生和TR人民的大力支持。禁止RU軍艦進入黑海以及對UA重大的軍事和人道主義支持對UA極為重要。UA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作者翻譯：剛剛與@POTUS完成了一個小時的對話。共同評估戰場上和談判桌上的局勢。談到了具體的防禦性支持、加強制裁的新計畫、大量金融和人道主義援助。）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事手法，影響國際社會對於兩國的觀感與看法，積極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本研究即以烏國總統官方推特推文作為分析對象，利用資料探勘方式、戰爭衝突框架以及敘事視角檢視其言說策略，探究其如何利用社群與推文形塑對己有利的輿論導向與國際情勢。

本研究發現烏克蘭國家領導人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情境下，運用社群媒體特性及科技所賦予的屬性如即時性、互動性和擴散性等，將其直接運用於戰事中，改變了現代新型態戰爭的態樣，這與現有胡光夏（2019）、黃柏欽等人（2020）研究中所提及當今戰爭衝突中社群媒體的重要角色相呼應。面對國土龐大且軍武力量強大的俄羅斯，澤倫斯基選擇使用更靈活的宣傳方式應對這場戰爭，利用推文框架與敘事手法試圖扭轉國際社會大眾的認知與國際輿論的傾向。更精準地來說，烏國總統藉由「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抵制」、「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等 3 個主題框架相互扣連，並輔以平臺的標註（@）與標籤（# hashtag）等功能，將事件與框架更加緊密連結，影響國際社會對俄烏戰爭歸因，將站在烏克蘭一方的人道主義救助者形象化為符合社會道德期許的模範，進而在這場傳播科技下的輿論戰中取得先機。此現象與過往學者（如 Darley & Latané, 1968）提出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有異曲同工之妙，藉由「點名」（具體的指定）方式，使被點名的人物或組織，在「受到委託」後有更高的機會做出利他的具體行動；而推文中針對道德期許行為的設定，亦有較高的概率影響接收者執行符合其規範的樣貌，例如產生援助（烏克蘭）／抵制（俄羅斯）之行為表現（Bryan & Test, 1967; Eisenberg-Berg & Geisheker, 1979）

此外，本研究亦歸結出烏國總統推文主要的框架敘事意涵。首先，「人道主義迫害」框架以人道主義作為普世的善惡價值，描述烏克蘭人權主義受到威脅，進一步描述侵略者俄羅斯為踐踏人道主義的迫害者，連結戰爭中兩國立場，強化國際社會的道德之分，而此框架策略亦符合過往策略溝通中強調「認同化」的目標，意即透過貼文取得「連結」（connection），建立認同關係（方鵬程等人，2015）。其次，「援助與抵制」框架則以爭取國際實質援助為目的，提供他國／組織團體有效的行動方案－以經濟或軍事支持烏國（善），並抵制俄國（惡）的行動。此框架則呼應了過往戰爭傳播文獻中所提及的，面對戰事威脅，如何透過媒體進行資訊傳遞，並利用框架敘事說服目標受眾以爭取支持力量／聲量，有助達成戰略目標（Dimitriu，2012；方鵬程等人，2016；孫秀蕙，2005）；最後，「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則呼籲

國際社會應該與烏克蘭之善共同抵制俄羅斯之惡（侵略者），藉由發表聲明譴責旁觀者或要求世界表態等方式，表明非善即惡的立場之分，此框架亦與 Entman（2004）分析前美國總統小布希在 911 事件後發表的敘事架構相似，例如界定善與惡的鬥爭，呼籲受眾團結懲惡揚善等。

承上，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期間運用推文所呈現的敘事架構，相比於完整故事具起、承、轉、合之書寫，其發文主題明確且敘事架構淺顯，推文內所隱含的對立意識形態較少，較常見的方式為直接攻擊俄羅斯與表態俄烏雙方的善惡立場，而這樣淺白的傳播策略或許與平臺的字元數侷限有關。推特以短文建構社群對話為主（Wang & Yang, 2020），讓即時訊息能夠簡潔且快速地被傳散（Boyd et al., 2010, January），若能妥善運用此特性，則可將資訊如同重點摘錄般強調與宣傳，反之則有可能落入發布資訊破碎或語意不明等窘境（Coesemans & de Cock, 2017）。換言之，雖然字數限制有可能侷限發文者在意義上的表達，卻也能夠將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利用簡短的模組化訊息不斷地重複發送，如澤倫斯基在戰事期間發布的推文皆專注於打擊俄羅斯與尋求國際援助，便是熟用媒介平臺特性所建構出的戰爭數位傳播策略。

總結來說，誠如 Goffman（1974）所述，框架為不同情境與訴求提供了相對應的「特定期望」。同樣地，在面對戰事威脅，本研究中所提出 3 個不同主題框架的運用也各自搭配不同的目的。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國家領導人運用社群媒體作為面對戰爭威脅的傳播工具之一，其框架的建構與敘事策略不僅呼應過往文獻中提及單位／組織／團體在面對外在威脅或危機時，如何妥慎運用「溝通」手段提升大眾對形象認知與建立支持的重要性（胡光夏，2017；Ray, 1999；Sturges, 1994），也擴展在戰爭與宣傳研究領域之範疇。具體來說，過往的文獻多以歷史戰爭為主體且以傳統媒體為主要研究面向（方鵬程，2010；蔡綺，2008；鍾淑惠，2015），而本研究以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官方推特為研究對象，除了印證學者曾提及的社群媒體在現代衝突與戰爭中的重要角色（胡光夏，2019），也為現代戰爭與宣傳提供了實際例證與重要參考。

最後，若反思社群媒體對於政治與戰爭傳播之影響，亦可從網路社群如何將過去遙不可及的政治精英拉近到公眾「眼前」談起。國家、政府組織與政客們藉由註冊社群帳號、定時發文、直接回覆留言、轉發與按讚等方式與民眾進行互動與建立維繫關係，不僅拉近了與發文者的距離，亦透過網路凝聚群眾力量（Moon & Yang, 2021），讓「事件」發生時，網路群眾產生參與

感與使命感，透過自發性的轉推、發表評論和情緒表態等多元方式，如同真實地參與世界集會行動一般，形塑「這件事情很重要」的情境與共識（Emrich et al., 2001; Gustafsson & Weinryb, 2020; Tur et al., 2022）。因此，國家、政府組織與政治家利用網路媒體、平臺將其欲推波的觀點傳散到全世界，促成事件朝其所望之方向發展，此時，即便是推文的「隻字片語」，亦能煽動世界。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資料分析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社群媒體推文為主，雖然在資料蒐集階段時亦針對其國際性（英語）貼文內容進行篩選，惟分析結果僅能呈現烏國領導人的社群框架及敘事策略，對於整體國家在面對戰事威脅的戰略、傳播溝通策略的瞭解仍較為缺乏，未來若要更進一步檢視烏克蘭國家整體的反應策略或政府如何應對此類危機，可以考慮納入該國家對外新聞發言單位、副總理或國防部等相關官方言說資料，或許能夠更完整的觀察烏克蘭國家的傳播應對策略，亦能更全面且多元的地探討國家面對戰事威脅言說框架的規劃與應用。

再者，本研究雖以烏克蘭收復南部重鎮赫爾松，取得階段性戰略成果的 11 月 13 日作為資料蒐集區間，但實際上戰事仍未停歇，未來若能將資料蒐集與分析範圍涵蓋至整場戰事，將有助於對戰爭前、中、後等事態狀況與發展脈絡有更全面的瞭解與認識，也能較完整檢視和比較戰爭衝突各階段中的傳播策略、主題框架與敘事架構，促使更加完整呈現整體描述與分析結果。

最後，本研究運用框架與敘事方法分析澤倫斯基之推特論述，結果發現其敘事結構較為簡單且淺顯，這或與平臺字元數侷限了完整意涵的表達有關。未來研究若能將烏國政府公開聲明稿、外交部記者會發布之內容或澤倫斯基於國際會議上演講的講話稿等內容進行全面性比較與分析，將有益於更完整的檢視與瞭解國家領導人面對戰爭威脅時對外傳遞的敘事結構。

參考文獻

方鵬程（2007）。《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秀威資訊。

_____（2010）。〈總體戰爭時期與冷戰時期的宣傳戰〉，《復興崗學報》，98：51-78。

方鵬程、延英陸、吳冠輝、胡光夏、徐蕙萍、陶聖屏、張梅雨、陳心懿、陳竹梅、陳佳胤、陳聰盛、曹開明、傅文成、葉思吟、廖名湖、劉大華、邊明道（2016）。《軍隊公共事務 15 講》。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方鵬程、延英陸、李泰爾、胡光夏、徐蕙萍、陶聖屏、黃鈴媚、曹開明、傅文成、劉大華（2015）。《軍隊危機傳播 15 講》。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2022 年 9 月 6 日）。〈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趨勢與防護〉，《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上網日期：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twcert.org.tw/newepaper/cp-64-6481-deb5b-3.html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2 年 2 月 24 日）。〈普京發表電視講話：決定在頓巴斯開展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上網日期：2023 年 2 月 4 日，取自 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20224/1039534647.html

胡光夏（2017）。〈社群媒體與國軍危機溝通案例分析〉，傅文成（編），《社群媒體與軍事傳播》，頁 113-128。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_____（2019）。〈新媒體時代下的輿論戰攻防〉，劉大華（編），《新媒體時代下的軍事傳播與輿論戰》，頁 31-44。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孫秀蕙（2005）。〈符號、敘事結構與公共關係中的「說服」：以九一一事件布希演講稿為例〉，《關係管理研究》，1：115-159。

張玲玲（2022 年 10 月 14 日）。〈【全民國防】借鑑烏俄戰爭 洞悉資訊心理戰〉，《青年日報》。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539189

曾柏元（2021）。〈俄羅斯運用社群媒體進行資訊戰之分析－以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為例〉，《陸軍學術雙月刊》，57（576）：43-68。

馮建三（2022）。〈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理解烏克蘭〉，《傳播文化與政治》，15：161-201。

黃柏欽（2020）。〈社群媒體武器化影響、運用與能量建構〉，《國防雜誌》，

35 (3)：1-30。

黃郁文（2022）。〈淺析俄羅斯「網路戰」－以 2022 年「俄烏戰爭」運用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56 (4)：88-104。

楊駿宗（2022 年 2 月 26 日）。〈「今夜非常難熬」澤倫斯基自拍堅守基輔穩軍心〉，《TVBS 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2 月 12 日，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725882

詹祥威（2022 年 4 月 14 日）。〈俄烏戰爭中的「混合戰」運用〉，《國防安全雙週報》。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1875&pid=1631&typeid=3

蔡綺（2008）。〈美國二戰宣傳海報中的戰爭圖像符號研究〉，《商業設計學報》，12：97-116。

鍾淑惠（2015）。〈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3：45-81。

顏瑞宏、傅文成（2022）。〈外交新常態？以主題及網絡建模技術探索中共 Twitter 外交的戰狼溝通策略〉，《資訊社會研究》，43：67-113。

Agarwal, N. S., Punn, N. S., & Sonbhadra, S. K. (2022, August). *Exploring public opinion dynamics on the verge of World War III using Russia-Ukraine war-tweets dataset.* Paper presented at KDD-UC 2022, Washington DC.

Alden, C., & Chan, K. (2021). Twitter and digital diplomacy: China and COVID-19. *LSE Ideas.*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3, from https://eprints.lse.ac.uk/110754/1/LSE_IDEAS_twitter_and_digital_diplomacy_china_and_covid_19_strategic_update.pdf

Barna, I., & Knap, Á. (2022). Analysis of the thematic structure and discursive framing in articles about Trianon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online Hungarian press using LDA topic modelling. *Nationalities Papers*, 1-19.

Barthes, R. (1978). *Image, music, text* (S. Heath, Trans.). Hill and Wang.

Banerjee, A., & Basu, S. (2007, April). Topic models over text streams: A study of batch and online unsupervised learn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07 SIA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pp. 431-436).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Bjola, C., & Holmes, M. (Eds.). (2015). *Digital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1st ed.). Routledge.

Boyd, D., Golder, S., & Lotan, G. (2010, January). Tweet, tweet, retweet: Conversational aspects of retweeting on twitter. In 2010 4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pp. 1-10). IEEE. https://doi.org/10.1109/HICSS.2010.412

Bryan, J. H., & Test, M. A. (1967). Models and helping: Naturalistic studies in aid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400-407.

Chen, B., Wang, X., Zhang, W., Chen, T., Sun, C., Wang, Z., & Wang, F. Y. (2022). Public opinion dynamics in cyberspace on Russia–Ukraine War: A case analysis with Chinese Weibo.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ystems, 9*(3), 948-958.

Coesemans, R., & de Cock, B. (2017). Self-reference by politicians on Twitter: Strategies to adapt to 140 charact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6, 37-50.

Cohen, Y. (1986). *Media diplomacy: 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ge.* Routledge.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Dimitriu, G. R. (2012). Winning the story wa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2), 195-207.

de Vreese, C. H., Peter, J., & Semetko, H. 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07-122.

de Vreese, C. H. (2005). News framing: Theory and typology.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Document Design, 13*(1), 51-62.

Douai, A., & Moussa, M. B. (2013). Twitter frames: Finding social media's "influentials"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 A. A. Olorunnisola & A. Douai (Eds.), *New media influence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frica* (pp. 202-217). IGI Global.

Dunning, E. (2018). #Trumpstyle: The political frames and Twitter attacks of Donald Trump. *The Journal of Social Media in Society, 7*(2), 205-231.

Eisenberg-Berg, N., & Geisheker, E. (1979). Content of preachings and power of

the model/preacher: The effect on children's generos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2), 168-175.

Emrich, C. G., Brower, H. H., Feldman, J. M., & Garland, H. (2001). Images in words: Presidential rhetoric, charisma, and great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3), 527-557.

Enjolras, B., Steen-Johnsen, K., & Wollebaek, D. (2013). Social media and mobilization to offline demonstrations: Transcending participatory divides?. *New Media & Society, 15*(6), 890-908.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_____(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lboa, E. (1998). Media diplomacy: 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3), 56-75.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ustafsson, N., & Weinryb, N. (2020). The populist allure of social media activism: Individualized charismatic authority. *Organization, 27*(3), 431-440.

Heidenreich, T., Lind, F., Eberl, J. M., & Boomgaarden, H. G. (2019). Media framing dynamics of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A comparative topic modelling approach.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32*(Special_Issue_1), i172-i182.

Hemphill, L., Culotta, A., & Heston, M. (2013). Framing in social media: How the US Congress uses Twitter hashtags to frame political issue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17335

Hubner, A. (2021). How did we get here? A framing and source analysis of early COVID-19 media covera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38*(2), 112-120.

Khan, M. K., & Pratt, C. B. (2022).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The Pakistan military's use of social media against terrorism. *Media, War & Conflict, 15*(4), 450-485.

Manor, I., & Crilley, R. (2018). Visually framing the Gaza War of 2014: The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Twitter. *Media, War & Conflict, 11*(4), 369-391.

Materna, J. (2012). LDA-Frames: An unsupervised approach to generating semantic frames. In Gelbukh, A. (Ed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intelligent text processing. CICLing 2012.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7181(pp. 376-387). Springer-Berlin-Heidelberg.

Miskimmon, A., O'loughlin, B., & Roselle, L. (2014).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Routledge.

Moon, B., & Yang, S. U. (2021). Developing the scale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ialogic communication (PCDC) during the 2017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South Korea.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7*(1), 102000.

Neuman, W. R., Neuman, R. W.,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selle, L., Miskimmon, A., & O'loughlin, B. (2014). Strategic narrative: A new means to understand soft power. *Media, War & Conflict, 7*(1), 70-84.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1), 55-75.

Pohl, J., Seiler, M. V., Assenmacher, D., & Grimme, C. (2022). A Twitter streaming dataset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n 202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66543

Ray, S. J. (1999).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the airline industr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Serafin, T. (2022).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y takes the Russia/Ukraine War viral. *Orbis, 66*(4), 460-476.

Sturges, D. L. (1994). Communicating through crisis: A strategy for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 297-316.

Scheufele, D. A., & Tewksbury, D. (2007).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9-20.

Steyvers, M., & Griffiths, T. (2007). Probabilistic topic models. In T. K. Landauer, D. S. McNamara, S. Dennis, & W. Kintsch (Eds.), *Handbook of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pp. 439-460).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Free Press.

Tur, B., Harstad, J., & Antonakis, J. (2022). Effect of charismatic signaling in social media settings: Evidence from TED and Twitter.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33*(5), 101476.

Twint (n.d.). In Twint project. *GitHub.* Retrieved August 12, 2022, from https://github.com/twintproject/twint

Wang, Y., & Yang, Y. (2020). Dialogic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How organizations use Twitter to build dialog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ublic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4,* 106183.

Yang, J. (2003). Framing the NATO air strikes on Kosovo across countries: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 newspaper coverage. *Gazette, 65*(3), 231-249.

Yang, Y., Hsu, J. H., Löfgren, K., & Cho, W. (2021). Cross-platform comparison of framed topics in Twitter and Weibo: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to social media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11*(1), 75.

Zhou, Y., & Moy, P. (2007).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79-98.

本文引用格式

江知萱、孫復威（2023）。〈善與「俄」：俄烏戰爭中澤倫斯基推文言說框架與戰爭傳播策略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13（2）：155-185。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6

Chiang, C. H., & Sun, F. W. (2023). The goodness and the wickedness: A study of discourse frame and w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Zelenskyy's tweet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155-185.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6 [Text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155-185, July 2023

The Goodness and the Wickedness: A Study of Discourse Frame and W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Zelenskyy's Tweet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CHIANG, Chih-Hsuan

Political Warfare Officer, Student Command, Army Academy

SUN, Fu-Wei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framing theory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themes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y's public tweets on his official Twitter account dur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February 24th to November 13th, 2022, with a total of 447 tweets. After employing th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topic modeling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ematic framework of Zelenskyy's twee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in topics: 1. humanitarian persecution, 2. aid and boycott, and 3.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Upon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Zelenskyy emphasized war attribution and Ukrainian national/people's values in terms of good vs. evil induction, moral evaluation, and action plans. In addition, Zelenskyy expressed Ukrainian demands and interests while connecting his purpose and thematic framework with "slogans"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social media, Russian-Ukrainian War, framing theory, narrative analysis,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weisun5@gmail.com
Received: 2022.11.02; Accepted: 2023.04.01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世新大學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內容產製與當代影視產業：LED幕虛擬製作室之研究

黃文龍*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周成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要

自 2019 年《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影集採用 LED 幕取代藍、綠幕的製作方式，已為影視產業帶來新的變革。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當代影視產業、影視內容產製與視覺美學之影響。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研究結果首先得出採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時，後期製作必須在前期階段就展開，且要在拍攝前完成虛實景物預覽等工作，此「後期前製化」改變了產製流程。其次，LED 幕虛擬製作室目前以製作廣告、MV 類型為多，建議未來可以開發電影或影集來擴展製作內容與國際競爭力。最後在視覺美學方面，多種數位科技的深度混合可讓演員進入虛擬空間演出時，感知到周遭環境的真實性，進而創造擬真性的虛實影像，以引發觀者沈浸在感知真實性之美學體驗。

關鍵字：LED幕虛擬製作室、視覺美學、當代影視產業、影視內容產製

* 通訊作者，E-mail: wlhuang@mail.fgu.edu.tw
投稿日期：2022 年 10 月 08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2 月 22 日

壹、緒論

自從 2006 年瑞德數位電影攝影機公司（Red Digital Cinema Camera Company）在美國發表第一臺數位攝影機紅一（red one）[1] 展現出豐富的動態範圍、色階與顏色，引起了其它知名攝影機製造廠商：如德國阿諾萊德電影技術公司（Arnold & Richter Cine Technik，公司名稱為「ARRI」，中文為阿萊集團）、美國全景電影公司（Panavision）、源於日本的索尼（Sony）與 Panasonic 控股株式會社（Panasonic Holdings Corporation，華人世界一般通稱為松下電器）等廠商陸續投入數位攝影機的開發。

經過大家的努力，如今的數位電影攝影機，例如瑞德 red scarlet-x 與阿萊 alexa 等在搭配電影鏡頭下所記錄的 raw 或 log 格式的影像，已具備與底片相近的紀錄功能，並可運用伽瑪（gamma）曲線盡可能將所有的色階記錄下來，且此格式可以再經由後期製作調整感光度（ISO）、白平衡（white balance）、色彩平衡（color balance）與伽瑪值來達到創作者心目中的視覺藝術感（玄光社，2013 ／周明憲譯，2013）。

再者隨著攝影機運動追蹤技術、動作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機系統與電腦圖像技術的發展，提升了 3D 電腦軟體在虛擬景物與實景的合成技術，此技術已漸漸能製作出更震撼與逼真的影像，來達到擬真性的視覺美學。因此，一些大型電影公司紛紛透過這些技術進行影像創意的展現。例如，從早期的《鐵達尼號》（*Titanic*）電影運用電腦視覺特效去創造逼真的沉船事件，到《阿凡達》（*Avatar*）電影採用動作捕捉技術去記錄演員的演出神態與肢體動作，再將其轉換為 3D 虛擬角色的神態和肢體動作，讓動畫生成的 3D 虛擬人物就如同真人一樣的逼真演出。由此看出：科技不停研發除了帶動電影追求視覺特效外，更讓電影影像帶給觀者真實性與存在感（楊錫彬，2020）。

近年來隨著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diode，簡稱 LED）科技的發展，LED 幕可以呈現的影像品質越來越高，讓長期只以藍、綠幕為背景的虛擬製作有了新的選擇。因此，採取 LED 幕來替代藍、綠幕的虛擬製作成為影視產製的新方式，而此方式能使真實演員和虛擬場景完美融合（Shan & Chung, 2022），並可讓電影製作團隊，例如導演、攝影指導、製片人與演員在拍攝現場觀看他們在實體與虛擬場景中所展開的拍攝，以及最終呈現結

1 紅一攝影機不用底片，因此可省略繁複的沖片程序，避免時間落差、保存年限與品質不穩定等，且機身輕巧，可拍攝 2K、3K、4K 的高畫質影像。（維基百科，n.d.-d）

果，大幅度的改善傳統藍、綠幕虛擬製作的影片必須經由後期製作才能看到最終結果的擔憂，大大減少拍攝的不確定感（Priadko & Sirenko, 2021）。

若以實踐而言，首先採用 LED 幕虛擬製作技術是 2019 年由迪士尼出品的《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電視影集。[2] 此影片擁有大量虛擬的科幻場景，以及身穿金屬服裝造型的演員，透過 LED 幕播放的虛擬場景的光源照射到金屬服裝上的效果，讓現場攝影機補捉到如同在真實環境下拍攝的真實感，並且可將錄製的影片作為最終成果，在此影片推出後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讓當今的影視產業都為之興奮。因此，通過這種新的製作技術，可以將實體與虛擬景物合而為一，並且立即呈現在實體攝影機的景框內，從此改變攝影機與真實空間、景物的關係，再次說明科技對視覺美學的影響（李想等人，2022；Kadner, 2021, April 6）。另外，根據 iDISPLAY（2022）官方指出使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具有以下優勢：節省時間和成本、加快拍攝過程、增強可見性、打破時間和地域限制等等。於是，採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方式，若能在節省製作成本下，又能達到震撼的影像效果與視覺逼真性，或許可為臺灣影視產業帶來新的契機。

綜合以上論述，LED 幕虛擬製作室不僅為當今影視產業帶來新的機會，也改變了影視產製與視覺美學。有鑒於此，本文特別探討 LED 幕虛擬製作室所帶來新的產製方式，以及國內影視產業在此方面發展之情形與對電影的美學形式有哪些影響？

貳、 文獻探討

一、 虛擬製作之發展

在影視製作中，場景設計一直是鏡頭組成的重要元素，然而選擇外景拍攝時卻常常受限於現實環境的天氣、交通距離與時間等因素而影響製作進度與品質。因此，為了突破這種種的限制，影視產業開發了色度鍵（chroma keying）技術讓人物在藍、綠幕前進行拍攝（此為前景），以與事先製作好的實景場景或是虛擬場景（此為背景）進行後期製作合成。色度鍵技術是一種

2　《曼達洛人》（電視劇）是一部美國網路電視劇，取材自盧卡斯的《星際大戰》。故事發生時間在電影《星際大戰六部曲：絕地大反攻》中的銀河帝國滅亡五年之後，名為丁．賈林（Din Djarin）曼達洛人是一名銀河系的賞金獵人，他在一次任務中巧遇古古（Groge），兩人在執行任務中漸漸產生父子情的故事。（維基百科，n.d.-c）

將前景與背景組合的技術，此技術可將前景中的綠色或藍色去除並與背景組合成具有獨特效果的畫面，運用此技術讓原本不可能到達的場景，例如外太空的星球或寬闊的太空背景，以及虛構場景變的可能性，增加了電影場景無限的可能性（Raditya et al., 2021）。

根據 Zhi（2015）的揭示，最早使用藍幕技術是 1933 年的電影《金剛》（*King Kong*）所使用的「鄧寧藍幕技術」（Jewell, 1994）。此技術於 1925 年代被好萊塢特效師鄧寧．道奇（C. Dodge Dunning, 1907-1959）所發明，當時的藍幕技術是運用彩色照明打在背景使其成為藍色，而前景呈現為黃色，再通過特殊處理將前景與背景分離，不過此技術只能在黑白影片上起作用，並不能運用在彩色電影。到了 1935 年第一部真正的彩色電影誕生後，以及對於視覺特效的要求越來越高等原因下，促使了藍幕技術的創新，例如 1940 年代出品的彩色電影《巴格達的小偷》（*The Thief of Bagdad*），則採用藍色布幕，使其演員在藍幕前演出，雖然當時的技術還不是很純熟，但卻帶動藍幕技術的發展（Zhi, 2015）。接著到了 1950 年，影視特效大師彼得羅 · 弗拉霍斯（Petro Vlahos）利用鈉光燈的光譜特性開發黃幕技術，此技術讓前景的人物處於正常打光環境，再使用鈉光燈打在白色背景，再經過特殊處裡將前景和背景分離，創造出令人驚歎的視覺效果。然而此黃幕仍有其侷限性，其中最主要是拍攝現場使用黃幕需要高功率鈉光燈，這種燈光非常強烈，會使演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感到不適。此外，黃幕技術需要非常精確的照明和拍攝條件，否則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協調的問題，例如陰影和色彩失調等。因此，藍幕技術仍然佔有主導之地位。直到 2000 年數位時代來臨，許多數位感光的器材對綠色更為敏感，站在綠幕前演出的人物更容易使用色度鍵技術讓前景的綠色分離而與背景組合，再者綠色服裝不像藍色服裝那樣常見。因此，人物站在綠幕前演出的拍攝方式更受到電影特效師的喜愛（桑尼，2015 年 7 月 13 日）。

另一方面，1970 年代微處理器的發明，開啟了電腦圖像學的發展，促使電腦 2D 繪圖運用在影視產業，並帶來虛擬製作的發展。根據 Gibbs et al.（1998）指出 1980 年代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ōsō Kyōkai，簡稱 NHK；英文則為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開發了一套平面（2D）合成視覺（synthevision）[3] 的虛擬製作系統，此系統包含攝影機感應器與電腦

3 合成視覺的虛擬製作系統首次出現在 1988 年的首爾奧運會上，當時 NHK 在每天新聞節目中使用它。雖然當時背景圖像多是靜態圖像，但已初步看到虛擬攝影棚的模式（Gibbs et al., 1998）。

繪圖處理器，感應器安裝在攝影機上負責捕捉攝影機的運動資訊，再將感應器所補捉的資料傳到電腦繪圖處理系統進行虛擬場景運算，虛擬場景運算後可得到與前景匹配的運鏡與透視，然後再利用色度鍵技術將前景崁入虛擬場景進行合成（同上引）。然而當時技術僅能將一張較大尺寸的高畫質 2D 虛擬場景之電腦繪圖進行平移、傾斜和縮放等運動。

全球第一臺數位控制攝影機運動系統的戴克斯特拉（dykstraflex），[4] 在 1976 年誕生，可以控制攝影機運動軌跡，如左右橫搖、上下直搖、鏡頭伸縮、左右推動等運動，並可在多次拍攝時確保同樣的運動方式。最早運用此設備首推 1977 年是喬治 · 盧卡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所執導的《星際大戰》（*Star Wars*）[5] 電影，此設備提供攝影人員透過攝影機運動控制系統可以精確掌握攝影鏡頭的空間坐標與拍攝視角，並且重複地來回拍攝，提高了取景、演員走位與攝影機運動的準確性（楊錫彬，2020；Bignell, 2010）。

經過數年後，隨著電腦 3D 軟體的發展將 2D 虛擬製作提升到 3D 的製作品質，運用此技術首推 1993 年史蒂芬 · 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所執導的電影《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開始運用了 3D 電腦圖像技術製作了 3D 恐龍動畫等角色，並且首次為影片中的特效鏡頭預先製作了動態分鏡，以提供導演與攝影指導在拍攝現場時參考。此動態分鏡開創性的幫助創作者在藍、綠幕前拍攝實景畫面時能先行想像在後期製作時經由視覺特效合成後的結果，稍微改善以往在藍、綠幕背景前拍攝的實景或人物與後期動畫合成的不確定性（胡峻曉等人，2021）。後來，隨著電腦視覺特效技術的提升，有越來越多的拍攝計畫在藍、綠幕背景上完成，並且大量使用 3D 電腦圖像技術去添加許多的場景、煙火和人物等虛擬景物，再透過後期製作進行合成，深深的影響電影的製作方式。然而，此種方式也存在一些挑戰，亦就是最後結果也只能在後期視覺特效製作完成後再給導演審查是否符合需求，如此一來常常需要往返修改到滿意為止，造成製作時間與成本的增加。因此，為了改善這一個問題，一種新的「可即時交互預覽」的技術，亦就是新的虛擬製作技術被用來解決此一問題（Plessiet et al., 2015, April）。

新的虛擬製作技術結合即時 3D 電腦圖形運算引擎、虛擬攝影機系統

4　戴克斯特拉數位控制攝影機系統於 1976 年專門為《星球大戰》中的複雜特殊的效果鏡頭而開發。這是電影史上最早開發的數位攝影機運動控制器（Motion Control），可以大大提升電腦特效與實景合成的準確性和可重複性（楊錫彬，2020）。

5　《星際大戰》（star war）是盧卡斯一系列科幻電影中最早拍攝的影片，故事講述的是銀河帝國與各地反抗軍互相對抗的故事，其中曼達洛人則是銀河帝國所顧用的傭兵，用來對抗反抗軍與絕地武士。本文中提及的《曼達洛人》電視影集中的主角則為曼達洛人。（維基百科，n.d.-b）

和動作捕捉技術等對創意進行視覺探索、定義和交流（Bennett & Carter, 2014），此技術「能夠即時的提供電腦合成圖像爲電影製作人的創意決定提供資訊」（Ilmaranta, 2020, p. 326）。詹姆斯 · 卡麥隆（James Cameron）2009 年所執導的《阿凡達》電影是最先使用此方式的團隊，此團隊為了創造《阿凡達》劇中虛擬人物能以更接近真人的演出開發了「可即時交互預覽」的技術，此技術創造性的結合動作捕捉技術與虛擬攝影機系統，動作捕捉技術則是用於補捉真實演員在藍、綠幕前演出的肢體動作與臉部表情資料，並將其轉換為數字模型的動作，並生成虛擬人物的電腦動畫，此方式可讓虛擬人物演出的肢體動作和表情更接近於真人；另外在現場攝影機上裝上紅外線感應器，讓安裝在攝影棚頂部的紅外線攝影機，可以即時獲得現場攝影機所拍攝的空間座標，並將訊息同步傳至虛擬場景中的虛擬攝影機，讓導演通過現場攝影機操控電腦圖像中的虛擬攝影機來拍攝虛擬人物，如此一來增加了導演對虛擬人物與虛擬場景空間的掌控力，最後透過即時 3D 圖形去背合成，再將合成的畫面送至監看螢幕，讓電影主要創作人員，例如導演與演員能立即看到合成結果，雖然此時畫面仍然只能以低畫質呈現，但對於導演與演員已經具備重要的參考價值（胡峻曉等人，2021；Thacker, 2012 May 10）。

隨著卡麥隆採用新的虛擬製作技術成功的運用在電影科幻片的創作上，帶動了電影虛擬製作技術不斷的更新，接著在其後的 10 幾年當中，陸續出現更好的製作系統以及效率更高的虛幻引擎（Unity、Unreal Engine）[6] 的加入，提升了「可即時交互預覽」的畫面品質，並可將此高品質畫面傳輸到 LED 幕當成演員的背景解決了傳統藍、綠幕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演員面對傳統藍、綠幕演出的沉浸感問題，以及藍、綠幕顏色容易反射到演員身上，讓演員毛髮不易處理，為了產生光影的真實性必須與虛擬景物不斷的反覆運算處理等問題（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 Shan & Chung, 2022）。因此，LED 幕虛擬製作室（LED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正式被運用在影視產業。

根據 Kavakli & Cremona（2022, March）作的研究揭示 LED 幕虛擬製作室整合以下關鍵要素：虛幻引擎、LED 幕、攝影機追蹤系統、動作捕捉系統、同步攝影機、數位元影像校準系統、運算農場和運算平臺。此新的製作

6 Kavakli & Cremona（2022, March）指出虛幻引擎（Unreal Engine）是一款由 Epic Games 公司所開發的遊戲引擎，運用在影視產製的轉折點是發生在 SIGGRAPH 2019 在洛杉磯舉辦的組織的計算機圖形學頂級年度會議上，Epic Games 公司展示第一個集成 LED 虛擬製作室和虛幻引擎。

系統運用虛幻引擎，可以即時運算高品質的虛擬場景並傳到 LED 幕中，讓演員在其中表演，由此產生的圖像（演員與背景），可以直接成為最終的合成圖像。因此，虛擬製作允許電影創作者通過即時遊戲引擎技術，如 Unreal 和 Unity，以及周圍的 LED 幕，可運用實體攝影機捕捉大量複雜的視覺特效鏡頭。而要做到這一點，LED 幕虛擬製作室必須與攝影機追蹤系統結合起來一起工作，該系統將攝影機的運鏡行為（如橫搖、上下直搖、推拉、升降、橫移等）與鏡頭參數（如焦點、焦距、鏡頭畸變等）透過追蹤設備軟體即時傳輸給虛幻引擎中的虛擬攝影機，再透過現場的同步攝影機（如紅外線攝影機）將現場實體攝影機座標與虛幻引擎中的虛擬攝影機座標互相匹配，最後運算出位置、透視、視野等讓虛擬場景隨著虛擬攝影機的運動被即時呈現在 LED 幕上，並隨著現場攝影機的角度而變化，避免了視差問題，以達到如同真實環境拍攝下的運鏡效果。

另外，動作捕捉系統可以補捉演員的表演資料來讓動畫人物栩栩如生。這些系統直接進入遊戲引擎，以盡可能低的延遲提供動作捕捉資料。再者場景中任何有標記的物體，如道具、互動設備或場景佈景，也可以透過此系統在虛擬空間中被追蹤。因此，動作捕捉系統將現場表演與動畫角色、物理和遊戲物件整合在一個混合視覺連續體[7]中是不可少的。為了提升虛擬製作系統的靈活性，採用運算農場和運算平臺，此技術集成了不同的軟體與圖形處理器來加速圖形運算，以獲得更流暢及有效的運算。最後，透過 LED 幕虛擬製作室系統的整合，現場攝影機拍攝的畫面即是最終畫面，這與使用藍、綠幕拍攝的電影過程相比，極佳的提升了導演、工作人員和演員在現場拍攝時能準確的看到畫面所有組成部分（Priadko & Sirenko, 2021）。

然而 LED 幕虛擬製作室系統發展至今只有短短幾年，尚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產業與工作人員繼續克服的地方，例如 Southern（2022）研究 LED 幕虛擬製作室時發現以下幾項要注意的問題：（1）攝影鏡頭不能對焦於 LED 幕所投放的畫面以防產生摩爾紋現象（moire pattern）[8]；（2）攝影機

7　連續體首先出現在 Milgram & Kishino（1994）提出虛擬與真實連續體的概念中，此連續體分為三個維度，左端為真實環境，右端為虛擬環境，兩端之間即是混合真實。然而根據 Skarbez et al.（2021）的研究認為除了左右兩端外，很難將此三個維度的界線區分清楚。因此提出應該要更強調使用者在 3D 空間的臨場感與沈浸感，而這也是經過 20 多年來混合現實技術的成熟而產生的新的視覺體驗。換句話說，此處混合視覺連續體意旨 LED 幕虛擬製作技術將虛擬與真實融合在同一個 3D 空間，已具有讓真實演員置身在虛擬與真實混合的視覺連續體中能產生臨場感與沈浸感，而這正符合 Skarbez 等學者所提出的新概念。

8　攝影機拍攝 LED 顯示屏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拍攝的畫面出現水波紋的形狀，大大影響呈現品質，這種現 象稱之為「摩爾紋現象」。（維基百科，n.d.-e）

的快門速度若與 LED 幕顯示頻率不同步，或者在拍攝牆壁時快速移動，則拍攝的畫面可能會出現明顯的掃描線閃爍的偽影（scanline artefacts）；（3）攝影棚的燈光照明和 LED 幕之間的相互作用，容易讓 LED 幕呈現的畫面出現褪色；（4）表演者若在較小範圍的 LED 幕的環境下演出容易讓表演者的聲音產生顯著的聲音回音；（5）當攝影機角度旋轉到與牆面對齊時，色彩再現會變差等。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LED 幕虛擬製作室為當代影視產業帶來新的商機，並為影視產製帶來新的突破，然而在產製過程中也與傳統製作有顯著差異。

二、 數位科技對視覺美學的影響

在誕生至今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電影經歷多次技術變革，其中以數位科技，帶給電影隨意創造各種影像的表現能力最為震撼，也產生獨特的視覺美學。而根據電影理論學者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與克莉絲汀．湯普遜（Kristin Thompson）在他們出版的《電影與藝術：形式與風格》（*Film Art: An Introduction*）一書中指出電影的視覺美學概念是指如何運用攝影技巧、運鏡、構圖、色彩等元素來創造出有力的視覺效果，以及如何運用這些元素來傳達情感、表達主題和引起觀眾共鳴。此外，鮑德威爾也強調如果一部電影或影像作品的視覺元素與現實世界的相似度較高，可能會更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和接受它的視覺美學效果（Bordwell & Thompson, 2008／曾偉禎譯，2008)。因此，從上述學者所述的觀點，電影所創造的影像世界必須能喚起觀者在現實世界中的知覺才能引起共鳴。例如，從 1895 年盧米埃兄弟（Lumiére Brothers）拍攝了全球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 at the station*）於戲院播放而言，觀眾被銀幕中直衝他們而來的列車嚇得驚慌失措而逃到放映室的後面。這種帶給觀眾如同與現實世界中真實火車身處同一空間的感知確立了電影提供一種全新的「客觀真實再現」的視覺體驗（Bazin, 1971），而這也說明了攝影是作為「電影真實」再現引起觀眾感知共鳴的最早表現形式，如同安德列 · 巴贊（Andre Bazin）提出攝影的美學特性在於揭示真實，這種揭示強調攝影應以純真的原貌來還原世界，以擺脫人為的主觀介入（Bazin, 1985／崔君衍譯，1995）。

巴贊的真實感不僅強調了攝影對象的真實、時間與空間的真實以及敘事結構的真實，同時也強調了社會和心理情感上的真實。然而，隨著攝影機的

數位化與電腦圖像技術的發展且被廣泛運用於電影創作，電影攝製已經可以不用完全依靠實景拍攝，而是可以藉由數位科技的技術來呈現現實與非現實世界的景觀，進而完成電影虛擬實境的夢想，如尚 ·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言「模擬不再是有關領域、指涉性存有或實體，而是沒有原初或眞實的眞正模型的產出：超眞實」（Baudrillard, 1994, p. 1）。亦即沒有實體原物出現，通過電腦圖像技術也可以創造再現現實或者創造出一種人們想像出來的世界景象，並且以一種「想像的真實」來塑造人物心理感知的真實感。而從攝影製作方式和程序而言，雖然「想像的真實」與巴贊所提的真實感與美學存在不同，但都存在著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例如，數位科技追求影像上的擬真也來自真實的現實生活，而且可將豐富的想像力轉化成逼真性的影像，促使觀眾的精神與情感投入其中，並形成人們所期待的視聽藝術（劉晗、王桂亭，2005）。因此，這開啟電影追求更趨近於心理感知的擬真性之影像，於是各種數位技術不斷地被創新。

首先數位攝影機的誕生除了傳承傳統底片攝影機的質感外，其數位化的紀錄模式擺脫了傳統底片錄製長度的限制，以及更容易創造長鏡頭的效果，以致帶給觀者感受到空間不間斷的真實感得以實現，例如《1917》[9] 電影採用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來呈現劇中主角帶領觀者與其一起經歷戰爭現場的殘酷與緊張的真實感（Liu，2020 年 1 月 11 日）。此外藍、綠幕技術的出現與電腦圖像技術越加成熟下，讓電影對空間的創造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例如運用電腦繪製的場景之美學風格（如光影、色彩、紋理等）與藍、綠幕合成的擬真程度，使得原本分屬於虛擬與實體兩個不同的空間能夠結合成電影中單一的空間或地點形式，這種無縫合成的鏡頭創造了空間與造型的擬真性，提供觀者更真實的沉浸感，而這種同時包含真實與非真實的影像，如同普林斯（Prince, 1996）對數位元影像提出的「知覺真實論」（perceptual realism）的看法，亦就是非真實的影像在指示性上是虛構的，但在知覺上卻讓觀者感受到真實性。

隨著 3D 電腦圖形即時運算與虛幻引擎的虛擬攝影機系統再次打破了攝影真實性與空間的界定。此時實體攝影機不僅僅掌控實體空間的景物，以及可操控虛擬攝影機在虛擬環境與造型之間運鏡，突破了傳統實體攝影機只能穿梭於實景或模型的運鏡限制，表現出更自由與靈活的在 3D 虛擬場景之間

9　《1917》電影主要描述兩名年輕的英國陸軍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傳令兵，並冒著槍林彈雨，傳達重要情報，從而阻止友軍落入德軍圈套。（維基百科，n.d.-a）

穿梭或以高角度進行拍攝，進而表現出不同視點的空間感與知覺真實性的感受，再度激發電影視覺美學上的變化。例如 2009 年《阿凡達》電影中大量的飛行鏡頭，即是運用虛擬攝影機帶領觀者穿梭在夢幻如真的虛擬世界，虛擬攝影機系統為電影在 3D 場景與各種造型之間的運鏡增加了靈活度與豐富性，並為電影的視覺空間帶來無限的可能性（Allen, 2002）。

因此，數位科技的發展儼然改變了電影藝術發展之初，由俄國導演迪嘉．維多夫（Dziga Vertov）提出的所謂真實是透過攝影機所呈現的真實概念，而是轉為一種異質性的不同媒材混合而成的圖像與美學形式，如將實景鏡頭、繪圖、2D 與 3D 等多元媒材進行重組、融合。換句話說，數位科技對電影帶來的變革不再依賴於攝影機捕捉的真實素材，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運用電腦數位技術讓電影呈現出新型態的視覺經驗，來拓寬電影的向度與形式的創新。然而，數位科技變化不但改變了電影製作的模式，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電影理論對影像本質的思考。依據列佛 · 曼諾維奇（Manovich, 2016）指出真實鏡頭已經不是製作電影中唯一的素材，而是將真實素材與電腦軟體產生的影像素材進行再製、組合成新的素材。於是曼諾維奇將數位電影定義為「實景拍攝＋繪畫＋影像處理＋合成＋ 2D 電腦動畫＋ 3D 電腦動畫」（Qian, 2022, June）。換言之，數位科技模糊了真實與虛擬的界線，可以呈現出與人們所處的生活世界相仿的空間，甚至可以超越物理世界的想像景觀，以及顛覆了對物質真實的概念，創造出一種混合真實與虛擬的擬真影像。

緊接著近年來 LED 幕虛擬製作室除了具備前述的功能外，更將虛擬與實體合成為一呈現在實體攝影機的景框內，此時攝影師與現場工作人員都能在當下感受到虛實整合的視覺震撼性。因此，電影隨著科技的發展不斷的突破虛擬與實體的疆界，也改變攝影對象的真實、時間與空間的真實。這期間不只改變電影「真實再現」的視覺表現，也對電影呈現空間的方式產生影響。然而電影為了提供觀眾更強的感知，電影自身就要不斷地創造知覺真實的影像感，如此才讓觀者忽略電影銀幕空間的存在，讓觀者有如身歷其境的沉浸在電影所創造的空間結構去感知電影文本所創造的知覺真實性。

綜合以上論述，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發展對電影的視覺美學所帶來的影響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參、研究方法

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首先，梳理 LED 幕虛擬製作室帶來新的產製方式，此目的著重於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流程與關鍵的核心技術，以期作為國內影視產業在發展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參考。其次，探究目前國內影視產業在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發展情形，以期作為當代影視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策略。最後，分析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電影視覺美學的影響，作為影視創作者在開創新作品時視覺美學的參考。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深度訪談法為輔。研究過程之重點說明如下。其一，為了確認研究對象的適合性，本研究界定受訪者（如導演、美術與動畫師等）必須曾經採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來完成影視作品之經驗，另外採訪擁有這類虛擬製作室的經營、管理階層、藝術總監、藝術指導與系統技術等經驗之人員。因此，藉由多次聯繫，最後願意接受訪談意願的有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 LED 幕虛擬製作室團隊，以及影視導演、美術、與動畫師等產製人員。訪談對象資料可參閱附錄一。

其二，本文研究目的包含影視內容產製、影視產業與視覺美學，因此擬定的問題朝此方面設計訪問綱要。例如在影視內容產製方面擬定的訪綱如（1）LED 幕虛擬製作室與藍、綠幕虛擬製作上有何差異性？（2）何種類型的影視內容適合運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其原因為何？接著在影視產業方面擬定的訪綱如（1）目前在臺灣的影視內容上，已經運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影視內容有哪些？（2）目前國內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人力、資源與產業結構的發展情形如何？（3）建構一個完整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需要的資源有哪些？最後在視覺美學方面擬定的訪綱為 LED 幕虛擬製作室在電影視覺美學上有哪方面的突破？

由於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運作與經營涉及多面向條件，上述每項問題可能跨越不同部門與人員，而為了增加研究的信實度，只要研究問題與之有關的人士皆接受訪談，且在研究過程中亦同時蒐集國內、外 LED 幕虛擬製作室相關之專書、報章雜誌資料與學術研究之論文等資料來源與訪談內容，進行對照及相互驗證。訪談問題與對應的受訪人員的資料可參閱附錄二。

本研究期待透過深度訪談與文獻分析法，來探討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當代影視產業之影響，提供產業界未來發展與內容產製之參考。

肆、研究結果

一、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方式

自從電影誕生以來，科技的進步一直帶動電影的發展，例如從無聲片到有聲片、黑白片到彩色片，再到寬銀幕、數位、大銀幕、3D、虛擬製作與如今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等都跟科技有密切的關聯。然而，科技不僅提升電影的藝術創作力與表現力，也改變電影的製程與製作觀念。例如數位攝影機取代了膠捲攝影機，提高了電影製作的速度、效率和靈活性，以及電腦圖像技術與虛擬技術的發展為電影提供視覺藝術的延伸（Fang & Xiong, 2020）。如今，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技術及其執行已成現今電影創作的新方法，然而此新方法涉及高度專業分工的產製過程，唯有在拍攝之前有完善的企劃內容與前製作的詳細規劃與設計才能降低產製過程中的風險，以及避免產製過程中的不必要浪費，讓此新方法在製作上達到最大的效益。如以下受訪的導演描述自身選擇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想法：

> 選擇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思考有兩種，一種是時間。第二就是看劇本上拍攝的內容是什麼？比如說我們要拍一個喜馬拉雅山，但是山就是很難去的地方，那在 LED 幕虛擬製作室拍攝時可以省去旅途的時間，第二是適合一些天馬行空比較科幻的影片！例如像國外一系列的漫威電影，因爲這些電影若不是用虛擬場景就是搭景，而如果有好幾個場景都要用搭景，不僅增加製作時間也增加製作成本，這時候選擇虛擬製作就比較有利。（受訪者 E）

因此，選擇以 LED 幕虛擬製作室來製作電影或影視作品，必須評估如果選擇此方法來製作影片是否能提高製作的效率與降低成本，以及是否可讓題材得到很大的擴充，讓視覺景觀更為豐富。再者此方式可讓電影製作人需要在真實環境拍攝的需求減少，可以免除攝影製作組的差旅費和住宿費，減少氣候條件的因素影響與特殊許可之需求，這些優點有機會讓低預算的小製作得以被拍攝與上映（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然而，劇組進到了 LED 幕虛擬製作室拍攝即完成最後圖像的結果，這與傳統電影製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如導演通常習慣性在現場修改拍攝計畫或是在後期製作時習慣修改，如以下受訪者描述：

> 以前的後製現在變成前製，各種的觀念都是必須改變，所以就要看劇組他們能不能接受，目前有些劇組還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形式，因爲有些導演覺得說我拍完了有些東西想要改，但是 LED 幕虛擬製作這種形式可能顛覆一些傳統技術的方式，例如在這個 LED 棚裡面拍完的東西它不能改，你要改就要再進來再拍一次，但要看導演能不能接受這些事情，這樣子工作的流程，製作人員必須更清楚一點。（受訪者 F）

由此可知，LED 幕虛擬製作室改變了傳統電影行業從前期製作、製作和後期製作的線性生產線的遊戲規則，但相對的也增加工作流程的複雜性，特別是對傳統影視製作的觀念衝擊更大了（Iseli et al., 2022; 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因此，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於習慣傳統製作方式的團隊或工作人員，仍然是一大挑戰，尤其是現今電影或電視對視覺特效的需求越來越頻繁下，如果仍舊採取線性製作觀念來使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將會增加不必要的預算支出與拍攝時間，而無法將此製作方式的特色發揮出來。相反的，如果能掌握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優點，將會給製作團隊帶來新的視覺效果。如以下受訪者描述：

> LED 幕虛擬製作室有很多設備，它就是把以前在現場劇組的燈光助理、攝影助理人員轉換成現場虛擬製作室的人，以及演員的光影特效在以前是一個一個在後期製作打出來的，現在可以在拍攝現場由 LED 幕來補光。這跟以前都是現場歸現場的，後期作後期，兩者是分開來做是很不同的，另外導演在現場可以完全看到演員與虛擬場景合成後的效果，並且可以完全控制攝影機來呈現演員在虛擬場景前的表演。（訪問者 B）

由此可見，虛擬製作的出現可以解決線性生產方式的不確定因素，以更好的方式整合傳統電影製作的導演、攝影師、燈光師與特效師等專業人員，讓導演在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拍攝現場對虛擬場景中單擊、拖動、更改佈景、燈光等來掌握拍攝成果，並快速反覆運算後立即重新呈現拍攝的內容。這種方式對工作人員產生新的協同方式，並為電影製作中節省成本、時間和創造了新的視覺效果（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

綜合以上所述，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方式與傳統影視製程最大的

差異是將「後期前製化」。因此，國內的影視產業在面對這樣的情況，必須加強影視產業人員對此趨勢的瞭解與培訓來提升他們的影視製作能力。然而為了充分運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技術來產出具有觀眾票房的電影，並不是單純的將後期製作提前在前期製作階段完成即可達到。根據 Jwa & Lee（2006）研究好萊塢電影成功要素指出在電影製程中以企劃發展階段與前期製作階段為電影成敗的關鍵要素。事實上以好萊塢商業電影而言，企劃發展階段首重任務是要正確的找出目標觀眾群喜好的電影口味，再依此來決定電影題材，而這也是近十多年來韓國電影崛起的原因之一（林有慶，2007）。反觀國內產製的電影大部分不受國人青睞，究其原因是題材類型不夠多元，且偏離大眾市場，以及欠缺專業企劃人才等（劉瑋婷，2010）。如今 LED 幕虛擬製作室具備擴展電影題材的能力，以及豐富影視的表現力，例如動漫、恐怕片、懸疑片、超級英雄、動作片以及科幻片等在融入了新的 LED 幕虛擬製作技術後都表現出巨大的潛力，也廣受大眾的喜愛（賈婧，2019）。因此，要發揮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功能必須從企劃發展階段開始尋求合適與符合大眾市場的題材，再精確的規劃產製流程，以及提升製作團隊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觀念與能力，或許能為我國影視產業帶來新的機會。

二、 LED 幕虛擬製作室在我國影視產業發展之現況

LED 幕虛擬製作室自 2019 年出現以來，已經帶給影視產業逐年增加的商業價值，根據美國環球電訊社（GlobeNewswire）分析報導指出由於 LED 幕技術的日益普及引領虛擬製作在媒體、電影與娛樂產業的運用增強，預計全球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生產規模到了 2026 年將達到 31 億美元，並且在預測期內將以 14.3% 的年複合增長率上升。面對這一個近年來最偉大的進步技術之一，擁有這個技術關鍵將可以提升產業持續性的發展（GlobeNewswire, 2021, February 25）。因此，這一個新的技術目前已成為好萊塢電影關注的產製方式。然而 LED 幕虛擬製作室不只是一個攝影棚的簡易概念，它是高度整合相關科技（如研發、資訊與硬體系統整合等）、產業鏈的製作方式，並注重營運、服務品質等要素。換言之，發展 LED 幕虛擬製作室若要成功，它的關鍵在於整合軟體、硬體、營運以及上、中、下游的產業鏈等等。[10]

依據本研究截至目前調查，國內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數量在這三年間，產業界部分共完成四個 LED 幕虛擬製作室和一個正在建置中。四個完成者有夢想動畫虛擬製作棚、桃竹文化科技數位元基地「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工研院攜聚積、米斯合作的「電影級 XR 虛擬影棚」、友達光電與再現影像共同成立 LED 虛擬製作智慧攝影棚，以及由「元宇宙合作聯盟」新創投資團隊正在打造的「臺北市北投製片廠」。另外學界部分則有世新大學與駐美國洛杉磯新創團隊（Glassbox Technologies）合作所成立的「智能攝影棚」。然而，國內這些 LED 幕虛擬製作室經營團隊大多採取跨域組合或以合作方式進行，其原因是此製作室涉及多方領域的專業知識與人力資源等。如以下「智慧攝影棚」的受訪者描述：

> 建構一個完整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有三件事情我覺得是有必要的，一個是硬體部分。比如說 LED、電腦主機運算、攝影軌跡追蹤、動作補捉設備、現場燈光等等。另一個是演算法、資訊流與 AI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等等。第三個是圖像組合，這部分涉及影像美學與繪圖技術部分。（受訪者 A）

10 羅桑（2022 年 2 月 7 日）。〈阿凡達續集用他的技術，攜手世新打造智能攝影棚，想帶臺灣進軍好萊塢〉，《遠見雜誌》。上網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86742

從上述的內容揭示 LED 幕虛擬製作室必須結合傳播、設計、數位動畫、AI 與資訊程式設計等不同專業領域與人力資源的投入才能發揮此新的產製效果。因此，人才的需求是目前 LED 幕虛擬製作室經營者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歷年公佈的「影視產業趨勢研究專題研究報告」統計，我國電影拍攝成本雖然年年逐步增加，但遠低於好萊塢動輒上億元美金的預算（董澤平、廖志峰，2017）。因此，以我國的電影預算很難吸引擁有專業動畫與視覺特效的人才投入電影產業。另外國內優秀的資訊工程系所畢業的學生，也常以面板、半導體等高科技明星產業為就業首選，導致影視產業資訊工程人才嚴重不足。在面對以上這些問題時，依據本研究調查目前有廠商自行開設課程來培育人才，例如夢想動畫在臺北開設「實習課程」與高雄開設「夢想方舟」學院來培育自家人才。

> 我們每年會開一個就 60 人的這個實習生啊，每班 20 人都是一年開三次，目的是要引領這些學生，因爲我們需要人才，希望年輕的新血可以在這個業界一起工作，那大家的想法就會有越來越多共同點，那我們就可以有更多機會讓大家知道這個技術，這樣他們將來要拍片時就知道怎麼樣做才有效率來節省資源。（受訪者 B）

由上所述，產業自行辦理人才培訓是積極的做法，這是可以改善國內產業長期以短視獲利為目的之習慣，並以此培養新生代影視人員認識此新的產製方式，以利這些人員未來進行影視創作時能有效利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優勢。然而除了培育實習生外，對於在職員工的訓練也是不容忽視，因此，企業應可與國外相關廠商進行人才交流與培訓等合作事宜，以鼓勵優秀職員到海外培訓，或參加國際性展覽與參訪，並建立人才培訓技術回饋機制來提升企業全面的競爭力（洪雅玲，2007）。另外身為全臺唯一擁有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世新大學於 2019 年成立全媒體中心，校方在相關學系開設 11 門課程，致力培育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人才，以因應國內人才需求與競爭。以下為世新大學教務單位受訪內容：

> 我們整個棚動起來的時候，大概幾個系的人都跑不掉，如廣電、圖文傳播做平面設計，還有數位多媒體做那個動畫遊戲，另外有一個是程式設計，所以資管、資工系的都要進來。這個棚不簡單就在這裡，他不是要像我們廣電做一個氣象報告而已那麼簡單，他

每一個動作都是要軟件，每一個動作都有感覺，軟體包括我們實習的工具軟體，還有一個腦袋瓜的軟體。這個部分啊，我們已在相關學系開設相關課程來培育學生這些能力，所以這個棚是他們的實作場合。（受訪者 A）

由訪談內容得知學界如果要培養 LED 幕虛擬製作室所需要的人才必須要進行跨系與跨領域的人才培育計畫，例如將廣電系、圖文傳播系、數位媒體系與資工、資管等系所一起納入此計畫中。然而 LED 幕虛擬製作室屬於新興產製模式，需要投入龐大資金購買新興設備，其他大專院校有關影視或數位內容之科系投入的產製設備是很難跟上產業的腳步。因此，若能建立資源共用，鼓勵擁有相關科系的學校進行校際合作選課、共認學分方式來開課，將有助於更多人才之養成，以及在這些學生畢業之外，能盡速投入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產業來彌補人才不足之問題（洪雅玲，2007）。接下來，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另一個問題是營運問題，也是經營者重要的挑戰。接受訪問的夢想動畫虛擬製作棚經營者描述如下：

我覺得最核心的部分其實是營運。營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假如你今天蓋 LED 棚，設備我買了、蓋了、交貨就可以結案！但營運不是，你看我們大概做了 30 幾個案例，我們要跟客户說什麼可以、什麼不行。然後我們幫客户完成後，客户忽然問說：我這邊想要一條龍飛出來，這時候你就必須跟客户說明必須重做，而且會增加成本。換言之，這個新的製作方式必須從企劃、製作公司到後製都能瞭解才能達到普遍的被運用。（受訪者 B）

由上述受訪者內容可知，國內一些影視創作者對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流程還未全部瞭解。因此，經營者必須透過多方之溝通機會以及舉辦說明會來推廣此新的產製方式。除此之外，我國影視產製環境長期接受政府的輔助與資金支持，且經費有限，難以支撐大量的虛擬製作，再加上歷年來只有少數作品能獲得國外資金投入（賴以瑄，2018）。在此種情況下，LED 幕虛擬製作室經營者目前大多只能先以廣告與 MV 製作為業務來源以維持營運。如以下受訪者所描述：

我覺得預算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啊，臺灣一般的影視內容如戲劇或電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預算啊，那一開始我們只能先做取捨，因

> 爲這製作需要很大的人力，而我們要養團隊，所以就是先努力做廣告與 MV 項目。（受訪者 B）

然而，經營者若只能承接廣告或 MV 為營運項目時，產業人士很難累積戲劇或電影等較大規模的製作經驗，勢必不利於爭取國際合作。例如在天下雜誌「探索與創造」論壇中李安導演提到臺灣目前在個別領域有很強的技術，但沒有將其整合在一起，臺灣環境就是差一點（天下雜誌 video，2016 年 10 月 1 日）。因此，營運者除了推廣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方式外，還必須整合影視相關企業的力量來爭取國際上戲劇或電影的合製機會，以此累積國際製作經驗，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有鑒於此，LED 幕虛擬製作室經營者正朝向以合作或併購方式來進行專業領域的整合，以備未來能有機會爭取國際市場合作的機會，如以下描述：

> 現在我們以合作夥伴的方式來進行 LED 幕虛擬製作室，例如與 3D 動畫公司合作。然後我們同時還去併購另外一家，大概有 20 個人的左右的動畫公司來做特效、3D。因爲我們這個棚要蓋二到三年，我們希望做的是一家世界級好萊塢片場的感覺，除了提供硬體與技術的服務外，我們會將化妝間、更衣室跟休息區都規劃得很好，讓來拍攝的劇組能有完善的休息環境與服務。（受訪者 E）

然而，除了上述受訪者所言：進行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公司外，另一個要正視的問題是國內產業目前仍然沒有一個優質的片場環境與服務，提供給來此的劇組或工作團隊進行上、中、下流一氣呵成的產製環境。反觀鄰近韓國於 1997 年耗資韓幣 400 億元興建南揚州綜合製片場（Namyangju Cinema Studio），提供從劇本到後期製作完整的產業鏈來滿足影視內容的製作需求。因此，韓國電影在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近年來創造出亮麗的成績（臺中市政府新聞局，2012）。由此可知，建立一個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產製環境是提升影視作品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因此，LED 幕虛擬製作室經營業者若能以片場形式來經營，將影片製作各個環節，如企劃發展、前期製作、製作與後製作滙聚成一個 LED 幕虛擬製作室園區來提供各項技術與服務，或許能有機會去承接具挑戰性高的影音內容。

總體而言，雖然我國的影視市場量體規模不大，然而現階段國內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發展是與全球同步。因此，只要有完整的軟、硬體設備與優

質的人才，再將企劃發展、前製作、製作與後期製作串聯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接著增強營運管理能力，例如招收具有國際化、前瞻性、整合能力與專案管理能力等人才來擔任製作人與專案經理，並且吸引國際行銷等人才一起共組經營團隊，如此一來應可強化企業競爭力，創造國際合作機會，以擺脫國內有限的經濟規模，開創新的商機。

三、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視覺美學的影響

當我們看到的電影是一種如同曼諾維奇所提出的混合多種媒材而成的影像時，電影已經不同於巴贊所指的電影是對真實所進行的完美複製（Bazin, 1967）。據此，現今的電影並不能只從傳統真實再現的美學脈絡下去思考，因為真實再現意味著真實事物與影像之間存在重現或代表的關係。正因為如今的電影已是運用多種軟體與科技來重塑主體與真實之間的文化關係，並且傳統攝影的影像已被數位科技轉變成資訊化進行重組或變造，已經逐漸遠離原本的影像本質（Harbord, 2002）。

以 LED 幕虛擬製作室所產製的影像而言，它是以電腦為中心的硬體設備和軟體技術之搭配而形塑了當代數位影像樣態，此時影像已經不是機械「再現」真實影像的美學形式，而是一種「呈現」與真實符應的虛擬語彙，亦即將原本想像中不可見的世界變成當下映入眼簾的可見世界，企圖編織一種感知真實性的擬真世界。然而虛擬製作技術所產製的影像要帶給觀者體驗感知的真實性，也必然要依據人類真實世界的情感經驗、社會經驗和視覺經驗來設計，讓觀者能有所體驗，如同貝拉 · 迪克斯（Bella Dicks）指出虛擬實境除了技術之外，更多的是體驗：

> 所有體驗所有效果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創作要靠設計編織經驗，利用電腦工具參照眞實的世界，裡面有模擬眞實世界的圖像擬眞，還有利用幾何與透視建構的幻境（Dicks, 2004／馮悅譯，2012，頁 182）。

如上述所言，LED 幕虛擬製作室為了呈現虛擬影像的擬真性，也必然要參照真實世界的生活經驗來設計，讓觀眾在認知過程中獲得認同而產生感知的真實性。例如呈現在 LED 幕中的畫面光影，雖然不是物理世界的自然光，而是虛幻引擎計算出來的明暗，然而這個光透過 LED 幕照射到物理空

間的演員時，卻能讓演員感知到身體如同在真實環境所經驗的光影照射，使其演出更貼近真實情境（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如同以下受訪者所描述的「賽博龐克」（cyberpunk）情境：

> 如果說我要拍攝像「賽博龐克」的環境感覺，我們可以搭配虛幻引擎的智慧燈光，那它透過 LED 幕發出來的光源照射在演員身上就會很像是演員置身在滿是霓虹燈的城市中，如果說虛擬背景在動，那智慧燈光（霓虹燈）也會跟著動，所以演員身上就會有霓虹燈的照射，非常眞實。（受訪者 E）

簡言之，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電腦軟體所產生的智能燈光能讓「賽博龐克」電影中的元素，如金屬、龐克，得以透過電腦資料運算所產生的光影映照其上，進而產生如同真實環境的氛圍。因此，這種將真實景物、虛擬燈光、虛擬場景重新合製成一個擬真性的虛實混合的空間，改變了過去我們對電影「真實空間」的認知。換言之，此方式瓦解了空間的物理距離，創造了一種數位式虛擬空間，讓演員在虛擬空間進行沉浸式體感的表演，這種消除虛構／真實界線，不僅改變了影像的呈現方式，也改變影像的本質。這也與現今好萊塢科幻電影透過數位科技的資訊結構擬仿出超現實的樣態相似，而這些都是拜電腦科技與軟體才能將不同的種類的媒體融合，以再現形式出現（Manovich, 2013）。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 虛擬製作就是指實拍的人再加上 LED 幕即時的景，廣義看來這些都是突破我們過去實人實景的拍攝類型，我可以透過實人虛景或實景虛人的這些 AR 技術、VR 和 LED 技術，透過電腦科技在現場將這些組合起來重現新的影像，這在過去是各自獨立的媒體技術，如今都可以在 LED 幕虛擬製作技術中整合在一起。（受訪者 H）

因此，虛擬製作的特色能以全新的方式結合了動畫、繪圖、攝影、錄像、AR、VR 和 LED 幕等不同技術，成為數位電影在影像創作過程中提供非常好的預覽式體驗，另一方面原本互相獨立的科技與工具，全都在虛擬製作的環境中交會，這個交會便混合成一種新的動態圖像之美學，如同 Manovich（2013）所提出的「深度混合性」（deep remixability）的描述：

> 在軟體產製環境，讓設計者不僅可以將不同媒體種類的內容予以混合，更能將他們的基礎技術、運作方法、再現與表現方法也加以混合而成的動態圖像美學的核心（轉引自邱誌勇，2021，頁 209-210）。

於此，將不同軟體與科技混合的過程裡，其創作出的影像已經不是它原本的樣子；反之，混合後的影像已經是一種新的語言，一種結合多種科技而成的新影像語言，以及造就一種虛擬空間的電影屬性（Manovich, 2013）。亦即當代電影的影像特性便是虛擬與真實混雜的特性，以及模擬人類世界中可見的、可觸摸的、可感覺的事物，並且愈來愈貼近人類感知的真實世界，能提供不同於傳統電影的美學體驗，這也是當今好萊塢科幻、動畫電影與巨型銀幕電影製作和放映發展所追求的觀影體驗（邱誌勇，2012）。

總體而言，當談論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視覺美學的影響時，可借用曼諾維奇提出的「後媒介」概念，亦即數位科技廢除了攝影的概念，同時消除了所有媒體之間的界線（Manovich, 2003）。LED 幕虛擬製作室藉由各種數位科技的也成功消除了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界線，將擬真性建立在軟體與科技上，並將焦點轉向觀者想像真實的感知體驗。亦即觀者明確知道這是經由電腦虛構出來的，卻能以一種非身體直接接觸的真實感知進入敘事的擬真性空間裡，正如普林斯所提倡的當今電影理論所強調的重點已經從真實的寫實主義，轉變成感知真實性的美學路徑（Prince, 1996）。

伍、結論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技術革新，對國內影視產業帶來新的挑戰與機會。首先，此新的製作方式顛覆傳統影視從企劃、前製、製作與後製的產製流程。面對此變化，國內的影視產業雖然已經意識到此方法所帶來的衝擊，但是國內的影視市場一直無法形成足夠的經濟規模，在此情形下必然影響影視業者繼續投資新的技術與設備。而這也是國內目前僅有少數新創公司投資興建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LED 幕虛擬製作室迫切需要各種新科技人才投入和改變產業營運方式才能創造新的商機，而目前國內影視產業人員對此新技術還未完全熟悉，以及產業缺乏資訊科技與熟悉國際市場的行銷人才。因此人才的培育、新的商業模式與尋求產業、國際資金合作

是極為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以目前國內大專院校的影視教育而言，大部分還是教導傳統影視產製內容，只有少數學校導入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新方式來教育年輕學子。再者影視相關的職業教育機構，一向重視影片拍攝技巧，缺乏導入完整的商業運作模式之課程來教育有興趣投入影視產業的年輕學子。例如，若國內影視作品要行銷到海外、國際串流影音平臺，就必須要具備財務會計、法律事務、智慧財產、管理等專業能力才能在企劃階段就能以國際商業市場進行規畫，而這正是好萊塢影視公司的管理與製作策略。因此，影視教育單位與機構必須與產業建立長期的產學交流，並邀請職場專業技術人員與熟悉國際行銷人員來協助人才培訓，如此才能改善學用落差與職場人才短缺之問題。另外，國內影視產業須以華人或是國際市場的視野來建構全新的影視產業聚落，並且導入國際最新的影視產製技術來提升技術人才，以及學習好萊塢影視公司的管理與經營方式，如此才有機會將臺灣優質的影視內容進軍國際市場。

另外，LED 幕虛擬製作室已經為創作者帶來更大的創作空間，特別是攝影已能透過鏡頭將虛擬與真實合而為一呈現在景框內，讓擬真性的空間展現感知真實再現的視覺美學。再者此技術已突破傳統藍、綠幕的限制，賦予演員在虛擬空間感受到如同置身真實環境下的身體沉浸、知覺沉浸，空間沉浸，這種身歷其境的感覺正鼓舞了演員的表演。亦即透過 LED 幕虛擬製作室能增進演員、真實景物與虛擬景物合成的逼真性，建構出如同真實存在的主體與感知的視覺美學。因此，若是能了解此新方式的視覺特色來開發具有國際市場的電影文本，如奇幻、科幻等類型，或許能將國內的影片類型升級。

緊接著，近年來網路影音平臺的崛起，提供各國影視內容打通世界舞臺的機會。因此，影視產業已無地域限制，正邁向全球化競爭與合作的模式，國內業者必須要正視此課題，努力尋求國內外資金與技術合作，或許才能有機會產出優質影音內容來進軍國際市場或是串流影音（over-the-top media, OTT）平臺。如韓國電影公司在獲得 OTT 業者的資金合作下，運用足夠的資源產出優質影音內容「魷魚遊戲」，再將其內容在串流平臺播出後，即獲得全球數億人觀看，這正是一個走出國內市場迎向「全球化」成功的案例。據此，發行、電影製作與 LED 幕虛擬製作室等企業應可以積極尋求合作來形成新的商業模式，並爭取與國內外 OTT 業者合資來製作其所需之內容，共同朝向一起開發、製作和發行，或許有機會能突破國內有限市場的困境。

最後，本研究亦有侷限之處，首先：探究 LED 幕虛擬製作室僅以影視

產業為對象，並未將電玩動畫產業納入探究，以致未能完整勾勒出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全貌。這個主要原因是在訪談電玩動畫專家與學者時，知悉影視產業與電玩動畫產業在技術、美學表現形式、敘事與觀者有其相似與相異之處，需要更多文獻來進行討論，例如以擬真性視覺美學而言，電玩動畫的人物擬真性與電影中虛擬與實景的擬真性存在著不同的觀看視角等差異性，這些是本研究未觸及深入討論面向的原因。其次：LED 幕虛擬製作室發展時間不長，相對的國內相關業者目前也正處於發展期或者是規劃中。再者具有此經驗的專業人員有限，以致可以約訪的對象有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電玩動畫的擬真性與電影的擬真性等視覺美學表現形式的差異性進行相關研究，以及約談更多的國內外業者與專業人員，以提供更多元、更代表性的探究結果。

參考文獻

Jwa, S. H., & Lee, T. K.（2006）。《韓國電影產業結構變化與電影產業政策研究》。韓國經濟研究院。

Liu, L.（2020 年 1 月 11 日）。〈揭開《1917》一鏡到底拍攝！如何完美呈現不可能的戰爭任務真實緊張感〉。上網日期：2022 年 10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2000046

天下雜誌 video（2016 年 10 月 1 日）。〈論壇懶人包：讓全場沸騰的李安六段金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96SlfzZ0w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2012）。《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參訪韓國釜山亞洲電影市場展及製片場報告書》。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李想、趙建軍、陳軍（2022）。〈基於 LED 背景牆的電影虛擬化製作中攝影機追蹤技術研究〉，《現代電影技術》，1：10-19。

周明憲譯（2013）。《微電影講堂：數位電影攝影機完全攻略》。尖端出版社。（原書玄光社編輯群［2013］. *Digital Cinema Camera.*）

林有慶（2007）。〈韓國電影產業的資本變動與電影產製的變化〉，《新聞學研究》，91：1-34。

邱誌勇（2012）。〈幻化流形：後電影時代的數位元活動影像〉，《現代美術學報》，23：101-123。

_____（2021）。〈重構一段被忽略的歷史：評列弗曼諾維奇的《軟體主宰》〉，《清華藝術學報》，3：207-215。

洪雅玲。（2007）。〈臺灣數位內容產業專業人才培訓問題探討：以遊戲、動畫產業為例〉，《資訊社會研究》，12，213-240。

胡峻曉、張文軍、駱駪駪（2021）。〈電影虛擬化製作的發展前沿探究〉，《現代電影技術》，2：28-32。

桑　尼（2015 年 7 月 13 日）〈好萊塢的障眼法——綠幕〉，《壹讀》。上網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取自 https://read01.com/zh-tw/ankmoD.html#.YtTXl3ZBxqN

崔君衍譯（1995）。《電影是什麼？》。遠流。（原書 Bazin, A. [1985]. Qu'est-ce que le cinéma? Paris, France: Éditions du Cerf.）

曾偉禎譯（2008）。《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麥格羅希爾。（原書 Bordwell, D & Thompson, K. [2008].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 (8th*

ed). McGraw-Hill.）

馮悅譯（2012）。《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Dicks, B. [2004]. Culture on display: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visitabili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楊錫彬（2020）。〈電影視覺特效發展策略之探索 - 以虛擬實境為例〉，《中國廣告學刊》，25：75-90。

董澤平、廖志峰（2017）。〈電影資本市場失靈與匡正機制之探討〉，《Management Review》， 25 (1)，101-134。

賈　婧（2019）。〈淺析數位技術對電影美學的衝擊〉，《新聞研究導刊》，11，123-123。

維基百科（n.d.-a）。〈1917（電影）〉，《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s://reurl.cc/o0DngV

_____（n.d.-b）。〈星際大戰〉，《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s://reurl.cc/4QgKAL

_____（n.d.-c）。〈曼達洛人（電視劇）〉，《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s://reurl.cc/vknYRL

_____（n.d.-d）。〈瑞德數位電影攝影機公司〉，《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22 年 12 月 15，取自 https://reurl.cc/LNeqey

_____（n.d.-e）。〈摩爾波紋〉，《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22 年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s://reurl.cc/Dm1R6d

劉晗、王桂亭（2005）。〈數位化：電影美學視域中的價值拷問〉，《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 (1)：33-36。

劉瑋婷（2010）。〈臺灣電影產業之未來與挑戰〉，《臺灣經濟研究月刊》，33 (8)，53-61。

賴以瑄（2018）。〈蔡岳勳後儒家影視劇的東亞國際化與市場競爭〉，《新聞學研究》，135，49-92。

羅　桑（2022 年 2 月 7 日）。〈 阿凡達續集用他的技術，攜手世新打造智能攝影棚，想帶臺灣進軍好萊塢〉，《遠見雜誌》。上網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86742

Allen, M. (2002).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film aesthetics. In D. Harries (Ed.), *The new media book* (pp. 109-118).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audrillard, J.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azin, A. (1967), The myth of total cinema. In H. Gray (Trans.), *What is Cinema* (pp. 17-2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_____ (1971). *What is cinema? Volume II* (H. Gray Tr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nnett, J., & Carter, C. (2014). *Adopting virtual production for animated filmmaking.* In E. Prakash (Ed.) *Proceedings of the 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Games, Multimedia and Allied Technology* (pp. 81-86).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 (GSTF), Singapore.

Bignell, J. (2010). Star Wars (1977): Star Wars (1977): back and forth in time and space. In Brown, T. & Walters, J. (Eds.) *Film moments: criticism, history, theory* (pp. 111-115). British Film Institute and Palgrave.

Fang, J., & Xiong, W. (2020).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o film industry. In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768, No. 7, 072112). IOP Publishing. DOI:10.1088/1757-899X/768/7/072112

Gibbs, S., Arapis, C., Breiteneder, C., Lalioti, V., Mostafawy, S., & Speier, J. (1998). Virtual studios: An overview. *IEEE multimedia, 5*(1), 18-35. https://doi.org/10.1109/93.664740

GlobeNewswire (2021, February 25). Global virtual production market by component, by type, by end user, by region, industry analysis and forecast, 2020-2026. Retrieved July 25, 2022, from https://reurl.cc/OVbdND

Harbord, J. (2002). Postmodern praxes: Production on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stage. *Film Cultures* (pp.93-116). SAGE.

iDISPLAY (2022). Advantages of using virtual production LED wall. *Idisplay.* Retrieved June 30, 2022, from https://reurl.cc/xlDdMV

Ilmaranta, K. (2020). Cinematic space in virtual production. In De Paolis, L., Bourdot, P. (Eds.) *Augmented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and computer graphics: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VR 2020, Lecce, Italy, september 7-10, 2020, proceedings, part II* (pp. 321-332).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58468-9_23

Iseli, C., Loertscher, M. L., & Thomas, G. (2022). Virtually real: Aesthetics and

perception of virtual spaces in film. *Interactive Film and Media Journal, 2*(1), 92-105.

Jewell, R. B. (1994). RKO film grosses, 1929–1951: The CJ Tevlin ledger.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4*(1), 37-49. https://doi.org/10.1080/01439689400260031

Kadner, N. (2021, April 6). The virtual production field guide: Volume 1. *Epic Games.* Retrieved July 10, 2022, from https://www.unrealengine.com/en-US/blog/volume-2-of-the-virtual-production-field-guide-now-available

Kavakli, M., & Cremona, C. (2022, March). The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 concept–an emerging game changer in filmmaking. In *2022 IEEE Conference on Virtual Reality and 3D User Interfaces (VR)* (pp. 29-37). IEEE. Doi: 10.1109/VR51125.2022.00020.

Manovich, L. (2003). New media from Borges to HTML. *The new media reader, 1*(2), 13-25.

_____ (2013). *Software takes command.* Bloomsbury Academic.

_____ (2016). *What is digital cinema?* Retrieved July 10, 2022, from https://reurl.cc/o0Xea3

Milgram, P., & Kishino, F. (1994). A taxonomy of mixed reality visual displays.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77*(12), 1321-1329.

Plessiet, C., Chaabane, S., & Khemiri, G. (2015, April). *Autonomous and interactive virtual actor, cooperative virtual environment for immersive Previsualisation tool oriented to mov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Virtual Real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ew York.

Priadko, O., & Sirenko, M. (2021). Virtual production: A new approach to filmmaking. *Bulletin of Kyiv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Series in Audiovisual Art and Production, 4*(1), 52-58. https://doi.org/10.31866/2617-2674.4.1.2021.235079

Prince, S. (1996). True lies - perceptual realism, digital images, and film theory. *Film Quarterly, 49*(3), 27-37. https://doi: 10.1525/fq.1996.49.3.04a00040

Qian, B. (2022, June). Seeing and being seen. discuss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and Reality. In A. Khalil & J. S. Zha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22)* (pp. 1091-1095). Atlantis Press.

Raditya, C., Rizky, M., Mayranio, S., & Soewito, B. (2021). The effectivity of color for chroma-key techniques.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179,* 281-288. https://doi.org/10.1016/j.procs.2021.01.007

Shan, X., & Chung, J. (2022).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screen and LED wall in virtu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Smart Convergence, 11*(2), 64-70.

Skarbez, R., Smith, M., & Whitton, M. C. (2021). Revisiting milgram and kishino's 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 *Frontiers in Virtual Reality, 2,* 647997. https://doi.org/10.3389/frvir.2021.64799

Southern, R. (2022). *A comparison of LED panels for use in virtual production: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Bournemouth University (Unpublished). https://eprints.bournemouth.ac.uk/36826/

Thacker, J. (2012, May 10). In search of virtual production, *CG Channel.*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from https://reurl.cc/n7XEav

Zhi, J. (2015). An alternative green screen keying method for film visual e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media & Its Applications, 7*(2), 1-12. https://doi.org/10.5121/ijma.2015.7201

本文引用格式

黃文龍、周成虎（2023）。〈內容產製與當代影視產業：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13（2）：187-217。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7

Huang, W. L., & Chow, C. H. (2023). Content produc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187-217.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7 [Text in Chinese]

附錄

附錄一

訪談名單

代號	訪問對象	類別／職務	受訪時間／地點
A	世新大學教務單位	管理階層	2022 年 7 月 1 日／世新大學
B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者／動畫師	2022 年 7 月 13 日／夢想動畫公司
C	堅達資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者／資工師	2022 年 7 月 26 日／堅達公司
D	茶金電視劇製作單位	美術指導	2022 年 8 月 2 日／視訊
E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者／導演	2022 年 8 月 4 日／風度影業公司
F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	藝術總監	2022 年 8 月 9 日／視訊
G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	藝術指導	2022 年 8 月 23 日／世新大學
H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媒體系	遊戲動畫師	2022 年 11 月 20 日／臺北
I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經營者／動畫師	2022 年 11 月 10 日／視訊

附錄二

訪談題目	LED 幕虛擬製作室在電影視覺美學上有哪方面的突破?
受訪者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茶金電視劇製作單位美術指導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指導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媒體系遊戲動畫師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訪談題目	建構一個完整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需要的資源有哪些?
受訪者	世新大學教務單位管理階層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堅達資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資訊工程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訪談題目	在影視內容產製上，LED 幕虛擬製作室與藍、綠幕虛擬製作上有哪些差異?
受訪者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茶金電視劇製作單位美術指導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堅達資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資訊工程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媒體系遊戲動畫師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訪談題目	何種類型的影視內容適合運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其原因為何?
受訪者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媒體系遊戲動畫師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訪談題目	目前在臺灣的影視內容上，已經運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影視內容有哪些?
受訪者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訪談題目	目前國內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人力、資源與產業結構的發展情形如何?
受訪者	世新大學教務單位管理階層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187-217, July 2023

Content Produc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

HUANG, Wen-L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CHOW, Cheng-Hu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se of LED screens instead of blue and green screens for production in The Mandalorian television series since 2019 has brought about a revolution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s on the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content production, and visual aesthetics. The study employe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ly, the adoption of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s requires the post-production process to be initiated during the pre-production stage, and the preview of virtual and real scenery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shooting, resulting in a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Secondly,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s are currently primarily used for producing advertisements and music video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studio can be employed for creating films or television ser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range of content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inall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visual aesthetics allows performers to perceive the realism of their surroundings while performing in the virtual space, thereby creating a realistic virtual image to immerse viewers in an aesthetically pleasing experience of perceptual realism.

Keywords: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 visual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film and television content production

---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lhuang@mail.fgu.edu.tw
Received: 2022.10.08; Accepted: 2023.02.22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世新大學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跨媒介料理：互動性敘事中迷因再製之研究*

賴玉釵**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摘要

跨媒介敘事研究視迷因文本為衛星支線，輔助核心體系；過往，虛構文學勾勒想像料理之「美食書寫」多所發展，近年則轉為「跨媒介料理」，著重身體感知與敘事設計。論文由此出發，試圖藉原著《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的案例，與 220 則網路圖文的多模態分析，說明迷因再製者的轉化（菜色）成品及再現（文本）策略。研究發現，互動性敘事涉及迷因再製者融入文學體認，連動食材與身體感知的聯想。其次，轉化歷程需對應較易尋得的食材／媒材，符合日常技藝等情境。其三，創作者融入跨媒介記憶，拼盤「共時系統」或小說時空「歷時系統」，復刻奇幻美食。其四，創作者運用多模態資源再現迷因文本，彰顯個人創意、引發詮釋社群迴響，鞏固跨媒介料理創作動力。

關鍵字：互動性敘事、身體感知轉向、迷因再製、虛構文學美食書寫、跨媒介料理

---

* 作者敬謝審查委員及編輯委員會師長指正，也感謝編輯團隊的悉心付出。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數位匯流之跨媒介敘事傳播：改編產業、故事品牌及迷因傳散」專書寫作計畫〉（MOST 110-2410-H-130 -035 -）之部份成果。

** 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投稿日期：2022 年 09 月 27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4 月 07 日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壹、動機與問題

一、 研究動機

敘事學隨著數位匯流趨勢，興起「跨媒介轉向」（a trans-media turn）觀點（Gibbons, 2017）。跨媒介敘事是以「媒介」為核心（media-conscious transmedia narratology），闡釋不同類型之說故事形態（Thon, 2014）；運用者以相異載具之多模態資源，透過「一源多用」供閱聽人賞析不同類型文本（Painter et al., 2013; Park et al., 2019）。

近年如漫威影業（Marvel Studio）超級英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及《星際大戰》（*Star Wars*）均為顯例，或如本土電玩《返校》等也改編為影視文本，顯見數位匯流帶動跨媒介產業與創作蓬勃發展（李政忠，2021；Duret, 2019； Flanagan et al., 2016；Pearson, 2018）。

（一）跨媒介敘事與迷因再製

與傳統敘事學相較，因數位匯流而醞釀的互動性「跨媒介敘事」更具流動及傳散特質，也因而產生更大影響；這些閱聽人主動參與的變化造就了跨平臺敘事、跨媒介網絡、迷因文化等現象（Johnston & Battis, 2015）。其中，跨媒介敘事研究之網路迷因屬衛星輔助支線（transtext），協助共構故事體系，故該領域之迷因元素備受關注（Danesi, 2019; Kitchens & Hawk, 2019; Resuloğlu, 2019; Skains, 2023; Wilson & Unruh,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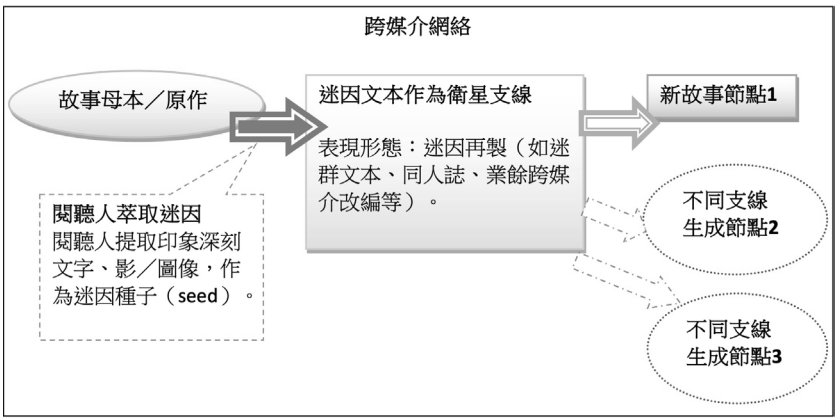
迷因與希臘語 mimeme 同源，即敘事者模仿文化元素，如再製音樂旋律、概念、服裝、音樂旋律及食材等，並藉跨平臺傳散資訊（Cannizzaro, 2016; Wang & Wang, 2015）。「迷因」語出 Richard Dawkins 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說明文化傳播宛如基因選擇遞嬗，且相似概念如同基因複製般傳輸至另一個體心智（Dawkins, 1989; Sharma, 2018）。

以跨媒介敘事研究為例，閱聽人萃取印象深刻之概念、文字、影音、圖像等形態後，即接受迷因種子（seed），繼而模仿、複製及再創作既有迷因形態，構成「跨媒介網絡」分支（Kitchens & Hawk, 2019; Wilson & Unruh, 2011）。本研究以「迷因創製」（meme creation）概念，說明閱聽人萃取既有迷因元素而「再」創造（recreation）歷程，重新形塑為新版迷因，故通用「迷

因再製」（meme recreation）。迷因元素與再創作淵源甚深，如網友依循互文概念，不斷複製梗圖或文字傳散；另如網路迷因與網友集體智慧相繫，通常涉及多次再製（Johann & Bülow, 2019;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自 2011 年以來，該領域研究肯定迷因具跨媒介導航（transmedia navigation）效力，協助閱聽人跳接跨平臺文本（Danesi, 2019; Johnston & Battis, 2015; Kitchens & Hawk, 2019; Kurtz & Bourdaa, 2016;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Skains, 2023; Wilson & Unruh, 2011）。跨媒介敘事研究視凸顯更多互動的迷因為易重製及記誦故事元素，閱聽人之迷因再製實展現「互文性」（Sánchez-Olmos & Viñuela, 同上引 ; Skains, 同上引）。跨媒介敘事之迷因研究範疇，如圖 1 所示。

圖 1：跨媒介敘事之迷因研究範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承襲跨媒介敘事討論，探索迷因如何成為衛星輔助支線，並為原作助攻；常見跨媒介分支如閱聽人的迷因再製，即模仿經典文本符碼之形音義等外顯特徵，變造文本後成「再創作」成品，這也凸顯出不同的互動性面向（Johnston & Battis, 2015; Kitchens & Hawk, 2019; Kurtz & Bourdaa, 2016; Özbölük, 2019;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Skains, 2023; Wilson & Unruh, 2011）。整體言之，回顧跨媒介敘事研究領域探索迷因「衛星文本」趨勢，

未來可深耕迷因傳散如何輔助核心文本，共構跨媒介網絡。[1]

綜上所述，迷因涉及文化概念傳遞，如同基因般跨世代散佈特定價值觀，並植基於特定文史脈絡（Sharma, 2018; Shifman, 2014; Wang & Wang, 2015）。本研究承襲跨媒介敘事學理系譜，探索迷因文本之輔助支線功能。

（二）跨媒介敘事與生活美食

1.美食文學與跨媒介料理

經典文學描繪飲食段落、搭配特定角色及對話等，推展情節發展，此讓「美食文學」（food and literature）成為研究領域（Shahani, 2018）。本研究盼鎖定主題，故由此延伸至跨媒介料理（transmedia food）。

近年跨媒介學理倡議「食物中介」的媒材與轉化，呼應閱聽人仿製經典文學之美食書寫而衍生跨媒介料理，即指閱聽人轉化文學的想像食物描寫為「真實料理」而共構跨媒介網絡（Kérchy, 2016）。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萃取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時，不能僅複製既有影劇符徵，而需考量文學典故、美食於原作出現脈絡及敘事功能（同上引 ; Solomon, 2017）。創作者並未在現實世界親眼目睹、品嚐想像料理，故需動用「身體感知」聯想，賦予迷因再製者更多想像空間（Kérchy, 同上引 ; 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Monroe-Cassel, 2015）。

相較於小說及影視等跨媒介改編，虛構文學之飲食書寫未必有具體表徵參照，難全然等同「互文」或「媒介形式相互模仿」。本研究承襲跨媒介敘事領域觀點，迷因再製者需從文學飲食書寫萃取迷因種子，再轉為跨媒介料理。故閱聽人如何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實為目前跨媒介敘事研究趨勢。

2.跨媒介料理與身體感知

迷因再製者面對作家想像美食，更需藉身體感知及文學詮釋，方能轉

1 著名如小說《哈利波特》發行二十周年新封面設計，此即迷因與品牌傳散顯例。J. K. Rowling 要求各國繪者再設計新版封面應結合各國文化元素（不可與電影影像重複），且新封面需經 J. K. Rowling 同意方能發行；臺版封面即以阿里山火車頭代言「霍格華茲特快車」，此舉帶動臉書討論度，展現迷因與在地文化傳散關聯（LEE，2020 年 8 月 12 日）。

化抽象書寫為跨媒介料理（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Monroe-Cassel, 2015）。「身體感知」強調閱聽人「身體」等物理條件，感官體驗連動外在環境、敘事設計（余舜德，2008，2016；Roberts, 2022）。迷因再製者萃取若干可辨識食材及作工描寫，並整合身體感聯想，方能「畫」出虛構文學飲食的可能味道。

閱聽人萃取若干迷因種子後，也需搭配可行食材與烹調器具，形塑合宜烹調環境／系統，方能「轉化」為真實菜餚。最後，閱聽人需回味文學沉浸體驗、美食設計經歷，方能「再現」自身經驗為「跨媒介料理」及部落格圖（影）文敘事。整體言之，跨媒介料理強調身體感等轉化歷程，目前較少跨媒介敘事研究論及。本研究盼承襲跨媒介敘事之迷因再製議題，探索文學美食書寫「轉化」及「再現」歷程：首先提及閱聽人萃取何種文學美食書寫典故；次再說明閱聽人轉化文學為真實菜色歷程，最後論及跨媒介料理再現為網路圖文等機制。

二、 探索問題

閱聽人補白活動不限於劇作映演期間，惟電視劇等長年映演之分季結構，常引發閱聽人靜候新劇集之懸念、激發再製活動（Mikos, 2016; Resuloğlu, 2019）。目前甚少研究細緻說明劇集以「季」為單元之敘事結構，如何引導美食迷因再製者靜候下一季區間之補白歷程。本研究擬鎖定（系列劇集）追劇區間，探索業餘創作者觀劇長年懸念與美食迷因再製等議題。

研究問題涵蓋「轉化」及「再現」兩者，即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並「再現」箇中歷程為跨媒介圖文。若以「轉化」言之，閱聽人選取美食書寫迷因元素，再據此選擇日常食材、可行烹調工具，方能轉化為跨媒介料理。或以「再現」言之，閱聽人需選用特定科技載具之敘事資源，方能再現美食迷因再製之圖（影）文。

（一）迷因再製者轉化抽象文學為現實料理之起點為何？

本研究盼探索閱聽人萃取及轉化迷因元素，如模仿迷因外顯特徵，並整合多元媒材以再創作（Cannizzaro, 2016）。迷因再製者體察文學描寫之形、音、義，再連動日常食材等感官聯想，進一步「轉化」抽象文學美食描寫為

具體菜餚。易言之，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時，連動文學迷因等閱讀體驗與身體感。閱聽人萃取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後，如何轉為具體菜餚？

（二）迷因再製者「賦形」等補白活動

跨媒介敘事研究甚少論及迷因再製者「長期」追劇之補白活動，若閱聽人靜候新劇集時，引發懸念能否轉為「視覺化」等補白動力？閱聽人「身體感知」如何協助轉化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為「跨媒介料理」？

文學美食書寫多屬文字表述，此時更需閱聽人「視覺化」等補白歷程，方能提供辨識度高「可見符徵」並為抽象書寫「賦形」（Kérchy, 2016, 2018）。本研究擬探索，閱聽人形塑文學美食迷因再製之補白及革新歷程為何？轉化歷程參照之歷時體系（如文學典故）、共時體系（擺盤呈設）為何？身體感在上述「轉化」具體菜色時，扮演何種角色？

（三）跨媒介料理文本與社群傳散

閱聽人如何再現「跨媒介料理」創作文本？如何整合網路圖文及影音等敘事資源，以利網路迷因傳散？

閱聽人可模仿／轉化圖像、慣用語及主題標籤（#hashtag），轉述迷因為創作素材，促成迷因形變而體現參與文化（Grundlingh, 2018; Woodworth, 2018）。本研究結合迷因傳散及多模態再現機制，細緻說明跨媒介料理之衛星輔助支線效力。

整體言之，迷因形態雖含括食物等媒材，但目前跨媒介學理較少論及文學如何轉為飲食及圖文敘事，而非僅複製既有符碼、拼貼至美食（Solomon, 2017）。若回顧跨媒介敘事研究圖譜，甚少敘明迷因再製者如何選擇文學美食描寫、連動身體感，影響後續選用食材以精準詮釋感官體驗。易言之，閱聽人轉化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為跨媒介料理，屬跨媒介敘事研究可延伸面向。

貳、概念與文獻

一、 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

本研究以虛構文學勾勒想像料理之飲食書寫為例，如閱聽人依循《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之下午茶書寫，出版食譜復刻奇幻「原味」菜餚，並參照原典維多利亞時期設定以轉化「愛麗絲奇幻仙境美食」（food of Wonderland）（Kérchy, 2016）。下文擬說明飲食書寫案例，並說明迷因學系譜、跨媒介敘事與迷因關聯，次闡述跨媒介料理潛藏迷因元素。

（一）迷因的辨明與類型

1. 迷因源起與特色

當代迷因學常關切網路迷因與文化議題，並應用傳散機制至通俗文化、宗教與行銷等領域，如 Web 2.0 情境提供迷因極佳的文化傳散情境，讓閱聽人得以整合通俗文化，形塑、重製與操弄既有迷因文本（Cannizzaro, 2016; Wang & Wang, 2015; Xu et al, 2016）。迷因研究也受跨媒介敘事領域重視，跨媒介研究者曾分析影音迷因文本，探索故事元素、組合形態、美學觀及流佈時間（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一九九〇年後，「當代迷因學」包括文化迷因等主題：

（1）文化迷因

跨媒介領域關切文化迷因議題，如探索閱聽人如何依迷因而定錨，川流於跨平臺故事圖譜（Danesi, 2019）。迷因產製者運用知識、圖像及影音等，引發閱聽人共鳴及詮釋而散佈迷因種子；經由閱聽人複製、記憶、再創作，持續構成文化迷因現象（Kitchens & Hawk, 2019; Skains, 2023; Wilson & Unruh, 2011）。

經典文學之食材描寫或揉合古時語言，或有製作工時、食品外顯特徵等陳述，此即迷因再製者轉化文學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之重要來源（Kérchy, 2016）。若閱聽人好奇跨媒介料理出處，或可翻閱文學典籍而查找美食與原作關聯，體現跨媒介導航功能。閱聽人曾轉化《愛麗絲夢遊仙境》下午茶描

寫為具體食材，參照維多利亞時期食譜而還原糕點樣貌；或依《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描寫，對照典故而出版雞尾酒食譜等（同上引）。易言之，迷因再製者「體物入微」及跨媒介轉化料理時，乃傳承文學美食迷因、參與文化基因輸出。

（2）其他領域

網路迷因研究重視再製文本同異，研究領域如對照迷因原圖、迷因再製圖示、社群媒體展演及數位策展，融入迷因再製者分享案例及細節說明（Woodworth, 2018）。相關取向含多種媒材的共時分析，探索一般網友如何基於相同典故／模板／曲調／梗圖等迷因，融入不同混搭及譬喻而促進迷因形變（Jenkins et al., 2013;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迷因研究亦與政治、廣告及品牌形象相繫，如探索希拉蕊及梅克爾之迷因圖像、政治議題建構；此領域研究歸類貼文標籤、關鍵字、影像內容，並輔以資訊視覺化及數據分析（Nee & Maio, 2019; Xu et al., 2016）。

迷因研究也結合整合行銷，探索策略應用及說服訊息推播，理解消費者體認之產品意涵；常見如探索迷因文本與閱聽人品牌喜好，理解迷因文本「正向」或「負面」表述對消費者態度影響（Meer et al., 2022; Nee & Maio, 2019; Ngo, 2021; Sharma, 2018; Wilson & Unruh, 2011）。

2. 迷因與分析階層

（1）迷因層次

迷因文本分析結合論述分析，聚焦系列創作之相關性、變異性及連續性（Cannizzaro, 2016）。迷因研究著重系列文本異同：部份研究關切共同層次，融入互文線索等分析，或融入符號學觀察，強調迷因映射「語言系統」（langue）恆常結構；部份研究則關切表象「言語」（parole）變異形態，致意迷因文本之基本單位、共時關係及歷時關係（同上引；Johann & Bülow, 2019）。本取徑可結合多種媒材的分析形態，說明符號資源與迷因建構（Grundlingh, 2018; Johann & Bülow, 同上引）。分析階層包括：迷因圖像及影音文本內容、關鍵詞等主題標籤，再進一步探索產製者立場及評述（Dwyer & Fraser, 2016）。

（2）個人特質

迷因學關切使用者特質，如採用消息來源、梗圖改編與傳播；並關注創

作者分享個人見聞，激起閱聽人情感等（Johann & Bülow, 2019）。另有研究結合深度訪談法，探索閱聽人社群參與、創造網路迷因形態（Hapsoro, 2018; Sharma, 2018; Shifman, 2014）。

（3）社會網絡層次

迷因學關注社會網絡，此取徑關切社群網絡與意見領袖，發掘迷因文本之社群表現顯著度；研究範疇包括圖文改編、梗圖傳散、主題標籤註記、轉貼分享等，探索網友社會關係、追隨者多寡等社群位階（Johann & Bülow, 2019; Xu et al., 2016）。

本研究致意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再製，故循既有取徑採多模態文本分析。

3. 迷因與跨媒介敘事

跨媒介敘事研究常關注迷因領域，迷因文本宛若種子，協助閱聽人易於重誦、記憶及參與故事體系（Wilson & Unruh, 2011）；部份專書聚焦互文層次等現象，探索迷因副文本（paratext）、跨文本支線（transtext or transmedia franchise）與跨媒介改編關聯（Johnston & Battis, 2015; Kitchens & Hawk, 2019; Kurtz & Bourdaa, 2016; Skains, 2023）。創作者提取原作文字及圖像迷因元素，再改編迷因為副文本發佈，拓展《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A Song of Ice and Fire I: Game of Thrones*）原著的跨媒介網絡（Johnston & Battis, 同上引）。整體言之，跨媒介敘事研究致意迷因再製議題，創作者可從印象深刻之視覺及文本元素起始，參與共構跨媒介網絡（Kitchens & Hawk, 同上引）。

（二）創作參與中的跨媒介記憶

閱聽人跨媒介記憶涵蓋「類型（typological）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referential inter-texuality），前者如閱聽人對類型公式等體認，後者如相似符碼引動跨文本指涉，激發閱聽人互文聯想（Harvey, 2015; Holthuis, 2010; Lamerichs, 2012）。

以類型互文為例，閱聽人跨媒介記憶含角色、情節及主題等「知識庫」，引用熟悉類型表現而臆測後續情節（Harvey, 2015; Picado & Jacob de Souza,

2018）。

以相互指涉為例，閱聽人依循互文知識而聯想特定用語及典故，擴充故事意涵（Harvey, 2015; Holthuis, 2010）。閱聽人亦可參照特定圖／影像，混搭其他元素而再創作（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如 NBC 電視劇《雙面人魔》（*Hannibal*）為《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前傳，改編自《人魔》（*Hannibal*）等小說系列；主角 Hannibal 酷愛美食常有烹調食物，故重製美食也為劇組拍攝重心（Harris, 2000; McLean, 2015; Poon, 2016）。電視劇美食造型師 Janice Poon 將餐飲設計寫於部落格《美國眾神餐桌：餵食漢尼拔》（*America Gods table: Feeding Hannibal*），並出版食譜《餵食漢尼拔》（*Feeding Hannibal: A Connoisseur's Cookbook*）（Poon, 同上引）。

本劇集也引發網友討論，閱聽人在 PTT 及知乎等討論電視料理食譜；網友逐一截圖、說明烹調步驟及所需食材。[2] 以類型互文言之，網友梳理劇集映演烹調食物流程，並以食譜工具書等類型傳散；以相互指涉互文言之，網友轉述劇情為美食製作流程，參照劇集短影音及圖像而傳散網路迷因。

閱聽人亦可從感官知覺激發其他體驗，如視覺感知引發嗅覺及觸覺想像（Lippitz, 2019）。如 NBC 劇集《雙面人魔》改編同名系列小說，主角 Hannibal 擅長中式料理，劇情提及枸杞、紅棗、人蔘及銀耳熬煮「烏骨雞湯」，融入食補概念（Poon, 2016）。閱聽人可從日常熟知素材起始，依個人生命經歷解讀（如銀耳是否屬甜湯食材）；或因想像力而聯結不同概念（如中藥食補文化、可添加哪些藥膳），重製／變造既有迷因文本。上述轉化歷程涉及熟悉食材，閱聽人需憑藉真實世界之可行食材、烹調器具，對應文學描寫至日常歷時及共時出菜系統。

二、 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

再創作歷程與補白及否定性（negativity）相繫，補白意為閱聽人增補既有文本典故；否定性意謂推翻既有設定、促成文本革新（Harvey, 2015; Lippitz, 2019）。

閱聽人可參照外部互文，引述既有符號元素再創作迷因文本（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如前所述，閱聽人需將抽象文學「視覺化」為

2 相關討論串可參見：知乎用戶（2016 年 1 月 17 日）。〈《漢尼拔》裡面的菜都怎麼做？〉。取自「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11871

料理設計，即為文學意象「賦形」。閱聽人欲復刻《愛麗絲夢遊仙境》下午茶糕點，實可參照「英國文化遺產」（English heritage）YouTube 頻道，內有專題「維多利亞時代生活方式」（The Victorian way）介紹該時期泡茶方式、牛油製作及蛋糕烹調步驟，引介廚娘穿著等民俗（English heritage, 2016, September 23）。閱聽人可將此作為外部互文基礎，即參考影片為「視覺化」文學書寫依據，轉化維多利亞時期文學為具體食品。

閱聽人「否定性」可展現於思辨能力，如改作圖片、影音及經典名句等，或混搭其他元素引發迷因變異（Cannizzaro, 2016; Szczepanik, 2002）。閱聽人可參考其他網友研發食譜，融合文學迷因、飲食偏好與跨文化脈絡，發揮「否定性」改變迷因文本。如西班牙讀者提供《唐吉訶德》（*Don Quixote*）「什錦菜肉燉煮」（olla podrida）食譜，後有網友參考原作對話、17 至 18 世紀飲食習慣，融入「西班牙蛋餅」（tortilla）等豐富菜色，並以木碗呈裝符合彼時風土民情（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2, May 10）。迷因再製者依特定文化脈絡設計料理、裝飾及擺盤，「視覺化」共時出菜系統。閱聽人反思現有文本及組成要素，展現「否定性」推動迷因變異及革新，繼而賦加新義而再造迷因文本。

三、 多模態資源與迷因再製

科技載具提供多模態敘事資源，如討論方法取徑時論及媒介之敘事潛力及限制（Painter et al., 2013）。閱聽人可運用梗圖、網路流行語／慣用語、主題標籤等慣例形式，結合社群媒體流佈／轉載迷因再製文本，引發網路聲量及討論熱度（Dwyer & Fraser, 2016; Grundlingh, 2018）。

迷因文本之多模態結構可包括「靜態圖像」或「混搭圖像」（remixed images），前者如單一圖片、照片、多幅漫畫／劇照集錦等；後者多半附有註釋、經典語句、引言等說明（Grundlingh, 2018）。網路迷因文本多伴隨關鍵詞等「主題標籤」，表明創作者評述及立場，鼓吹特定觀點（Dwyer & Fraser, 2016）。

迷因類型如語言迷因、視覺迷因、音樂迷因（短影音／重複旋律）、混合迷因（composite memes）；如語言迷因含括經典名句、視覺迷因含括「靜態圖像」或「混搭圖像」（含附註照片）、音樂迷因包括重複旋律之短影音（陳家幸，2010；Grundlingh, 2018）。創作者亦可增補主題標籤，運用關鍵詞表

述故事重點，另結合網路熱點而增加迷因傳散（Dwyer & Fraser, 2016）。

四、 跨媒介文本與社群傳散

迷因再製屬「閱聽人導向改編」（audience-driven adaptations），引動跨媒介產業及粉絲社群對話（Fehrle, 2019）。迷因再製多具共享／模仿形式，持續於數位匯流情境流佈、仿效及變形（Johann & Bülow, 2019; Shifman, 2014）。如迷因行銷（meme marketing）植基參與文化，探索網路迷因擴散、市場效益與消費者行為（Meer et al., 2022; Ngo, 2021）。

閱聽人依個人知識起始，融入創見並製作粉絲文本；另可參照社群討論等集體智能，經社群互動、多人創作共構故事體系（Bourdaa, 2016）。閱聽人參與文化之改編基礎含「集體智能」及「個人知識」，前者如閱聽人參照文化知識庫、融合社群構思而集體創作；後者如閱聽人以個人創意製播影音文本，細緻呈現跨媒介故事世界（同上引）。閱聽人若據知識社群（knowledge communities）資訊衍生跨文本支線，此即集體智能開端（Özbölük, 2019）。由於跨媒介網絡屬彈性發展狀態，官方產製者可隨系列文本發展而不斷增設角色及場景；故閱聽人再製迷因文本時亦可參照知識社群共識，建構個人創見、集體智能及官方設定等並存體系（Schober, 2019）。

以迷因文本言之，該領域盼探索迷因文本如何具繁殖力（fecundity）、持續力（longevity）、保真力（fidelity），隨不同議題而形變（Johann & Bülow, 2019; Wang & Wang, 2015）。電視劇《雙面人魔》閱聽人轉述劇集為網路圖文等迷因創作，並於 PTT、知乎及彈幕影音等加註；如嗶哩嗶哩（bilibili）短影音名稱《舌尖上的漢尼拔》即與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互文，結合在地文本、促成迷因形變。[3] 互文體系融合在地美食紀錄片及電視迷因，鞏固《雙面人魔》與美食意象關聯，連動在地情境協助迷因傳散。

以迷因流佈為例，微觀層次（個人決策）、宏觀層次（社群傳散）均可探索：以個人層次言之，該領域盼探索閱聽人創意如何影響迷因再製革新及傳散；以社會網絡言之，該領域關切社群媒體之意見領袖／權力位階高者如何引導輿論方向（Johann & Bülow, 2019; Poore, 2019）。以社群之迷因傳佈為例，閱聽人賞析電視劇《雙面人魔》後傳抄網路食譜，並討論食物隱喻及相

3 影片可參見：阿楚阿離（2019 年 11 月 18 日）。《舌尖上的漢尼拔》。取自「bilibili」https://m.bilibili.com/video/av76183069

關情節，重新回顧官方美食設計概念（McLean, 2015; Poon, 2016）。網友轉述電視劇為食譜後，貼文獲取同意數、瀏覽數及回應數，彰顯社群權力位階及迷因傳散情況。[4] 易言之，閱聽人接觸電視劇美食迷因圖文，可再重溫原作及官方美食圖譜。閱聽人賞析美食迷因之食譜書與網路迷因文本，均鞏固跨媒介支線，引動社群討論熱度。

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乃參照跨媒介記憶，或參照「身體感聯想」轉化迷因元素。閱聽人亦可於社群媒體傳散迷因再製，經再創作引發文本革新，此與補白及否定性相繫。以迷因再製「視覺化」等補白活動言之，閱聽人可依外部互文連結其他知識庫，傳遞個體感知之故事旨趣；或依多模態敘事資源，形塑迷因文本圖文／影音互涉效果，推播相關資訊至社群媒體（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故以迷因再製「否定性」言之，閱聽人可挑戰迷因元素再現形式，如顛覆慣例符碼及公式、翻轉官方設定。

參、方法與案例

本研究盼鎖定閱聽人靜候新劇集（新季）區間，貼近彼時迷因再製生成情境。跨媒介故事體系長期發展，或有若干劇情矛盾，更激發閱聽人再創作動機。如近年研究探索閱聽人跨媒介蒐集資訊歷程，滿足閱聽人預知後續想望（Mikos, 2016; Resuloğlu, 2019）。易言之，閱聽人在劇集空檔或更能積極構連細節、弭合文本未言明處，透過自製文本而再涉入故事。閱聽人靜候下一季劇集時，更易充份發揮補白活動；如融合虛構故事於日常生活，填補等候新一季播映「空窗期」。本研究考量閱聽人靜候新劇集區間之補白活動等特殊性（如急欲消弭懸念），故擬專論閱聽人追劇期間之跨媒介料理的迷因再製。

一、 案例選擇：HBO 電視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迷因再製

電視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簡稱《權力遊戲》）熱播讓 HBO 串流平臺下載率破百萬，如最終季的《權力遊戲》即吸引美國近 1800 萬人觀看，並成為諸多跨媒介產業書籍之分析個案（紀沈廷，2019 年 4 月 16 日；

4　相關討論串可參見：知乎用戶（2016 年 1 月 17 日）。〈《漢尼拔》裡面的菜都怎麼做？〉。取自「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11871

Smith, 2018）。此電視劇集改編自喬治馬汀（George Raymond Richard Martin）小說《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整合原作設定維斯特洛大陸（lands of Westeros）等故事線（Klastrup & Tosca, 2016; Smith, 同上引）。小說為橫跨七國之宏偉史詩，HBO 跨媒介轉述則簡化故事形態，試圖讓閱聽人更易理解奇幻世界；電視劇的拍攝則依關鍵場景分派不同故事線，地點包括克羅埃西亞、西班牙、冰島、摩洛哥及北愛爾蘭，眾多場景已成影像旅行之著名景點（Resuloğlu, 2019; Smith, 同上引）。

電視劇《權力遊戲》衍生電玩及桌遊等官方授權商品，另有粉絲社群及維基百科等非官方之跨媒介支線（Resuloğlu, 2019）。本劇花費近九年才播畢（共推出八季），各季時距平均約一年推出一季，第七季及第八季時距近兩年；另每季可能僅有十集劇作，甚至低於此集數。[5] 小說作者喬治馬汀僅參與前幾季劇集編寫，此讓電視劇結尾未必忠於原作，故閱聽人僅能多方臆測走向。另則喬治馬汀迄今仍未出版小說系列之最終二集，故無「原作」後續發展及結局確定版，註定讓閱聽人翹首久候最終結果（蘇詠智，2017 年 9 月 8 日；Jennings, 2014, June 11）。本劇並無原作結尾供對照，且各季播映間距長、每季播映劇集不多，加上原作者喬治馬汀之小說版長年拖稿，均留給閱聽人眾多劇情補白空間。上述外部環境、文本結構等因素，徒增閱聽人追劇焦慮，此皆彰顯《權力遊戲》個案特殊性。故在本劇熱播八年期間，閱聽人靜候新季劇集時紛紛再創作，提出粉絲理論彌補原作及電視劇間隙，或推出粉絲自製文本（尋夢園，2018 年 11 月 20 日），或為紓緩久候心情之策。

本研究考量 HBO 電視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網路聲量、迷群靜候劇集之補白活動，故以迷因再製為分析案例。下文依既有分析方式探索迷因再製歷程，如何轉化虛構小說食品為跨媒介料理，並再現為網路圖（影）文。

二、 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多模態分析

下文擬先說明分析個案選擇標準，次再說明多模態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DA）指標，探索迷因文本結構及表述旨趣（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

---

5 數據資料出自 Catchplay+（n.d.）網頁紀錄：https://www.catchplay.com/tw/video/021f65f2-1c7d-4ad2-9f7a-9a978e1ac1e0

（一）跨媒介料理文本及個案選擇

本文慮及跨媒介研究待開發方向，也盼對應美食書寫轉化為實體物事，闡釋閱聽人如何還原想像食材。小說《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作者盼讀者宛若活在奇幻場景，故大幅描寫美食以喚起閱聽人感官體驗；作者細緻描寫食物、烹飪方式、香味及味道等，盼閱聽人具體感受各區美食文化（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作者喬治馬汀認為「閱讀」如同旅行般，鼓勵閱聽人放下書本後，仍感知小說裡描述的美食氣味；他認為，感官是引導體驗的關鍵，食物的五感體驗讓場景更鮮活，故致力於角色們的吃食描寫（同上引）。

小說《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29 章〈珊莎〉描寫：

> 菜餚一道道送上端下，有濃稠的大麥鹿肉湯、灑上堅果碎片的涼拌甜菜、菠菜和李子沙拉，還有蜂蜜大蒜煮蝸牛。……接著是剛從河中捕來、封在粘土裡的烤鱒魚。……之後又上了甜麵包、鴿肉餡餅、散發肉桂香氣的烤蘋果、灑滿糖霜的檸檬蛋糕（Martin, 1997 ／譚光磊譯，2011，頁 402）。

此皆可見作者著重飲食書寫，並提供業餘創作者詮釋素材。本研究選擇分析案例標準如下：

其一，個案需敘明典故出處，指出飲食圖文敘事、原作及電視劇關聯，彰顯文本淵源及迷因傳散。

其二，創作者轉化迷因為具體餐飲及部落格書寫，若其後有 HBO 等官方異業合作、或有小說原作者背書尤佳。若迷因再製者轉化迷因時僅複製符徵，則不在分析之列。

其三，迷因再製者必須於一至八季播映時追劇（如敘明發文時間、或於網頁紓發追劇心情等），展現部落格飲食圖文與追劇期間「補白」關聯。若部落格只張貼單篇《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復刻美食，則無以展現閱聽人長年靜候劇集之補白活動，故僅有單篇飲食圖文亦非分析範疇。

網站「十字路口小棧」（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The starving chef、Feast of starlight、Live in kitchen 與 In literature 等再現奇幻小說美食，體現閱聽人多感官涉入、沉浸故事世界歷程。如網站「十字路口小棧」名稱出自小說原作之同名餐館，部落客依小說描寫轉述為網頁食譜圖文，並出版食譜

專書、開餐館販賣美食，且獲小說作者寫序推薦（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6]。本研究共以五個《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書寫之迷因再製部落格為例，分析逾 220 則發表篇章，分析文本如表 1 所示。

表 1：《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迷因再製分析文本

部落格名稱	則數	《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食譜網站特色
Game of Thrones, foods by region –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150 篇	創作者以分區之形式，圖像導向呈現。作者從維斯特洛大陸「北境」到極南「多恩」，分從不同地理環境，對應可行食材。 創作者引用原作文學典故，說明食物設計、靈感來源。 創作者於部落格貼文後，擴寫出版二本食譜，部份美食迷因再製並獲小說原作者背書。
Feast of starlight	33 篇	創作者選取網路熱點，搭配電視劇《權力遊戲》新聞、Emmy award 頒獎典禮前夕等時效。 創作者引用文學典故，展現角色及情節等詮釋。 創作者重視常民實踐。網站敘明製作時間，搭配「資料視覺化」，推出網路食譜等說明製作流程。
In literature	5 篇	作者引述小說原作之美食書寫典故。 作者為還原古早風味，貼近小說原作設定時間，選以 1894 年食譜以製作菜餚。 網站特別敘明，創作者乃因紓發等候新劇集焦慮，故製作跨媒介料理以緩和心境。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31 篇	創作者書寫追劇心情（靜候最後一季），另外也會搭配影集視訊。 創作者曾以家族歷史視角說明設計食物緣由。
Live in kitchen	5 篇	創作者等候及觀看第八季時（從 2019 年 1 月起始），以追劇歷程、電視劇描寫，製作食譜。 創作者以角色為切入點，試以人物特質為題，迷因再製素食食譜。 創作者搭配跨媒介料理之短影音，簡單展現食材分配、製作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多模態分析範疇包括：

1. 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圖（影）文樣貌

隨著 HBO 電視劇《權力遊戲》熱播，創作者也依電視影集呈現食物樣貌，並開設餐館販售美食迷因再製成品（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Monroe-Cassel, 2015）。本研究擬先分析部落格圖像（如視覺符碼、物件並列關係、構圖形式），其次分析文字（如引用小說原典、參照歷史素材等描寫），再對應部落格主敘明再創作考量。

6 網站「十字路口小棧」網址為：http://innatthecrossroads.com

2. 跨媒介料理文本之網友討論

本研究逐一分析網友於上述五個部落格之討論貼文，如部落格讀者依復刻食譜下廚、親赴特定餐廳品嚐迷因再製美食等。部落格讀者親至餐廳享用餐點、或依循網路食譜製作虛構食品；故網路評述或夾雜個人品嚐美食心得，有別於原作及改編劇集之美食設定。易言之，部落格讀者參與也促成迷因流佈，間接引導小說及劇集網路聲量。

3.跨媒介料理文本再現為食譜圖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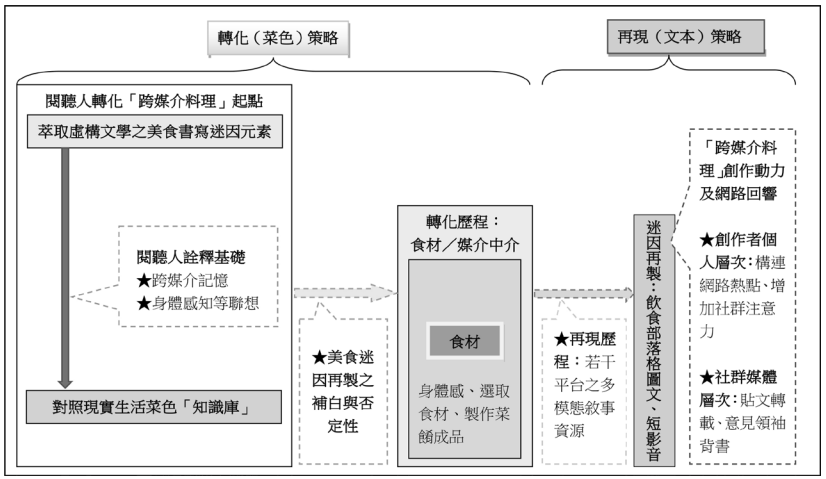
本研究分析範疇如下：其一，本文擬分析食譜圖文書補述資訊，探索迷因再製與原作互文關聯。其二，本文擬對照食譜圖文及原作典故，探索創作者轉化跨媒介料理考量。其三，本文參照食譜圖文書補述，探索創作者對照何種中世紀讀本「具體化」奇幻美食，並將抽象物事臨現於世。其四，本文擬理解創作者如何以現代元素置換中世紀食材，融入現實食物至虛構小說之美食系統。

（二）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多模態分析指標

本研究以多模態文本分析探索迷因再製案例，理解迷因文本再現、詮釋歷程及意義產製（Grundlingh, 2018）。下文擬先說明本研究關切「轉化（食材）」及「再現（文本）」面向，次對應至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多模態分析指標。

以轉化言之，涉及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再論及閱聽人轉化跨媒介料理之交流歷程。以再現言之，涉及閱聽人以多模態資源「再現」迷因再製，網路貼文流佈則論及「跨媒介料理文本與社群傳散」。本研究分析架構圖如圖 2 所示，全圖可略分為「轉化」及「再現」兩者，前者為閱聽人萃取文學美食迷因，再「轉化」抽象文字描寫為具體菜色；後者為閱聽人選取合宜圖文影音媒材，「再現」飲食圖文等迷因再製成品。

圖 2：「文學美食書寫」迷因再製之轉化及再現策略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轉化言之，分析指標包括「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以再現言之，分析指標涵蓋迷因再製之「多模態資源與迷因再製」，最後論及「跨媒介文本與社群傳散」。多模態分析指標如下：

表 2：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之多模態分析類目

一、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
（一）跨媒介記憶 1. 類型互文： (1) 創作者轉述文化迷因時，是否參照特定類型表現？ (2) 創作者轉化原作虛構食材時，是否模仿常見之飲食書寫形式？ 2. 相互指涉互文： (1) 創作者轉述文化迷因時，如何選擇（複製）重要元素？ (2) 創作者為何想選擇特定食物？對應原作情節及地理等描寫為何？
（二）身體感知與聯想 1. 日常素材：創作者轉述文學美食迷因，如何運用日常食材，指涉奇幻故事的美食圖譜？轉化／替換理由為何？ 2. 五感聯想：創作者是否提及原著之飲食描寫，激發何種五感聯想？此種聯想如何引導迷因轉為食材設計？
二、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
（一）迷因與補白活動 1. 創作者轉化文學為具體食物時，補白歷程是否有粉絲理論？如融入閱聽人對角色設定等想像，再現虛構食材？ 2. 創作者如何選擇文史知識等外部資訊而補白？ （二）迷因與否定性 1. 創作者再製迷因文本時，是否翻轉原作設定？ 2. 創作者是否評述及變造其他創作，促使迷因文本革新？

三、多模態資源與迷因再製
1. 創作者再製迷因圖文時，混用何種視覺及聽覺迷因？視覺構圖如何指涉奇幻美食系統（如何藉擺盤、裝飾、燈光等形塑美食體系）？聽覺元素如何輔助視覺呈現？ 2. 創作者再製文化迷因時，動用哪些關鍵詞及標籤？標記內容、評論、情感等？
四、跨媒介文本與社群傳散
（一）個人創意與再創作 1. 迷因創作者展現何種獨有詮釋？ 2. 創作者如何增加社群注意力？ （二）集體智能與再創作 1. 部落格圖文若引發原作者、網友互動，是否影響後續迷因創作？部落格是否引用其他社群媒體內容、超連結？ 2. 部落格圖文曾在詮釋社群廣泛轉貼及討論嗎？ 3. 創作者再製迷因文本，是否曾獲意見領袖背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 分析與討論

一、 創作者的轉化基礎

（一）跨媒介記憶

1. 類型互文

迷因再製者多循故事典故，再塑可對應真實世界之奇幻食品；另模仿食譜書寫慣例公式，敘明配方、份量、作法及貼心叮嚀，並循小說原作「中世紀」設定而指涉歷時系譜（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13）。再如迷因再製者以短文扼要說明作法、烘焙溫度及時間，產製圖像導向、文字簡要之「網路食譜」類型（Feast of starlight, 2016, September 18）。

2.相互指涉互文

迷因再製者選擇食物代言地理環境，發掘小說與現實相似處，另查對特定地域之動植物、歷史、食材分佈，再轉化奇幻文學美食書寫為烹調食譜及餐飲商品（Monroe-Cassel, 2015; Pearson, 2018）。迷因再製者可發掘文學飲食對應小說環境，再尋訪現實世界之相似氣候及地理環境（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4, May 8）。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6, April 21）考量維斯特洛大陸各區飲食習慣（如北方常用百里香、南方多用辣椒），形塑地理空間及虛構美食關聯，參見圖 3 及部落格主分享：

> 我選擇香料時，考量臨冬城與君臨城地理差異，以鼠尾草及百里香代表寒冷北境，再以辣椒粉及紅辣椒片代表溫暖海境王國。

迷因再製也考量工具／技藝易得性，植基於日常脈絡以具體實踐。迷因再製者引述小說原作再製菜色「粘土烤鱒魚」，小說記述土塊包覆鱒魚；部落客考據烤泥魚是古老技藝，或如美國西南部族群曾以陶土包覆魚類烘烤（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June 7）。迷因再製者考量「土塊」取得可能性（工具便利性），故選擇赤陶土盼貼近原作設定（同上引）。若將日常烹調視為共時情境，迷因再製者需考量「工具／技藝易得性」，發揮個人創意突破系統限制、展現能動性。

另外，迷因再製者承接歷時系譜，再現中世紀風味。電視系列劇集鋪陳「分季」時間軸，系列作品之情節、角色設定、歷史脈絡等（Pearson, 2018）。部份迷因再製者配合系列情節變革，選擇創作素材。如部落客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9, April 5）分析，洋蔥易長期保存於黑城堡地窖，應屬人們對抗異鬼的重要守城糧食，故選擇再製「肉汁烤洋蔥」再創作。易言之，迷因再製者可慮及劇集演變，選出代言奇幻地理空間及關鍵情節之象徵食材，「肉汁烤洋蔥」成品如圖 3 所示。

迷因再製者沉浸追劇，故願開發虛構文本之小說／電視美食食譜，結合「食材」談論劇情發展（Feast of starlight, 2016, September 18）。如美食迷因創作者配合角色對話、維斯特洛地理環境，故設計適合北境守夜人攜帶麋鹿肉丸；另則青蔥及大蒜都常見於寒冷北境，也成調製香料首選（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7, July 13）。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參照原作小說指涉之歷史脈絡，還原文學美食指涉歷時關係。

（二）身體感知與聯想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曾使用日常素材，代稱奇幻美食。「十字路口小棧」部落格讀者 Basel Gill 回覆菜色「蜂蜜烤雞」討論串，並以日常脈絡、文史知識為互文線索，進一步質難論辯（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6）：

圖 3：迷因再製者考量區域屬性以轉化成品例圖

資料來源：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6, April 21）

如古羅馬極少產製葡萄，然而部落格創作者以葡萄乾代替部份物料，或許難以呼應地理及食材關係；網友也依日常情境，建議以櫻桃乾等入菜，較貼近小說描寫寒冷北境。易言之，部落格讀者也調整網路迷因文本，並參照文史知識等線索，找尋服膺共時／歷時系統之食材。另外，迷因再製者選擇親民物料，或採納常民熟悉之短影音類型，均助連結「小說虛構美食」與日常生活。部落格讀者也考量日常實踐可能性，重新思辨迷因再製設計。閱聽人提供更便捷可行版本，有助迷因再創、轉傳其他社群，此為迷因長久保存、持續形變等關鍵。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運用「身體感知」等想像，方能轉化奇幻文學飲食書寫為具體食品。迷因再製者引述小說《劍刃風暴》（*Storm of Swords*）典故，主角於多斯尼克平原帶回山羊及蔬果，並塗上蜂蜜以甘草烤肉；迷因再製者推出菜色「山羊與火莢、甜草和蜂蜜」，聯想多斯尼克族（游牧民族）飲食習慣、參照小說設定游牧原型，感知宛若聞到馬汗味、微風吹拂帳篷等氛圍（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7）。易言之，迷因再製者參照知識體系（如游牧民族之生活起居、飲食習慣），形塑迷因文本引發身體感聯想，成為持續沉浸虛構世界之再創作動力。

二、 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

（一）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視覺化」的努力

迷因再製者考量角色之地理環境、社經地位及飲食偏好，作為「視覺化」等補白基礎。美食迷因再製者引自小說《與龍共舞》（*Dances with Dragon*）對話，推出「與瓊恩史諾共進早餐」主題；具體菜色承自原典，包括黑布丁、香腸、培根、鴨蛋和黑啤酒（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October 11）。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考量角色位居寒冷「北境」需更多熱量，故以酒類適時補充體力，參照長城及北方風味之美食體系（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對應角色生命歷程、所處地區及關鍵故事，挑選對應媒材呈現。迷因再製者賦予奇幻食品「視覺」及「觸覺」等身體感聯想，運用食材展現文史詮釋。

以角色社經地位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參照奇幻國度首都君臨城宴席，熱門菜色如鴿肉餡餅、肉桂烤蘋果、撒滿糖霜的檸檬蛋糕，故設計甜點「莎珊的檸檬蛋糕」（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跨媒介料理創作者烘焙檸檬蛋糕時，參考 1591 年及 1615 年食譜，貼近小說「中世紀」飲食設定；迷因再製者也參照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甜點，點心狀如中世紀圓盾，呼應「古風甜點」基調（同上引 ;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11），復刻版料理如圖 4。

> 我參考伊麗莎白時期的食譜，烹製濃郁檸檬罌粟籽蛋糕……食譜出自 1951 年 A. W. 烹飪書籍，另也參考 1615 年 Gervase Markham 撰述的英國烹飪資訊。圓形蛋糕樣貌如同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所述，如同中世紀圓形盾牌。

閱聽人同理虛構角色際遇，逐步建構特定角色「知識庫」（Freeman, 2016; Tosca & Klastrup, 2018）。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引用《劍刃風暴》典故，說明龍后品嚐菜色「羊肉佐葡萄乾」，並搭配浸在酒裡的沙拉，她同時追憶：坦格里安家族、維斯特洛「征服者」伊耿、兄長雷加參與戰爭後，是否感覺疲倦（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17）。美食迷因再製者以特定食物聯結角色回憶，如參照小說典故、古羅馬食譜原稿，放置葡萄乾、歐洲配菜及配料（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同上引）。

圖 4：迷因再製者仿造中世紀食譜「復刻」成品例圖

資料來源：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2011, April 11）

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建構古味飲食及角色記憶等關聯，形塑角色與迷因再製等衛星支線。

本研究亦發現，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參照文史知識而「視覺化」成品，展現補白活動。迷因再製者可參酌故事設定原型，整合既有知識體系而再造迷因；如「十字路口小棧」食譜創作者肯定小說《權力遊戲》以中世紀原型，故飲食基調多參考彼時風味（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Rutledge, 2019）。跨媒介料理創作者盼貼近小說原作設定，故重塑歷史美食以服膺故事旨趣；如找尋十四及十五世紀食譜，重製中世紀糕點麵糰（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22, 2011, June 30）。或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設計「熊老的燙酒」及「酒烹梨」，引用小說典故、十四世紀食譜配方，故在燙酒加入葡萄乾、蔓越莓與杏仁，再現中世紀作法（Monroe-Cassel & Lehrer, 同上引）。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可結合文史知識、原典基調，找尋貼近小說時空之現實食材。

（二）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革新文本

1. 創作者翻轉原作設定

迷因再製者行動需鑲嵌於符合食材易得性等「系統條件」，方能轉化虛構文學勾勒想像料理至日常烹調情境。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考量「鴿肉」為君臨城慶典之代表食物（如國王婚宴有鴿肉派），再如鴿子也是維斯特洛大陸重要肉品來源，故推出菜色「君臨城鴿肉派」（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6, April 19）。由於現實生活難尋獲鴿肉，故迷因再製者以雞肉代替「鴿肉派」食材（同上引）。此為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混搭原作設定，考量系統條件限制（食材易得性），彰顯個人創意等能動性。

2.創作者評述及變造其他創作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引用小說典故，說明侍從為龍后帶來「血派」等糕點；如發掘蒙古餡餅（khuushuur）內餡為馬肉與羊肉，推出傳統蒙古血派食譜（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2, June 28）。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融入蒙古飲食想像及評述，如搭配蒙古奶茶以品嚐餡餅，彰顯個人想像、文化脈絡與迷因變造等可能性（同上引）。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可依文史脈絡、當代飲食習慣，力求貼近小說指涉時空脈絡，也變造舊有迷因。部落客引用小說原典，說明蜂蜜蛋糕口感濃郁；另參考「伊麗莎白時期」蜂蜜蛋糕食譜，但製作成品更像薄餅（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2, May 31）。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雖用蜂蜜浸泡成品，但難以突出濃郁風味；故創作者改造中世紀版本，先填裝蜂蜜於蛋糕，盼成品貼近現代風味（同上引）。易言之，閱聽人以身體感為基礎，聯想奇幻文學之美食滋味，並考量食材及烹調器具等可行度，方能成功轉化文學描寫為真實菜色。

三、 創作者使用「多模態資源」再現文本

閱聽人需再現菜餚製作歷程為部落格圖文、食譜類型，下文擬分析跨媒介料理貼文之多模態結構。

以單幅結構為例，創作者結合網路熱點，構連小說、劇集及迷因再製之故事體系（Feast of starlight, 2016, April 23）。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藉「飲食配件及佈景」指涉故事體系，安排各地美食與道具風格；如首都君臨城食物常搭配金箔製品，長城守夜人飲食佈景常搭配粗麻布（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以文本並存多幅敘事言之，敘事者可藉多幅圖像表意，鋪陳故事發展時序及因果關係（Freeman, 2016; Rutledge, 2019）。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引述系列小說《列王的紛爭》（*A Clash of Kings*）典故，要角布蘭妮盯著培根鱒魚捲等晚餐並思索要事；迷因再製者說明追劇心境，並引用文學典故闡述菜色設計之靈感來源（Feast of starlight, 2017, August 25）：

> 布蘭妮看著晚餐，培根鱒魚捲、青菜甜草沙拉、豌豆、洋蔥與熱麵包。她一一吃著，如同晚餐爲待完成之困難任務。」（語出小說）……我等不及周日上映了，很興奮但也憂心，不知本季最終結局爲何。如果結局與上周日播映相似，我們處在極端高低落差的心境（譯文括號爲本研究所加）。

若單以影像部份為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以「光之神」紅衣女郎為發想起點，推出菜色「紅衣女郎的瑣事」；另有短影音呈現料理素材為紅色餅皮，並以紅布襯托糕點代言角色屬性（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6, April 27）。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以短影音呈現料理製作步驟，並以字幕說明配方份量，再輔以旁白及配樂烘托氣氛（The starving chef, 2016, April 18）。易言之，閱聽人整合不同圖文設計、系列小說及影集元素，再創作文本而成參與者（Wolf, 2018）。

四、 迷因再製動力及網路迴響

（一）跨媒介文本與敘事者創意

1. 閱聽人「身體感知導向」與再現美食意象

跨媒介敘事者「視覺化」及「聽覺化」文學描寫，具體化為圖文／影音等感官細節；另藉「互動化」設計，讓閱聽人接觸配件及道具，增加閱聽人

參與故事權限（Wolf, 2018）。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之食譜專書，提供閱聽人互動模板、手作參與契機；美食迷因創作者引用小說《列王的紛爭》奶油天鵝典故，並「視覺化」天鵝形貌模板，方便閱聽人描繪天鵝底座、翅膀和長頸（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故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多顧及網友能操作之家常層次，增加迷因網路傳散潛力。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可與正式組織合作而共構商品，形塑衛星支線以拓展跨媒介網絡（Barrett, 2019; Woodworth, 2018）。飲食部落客觀賞 HBO 第四季電視劇，發現劇組復刻「皇家婚禮」杏仁蛋糕；部落客並請益組內家庭經濟學家 Karyn Booth，進一步研發相關產品（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4, April 22）：

> 我在第四季劇集看到這些小甜點，便想動手製作。我聯繫劇集「家庭經濟學家」Karyn Booth，她提到甜點是磨碎杏仁製成，材質如同杏仁軟糖。

圖 5：迷因再製者轉化美食迷因「迷你杏仁蛋糕」例圖

資料來源：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2014, April 22）

易言之，迷因再製者增加互動導向，且考量常民易操作等形態。

2. 個人抓取「網路熱點」及「跨媒介料理創作」傳散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配合艾美獎等網路熱點，增加貼文社群平臺之流佈度。如飲食部落客搭配「艾美獎」熱潮，預測 HBO 劇集得獎趨勢、主角獲獎人選（Feast of starlight, 2016, September 18）。或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於各季劇集「空窗期」，推出美食設計。飲食部落客若有懸念，或以撰寫食譜及作菜紓解焦急情緒。迷因再製者掛念主角冒險歷程、去向及能否存活，故於第六季首播前十天密集製作跨媒介食品「艾莉亞的水果起司塔」，並搭配原作描述以紓緩懸念（Feast of starlight, 2015, June 4）：

> 主角艾莉亞從廚房偷走剛烤好甜點，點心填滿堅果、水果和乳酪且猶有餘溫；艾莉亞赤腳輕聲走路、低聲歌唱，感覺自己宛如幽靈。

易言之，電視劇集分季呈現，提供迷群參與空間，回味先前劇集以填補故事間隙。迷因再製者盼於首映前夕多發佈《權力的遊戲》食譜，並願重返原作、逐步搜尋原典刻劃跨媒介料理（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13）。迷因再製者藉美食設計以安撫懸念，動員身體感想像及實踐，緩解靜候劇集焦急感。

本研究亦發現，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配合最終季播映與熱門片段，展現個人創意及身體感詮釋。飲食部落客參照電視劇集迷因，女王瑟曦利用君臨城地底野火炸毀若干建築，並對照 HBO 電視劇第八季首映會線索，選以野火主題製作「野火鱷梨醬」；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剪輯劇集若干野火片段，並提及野火與青椒均綠色、「火辣」意象相連，故以青椒代言野火象徵（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14）。

HBO 劇集第七季大反派「夜王」率領異鬼攻破長城，揮兵臨冬城。電視迷因成迷因再製者補白及再詮釋素材，飲食部落客好奇夜王南下動機、異鬼回歸之謎；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分析「長城守夜人」抵抗異鬼南下之重要，並想像北境經典菜色「奶油蘿蔔」與長期抗戰關係（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3）。如蘿蔔等根莖類較易保存，燉煮後如同奶油般柔軟，故為北境常用食材（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易言之，庶民

創作者面對多季電視劇集「故事間隙」，或將懸念及補白歷程轉為創造跨媒介料理文本動力。或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根植於日常經驗，配合各季電視劇集情節演進，萃取文化迷因成創作動力。故跨媒介料理再現及具體化，實為閱聽人追劇及補白之日常實踐，塑造迷因展演舞臺。

（二）跨媒介文本與集體智能

1. 社群轉載與網路討論

網路迷因多為集體共構，歷經多重轉述／改作，故難確認「誰」是原作者（Cannizzaro, 2016）。飲食部落客引述小說《與龍共舞》典故，推出菜色「母雞佐以栗子、胡蘿蔔及李子」（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June 20）。網友 studno5 對照個人生命經驗，回覆菜色「母雞佐以栗子、胡蘿蔔及李子」討論串，指出部落客乃以「烏骨雞」重新詮釋食材；並提供更貼合中國語境、補品脈絡，如加入枸杞、甘草等配料等亞洲吃法（同上引）。閱聽人融入不同文化及族群詮釋，展現迷因再製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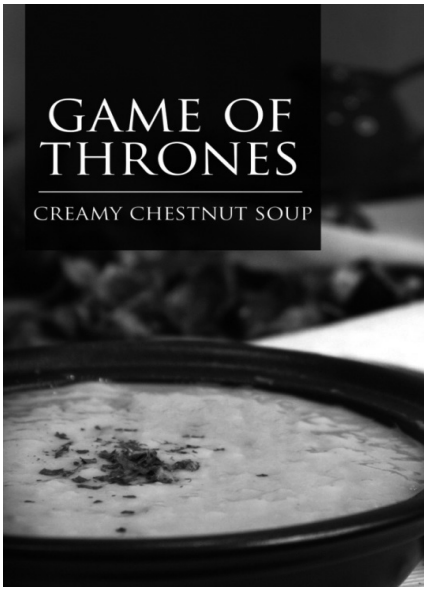
再如網友 John 針對迷因再製菜色「白豆培根」，對應食物流傳史而提出菜色選用見解；若《權力的遊戲》小說原型乃再現玫瑰戰爭，對照當時食物傳佈史，迷因再製者應選鷹嘴豆或青豆；或從歐洲飲食史推算，混煮豌豆與培根具長遠歷史，呼應小說原典旨趣（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22）。易言之，閱聽人可加入文史知識，並思辨及討論網路迷因再製文本，賦予新概念及詮釋。

再如迷因再製者引述小說《列王的紛爭》情節，描述女王瑟曦擺設宴席，享用奶油栗子湯、鰻派、烤天鵝；迷因再製者考量小說雖屬虛構時空，但評述原典設定趨於「中世紀」，故調整 1894 年栗子湯食譜而形塑新版飲食圖文迷因（In literature, 2017, August 10）：

> 「瑟曦眼前擺放滿桌佳餚，前菜是奶油栗子湯、硬皮麵包、蔬菜佐蘋果及松子蔬菜，再來有鰻魚派、蜂蜜火腿、奶油蘿蔔、白豆培根，還有烤天鵝填滿蘑菇和牡蠣。」（語出文學典故）……總有書籍能助我理解食物描寫……因爲《權力遊戲》設定於另一世界……有人建議可參考中世紀料理爲基礎，因此我盡力找到最古早的 1894 年栗子湯食譜，希望此食譜近似瑟曦世界的料理（譯文括

號爲本研究所加）。

圖 6：迷因再製者「復刻」古時湯品例圖



資料來源：In literature（2017, August 10）

若干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沉浸劇集甚深，故製作食物弭補內心等候焦慮及不確定感（In literature, 2017, August 10）。飲食部落客提及君臨城貧民窟燉菜「棕大碗」，並簡述原典設定，如菜餚常混雜首府常見鴿肉及根莖蔬菜；迷因再製者也想像化身首都攤販等故事角色，盼讓更多首府居民享用新菜式（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7, July 16）：

> 「我們會假裝『棕大碗』裝著雞肉，但我們心知肚明並非雞肉。」（本段出自文學典故）……君臨城的窮人吃的「棕大碗」呈裝爲貓肉與鴿肉，少有雞肉或牛肉。它是長時間燉肉的稀湯。……我們在現實世界當然不需抓貓或鴿子來做「棕大碗」……我燉一小時的菜餚，確認大麥鬆軟，裝入木碗後搭配硬麵包上菜。我相信，若在君臨城販賣這道菜，人們會湧向我的小攤來品嚐美味燉菜（譯文括號爲本研究所加）。

再如網友回覆迷因再製食譜討論串（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6, 2011, April 15），提出多種食材替代可能性，展現個人近用日常素材與集體創作潛力。若以小說、劇集及跨媒介料理言之，詮釋社群藉日常物事貼近／沉浸奇幻體系，運用食材銜接虛實相合之跨媒介體系。

圖 7：迷因再製者轉化美食迷因「棕大碗」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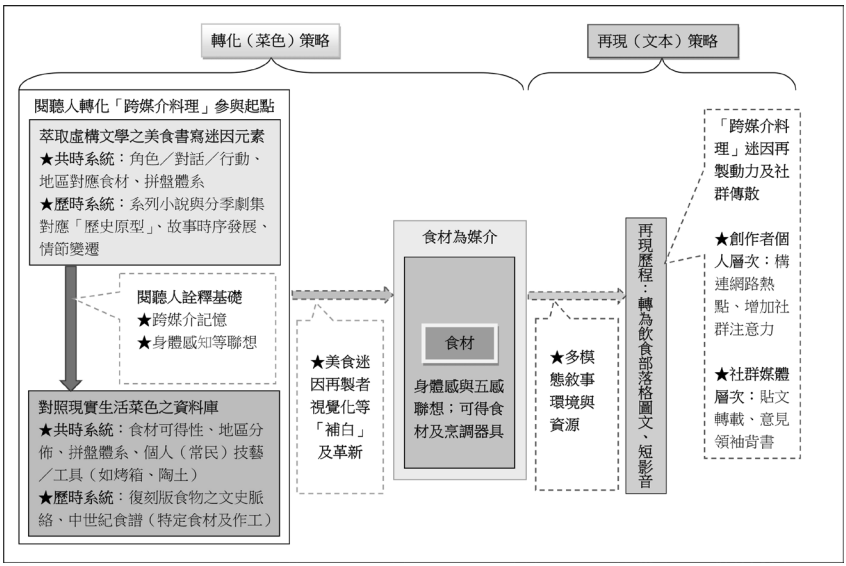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7, July 16）

2. 文本創作與意見領袖

參與者個人特質及社會網絡影響後續迷因傳散，如追隨者多少等即為社會網絡評估標準（Johann & Bülow, 2019）。若小說原作者肯定跨媒介料理成品，可增加迷因傳散、建立意見領袖位階。網友 Nuchtchas 及 Professor 等人於「十字路口小棧」部落格討論串表示，他們在原作者喬治馬汀網頁點選推薦連結，故瀏覽迷因再製之食譜圖文並留言肯定（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21）。本研究認為，意見領袖等高度社群能見度者背書，增強訊息可信度、小說讀者關注，加速迷因再製成品／品牌知名度。「十字路口小棧」推出《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迷因再製餐點後，隨喬治馬汀稱

許增加社群曝光率，此皆可彰顯意見領袖與社群認同效力。易言之，虛構小說原作者可為迷因再製之意見領袖，並為網路社群／粉絲族群之位階高者。若有原作者背書可引導網路迷因傳散，連動影響迷因再製者之社群地位、迷因流佈速度。

圖 8：文學美食迷因再製轉化「跨媒介料理」及再現策略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一則致意跨媒介敘事「迷因再製」等衛星支線功能，二則致意新興跨媒介料理領域，三則致意身體感。本研究闡釋《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文學美食迷因再製之轉化及再現策略，論及文學美食迷因先過渡為食材，其後再現為跨媒介料理之網路圖（影）文。本文以多模態分析闡釋「十字路口小棧」等部落格圖文，探索迷因再製者如何轉化虛構物事為具體食材，並梳理迷因再製者參照之歷時與共時系統。

（一）轉化層次

研究發現，文學美食迷因再製需經「轉化」及「再現」層次。「轉化（食材）歷程」涉及兩層次：其一，閱聽人轉化文學典故「美食書寫」為具體食品，可依身體感等聯想，轉化虛構描寫為真實菜色。迷因再製者融合原作小說、電視劇奇幻地景，並吸納通俗文化為跨媒介記憶；閱聽人並結合身體感聯想，萃取「文學美食書寫」迷因元素並加以轉化。

閱聽人轉化跨媒介料理之交流歷程，即以食材／媒介中介展現想像成品，銜接虛構文學與日常體系。由於原作者從未品嚐虛構美食，故迷因再製者需從身體感及文學詮釋，勾勒想像物事以貼近原作書寫。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挑選對應食材時，可參酌互文線索以補白，或融入個人評述／思辨展現「否定性」。以視覺化等「補白」言之，閱聽人製作迷因再製需「互文參照」史地元素（Johann & Bülow, 2019）。如《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原作曾描寫君臨城美食「檸檬蛋糕」，此為該書要角珊莎喜愛甜點；部落格「十字路口小棧」創作群考量原著範型來自中世紀，故參閱彼時食譜而製作「伊麗莎白時代」檸檬蛋糕（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可溯及原典描寫「共時系統」，也可溯及小說指涉時空原型等「歷時系統」。

以文本革新言之，閱聽人可翻轉官方設定而變造／革新既有文化迷因。如美食迷因再製者雖以中世紀食譜為軸，但若發現中世紀香料等難尋覓素材，故以日常熟知材料替代（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此即迷因再製者考量食材／媒介限制，翻轉官方文本設定，讓迷因再製文本貼近日常生活實踐。

（二）再現層次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需選用網路圖（影）文等結構，再現迷因再製成品。以個人創意言之，跨媒介料理具文化傳遞基因，但也允許閱聽人融入創見與變更。即便如網友個人點閱《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迷因再製貼文，或參照食材易得性、在地飲食習慣等，發揮個人創見以革新迷因文本。

以集體智能言之，閱聽人亦可整合社群之力共構跨媒介地景（Özbölük, 2019）。閱聽人若貼出跨媒介料理之網路圖文，或引來留言討論（網友建議應增補或置換食材），此屬集體智能展現。跨媒介料理者供網友釘選迷因再

製筆記，供追隨者訂閱、或在 flickr 等社群媒體流傳。再如跨媒介料理部落格及食譜專書等，獲得小說作者推薦及社群轉載，促成業餘創作協力迷因傳散。迷因再製者融入網路熱點、增高詮釋社群位階，均有助於閱聽人留意跨媒介料理而願參與跨媒介網絡。

二、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一）建議：迷因行銷趨動之故事產業

近年如迷因趨動之社群媒體宣傳，擴大故事品牌之討論熱度，也為大數據後臺分析與跨媒介研究之發展重心（賴玉釵，出版中）。迷因行銷在數位匯流時期更顯興盛，產製者散播梗圖等文本，供閱聽人擬仿或再創造相關特徵（Meer et al., 2022; Ngo, 2021）。易言之，迷因行銷引動網路聲量、閱聽人消費行為，益於故事品牌經營。本研究建議，日後可闡釋迷因再製、迷因行銷及故事品牌關聯。

（二）反思：身體感與跨媒介素養實踐

身體感學理闡釋媒介生態提供特殊機緣（affordances），引發閱聽人感知及後續行動（Varela et al, 2017）。本研究略述「眼耳鼻舌身」等閱聽人根器，另轉化歷程涉及「色聲香味觸」等想像，致意身體感轉向研究（余舜德，2008，2016）。後續研究可反思跨媒介素養實與多模態技藝，如何結合身體感、媒介載體及多模態資源（媒材），塑造更貼近人性之敘事設計（Ellingson, 2017; Tárcia, 2018）。

參考文獻

余舜德主編（2008）。《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

_____（2016）。《身體感的轉向》。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政忠（2021）。《電玩遊戲改編電影整合接收模式與 Q 方法的應用分析：電玩改編電影《返校》個案探討》（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MOST109-2410-H194-010）。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知乎用戶（2016 年 1 月 17 日）。〈《漢尼拔》裡面的菜都怎麼做？〉。取自「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11871

阿楚阿離（2019 年 11 月 18 日）。《舌尖上的漢尼拔》。取自「bilibili」https://m.bilibili.com/video/av76183069

紀沈廷（2019 年 4 月 16 日）。〈「龍后」發威！《權力遊戲》最終季上檔助攻 HBO NOW 破百萬下載〉，《匯流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取自 https://cnews.com.tw/140190416a03/

陳家幸（2010）。《網際網路知識傳輸型態之文化基因論分析及其對於英語教學的蘊義》。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

尋夢園（2018 年 11 月 20 日）。〈權遊理論：布蘭和夜王可能是同一個人，燒腦了吧〉，《尋夢娛樂》。上網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取自 https://ek21.com/news/star/17796/

賴玉釵（出版中）。〈在地視角之跨媒介敘事、文創產業與媒介生態體系：評介《數位時代之東亞跨媒介敘事》〉。《新聞學研究》。

譚光磊譯（2011）。《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高寶。（原書 Martin, G. R. R. [1997]. *A song of ice and fire: A game of thrones.* Bantam Spectra.）

蘇詠智（2017 年 9 月 8 日）。〈「冰與火之歌」到底是原著好還是影集好？〉，《聯合報》。上網日期：2022 年 11 月 29 日，取自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3/2690612

Catchplay+（n.d.）。《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取自「Catchplay+」https://www.catchplay.com/tw/video/021f65f2-1c7d-4ad2-9f7a-9a978e1ac1e0

LEE, J.（2020 年 8 月 12 日）。〈《哈利波特》20 週年繁體中文紀念版正式發售！封面融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設計元素、書背暗藏 7 集畫面彩蛋〉，《哈潑時尚》。上網日期：2022 年 11 月 28 日，取自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lifestyle/g33579715/20th-

anniversary-harry-potter-chinese-edition/

Barrett, K. (2019). A micro-budget approach to transmedia in small nations.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419-428). Routledge.

Bourdaa, M. (2016). "I and not a tribute" : The transmedia strategy of The Hunter Games versus fan activism. In B. W. L. D. Kurtz, & M, Bourdaa (Eds.), *The rise of transtex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p. 90-103). Routledge.

Cannizzaro, S. (2016). Internet memes as internet signs: A semiotic view of digital culture. *Sign Systems Studies, 44*(4), 562-586.

Danesi, M. (2019). *Memes and the future of pop culture.* Brill.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ret, C. (2019). Transfictionality, thetic space, and doctrinal transtexts: The procedural expansion of Gor in Second life's gorean role-playing games. In M. Fuchs & J. Thoss (Eds.), *Intermedia games-games inter media: Video games and intermediality* (pp. 249-270). Bloomsbury.

Dwyer, R., & Fraser, S. (2016). Addicting via hashtags: How is twitter making addiction? *Contemporary Drug Problems, 43*(1), 79-97.

Ellingson, L. L. (2017). *Embodimen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outledge.

English heritage. (2016, September 23). How to make a cup of tea - The Victorian way.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p7uciURYjvI

Feast of starlight. (2015, June 4). Game of Thrones: Arya's fruit and cheese tart. *Feast of Starlight.*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www.feastofstarlight.com/game-of-thrones-aryas-fruit-and-cheese-tart/

_____ (2016, April 23). Game of Thrones: Bread centerpiece. *Feast of Starlight.*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www.feastofstarlight.com/game-thrones-bread-decoration/

_____ (2016, September 18). Game of Thrones: Pigeon pie. *Feast of Starlight.*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www.feastofstarlight.com/game-thrones-pigeon-pie/

_____ (2017, August 25). Game of Thrones: Bacon wrapped trout. *Feast*

of Starlight.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www.feastofstarlight.com/game-thrones-bacon-wrapped-trout/

Fehrle, J. (2019). Introduction: Adaptation in a convergence environment. In J. Fehrle & W. Schäfke-Zell (Eds.), *Adapt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pp. 7-30).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Flanagan, M., Mckenny, M., & Livingstone, A. (2016). *The Marvel Studios phenomenon: Inside a transmedia universe.* Bloomsbury.

Freeman, M. (2016). *Historicising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ransmedia story worlds.* Routeldge.

Gibbons, A. (2017). Reading S. across media: Transmedia storyworlds, multimodal fiction, and real readers. *Narrative, 25*(3), 321-341.

Grundlingh, L. (2018). Memes as speech acts. *Social Semiotics, 28*(2), 147-168.

Hapsoro, L. S. (2018). *Beyond the "lulz": Audience engagement with political memes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und University.

Harris, T. (2000). *Hannibal.* Dell.

Harvey, C. B. (2015). *Fantastic transmedia: Narrative, play and memory across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storyworlds.* Palgrave Macmillan.

Holthuis, S. (2010). Intertextuality and meaning constitution. In J. S. Petöfi & T. Olivi (Eds.), *Approaches to poetry: Some aspects of textuality,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pp. 77-93). Palgrave Macmillan.

In literature. (2017, August 10). A Clash of Kings, Game of Thrones: Creamy hestnut Soup. *In literature*.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literature.net/food-in-literature/main-meals/soup/2017/08/a-clash-of-kings-game-of-thrones-creamy-chestnut-soup.html

Jenkins, H., Ford, S., & Green, J. (2013). *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ennings, D. (2014, June 11). George R. R. Martin wants more 'Game of Thrones,' too.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22,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4/06/15/arts/television/george-r-r-martin-wants-more-game-of-thrones-too.html

Johann, M., & Bülow, L. (2019). One does not simply create a meme:

Conditions for the diffusion of internet me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1720-1742.

Johnston, S., & Battis, J. (Eds.). (2015). *Mastering the Game of Thrones: Essays on George R.R. Martin's - A Song of Ice and Fire.* McFarland & Company.

Kérchy, A. (2016). *Alice in transmedia wonderland: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new forms of a children's classic*. McFarland.

_____ (2018). Transmedia commodification: Disneyfication, magical objects, and Beauty and the Beast.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223-232). Routledge.

Kitchens, J. C., & Hawk, J. L. (Eds.). (2019). *Transmediating the whedonverse(s): Essays on texts, paratexts, and metatexts.* Palgrave Macmillan.

Klastrup, L., & Tosca, S. (2016). The networked reception of transmedial universes: An experience-centered approach. *Medie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60), 107-122.

Kurtz, B. W. L. D., & Bourdaa, M. (2016).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transtexts are rising. In B. W. L. D. Kurtz, & M, Bourdaa (Eds.), *The rise of transtex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p. 1-11). Routledge.

Lamerichs, N. (2012). Holmes abroad: Dutch fans interpret the famous detective. In L. E. Stein & K. Busse (Eds.), *Sherlock and transmedia fandom: Essays on the BBC series* (pp. 179-193). McFarland.

Lippitz, A. (2019). Lost in the Static? Comics in video games. In M. Fuchs & J. Thoss (Eds.), *Intermedia games—games inter media: Video games and intermediality* (pp. 115-132). Bloomsbury.

McLean, J. (2015). *The art and making of Hannibal: The television series.* Titan Books.

Meer, A. S., Khan, R. A., & Kanwal, S. (2022). Meme marketing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A study of active social media users.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59*(3), 216-223.

Mikos, L. (2016). Television drama series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n an era of convergence. *Northern Lights: Film & Media Studies Yearbook, 14*(1), 47-64.

Monroe-Cassel, C., & Lehrer, S. (2012). *A feast of ice and fire: The official companion cookbook.* Bantam Books.

Monroe-Cassel, C. (2015). *From the sands of Dorne: A feast of ice & fire companion cookbook.* Bantam Books.

Nee, R. C., & Maio, M. D. (2019). A 'presidential look'? An analysis of gender framing in 2016 persuasive memes of Hillary Clint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3*(2), 304-321.

Ngo, T. M. (2021). *Meme marketing: How viral marketing adapts to the internet culture.* Unpublished honors program theses,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Özbölük, T. (2019). The marketer as storyteller: Transmedia marketing in a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R. Yilmaz, M. N. Erdem & F. Resuloğlu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pp. 310-330).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Painter, C., Martin, J. R., & Unsworth, L. (2013).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Equinox.

Park, J. H., Lee, J., & Lee., Y. (2019). Do webtoon-based TV dramas represent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ndustrial factors leading to webtoon-based TV dram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2179-2198.

Pearson, R. (2018). Transmedia characters: Additionality and cohesion in transfictional heroes.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148-156). Routledge.

Picado, B., & Jacob de Souza, M. C. (2018). Dimensions of authorship and style in television serial fiction formats. *MATRIZes, 12*(2), 53-77.

Poon, J. (2016). *Feeding Hannibal: A connoisseur's cookbook*. Titan Books.

Poore, B. (2019).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Viewers, the media, and Sherlock's lead writers. In J. Fehrle & W. Schäfke-Zell (Eds.), *Adapt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pp. 133-158).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Resuloğlu, F. (2019). A song of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 case study on Game of Thrones TV series. In R. Yilmaz, M. N. Erdem & F. Resuloğlu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pp. 72-90).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Roberts, S. (2022). *The power of not thinking: How our bodies learn and why we should trust the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Rutledge, P. (2019). Transmedia psychology: Creating compelling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350-363). Routledge.

Sánchez-Olmos, C., & Viñuela, E. (2017). The musicless music video as a spreadable meme video: Format, user interaction, and meaning on YouTub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3634-3654.

Schober, R. (2019). Adaptation as connection: A network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participation, and co-production. In J. Fehrle & W. Schäfke-Zell (Eds.), *Adapt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pp. 31-56).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hahani, G. S. (Ed.). (2018). *Food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rma, H. (2018).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and their role in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A study in India.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9*(3), 303-331.

Shifman, L. (2014).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MIT Press.

Skains, R. L. (2023). *Never ending stories: The popular emergence of digital fiction.* Bloomsbury Academic.

Smith, A. N. (2018). *Storytelling industries: Narrative produ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Solomon, C. (2017). *Tales as old as time: The art and making of Beauty and the Beast.* Disney Editions.

Szczepanik, P. (2002). Intermediality and (inter)media reflexivity in Contemporary Cinema. *Convergence, 8*(4), 29-36.

Tárcia, L. P. T. (2018). Transmedia education: Changing the learning landscape.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314-322). Routledge.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6). Honeyed chicken.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honeyed-chicken/

_____ (2011, April 7). Goat with sweetgrass, firepods, and honey.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goat-with-sweetgrass-firepods-and-honey/

_____ (2011, April 11). Lemon cakes, part 2.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lemon-cakes-part-2/

_____ (2011, April 15). Breakfast at Winterfell.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breakfast-at-winterfell/

_____ (2011, April 17). Mereneese Lamb with salad of raisins and carrots, hot flaky bread.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mereneese-lamb-with-salad-of-raisins-and-carrots-hot-flaky-bread/

_____ (2011, April 21). Potted hare.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potted-hare/

_____ (2011, April 22). White beans and bacon.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white-beans-and-bacon/

_____. (2011, June 7). Trout baked in clay.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trout-baked-in-clay/

_____. (2011, June 20). Hen Stuffed w/chestnuts, carrots, and prunes.*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hen-stuffed-wcarrots-chestnuts-and-prunes/

_____ (2011, June 30). Modern fruit tarts.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modern-fruit-tarts/

_____ (2011, October 11). Breakfast with Jon Snow.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breakfast-with-jon-snow/

_____ (2012, May 10). Olla Podrida: Don Quixote, 1655.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www.

innatthecrossroads.com/olla-podrida-don-quixote-1655/

_____ (2012, May 31). Honeycakes.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honeycakes/

_____ (2012, June 28). Dothraki blood pie.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dothraki-blood-pie/

_____ (2014, April 22). Mini marzipan cakes, from the show.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mini-marzipan-cakes-show/

_____ (2014, May 8). Walnut pie.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natthecrossroads.com/walnut-pie/

The starving chef. (2016, April 18). The red woman's trifle Game of Thrones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Retrieved April 10, 2023, from https://youtu.be/-9vI0V5lFj0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6, April 19). Pigeon pie from King's Landing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6/04/pigeon-pie-from-kings-landing-game-of.html

_____ (2016, April 21). Baratheon boar ribs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6/04/baratheon-boar-ribs-game-of-thrones.html

_____ (2016, April 27). The red woman's trifle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6/04/the-red-womans-trifle-game-of-thrones.html

_____ (2017, July 13). Oysters, clams & cockles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7/07/oysters-clams-

cockles-game-of-thrones-recipes.html

_____ (2017, July 16). Gendry's bowl o' brown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7/07/beef-barley-soup-game-of-thrones-recipes.html

_____ (2019, April 3). Lord commander's buttered turnips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9/04/the-lord-commanders-buttered-turnips-game-of-thrones-recipes.html

_____ (2019, April 5). Ser Davos' roasted onions in gravy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9/04/davos-roasted-onions-in-gravy-game-of-thrones-recipes.html

_____ (2019, April 13). 31 Game of Thrones recipes-master list.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9/04/31-game-of-thrones-recipes.html

_____ (2019, April 14). Qyburn's wildfire guacamole Game of Thrones inspired recipes.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2, from https://thestarvingchefblog.com/2019/04/qyburns-wildfire-guacamole-game-of-thrones-recipes.html

Thon, J. N. (2014). Subjectivity across media: On transmedial strategies of subjective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feature films, graphic novels, and computer games. In M.L. Ryan & J.N. Thon (Eds.), *Storyworlds across media: Toward a media- conscious narratology* (pp. 67-102).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Tosca, S., & Klastrup, L. (2018). An experience approach to transmedia fictions.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392-400). Routledge.

Varela, F. J., Thompson, E., & Rosch, E. (2017).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The MIT Press.

Wang, J., & Wang, H. (2015). From a marketplace to a cultural space: Online meme as an operational un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45(3), 261-274.

Wilson, E., & Unruh, W. (2011). *The art of memetics.* Lulu Press.

Wolf, M. J. P. (2018). Transmedia world-building: History, con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M. Freeman & R. R. Gambarat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media studies* (pp. 141-147). Routledge.

Woodworth, A. (2018). My body is ready: Best practices for using memes on library social media. *Reference & User Services Quarterly, 58*(2), 87-90.

Xu, W. W., Park, J. Y., Kim, J. Y., & Park, H. W. (2016). Networked cultural diffusion and creation on YouTube: An analysis of YouTube mem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0*(1), 104-122.

本文引用格式

賴玉釵（2023）。〈跨媒介料理：互動性敘事中迷因再製之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13（2）：219-262。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8

Lai, Y. C. (2023). Transmedia food: Meme re-creation in interactive narrativ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219-262.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8 [Text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219-262, July 2023

Transmedia Food: Meme Re-creation in Interactive Narratives

LAI, Yu-Ch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research, meme literature is considered a form of transtext that supports the core text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once highly-developed trend of fictional "gourmet writing" about imaginary food has shifted to the emergence of "transmedia food," which emphasizes body senses and narrative desig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used A *Game of Thrones: A Song of Ice and Fire* and 220 blog posts with images as samples for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food) produc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f text) employed by creators of derivative mem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ly, interactive narratives require the meme creators to integrate literary experiences with food ingredients and the sensorial associations. Secondl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must correspond to easily available food/media materials in the daily cooking skill scenarios. Thirdly, the creators must be able to integrate their transmedia memories to construct a "synchronic system" for the food they tried to recreate or a "diachronic system" for the universe of the novel for the authentic recreations of the mythical food described in the novel. Fourthly, the creators employed multimodal resources to represent the food described in textual memes, with the aim of demonstrating their own creativity, prompting wider responses from online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and encouraging the creative energies of transmedia food.

Keywords: interactive narratives, the sensorial turn, meme re-creation, fictional gourmet writing, transmedia food

* 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Received: 2022.09.27; Accepted: 2023.04.07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U CRP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世新 謝然 舍我 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 *

李佩雯**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共文化理論為框架，試圖理解臺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取徑與傾向。研究者與五個女同志、三個男同志家庭家長進行長期、數次深度訪談後發現，受訪同志家庭嘗試以「堅定自信」、「非堅定自信」與「挑釁」等溝通取徑，預期達到「順應」與「同化」等家庭認同的協商結果。論文指出共文化理論化框架需結合弱勢群體「交織性」及「非典型弱勢身份原型」等概念綜合討論，以強化其理論內涵。研究結果同時反映受訪同志家長的「厚交織」與「交織階序隱形」身份，對於家庭認同協商過程的具體影響。

關鍵字：交織性、共文化理論、同志家庭、家庭認同、認同協商

* 作者欲感謝所有受訪家長的傾心分享，期待拙作能讓你們的故事被聽見。作者也謝謝匿名評審們的專業建議，及國科會研究計畫助理郭柏妤與張福仁的參與付出。

** E-mail: pwlee@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01 月 07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6 月 02 日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家無單一化定義、亦非本質性地存在，而是一種認識、理解的框架和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實踐的過程（謝文宜、曾秀雲，2015，頁 4）。

壹、前言

臺灣針對中、老年男、女同志的研究顯示，部分同志在進入穩定或自訂婚姻關係後，與多數異性戀伴侶一樣，都會完成繁衍子嗣的人生任務（王增勇，2011；黃靖雯，2011）。亦有同志在離開異性婚姻後，與同性伴侶組成繼親家庭，共同養育之前在異性戀婚姻中所生之子女（曾嬿融，2013；趙彥寧，2008）。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1]（簡稱同家會）已接觸超過 100 個透過人工生殖生育子女的同志家庭；截至 2020 年底，臺灣來自同志家庭的孩子，大約有四百多位（王晴怡，2017；吳少喬，2021）。而國內同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2] 中，原規定同志婚後僅可收養「伴侶具血緣」的子女，不過 2023 年 5 月 16 日立法院三讀修法通過，同性婚姻關係當事人之一方，可收養他方的子女或「共同收養無血緣」的子女（謝君臨，2023 年 5 月 16 日）。伴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的日新月異，同志族群不需仰賴先進入異性戀婚姻來完成其生兒育女的人生目標（何思瑩，2014；曾嬿融，同上引），未來國內預計會有更多同志伴侶加入養兒育女的行列。

個人好奇，臺灣的社會文化在法治規定開展同時，是否也能跟進肯認同志家庭成為社會組成的現實，保障同志家庭免於污名與壓迫，繼而朝向「去異性戀中心」的家庭實踐發展呢？在檢視相關文獻後，發現國外學者們仍少關注學校、職場、教會、政府機構等外界機構，對於同志家庭生活可能造成的權力壓迫（Kuvalanka et al., 2014），諸如對這些非異性戀個人視而不見、對其身分產生歧視，或是不斷強調異性戀家庭才是唯一的正常等，而國內的情況也極類似。

西方的研究指陳，家庭需要透過內在與外在的溝通（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來協商其家庭認同（Galvin, 2006）。家庭認同並非恆固

---

1 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或「童家慧」，創設於 2005 年。該會致力於提供同志家庭服務，包括爭取同志家庭的各種權益與親職教育資源。

2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簡稱《748 施行法》，為國內的同性婚姻專法。該法由立法院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三讀通過，同年 5 月 24 日生效，使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不變，而是關乎於每一位家庭成員之間共同適應與創造的家庭敘事；家庭認同不僅是一個內部的關係界定，它同時也是家庭成員與外部的社會脈絡及文化期待互動過後，所協商出位處該社會文化下的認同歷程。因此，家庭認同應該是產生與維繫一個群體共享之文化意義的恆動性溝通過程（Huisman, 2014）。換言之，家庭認同的形成不會僅限於成員之間的符號互動與辨識，它更是全體家庭成員與外部社會文化系統（如：學校、職場）交流過後所形塑出之意義總和；在這背景下，研究者對同志家庭與外界社會如何透過溝通協商出其非典型的家庭認同產生好奇，並著手探知國內同志伴侶與子女共組的家庭生活樣貌。

貳、 文獻探討

一、 不夠格家庭？國內同志家庭研究

國內探討同志家庭圖像的學術實證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謝文宜（2006；Shieh, 2010）的一系列同志伴侶研究發現，臺灣的文化過分注重集體價值的家庭主義，同志伴侶間往往因為缺乏社會的肯認，只能依靠兩人不斷在親密關係中彼此承諾，很難進一步論述非傳統「家庭」的概念。劉安真（2017）針對國內外同性伴侶關係的研究強調，同志伴侶的關係品質與穩定度，和異性戀伴侶的相關情況並無差異，甚至在家務分工上，同志伴侶較不受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影響，且在工作分配與生活對待上，相較起來也更為平權。王慧琦等人（2017）的研究亦證實，同志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與異性戀家庭下成長的子女並無實質上的差異。但上述對於同志伴侶與家庭的調查結果及論述，尚未明顯改變同志伴侶與家庭在社會上相對邊緣化的處境。

同志伴侶經常得面對性少數族群的壓力、內化恐同、出櫃、與原生家庭關係的不確定、缺乏性別角色指引等問題。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簡稱女權會）[3]（余秋恩等人，2007）的調查指出，不願生養小孩的女同志有 26.7% 的原因是不願讓孩子承受外在社會壓力，而 Giammattei & Green（2012）的研究也指出，欠缺社會支持是同志伴侶遭遇最困難的議題之一，因為伴侶

3　女權會創立於 1994 年 2 月 5 日，當時正值臺灣婦運興起，許多婦女組織紛紛成立。女權會強調婦女權益要根植本土，婦女若遭遇到任何困難，一定要能夠在當地找到支援。因此，女權會從過去到現在，不斷致力於擴大婦女的社區參與，並於 2001 年大力鼓吹在地婦女競選里長（請參見「臺灣女人」網站：https://women.nmth.gov.tw/）。

關係難免在發展過程中遭遇不同挑戰，少了社會支持將使得伴侶關係更加困難，甚至導致關係結束。Rostosky & Riggle（2017）致力於概念化少數群體壓力的來源，他們建議學者在討論同志所面臨的少數族群壓力時，不應該只關注個人層面的議題，而需要探討來自人際、機構（學校、工作組織、教會）、文化（法律、政策、異性戀中心的價值規範）等不同結構層面的外部影響。

同志伴侶與家庭缺乏社會支持多半涉及大眾的同性戀恐懼（恐同，homophobia）、性傾向歧視（heterosexism）、與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等心態與價值體系。此三組概念雖然彼此關聯，卻不盡相同。同性戀恐懼，意指對同性戀者非理性的恐懼與敵意，學者認為「同性戀恐懼」這個語詞僅將社會對同性戀的敵意縮小至個人層次，卻忽略恐同的態度其實是社會文化層次上的壓迫。因此後來學術界開始沿用「性傾向歧視」一詞，以指同性戀所遭遇的制度、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層面的壓迫。「異性戀正典」則是指一套鞏固異性戀以及傳統家庭價值的性別規範，並認定此價值體系是人類唯一正確的生活方式（劉安真，2017）。Oswald et al.（2005）認為異性戀正典乃是通過社會建構而成，其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干預可分為三個向度：第一，性別角色二分；第二，獨尊異性戀，病理化非異性戀親密關係，反對兒童接受同志教育以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三，推崇有血緣關係的一父一母家庭為正常家庭，其他的家庭型態都被貶抑為「不正常」或「偏差」。恐同、性傾向歧視、與異性戀正典都可能造成同志伴侶及其家庭與外部社會連結時的困難，其堆疊而成的意識形態讓社會上不同樣貌的多元家庭，為避免遭受攻擊與傷害，必須隱而不見。

回顧國內同志家庭主題論文，幾乎都聚焦於女同志家庭的生活經驗。近幾年婚姻平權運動獲得社會的熱烈討論及關注，同志伴侶對於家庭的想像與實踐愈顯清晰。長期研究同志親密關係的謝文宜、曾秀雲（2015）訪談了長期交往的男女同志伴侶後揭示，有些受訪者以異性戀「一對一」、「愛情、婚姻、家庭」接續的關係發展為目標，要求與異性戀一般平等的家庭論述；有些同志家庭的建構在乎的是伴侶雙方是否能落實日常生活實踐伴隨而來的責任與義務。如潘琴葳（2016）的研究所示，當同性婚姻在國內尚未法制化之前，其研究參與者生兒育女需投入的大量資源與心力的歷程，往往等同於他們「成家」的實踐。

進一步探究女同志家庭的親職實作，長期關注同婚議題的研究者曾嬿融（2013）發現，異性戀父權體制仍真實深刻地影響著女同志家庭中的生殖與

養育行動，尤其是血緣、親屬、親職三位一體的觀念。曾嬿融（同上引）諷刺的以「不夠格家庭」、「不適任家長」來描述臺灣社會眼中的同志家庭；她發現在女同志的家庭中，親職並不像異性戀家庭依照血緣直接給定，同志家庭依靠的是親子間的雙向互動，靠其互動對象的肯認（confirm）來加以確認。女同志媽媽也會策略性地呈現自己為單親家庭，足見該研究發表當時，國內對於同志家庭的汙名，比單親家庭還嚴重。女同志家庭只好以「更好的親職」為職志，企圖證明自己是夠格的家庭。

獲悉女同志家庭處在不利的社會處境，潘琴葳（2019）從心理諮商的角度探問女同志家長如何透過親職實作來協助子女理解家庭組成、建立家庭認同。結果發現，受訪女同志家長相信堅定的自我認同是關鍵；繼親家長在家庭中的定位也應清楚明確，家長之間的伴侶關係也應言明；對外揭露同志家庭身份時需要考量環境的安全友善程度、子女的年紀及家庭成員的組成，同時充分對孩子說明在某些情況下，家長留在「櫃內」是為了保護家人；最後女同志線上社群扮演了重要的人際支持網絡，不僅提供主流社會不易獲得的醫療與教養資訊，也可提早為孩子建立友伴關係。

從上述國內女同志家庭研究結果可知，社會上崇尚異性戀家庭常規的意識形態，令同志家庭難以自由而平等地發展其多元的家庭想像。為了擺脫社會汙名，同志家庭必須努力達到社會上所謂正常、夠格家庭的標準；而在面對外在強大的異性戀中心結構時，同志家庭是否嘗試以不同的策略與社會外界進行認同協商？國外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可借鑑之處？

二、「安內」與「攘外」：國外同志家庭認同研究

美國有多達 370 萬以上的兒童或青少年，其家長之一為 LGBT 的族群；大約 20 萬的兒童是由同性的雙親所扶養長大（Gates, 2015）。西方探討同志家庭認同協商與溝通歷程的文獻顯示，「出櫃」是同志家庭中所有成員都必須經歷的過程（Baker, 2019; Breshears & DiVerniero, 2015）。西方同志家庭收養的孩子向同儕揭露自己的家庭認同似有不一致的做法（Gianino et al., 2009）。根據早期 Goldberg（2007）同志家庭子女揭露動機的研究，成年子女對於同性家長的性傾向認同會進行隱私界線管理（boundary control），如：要求家長不要在公開場合有親密行為；只選擇跟幾個親近好朋友訴說家中的情況（selective disclosure）；自己擬定告知身邊朋友自身家庭認同的準則，

像是以提供教育類資訊的方式來試探對方能否接受同性戀。同樣從同志家庭子女的視角出發，Breshears & DiVerniero（同上引）的研究以「溝通隱私管理理論」（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的觀點檢視同志家庭與外界的互動。該研究受訪的異性戀婚生子女成年之後並不認為同志家長的性傾向為自己的家庭認同，反倒認為這是家長自己個人的性傾向認同，與自己無太大關聯。受訪者年幼時可能還覺得自己會受到同志家庭認同的影響，但長大有了自己的生活經驗之後，反而把這部分資訊的所有權歸給其同志家長，所以對成年後的受訪者來說，這份由異性戀家庭轉為同志家庭的認同是隨著時間不斷流變的（rules and boundaries fluctuate）。該研究中的成年子女不會輕易將同志家庭的資訊透露給家長的交友圈，但對於自己親近的朋友，反而不會過度保密。

儘管美國同志家庭的子女有自己揭露、管理非傳統家庭認同的策略，這些孩子在學校仍可能遭遇結構性的性汙名對待。Kuvalanka et al.（2014）指出，同志家庭的子女在校園學習過程中，容易被無視（invisibility），學校也很少提及同志家庭正面或中性的資訊，因此同志家庭的孩童在校園經常感覺到自己遭排除在外。這些青少年在學校遭到汙名時的應對策略包括：試圖融入（blend in）主流環境、隱藏同志家庭的秘密、忽略（ignore, detach）其他人的汙名行為等。作者們建議，提高同志家庭的能見度、多與其他同類家庭聚會，也許能減低這類非典型家庭被邊緣化的情況。

同志家庭在教育與訓練環境、醫療院所及職場評鑑中可能遭遇不同類型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s），其與一般的歧視行為同樣能造成強大與潛在有害的影響（Sue et al., 2007）。Haines et al.（2018）發現，同志家庭成員（家長或子女）遭遇的微歧視涉及：（1）家庭的正當性，指同志親密關係不是「真的」關係，只是跟室友或朋友發展出來的關係，因此同志家庭被認為不是真的婚姻；（2）違反異性戀主流或宗教家庭價值，因爲同志往往被過度性化、指涉為淫亂與刻板化，所以同志家庭成員間在公開場合的情感與肢體表達較容易受限縮；（3）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指同志家庭缺少一男一女的傳統性別角色成員，所以不被認可為真正的家庭。上述微歧視皆以異性戀正典為審視的標準而衍伸出眾多恐同行為，而同志家庭也因為不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別表現、與家庭成員組成而易被外界妖魔化。

因為同志家庭認同經常遭受不具正當性的挑戰，西方學者認為同志家庭內的意義協商與論述的建立對於穩定家庭關係具有其重要性（Galvin,

2006）。Baker（2019）發現，當男同志家長向孩子說明自己的家庭現狀與家庭的意義時，必須面對「傳統家庭結構論述」與「非傳統家庭結構論述」之間的反覆辯證（dialectics）。男同志家長表示，自己的家庭內互動免不了會受到傳統家庭結構論述所干擾與影響。為了協商此辯證，家長傾向以娛樂或輕鬆的策略（entertaining）來論述非傳統家庭結構的功能性和價值，為孩子打造一種「新正常」（new normal）的觀念，經常性地灌輸不一樣的家庭或非傳統的家庭並沒有不好的觀念；或是否定（negating）、遠離以傳統異性戀核心家庭結構為主流的論述趨勢。Breshears（2010）研究女同志家長如何藉由重要的家庭轉捩點（turning points）來為孩子強化自身的家庭認同，結果發掘：第一次跟孩子出櫃、共同面對外界對家庭正當性的挑戰、以及紀念性的婚禮或關係儀式都是成為家庭論述的重要素材經驗。此研究的受訪者也指出每天的家庭對話（everyday conversations）對家庭認同的建立頗有助益。

上述文獻揭示，同志父母意識到他們的性傾向可能對孩子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亦即身在同志家庭中的孩子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思考「如何」以及能夠「向誰」揭露自身家庭型態。為了排解同志家庭子女可能對自身家庭感到的羞恥與尷尬，同志家長所面臨的挑戰是為孩子們打造一種穩定、安全的家庭認同論述。與此同時，Breshears & Beer（2016）指出同志家長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社會外界流傳的負面論述時，所必須協商的少數族群認同與社會位階，亦至關重要。因此，他們在南非的研究中採納「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視角，嘗試向同志家庭成員（包括 17 位同志母親、4 位同志父親、8 位青少年子女、及 4 位成年子女）提問：同志家庭是如何協商外界社會看待他們的態度，以維繫或創造一種正面的家庭認同？研究結果發現，同志家庭成員經常藉由「忽略」（ignoring）負面的社會觀感；多與認同自身家庭的親人朋友們相處，為孩子「創造安全空間」（creating safe spaces），以減少直接遭遇歧視的機會；及「在公眾場合改變自身行為」（altering behavior while in public），避免與伴侶過度親密，引人側目等策略來協商社會態度。

不論是在學校或職場，來自同志非典型家庭的成員，或被視而不見，或被高度注視（hypervisibility）、妖魔化（Dixon & Dougherty, 2014）。Breshears & Beer（2016）提道，身具「雙重」或「三重」（double or triple minority status）弱勢身份的同志家庭成員在與外部社會互動時，甚至必須經歷多重困難（multiple difficulties）。而臺灣的同婚合法化之後，同志家庭是

否也如國外研究所述，對外協商家庭認同與社會位置時感到步步為艱？

三、 溝通理論視角：Mark Orbe 之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theory）

臺灣同志家庭與主流社會系統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溝通樣態，可採用 Orbe（1998a）的「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theory）來理解。根據 Orbe 的定義，共文化溝通指的是在社會上處境不利、不被看見的弱勢群體與掌握主要權力、優勢群體成員之間的溝通行為。當弱勢群體使用特定的溝通策略，並且有一特定的目標，希望能被強勢群體所接納時（如同志家庭認同），該過程中弱勢群體所使用的策略為何（what）及其如何被使用（how），正是共文化理論所企圖看見的溝通歷程（Bie & Tang, 2016）。

植基於性別研究中的「消音群體理論」（muted group theory）與「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Orbe（1998a）系統性地歸納出一系列實際的互動行為（如表 1 所示），其用意不在於定義這些不同的實踐與行為，而是「看見」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溝通的整個過程究竟如何進行，期間他們可能遭遇的不平等對待又是如何。

Orbe（1998b）早期的研究結果，指出了六種可能影響弱勢群體與掌握社會主要權力的組織或群體間溝通進行的主要因素，包括（Orbe & Roberts, 2012）：（1）預期結果（preferred outcome）：三種預期結果的形式較常發生。「同化」（assimilation），遵循強勢群體的生活規則；「順應」（accommodation），試著去反映弱勢群體的生活經驗，能在社會上被接受和取得適當的空間，並達到文化多元性的結果；「疏離」（separation），在跨文化互動中與其他共文化群體合作，創造出反映弱勢群體文化規範與價值，維持自我獨特的文化認同。（2）過去經驗（field of experience）：溝通者過去的生活經驗將會影響其如何抉擇共文化溝通實踐。這些經驗包含家庭的影響、社會化歷程、正式與非正式教育、關鍵事件等。（3）能力（abilities）：共文化溝通實踐的發生端賴弱勢群體溝通者是否具備相符的能力，在合適的個人特質與情節環境下，才能予以實踐。（4）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思考詳細的脈絡與環境因素，以選擇適合的溝通實踐。（5）預知損失與回報（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從過去的經驗累積，共文化溝通者可預先判斷某些溝通實踐可能帶來的損失或效益。（6）溝通取徑（communication approach）：

表 1：共文化理論取徑與傾向

溝通取徑 Communication Approach		預期結果 Preferred Outcome		
		Separation 疏離	Accommodation 順應	Assimilation 同化
	非堅定自信 Nonassertive	Avoiding 迴避	Increasing Visibility 提高能見度	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強調共通性
		Maintaining Barriers 保持困難障礙	Dispelling Stereotypes 驅散刻板印象	Developing Positive Face 培養正面價值
				Censoring Self 自我審查
				Averting Controversy 避免爭議
	堅定自信 Assertive	Exemplifying Strengths 證明優勢	Communicating Self 溝通展現自我	Extensive Preparation 全面性準備
		Embracing Stereotypes 接納刻板印象	Intragroup Networking 內群體網絡連結	Overcompensating 過度回報
			Utilizing Liaisons 運用中間人	Manipulating Stereotypes 操控刻板印象
			Educating Others 教育他人	Bargaining 討價還價
	挑釁 Aggressive	Attacking 攻擊	Confronting 直接面對	Dissociating 解除關聯
		Sabotaging Others 蓄意破壞他人	Gaining Advantage 獲取好處	Mirroring 模仿
				Strategic Distancing 策略性疏遠
				Ridiculing Self 自我嘲諷

資料來源：Orbe & Roberts（2012）

弱勢群體可透過三種溝通取徑來表達自己的意見：（1）非堅定自信的取徑（nonassertiveness），指的是個體受制約，不直接面對挑戰，以他人的需求為主以迴避衝突；（2）堅定自信的取徑（assertiveness），意指個體願意表達感受、想法、主張自我的權利，以雙方的利益導向為出發點考量的意見表達；）（3）挑釁的取徑（aggressiveness），以強勢、攻擊的手段要求對造考量我方的需求與利益，並忽視對方的需求。

上述的六項因素之間彼此互相影響（interdependent），全面整合成一個理解共文化溝通策略選擇的理論架構：

> 共文化群體成員以其過去經驗（field of experience）中對於行爲後可能產生損失與回報（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的認知爲基礎，搭配他們對自我運用的能力（abilities）與溝通實踐行爲的瞭解，他們會選擇採用某些溝通傾向（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搭配他們所傾向的預期結果（preferred outcomes）及溝通取徑（communication approaches）—以適合該特定情境事實（specific situation）的策略與其他強勢群體成員溝通（研究者翻譯，Orbe, 1998b, p. 19）。

這六項要素都是共文化群體成員進行跨文化溝通時的重要準則。其溝通取徑搭配想要的預期結果，可構成九種溝通傾向（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Orbe & Roberts, 2012）。請見表 1 中的說明與解釋。

過去以共文化理論做為研究框架的實證研究，通常是針對一共文化在某種特定結構、組織情境下所進行的探討，例如：在美國的穆斯林群體（Bashir & Rohani, 2009）、在組織中的非裔美人領導階層（Hopson & Orbe, 2007）、以及亞裔女性教師在白人為主大學的教學處境（Lee, 2006）。與本研究尤其相關的是 Camara et al.（2012）針對同志群體在美國社會面對性傾向歧視的溝通因應策略。該研究特別著眼於同志群體所遭遇的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與人際偏見（interpersonal prejudice）如何影響性傾向歧視互動的因應策略進行探究。作者們強調，西方社會的異性戀中心主義嚴重的邊緣化各種非異性戀的種族、族群、階級，同志群體最容易遭受歧視的情況通常是在公共領域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作者建議，同志群體或可先偵測公共場域的性別友善程度，以免遭遇不平等的對待。另外，Bie & Tang（2016）的共文化溝通研究指出，中國已（異性）婚男同志向身旁的家人親友的出櫃經驗受

文化價值觀中的家庭、婚姻與責任感影響至深，因此在中國重視群體主義與華人文化習俗的脈絡下，他們分析的出櫃故事除了與權力階級有關之外，亦傾向符合文化適切性的社會關係維繫模式（culturally appropriate manner），因此該研究的已婚男同志多以堅定自信的同化（assertive assimilation）、堅定自信的順應（assertive accommodation）、及非堅定自信的順應（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為主要溝通取徑，亦即他們嘗試主動或被動地遵循主流異性戀正典，不論出櫃的對象是父母或異婚的妻子，男同志都以「繼續維持正常異婚」為前提，以確保家人接納其同志身份。

Orbe & Roberts（2012）指出，共文化理論應該被視為一個非固定（non-definitive）、動態（dynamic, adaptable, stretchable）與進行中（work-in-progress）的理論架構。因此，Orbe & Roberts（同上引）傾向以「理論化」（theorizing）的說法來強調共文化理論所凸顯的非恆定特質，並主張該理論化的過程，能夠讓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得以不斷擴大自身對共文化群體策略性協商的複雜性理解。換言之，共文化理論發展至今，其核心精神與對學術界的貢獻乃是 Orbe 與共同研究者結合世界各地的實證研究成果，持續擴展不同的共文化脈絡化溝通協商與實踐洞察。本研究選擇共文化理論化框架，期望研究結果能協助其他研究者，深入理解尚為少數的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商其家庭認同的跨群體溝通過程。

綜觀上述，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只一種家庭型態：例如從傳統核心家庭轉變成單親家庭，又轉變成繼親家庭。個人可能因為不同的生命歷程而進入不同的家庭型態，但是多元型態的家庭卻很少在體制內受到討論。家庭認同的協商需要內部家庭成員彼此之間，以及成員與外部社會的雙向溝通。同志伴侶面臨少數族群組成家庭之壓力，學者不僅應關注其個人層面的議題，同時也需要探討來自人際、組織機構、文化規範與政策等社會結構層面對其非傳統家庭之形塑。Yep（2002）曾透過「內部—外部／個人—集體」（interior-exterior / individual-collective）構面所形成的四個象限，概括分類既有研究所探知的同志相關議題。臺灣的同志研究大多聚焦探討個人如何面對內化恐同與外界仇恨犯罪等主題（individual / interior-exterior），有關同志作為一個集體（例如：同志伴侶）對內面對各種媒體論述暴力（discursive violence）或外部機構（例如：社會系統、教育單位、組織機構）（collective / interior-exterior）所強化的異性戀正典體制則較少被關注。故，本研究藉 Orbe（1998a, 1998b）之共文化理論為研究框架，試圖理解臺灣同志家庭與

外部社會（如：學校、組織、教會、醫療院所）溝通以協商家庭認同之過程：臺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如何協商其非典型家庭認同？其過程是否可見共文化溝通取徑？其確切採用的溝通傾向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歷時兩年的質性深度訪談研究。本研究初期曾針對同家會過去所出版之訪談及田野資料內容（例如：刊載在《彩虹家庭電子報》的文章與報導）進行資料檢索，以協助研究者進入田野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本研究最後透過同家會及臉書上的人際網絡，以滾雪球的方式接觸到全臺各地八個同志家庭（表 2）。在初步建立關係之後，邀請各家庭其中一位同志家長參與本研究。雖然國外文獻不乏出現以子女經驗為主的家庭認同研究，但本研究考量受訪家庭中的子女多為幼年兒童，因此未將各家庭中的子女納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

本研究定義「同志家長」為性傾向認同是同性戀或非異性戀的拉媽與 gay 爸，包括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關係生兒育女者，同時已向外部社會群體表明其同志家庭認同或無特別欺瞞者。這五個女同志家庭與三個男同志家庭的居住地分別位在臺北、臺中、臺南、宜蘭，筆者每隔幾個月的時間便與參與研究之同志家庭家長會面訪談，不過研究後期（第三次訪談）因為遭遇 Covid-19 疫情，所以部分訪談是以線上語音進行。第一次深度訪談為「家庭史訪談」（2019 年 1 月到 3 月之間），目的在聽取同志家庭的組成歷程，包含同志家長的相遇及其決定共組家庭之細節種種，每個家庭平均花費一小時。

第二次深度訪談為「家庭與外界互動經驗訪談」（2019 年 4 月到 6 月），重點在開放性地探知同志家庭在生活中與外界群體互動之正面與負面經驗，並聚焦於同志家長在這些經驗中如何協商其家庭認同，每回訪談平均花費兩小時。在第二輪訪談中，首先根據理論文獻提出可能出現日常互動的外部機構，比方孩子的學校、自身職場、教會、醫療院所等互動提問（Rostosky & Riggle, 2017; Sue et al., 2007），而後再鼓勵受訪者更開放性地回溯其他環境脈絡下的經驗，擴增如：街坊鄰居、社群媒體、線上社團、政府機關等外界群體互動情形。受訪家長幾乎沒有提到在宗教聚會場所，如教會，出現的外界互動經驗。訪談綱要大致如下：（1）如何定義自己的家庭類型？（2）目前有哪些外界人士（子女學校、職場、教會或其他）知道你的同志家庭身份？

（3）當初讓外界知道自身的家庭認同是基於何種理由？（4）如何（how）向外界透露你的同志家庭身份？（5）外界的反應為何（what）？（6）你如何依外界反應繼續與其互動溝通（how）？（7）是否聽聞過其他同志家庭與外界的互動故事？情況為何？

第三次深度訪談為「更新現況訪談」（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2 月），當受訪同志家長在前兩次訪談中理解本研究目的後，筆者邀請其於生活中加強留意並記錄後續與外部社會互動之經歷，並於第三次訪談中分享，平均花費一個半小時。受訪家長在第二輪訪談中擴充探討的「外部組織」環境脈絡，個人也在第三輪訪談中請所有受訪家長補充說明是否也有此類外部情境經驗。特別的是，第二次訪談與第三次訪談之間，正逢臺灣通過釋字第 748 號施行法，因此亦針對同婚專法通過後，受訪家長所遭遇之社會反饋進行討論。

本研究採行的資料分析方法為：（1）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將龐大的資料依據其組成歸納為不同類別的過程，目的是從資料中找出類型、規律性或是主題；（2）理論性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則是進一步解釋資料中類型如何組成，或是解釋研究者所理解到的規律性與特殊主題性。本研究結合上述兩種分析方法，確切的資料分析步驟包括：資料整理（data management）、閱讀資料與筆記（overview reading）、釐清主題類型（clarification of categories）、與呈現資料（presentation of data）（Angrosino, 2008）。

表 2：受訪同志家長資訊

代號／年齡	性傾向／婚姻狀態	居住地	職業	子女
y/41	女同志／固定伴侶	臺南	自由業	男孩 4 歲（於前異婚所生）
a/38	女同志／已婚	宜蘭	餐飲業	男孩 4 歲（a 所生）、女孩 1 歲（太太所生）（人工生殖）
m/37	女同志／已婚	臺南	醫生	4 歲男孩（太太所生）、2 歲男孩（m 所生）（人工生殖）
h/42	女同志／固定伴侶	臺中	政治工作者	18 歲男孩、12 歲女孩（皆為前異婚所生）
c/37 i/46	女同志、酷兒／已婚	新竹	作家、心靈療癒師	2 個國中生女兒（i 於前異婚所生，c 已收養）
L/43	男同志／固定伴侶	臺北	金融業	3 歲男孩、1 歲女孩（兩位不同代理孕母）
T/45	男同志／已婚	臺北	醫生	3 歲男孩（代理孕母）
D/46	男同志／固定伴侶（目前已婚）	臺北	醫生	4 歲男孩（代理孕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研究結果

男女同志及其生、收養子女家庭的家庭認同內涵不盡相同，本研究將八組家庭依其成員組成，劃分為「女同志家長與前異婚子女家庭」、「女同志家長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及「男同志家長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等三組，企圖更細緻地展現八個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的過程。以此結構呈現訪談結果，並非表示各組家庭的溝通傾向僅有下述可能，或各組間傾向彼此互相排除。相反地，同一個溝通傾向可能同時出現在不只一組家庭類型中，例如：「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不過各組家庭實踐的情境脈絡與結果各不相同。本研究僅召募到八組受訪家庭，確為其限制，研究結果亦無法推論至所有同志家庭。

一、 女同志家長與前異婚子女家庭

（一）社群媒體上公開同志家庭認同

兩位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受訪者在歷經不同的生命階段轉換之後，選擇在社群媒體上發文，以一次性的方式，公開自己新的身份與家庭認同，近似共文化理論中的「溝通展現自我」（communicating self）。y 選擇在自己某一年生日的時候在臉書上貼文公開自己是「拉媽」，她認為如此一來自己就無需向同事親友一一解釋。h 同樣利用臉書公開自己家中的新成員，並且從此享受在臉書上發送與伴侶「放閃」照片的樂趣：

> 我現在在做的就是，爭取權益或者是讓大家知道「我們沒有不同」。所以「放閃」也是一種倡議！我現在的立場其實踩的很硬啦，然後我的心理素質也比較強（h）。

其實 h 提到，自己當初揭露與前夫離婚的消息時相當恐懼，擔心他人會批評離婚後的自己。結果證明她在公開自己離婚的身份後，反而贏得更多友情。同樣地，y 和 h 都指出，在臉書上揭露自己是女同志家長的身份，獲得多數臉友正向的支持，她們猜測可能持負面觀感的臉友，也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和性別平等的趨勢而不願輕易表態。

（二）嘗試融入女同志圈內線上群組

西方研究指出，性少數在社會上遭遇的歧視多數來自陌生人或公共領域的互動，建議同志家長善用圈內（in-group）社群資源，為孩子尋找人際網絡，維持家庭認同的發展（Breshears & Beer, 2014; Camara et al., 2012），如共文化理論所歸納的「內群體網絡連結」（intragroup networking）傾向。乍看「女同志家長線上群組」應該為不需要特別協商同志家庭認同的網路組織，但是細聽受訪者們的故事之後，研究者發現曾進入異婚的女同志家長與其子女，幾乎被女同志家長社團的某些成員視為「圈外份子」（out-group）。

y 在離開異性戀婚姻後嘗試透過女同志線上群組（Line 和 PTT）建立人際網絡，可惜當她向群組內的成員表明自己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之後，遭受不少冷嘲熱諷與負面的回應。

> 很多人會覺得，妳是不是〔異性戀〕婚姻不幸才會想要來找女生？妳是不是因爲離婚，所以才找女生？就覺得男生造成妳很多傷害。我覺得拉媽背負很多這種刻板印象跟罪名（y）。

y 加入女同志社群後經常被詆毀，在 PTT 的拉版上也被質疑是上線來找陽剛女同志來幫忙養育小孩。種種酸言酸語導致 y 一再懷疑自己「不夠格」建立同志家庭或是擁有同性伴侶。為了平反，y 創設一個「拉媽版」，試圖創造屬於自己的社群，鞏固自己的內在家庭認同，號召與自己處境相似的拉媽加入。雖然截至訪談為止，參與的拉媽人數並不多，但 y 還是在線上為自己找到了一些拉媽同伴。

> 我去拉版，就發了一個文，我說我是一個拉媽，就是我曾經有跟異性戀結婚過，那現在我自己帶孩子，我離婚了。我要找跟我一樣，也許妳還在異性戀婚姻裡面，妳很痛苦，也許妳正準備要離婚，妳不知道找誰講。我覺得不管妳是哪一個處境，我希望我們可以集結起來。在這個群組，妳潛水沒有關係，妳半年不講話我都不會踢妳走，可是如果有一天妳眞的覺得很痛苦了，很想講這件事，我們會在這邊（y）。

女同志社群中有些人認為像 y 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又育有年幼小孩的女同志「不純」、「不配尋找伴」，甚至反對單身的女同志與拉媽養育前異婚

所生下的小孩。y 不滿女同志圈將她的小孩歸為「血統不純正」，訪談間透露出內心卡在那個「真的」女同志家庭的定義、「怕被嫌髒」等外界說法。

研究指出，對於像 y 一般較為年長的同志來說，家人的價值、對自己原生父母的尊敬與愛（filial values and love and respect for her parents），都是他們過去決定進入異性戀婚姻的重要原因。有不少人為了實踐親屬角色（Kam, 2013）不得不進入異性戀家庭，但也同時發展同性戀關係（Brainer, 2021）。

被女同志社群質疑為「非典型中的非典型」家庭的還有 c。她和曾經進入異婚的太太 i 經常被女同志社群挑戰「不是真的女同志家庭」，因為她們的處境「不夠可憐」、「不夠辛苦」、「沒有太多被欺負的經驗」。i 和 c 沒有經歷過人工生殖的苦，等同於彼此「撿到便宜」。所以她們在女同志家庭私密社團被問到「那妳們有去登記嗎？」彷彿堅定的女同志關係完全取決於有無婚姻關係（Lannutti, 2018）。c 與 i 無奈地表示，他們很期待受圈內人所支持，但這些質疑使她們有一種「被自己人推開」的感覺。

上述發現與潘琴葳（2019）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潘琴葳發現社群為女同志家長提供了訊息傳遞、情感支持，同時肯認同志與家長雙重身分，給予孩子同儕的重要功能。究其因可能是潘琴葳的研究調查的幾乎是伴侶共同計劃生育的女同志家庭（planned lesbian families），同質性高，其所遭遇的困難與組成家庭的過程也類似，其與本研究中曾經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女同志家長處境不同。即便國內女同志家庭型態以繼親家庭（lesbian stepfamilies）居多，然而這類家庭的境遇卻鮮為人知（洪于珊，2012）。

筆者詢問 a 與 m（與其太太皆為人工生殖）加入同志媽媽社團的過程，a 表示自己參與時並未特別遭遇困難，她強調「〔社團成員〕很怕被打擾，所以篩選機制嚴格，一定要真的拿到媽媽手冊，而且一定需要推薦人」。因此，曾經進入異性戀家庭的女同志家長，在申請入會時就會備受討論。社團會評估她們交往的時間長度、是否已登記結婚。m 直接說道：

> 每次有曾經進入過異婚的媽媽要加入時，我都覺得這社團內有好多〔元老級人物〕，說些荒謬的言論，彷彿只有自己是女同志媽媽的正宗血統傳人。社團內偶也有火氣，幾個〔元老〕都說出：「如果新人加入，我就退社」。然後大家都還要哄她們（m）。

a 指出，在女同志圈，如果從未與異性交往過者，尤其是婆，評價會比較高。針對此事 a 後來悟出了另外一番道理：倘若是雙性戀但是卻選擇跟同

性共組家庭，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決定，「因爲她不是選擇一條好走的路」。

（三）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c 和太太 i 認為自然地與大眾互動，有助於「撕標籤」，近似於共文化理論中的「提高能見度」與「驅散刻板印象」（increasing visibility and dispelling stereotypes）傾向。住家附近菜市場裡雖然有很多閒言閒語，但 i 覺得大家都是鄰居沒有必要交惡，所以繼續如常般互動。c 和 i 手勾著手一起去買菜時發現，有些攤家雖然會以異樣眼光看他們，但也有不少小販會透過行動來表達善意，例如菜市場賣花枝羹的阿伯，對她們一家人噓寒問暖，態度親切，有些菜販甚至會親自送菜到她們家。i 自認「沒有櫃子」，因此不必要一直懷疑其他人是不是對自己有敵意，強調自己願意給對方時間去理解、調整心態，也會教孩子如何剔除自己身上的標籤，她稱之為「家庭內功」。

> 一剛開始，應該是小一小二的時候，女兒們就會介紹說，c 是「我阿姨」這樣。然後等到二年級、三年級搬去花蓮的時候，同學就會問她們，因爲就是換了一批新的同學，她們又要再解釋一遍，所以她們就會說，她是 c，她是我的家人，那你們就跟我一起叫她 c 就好了（i）。

女兒們在花蓮學校的同學、老師、校長因為這一家人不掩飾、不迴避，所以對她們一家人自然地表現出支持。連學生家長看到 c 和 i 在校園散步，或是一起參加家長會，也都能跟她們直接談教育、聊親子關係，不會對她們的關係多做評斷。i 不斷強調一定要先修復自己，清楚自己的內在信念想法與自我認知，她說：「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子，我們所共振出去然後收到的外界回應與社會，就會是什麼樣子」(i)。

h 與女友分住兩地，雖然女友經常出入她臺中的家，但是基督教鄰居遇到 h 的家人會迴避談論女友，就算在社區遇見 h 和女友一起出現，也會刻意忽略女友的存在。h 認為源於異性戀霸權，鄰居對同志家庭流露出來的「假尊重」才是日常生活中比較嚴重的問題，如 Moreira（2018）提出的「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所幸同婚通過之後，h 信心大增，有了法律的保障，她也能更有自信、更自然地面對社區的鄰里與管理員。

（四）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前幾年 h 參與地方民意代表選舉時，出現很多可以面對面跟一般人對話、教育社會大眾有關同志家庭認同的機會（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h 發現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有特別的反應，在街頭少數前來踢館的人多半顯現對於性平教育內容存在許多誤解，幾乎都是道聽塗說之後就想以其非傳統的家庭型態來刁難 h。另外，h 也透露或許因為她的社經地位（政治工作者）的關係，所以一般大眾不敢明目張膽地挑戰她的家庭背景。而她自己也很確定自己的身份認同，所以那種無懼讓外界沒有可以恐嚇或施力之處。舉例來說，h 女兒的學校老師在臉書上得知 h 是女同志之後，私底下跟女兒說：「妳媽媽的事情盡量不要告訴別人，這樣子比較好」。h 知情後把女兒向外界協商自己身在同志家庭的權利留給女兒，她相信與其躲藏，同志家長對孩子的教育、給孩子建立的自信，會影響孩子如何去面對外界眼光。

> 孩子的人際關係，還有他父母的社經背景，他自己對他自己的自信這個東西，都有關係。比方說當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有問題，你不需要因爲這件事情覺得羞恥，如果有人因爲這樣那你就跟我說，我們做一件事情是坦然的時候，他對這件事情他就沒有那個壓抑、擔心、害怕。所以他在人際之間的互動，他展現的不會那麼畏縮，他被霸凌的機會也會小。然後還有因爲我從小一到小四，我都有去他們班上說故事，所以我會讓他們班上的同學認識我，然後他們對我有一個認識跟理解跟喜歡我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會讓我們比較有機會跟他們班上的同學親近、理解，那個也會讓小孩比較安全（h）。

後來 h 的女兒選擇跟比較要好的同學分享自己的家庭認同，結果不但沒有造成同儕反感，還意外發現班上其實也有其他女同志家庭。同志家庭權益倡議者吳少喬（2021）感嘆同志家庭普遍不被學校看見，家長們只好藉晨光時間，以「真實存在」的出現，讓孩子們看見不一樣的家。知名 Gay 爸陳子良根據其在美國的親職經驗，呼籲臺灣能將同志家庭元素循序漸進加入學校的家庭教育單元（孫子靖、陳振豪，2019）。

曾經將自己親身的同志家庭故事出版成一本書的 c 認為，一般人也許是因為不理解同志家庭議題，不認識任何同志家庭，因此不懂得如何去溝通。因此當她自己在面對他人的好奇時，並不吝於去說明：

>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家庭認同的問題〕，那基本上，你的提問對我來講都也只是好奇而已。那我能夠回應給你的，我一定會全部回應，可是那要不要接受，我們會交給對方（c）。

受訪者 c 並不怯於與外界談論、交流其同志家庭認同，只是互動對象的反應與回饋各有不同，有時很難在當下看見明確改變。

二、 女同志家長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

（一）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面對不知情的外界，a 和 m 的家庭皆傾向先不表明同志家庭認同的身份，而是從日常往來或工作服務的過程中讓職場上的他人看見自己（increasing visibility）（Orbe & Roberts, 2012）、接觸與相處，然後自然地發現他們原來是同志家庭（the process of making you see）（Friedman & Chen, 2021）。筆者認為此與華人傳統社會關係中的含蓄政治（politics of reticence）與默言寬容的文化思維有關，其並非意圖隱藏同志家庭認同，而是以關係互動維繫為前提，試圖撐出同志家庭被看見的可能性（李佩雯，2018；胡郁盈，2017；Liu & Ding, 2005）。

開餐廳的 a 和太太待人和善，她們遭遇的外部經驗大多算正面。一開始 a 和太太也不多介紹自己，而是讓鄰里、顧客慢慢認識她們是怎樣的家庭，以提高自我的能見度來消除一般人對同志的刻板印象。a 不去強調自己的家庭很特別，傾向自然地與店裡的顧客互動，因此其他人對 a 一家人的態度也很自然，順理成章地接受。

> 我們的經驗是，我們不是很直接，在大家不認識我們的時候，我們就直接很高調地說我們是同志，或我們是同性家庭什麼的。都是先有接觸，因爲店家嘛，那我們通常是採比較中立的，我們不是很直接表示我們是彩虹店家，那大家來了可能會有各個立場的人，他們會從餐飲的接觸、服務的接觸，對我們是好的印象，之後知道了會覺得，欸？其實也不錯啊，也沒什麼不一樣（a）。

m 參加太太的員工旅行時，自覺不需要透過言語出櫃，而是直接以日常

互動示人，如異性戀家庭般，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tacit subject）（Acosta, 2011; Decena, 2008）。m 太太的上司，雖然看著 m 說不出口「女朋友」或「太太」的字眼，但是卻讓 m 比照公司的其他眷屬，一起參與尾牙抽獎。

（二）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受訪者 m、a 都曾經接受全國性與地方性新聞報導，談論自己的同志家庭。她們與自己的伴侶都有心藉溝通自我與教育他人的傾向（communicating self and 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增加同志家庭在媒體上的能見度，盡己之力進行社會運動。雖然必須犧牲自己的隱私，但是透過電視節目的深度報導，觀眾得以更深層地理解同志家庭型態。受訪者在回應外界的提問或質疑時，皆嘗試達到觀念釐清的教育功能，例如性傾向、性別角色、親職角色等概念說明。從他們揭露的經驗中不難發現，一般人經常受「性別二分」與「異性戀正典」的意識形態所綁架。

社會過度刻板的性別二分與性別表現想像，出現在 a 的伴侶親職角色經驗上。a 的太太外型中性，因此有任何粗重活，鄰居都認爲應該是 a 的太太負責。面對其他性別刻板所延伸出的疑問，受訪者們坦言必須耐心說明。

> 鄰居就說：「妳們以後會教妳兒子就是譬如說跟男生交往，還是跟女生交往這樣？」我就說這個我們不會特別去教，因爲那就是很自然的性向，像我爸媽他們也不是兩個媽媽，他們也沒有教我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然後他們突然好像喘一口氣這樣，他們就說：「喔，那這樣子就好」（a）。

如 h、m 提到自己的高社經地位，致使職場同事不至於挑戰自己的同志身份。作為醫生，m 發現他身邊的病患、護理師對其同志家庭身份似乎欣然接受，甚至當她帶小孩到醫院時，護理師們還會主動幫忙照顧。

> 我有一個病人，他顯然本來對同性婚姻不以爲然，他大概六十歲左右，一個男性。他進來就拿著他的手機，然後翻到我跟我太太五月二十四號去登記有一個新聞稿，他就說：「欸，恭喜妳喔！很幸福喔！妳有沒有覺得立法太快了，公投明明就不同意同性結婚啊。」然後我就好好跟他講，而且他還很認眞聽。所以我覺得要不

是我是醫生，他不會願意花這十分鐘聽我們之前修法的過程。所以對外溝通我是非常受益於我是醫生的這個身分（m）。

但 m 坦白當初也是等自己升上主治醫師後，才願意直接揭露自己的家庭認同。她發現醫院裡的的基督徒長官對於其家庭認同的回應運用「階段性」循序漸進的方式，一開始不願回應，採“don't ask don't tell”的策略，後來才慢慢接受。m 遭遇的挫敗主要來自陌生人對她外在性別表現（gender presentation）的挑戰。外型中性的她曾帶著孩子參與選舉造勢場合時遭陌生人「微歧視」（Haines et al., 2018; Sue et al., 2007）：「妳們是同志家庭喔？」「妳是公的還是母的？啊，妳推娃娃車，妳是母的。」m 當下盡量表現溫和，並試圖機會教育，邀請對方認識自己現場的家人。遺憾的是對方不願對話，撂下此言後立刻走閃。曾嬿融（2019）指出，不受社會肯認所造成的焦慮迫使女同志家長只能依靠強化親職照顧，以確保自身家庭的正當性。甚至不斷挹注資源來創造孩子在學業和教育上的優勢，以防孩子受外界不友善的對待。m 在受訪時揭露，她的太太因為上述的微歧視經驗，要求兩人必須對親職實踐投注加倍心力，以免兩個兒子對自我的家庭認同有所懷疑。

（三）「挑戰」異性戀中心家庭體制

同婚通過前，m 和太太便已登記為法定伴侶，當時適逢調換醫院單位，新單位的院長在他剛到職為全家申請宿舍時勸戒她要「低調」，院長的說法是「小地方不要張揚這種事」。宿舍申請的承辦人甚至指明宿舍還是要跟「家人」同住最好。m 當下並未理會，照樣填寫當時的伴侶為家人來申請宿舍。

我不知道「低調」是怎樣。因爲單身宿舍就有點像學生宿舍一個房間，那我要申請的是公寓型，他就說那妳跟妳的家人？誰跟妳同住？然後我就寫了「同志伴侶」。那個承辦的人就很困擾，他不知道這算不算家人。因爲理論上我跟我太太還有當時的大兒子，我們法律上就是沒有關係嘛。他就跟我說最好是家人，然後我就管他，我就寫了，寫了他也就沒有再退回來，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了（m）。

a 認為自己與家人出入醫院或公家機關的經驗相對正面，她帶小孩看小

兒科時，主動將表格上的「先生」或「爸爸」一欄劃掉，更改成「伴侶」或「家長」，態度也很友善與自然。

> 小兒科其實也很清楚，我們甚至有時候都會想說，欸？他剛剛是叫〔我太太〕「媽媽」嗎？啊他怎麼知道？就是我們都一起去，正常都是叫我媽媽，有時候是甚至出來才想說他們怎麼都沒有疑問？然後就想說啊，可能我填表格，我都會很自然地在「先生」那邊劃一撇，就寫「伴侶」，所以他們可能自己就會拼拼湊湊。後來我就發現他們其實很容易記住我們，然後對我們也蠻關心的、也蠻友善的（a）。

母親節時，a 女兒的學校要求交一張母親的照片，a 和伴侶會自動繳交兩張照片，作為提醒校方與老師多元家庭存在的方法。a 認為學校的回應算是友善，還會請小孩帶回兩束母親節花朵送給媽媽們。

研究指出，女同志對於臺灣同婚通過能夠為同志家庭帶來的保障存疑，她們認為法律制度也無法自動根除同志生活所要經歷的歧視與不便（Chen & Wang, 2010; Friedman & Chen, 2021）。即使在法律上是家人，但生活實踐上仍可能在某些情境因為主事者性別觀念跟不上，而需要受訪者們積極主動發聲來為自己爭取權益（confronting and gaining advantage）（Orbe & Roberts, 2012）。如 Ching（2010）所言，性少數必須在常規（normativity）的兩個層次上游移，一方面是評估或挑戰本身就存在多重意義與矛盾的「正常」作為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時改造「正常」成為一種可能（assessing 'normal' as a possibility and transforming 'normal' into 'possible'）。換言之，性少數在日常生活中必須一方面檢驗以異性戀為準則的正典是否合理，一方面改變、創造出適合性少數的常規。

三、 男同志家長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

（一）漸進式協商同志家庭型態

前文提及，外界對於本研究同志家庭認同接納，有些採階段性進行。其實受訪家長在協商自己的家庭認同時，也可能採漸進式策略，強調與主流異性戀群體的共同點，以避免爭議（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and averting

controversy）（Orbe & Roberts, 2012）。男同志受訪者不願意在情況不明的狀態下向小孩的學校表明自己是同志代孕家庭，一來是因為自己當下可能沒有親密關係伴侶，二來是還不確定學校對同志家庭是否會產生惡意。如曾嬿融（2013）與潘琴葳（2019）研究中的女同志家長所言，如果家長評估現實環境的友善程度將會造成出櫃後的不利後果，則家長們通常會在確認職場和幼小子女學校的狀況後，不主動提起自己是同志家庭。但是這樣的抉擇亦可能造成家庭認同建構上的兩難，因為家長也會擔憂孩子誤以為自己不正常，才會需要被隱瞞。

受訪男同志家長起初選擇以「單親代孕家庭」的說法來測試校方的反應。D 提到，「這個社會就是比較能接受女女組成家庭」（D），他在幫兒子找學校時會語帶保留地強調自己是單親，藉以試探校方會如何回應與照顧單親的小孩。D 曾經跟三家幼兒園談過，其中兩個比較保守傳統的幼稚園園長回應：「小孩成長不能沒有媽媽」，甚至質疑 D「你怎麼可以跟媽媽沒有聯繫？」「你應該要跟小孩說媽媽在美國啊，在工作啊？」。

> 社群裡的其他爸爸問我怎麼處理這件事，我就直接開門見山跟學校說，我們家沒有媽媽這件事。然後那些爸爸就說，可是他們家那邊的學校很保守。我說，保守更要講啊，如果遇到那些不是很友善的，你就想辦法換一家。你覺得沒有怎樣對不對？然後要創造一個虛擬的媽媽出來給你小孩，然後呢？那我說，哪一年你小孩七歲的時候發現，這根本是虛擬的，他會恨你一輩子（D）。

D 不認同對孩子編造謊言以符合異性戀雙親家庭組成形態，但是 D 尚不願向學校協商其同志家庭身份。有部分原因是訪談當時他還是單身（目前已婚），他認為並沒有向學校主動揭露的迫切必要性。而校方在面試時通常會向家長保證單親家庭與一般家庭並無不同，其子女在學校中亦不會遭差別待遇。只不過有些師長還是會理所當然地表露其異性戀中心的父母雙親思維，追問孩子母親的相關資訊，問句中不經意流露其無法想像一個家庭中缺少母親的角色。

（二）家長與師長共同建構同志家庭認同

L 則是選擇先向兒子的幼稚園坦誠，看校方如何因應同志家庭，以避免

孩子一直被問「媽媽呢？」。L 發現大部分校方會回應單親家庭不是問題，但卻避而不談男同志家庭認同。入學後，L 主動向兒子的老師建議，如果上課內容提到媽媽的時候請以「主要照顧者」的說法取代，希望孩子對於家庭成員的想像不會困在主流家庭的性別角色窠臼。

而 T 和兒子學校老師一開始也採漸進式、心照不宣的方式互動，過了一段時間 T 主動找學校老師說明同志家庭的身份，並與老師們展開來回討論，「共同建構」他們的同志家庭認同，近似共文化理論中「借助友善中介」的溝通傾向（utilizing liaisons）（Orbe & Roberts, 2012）。

> 老師有跟我們談論之後可以怎麼樣去跟孩子說他身世的狀況。老師有提醒我們在家裡跟在外面，面對外人的態度要一致。我們在家裡的稱謂是「爸爸」跟「爹地」，那帶著孩子在有外人的狀況，我們也必須是爸爸跟爹地，不是變成爸爸跟「叔叔」之類的。那一天回家之後，老師也有傳訊息給我，她訊息裡面有一些他們在學校的繪本，就把它拍下來給我們看。其中就有一本叫做「家庭大不同」，就是他們在學校會給小朋友看的繪本，裡面有提到有些家庭，會是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有些家庭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兩個爸爸、兩個媽媽，會有這樣子的繪本。讓我知道他們在學校會怎樣處理這個部分（T）。

T 認為老師們尚在摸索如何教育同志家庭的孩子，但老師們懂得跳脫性別二分，在特殊節日的時候（例如母親節）告知學生和家長，兩個爸爸也同時可以是兩個媽媽。老師們也鼓勵 T 和伴侶自然地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與其他家長互動，無需躲藏。

D 發現同婚通過之後，學校或其他行業（例如婚禮相關產業、婚紗、蜜月旅行）開始看到商機，較有性別意識的幼兒園認知到多元家庭是必然得迎接與學習的趨勢。尤其是營利幼兒園，他們傾向直接邀請同志家庭到園內分享（D 就曾經受邀），進行多元家庭的教育訓練。

（三）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L 生了小孩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直接牽著兒子走進公司，結果女同事們非常驚訝，但是紛紛表達「有小孩是好事」。L 坦言有家庭責任感的男同

志很容易被「加分」。如過去的研究所示，子女的出現成功地減輕同志家庭缺乏正當性的質疑（曾嬿融，2013，2019；Lannutti, 2014）。不過 L 的上司在正面支持之餘還是提出了她的擔憂：

> 同事比較意外是有小孩子這一段，因爲臺灣對 surrogate 這個概念其實是很陌生的。上司當然就是說我很勇敢啦，她覺得我很有責任感，就是爲了家庭的傳承去做了這件事情這樣子。但她也會擔心這個孩子沒有娘這件事情，然後第二個擔心他是混血兒，然後又是來自於一個這樣子的爸爸，未來會被歧視的問題。她其實也都有點到，就是她的 concern 這樣，那她就問我說我有沒有想好這些事情，那我就會把我的想法跟她溝通這樣（L）。

L 指出很多同志爸爸在找卵子時同樣有上述的擔憂，甚至因此特別找亞洲女性提供卵子。L 在訪談中提到他如何回應他人這方面的質疑：

> 他們覺得說你是一個同志爸爸已經可能被人家歧視了，又是個混血兒，你就更容易被人家歧視。我一開始也曾經擔心過，但是我後來自己覺得這不是一個主要的考量點。我覺得他會被歧視，其實各種各樣的理由都會被歧視，我認爲不可能讓他一輩子在一個無菌的環境。我覺得「陪伴者」這個角色反而是比較重要的，不要分它是來自於爸爸還是媽媽。我覺得這個核心就是抽離性別，陪伴不是一定來自於母親或父親這樣子（L）。

L 的上司聽完他上述的回應，也只能點點頭，無法反駁。又有一回，家裡有客人造訪，L 的兒子一直在哭，他們便斷言是因為沒有媽媽的氣味和心跳來穩定孩子。Goldberg（2010）與 Goldberg & Smith（2011）指出，女同志家庭的家長也經常被質疑「沒有父親」或是「缺乏男性角色典範」來反對其養育孩子。所幸 L 很願意與外界對話（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他對自己花時間投注在親職實踐與陪伴深具信心，並未因他人的干擾與評斷阻礙其家庭認同的構築。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與同志家長長期、數次深度訪談，以共文化理論為框架，欲理解同志家庭面對外部社會的溝通過程。研究問題聚焦探討前述三組家庭使用哪些家庭認同協商的溝通傾向？其使用該溝通傾向的結果為何？這些溝通傾向對照出共文化理論中的哪些取徑？相關的研究成果，請參見「表 3：同志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實踐」的具體整理。

表 3：同志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實踐

家庭類型	女同志家長與 前異婚子女家庭	女同志家長 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	男同志家長 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
1. 常見溝通情境	職場、女同志家長線上社團、社群媒體、鄰里、學校、公共場合	職場、鄰里、醫院、公共場合	學校、職場
2. 溝通傾向	（1）社群媒體上公開同志家庭認同 （2）嘗試融入女同志圈內線上群組 （3）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4）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1）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2）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3）「挑戰」異性戀中心家庭體制	（1）漸進式協商同志家庭型態 （2）家長與師長共同建構同志家庭認同 （3）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3. 上述溝通傾向所得之家庭認同協商結果	（1, 3, 4）有助於家庭認同協商；（2）較不順利	（1, 3）有助於家庭認同協商；（2）端看對方是否願意對話	（1, 3）逐步階段性地協商家庭認同；（2）有助於家庭認同協商
4. 上述溝通傾向對應共文化理論「溝通取徑」與「預期結果」	（1, 2, 4）堅定自信地順應、（3）非堅定自信地順應	（1）非堅定自信地順應、（2）堅定自信地順應、（3）挑釁地順應	（1）非堅定自信地同化、（2, 3）堅定自信地順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該表第 4 點是指本研究歸納出之第 2 點溝通傾向與共文化理論比較後，對應表 1 所得之溝通取徑與預期結果。

如同其他採取共文化理論的實證研究，本研究致力於將該理論化框架應用於不同的社會文化實體脈絡，企圖提升研究者們對共文化溝通實踐的理解，解釋跨群體間（如：同志家庭與非同志群體）的微妙互動與溝通傾向（Razzante et al., 2021）。本研究發現，三組家庭在對外協商同志家庭認同時，多數嘗試「堅定自信」與「非堅定自信」的溝通取徑，極少數使用「挑釁」的溝通取徑，期望達到「順應」或「同化」的協商結果。根據受訪者的經驗之談，上述協商之溝通傾向並無法總是達到穩固同志家庭認同的結果，比方使用「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溝通傾向的結果，仍取決於溝通對象是否具備對話動機與意願，倘若缺乏此意願，則該對話傾向可能反向動搖同志家庭原

先的認同基礎（如 m）。此外，同志家長如果預期到溝通情境存在的風險越高，例如可能影響子女在校的處遇、職場晉升壓力，則越容易選擇持續觀察學校與職場的友善程度變化，再漸進式地使用不同溝通傾向來協商其同志家庭認同（如 D）。

過往的共文化理論化相關實證研究，多側重於理解不同文化情境下的溝通取徑實踐，試圖擴展共文化理論框架中多元的溝通傾向認知，以及跨群體（intergroup）間的動態交流與互動關係詮釋。直到近期 Razzante et al.（2021）指出，結合一個「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視角，將能為跨文化溝通學者們提供一個更全面的立基與角度來思考文化、溝通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換言之，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在同一脈絡下，不該被簡單地化約為二選一：不是優勢的一方，即為弱勢的一方（Orbe & Razzante, 2020）。學者們應該擁抱交織性的視角來理解人們可能同時擁有的邊緣與優越處境。舉例而言，Jun et al.（2021）採納共文化理論探討亞裔美國人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受到的仇亞歧視經驗。該研究結論指出，男性受迫者相較於女性更傾向採取「堅定自信」的溝通取徑，然而分析中卻僅只說明女性受歧視的機率為男性的三倍，致使女性較不願採取積極主動的手段來回應歧視者。可惜的是，作者們並未深入討論「性別」在此種族衝突情境中扮演的厚交織因素，而僅將性別視為一種造成溝通傾向差異的「生理變項」。事實上，女性亞裔美人相較於男性，在種族與性別交織的權力階序上位置更低，遂只能採迴避的手段來回應強勢群體。亞裔男性在仇亞的研究脈絡下，雖為弱勢群體卻也不可忽視其性別及身材體型上的權力優勢。

呼應 Razzante et al.（2021）的提醒，本文認為以共文化理論化框架檢視研究結果時，需結合弱勢群體的「交織性」及「非典型弱勢身份原型」（non-prototypical minority）等概念綜合討論，以強化其理論化內涵。茲分述如下：

一、 受訪同志家長與外界群體互動時，同時存在強勢與弱勢的厚交織認同

受訪者 m、h、D 與 T 指出，社會地位（positionality）與階級（class）深深影響其同志家庭認同協商過程與被外界接納的程度。m 提到在職場中「向下」協商家庭認同，比「向上」協商家庭認同的挑戰性來得低。換言之，

本研究中階級與社會位置較高的受訪者，如醫生與政治工作者，因具有較高的發聲位置與權力，故較能在職場上運用其優勢與賦權，在同時具備強勢群體身份（domination group identity）與弱勢群體身份的情況下，直接面對位階較低的護理師或同事協商其同志家庭認同。然而，同樣在醫院的場域脈絡，面對資深的醫師或長官，身為醫生的受訪者則失去強勢群體的優勢，在階級和非典型家庭認同上顯現為弱勢群體，於是出現向上協商的困難。

受訪家長優勢與弱勢身份在同一互動時刻交織出現的複雜生命經驗，可藉由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厚交織」（thick intersectionalities）概念進一步分析。早期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用於理解個人身份的多重組合，如性別、性傾向、種族、階級等同時對個人造成的賦權與壓迫，致使個人可能在生活中的不同時刻具備優勢與劣勢處境（Crenshaw, 1991）。而後 Yep（2010）批評，Crenshaw 所提出的交織性理解僅凸顯刻板印象中的弱勢認同分類（如女性、性少數、有色人種、非白領），流於「條列與平板」（roster-like），容易忽略個人因不同情境脈絡，在互動行為當下所受彰顯的交織身份認同（salient identities），及其如何彼此作用後影響溝通行為（the “how” and “now”）。Yep（2013）提出「厚交織」的概念，敦促研究者更細緻地檢視個體的交織身份背景與複雜的生活經驗，在不同脈絡與時空下（the time and space）對身份認同展現與協商造成之影響。換言之，過往有關交織性的文獻多單方面聚焦在顯見的弱勢群體（oppressed groups, marked identities）之受壓迫經驗，而較少檢視弱勢群體在某些情境時空下也同時是強勢群體（dominant groups, unmarked identities）的厚交織經驗（Yep, 2016）。

厚交織的概念可協助溝通研究者深入理解特殊脈絡下，複雜的權力消長與時空運作。本研究中單一受訪者的交織身份，在目前同婚已經通過的時空氛圍下，可能在同一互動時刻，存在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認同，其對外協商同志家庭認同的溝通過程，也不能一律被視為是共文化溝通，而可參照「強勢群體理論」（dominant group theory）（Razzante & Orbe, 2018）來雙向對照檢視（Razzante et al., 2021）。不過，共文化理論與強勢群體理論目前仍僅是二分地去理解弱勢與強勢群體如何與對造溝通，未來研究者應致力於挖掘個人同時具備強勢與弱勢身份認同時刻的溝通互動理論機制。

二、 受訪女同志家庭的內群體交織階序現象

本研究發現受訪女同志家庭可分為已婚、未婚，以及家長過去是否曾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家庭。筆者從 y, a, m, c, i, 及 h 的長期伴侶口中得知，僅交往過同性、未曾進入過異婚的家長，在女同志內群體中被認為「最純」，較能順利在內群體中協商其家庭認同。相對地，尚未與伴侶結婚並曾經進入過異婚、育有子女的女同志家長，在女同志內群體中較難順利獲得同儕間的網絡支持與資源分享。由此可知，不同背景的家庭成員所組成的女同志家庭互動，交織出女同志內群體中幽微的權力落差。

當我們思考同志家長的處境時，心中的原型（prototype）樣貌往往都是「順」同志性傾向，亦即未經過性傾向認同流動的兩人所組成的同志家庭，或是成長過程中從未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個體所組成的家庭。卻忽視了如厚交織概念所指出的時空背景、流動的身份認同影響之下，同志家長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樣貌可能相當變動與多元。因此有一些非典型（non-prototypical）同志家長所遭遇的困境遂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

西方學者提出的「交織隱形」概念（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Purdie-Vaughns & Eibach, 2008）指的是非典型弱勢群體成員因自己的非原型弱勢交織身份而在社會中隱身、不被看見（unseen）。此概念挑戰了人們普遍認知弱勢群體的成員應該是全面性、均質地受到壓迫。Coles & Pasek（2020）主張：

> 黑人女性所遭遇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特殊經驗在人權運動中受到忽略……實情是，大型的社會正義與平權運動（例如，女性主義運動與反種族歧視運動）聚焦的往往是單一的身份認同框架（single specific axis）所造成的壓迫。黑人女性的交織隱形身份妨礙了她們在這些運動中，被明確看見自身的需求。交織隱形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爲在美國，女人（弱勢性別）的原型指的是白人女性，而黑人的原型（弱勢種族）指的是黑人男性。因此著名的黑人女性主義者（Hull et al., 1982）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所有的女人都是白女人，所有的黑人都是黑男人。」（筆者翻譯，Coles & Pasek, 2020, p. 2）。

換句話說，非原型的弱勢群體成員（如黑人女性）所遭遇的壓迫，容易在社

會中被排除（exclusion）與消失（erasure）在女性主義性別運動與反種族歧視運動的核心關懷之外（同上引）。

在這些概念啟發下，本研究嘗試提出「交織階序隱形」的概念，亦即非原型的弱勢交織群體成員，如前述「不純」的女同志家庭，因其層層細膩、複雜、流動、非原型的交織身份，在該女同志家庭的弱勢群體中可能遭遇群體內自己人所排擠，同時群體外的人也想像不到、看不見其在內群體階層化下的「厚弱勢」處遇：亦即同樣身為女同志（家長）家庭，還有不同的階序之分，某種類型的家庭才能被稱之為「正統」，未符合正統標準的家庭則必須在某些內群體脈絡中承受被邊緣化的處境。本文並非想刻意強調哪一種女同志家庭組成最為弱勢，而是想提醒研究者們持續探究可能被隱形與忽視的非典型女同志家庭處境。

最後，回顧共文化理論化框架，強勢群體的回應與溝通過程往往能凸顯弱勢群體所遭遇的歧視現狀。本研究的三組同志家庭在受訪時不斷提及因異性戀正典所造成的汙名與溝通困境，包括前異婚汙名、性別角色混亂汙名、家庭不完整汙名。這類嚴重缺乏性別意識的錯誤觀念，使得受訪的同志家庭在協商其家庭認同時遭遇「不正當」、「不正常」的汙名與挫敗。尤其是以「小孩不能沒有媽媽」的論述，質疑受訪男同志家庭的正當性，凸顯了社會上普遍認定生理女性才適任母職的刻板觀念。此外，受訪男同志家長也強調，他們所面臨的異性戀正典挑戰，顯現在「代孕子女入籍」的程序上。T、L、D分別指出，除了臺北市大安區以外，其他地區的戶政單位通常都會以臺灣目前不承認代孕，來婉拒處理男同志子女入籍事宜，引來男同志圈「一國多制」的不滿。目前中南部的男同志家庭若要申請代孕子女入籍，必須花一整天時間到大安區，依照前人所流傳的「教戰守則」，才有可能順利完成所有的入籍程序：先做親子鑑定，再到移民署入臺灣籍，最後回到戶政機關辦健保卡。過去不少同志爸爸曾在移民署那一關被移民官挑戰：「我怎麼知道孩子是你的？」後來才發展出先驗 DNA 的流程。

陳嘉妤、余振民（2021）整理相關報導後發現，臺灣同志家庭申請收、認養的標準與異性戀家庭不同，曾有女同志家長的申請以「婚齡過短」為由被駁回，男同志家長也被要求做親子鑑定，繁瑣的程序不但耗損生父認養的時間與精神，也反映出法律對於同志家庭的保障不足。T 指出臺灣的「媽媽手冊」（寶寶手冊），亦即填寫孩子疫苗施打紀錄的文件，因為目前國內尚未通過代孕，故只能輸入「媽媽」的名字和身分證字號。這個規則忽視了以父

親為主要照顧者的家庭，是 T 認為極需要改革的體制規定。

現代多元家庭強調的是不分血緣親疏，以彈性的家庭成員組合，創造人與人間互相照顧的情感與物質生存組合（陳薏如、楊幸真，2010；彭懷真，2003）。本研究因召募到的同類型男女同志家庭較少，致使蒐集到的溝通經驗與結果較為發散，實為其限制。不過，也因為多類型的同志家庭受訪者而協助筆者聽見過去同志家庭研究未曾揭露與觀照的面向。建議未來研究可聚焦於同類家庭成員的同志家庭生命故事，並結合強勢群體理論與共文化群體理論，更加雙向地檢視性別跨群體溝通的歷程。

參考文獻

王晴怡（2017）。〈同志家庭的婚權與親權之路〉，《婦研縱橫》，107：88-93。

王增勇（2011）。〈跨越世代相遇：看見「老年男同志」〉，《生命教育研究》，3（1）：169-230。

王慧琦、徐森杰、伊魯秀一（2017）。〈同志收養的現況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59：291-302。

何思瑩（2014）。〈「非法」情境下的酷兒生殖－臺灣女同志的人工生殖科技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5：53-122。

余秋恩、陳逸伶、莊蕙綺、藍貝芝、簡舒培（2007）。《女同志健康行為調查報告》。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吳少喬（2021）。〈不被學校看見的同志家庭〉，《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2：36-38。

李佩雯（2018）。〈當「他們」也是「我們」：已出櫃同志與原生家庭之跨群體溝通關係維繫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8（1）：65-101。

洪于珊（2012）。《是拉子也是媽媽～拉媽懷孕／生養歷程及困境因應之敘說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胡郁盈（2017）。〈從「現身」到「關係」：臺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107-151。

孫子靖、陳振豪（2019）。〈邁向多元開放的教育環境：臺美同志家庭經驗之我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27-129。

陳嘉妤、余振民（2021）。〈同志家庭收養經驗之探討〉，《諮商與輔導》，425：33-38。

陳薏如、楊幸真（2010）。〈初探女同志家庭親屬工作之運作〉，《臺灣性學學刊》，16（2）：43-60。

彭懷真（2003）。《婚姻與家庭》（修訂 3 版）。巨流圖書。

曾嬿融（2013）。《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_____（2019）。〈女同志家庭的親職照顧〉，《婦研縱橫》，110：48-59。

黃靖雯（2011）。《年過半百做自己：三位中老年女同志的婚姻經驗與情慾實踐》。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彥寧（2008）。〈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究》，6：153-194。

劉安真（2017）。〈同志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39 (1)：19-38。

潘琴葳（2016）。〈同志家庭與原生家庭互動關係初探〉，《輔導季刊》，52 (2)：22-34。

_____（2019）。〈打造同志家庭：女同志家長如何協助子女建立家庭認同〉，《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5：59-91。

謝文宜（2006）。〈為什麼結婚：國內將婚伴侶婚姻承諾考量因素之探討〉，《中華輔導學報》，20：51-82。

謝文宜、曾秀雲（2015）。〈臺灣同志伴侶的家庭圖像〉，《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1：1-54。

謝君臨（2023 年 5 月 16 日）。〈立院三讀：同性婚姻者可共同收養子女〉，《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7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302755

Acosta, K. L. (2011). The language of (in) visibility: Using in-between spaces as a vehicle for empowerment in the famil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8*, 883-900.

Angrosino, M. (2008). *Doing ethnographic and observational research*. Sage.

Baker, B. M. A. (2019). "We're just family, you know?" Exploring the discourses of family in gay parents' relational talk.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9*(3), 213-227.

Bashir, H., & Rohani, M. R. (2009). Theory of co-culture and co-cultural groups: Study of muslims communications in the USA. *Journal of Iranian Cultural Research, 2*(2), 97-123.

Bie, B., & Tang, L. (2016). Chinese gay men's coming out narratives: Conne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 to co-cultural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9*(4), 351-367.

Brainer, A. (2021).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heterosexual kinship, and queer dreams: Making famili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aiwan. *positions, 29*(3), 633-656.

Breshears, D. (2010). Coming out with our children: Turning points

facilitating lesbian parent discourse with their children about family identity. *Communication Reports, 23*(2), 79-90.

Breshears, D., & Beer, C. L.-D. (2014)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dult children's advice for parents coming out to their childre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5*(4), 231-238.

_____(2016). Same-Sex Parented Families' Negotiation of Minority Social Identity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12*(4), 346–364.

Breshears, D., & DiVerniero, R. (2015).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among adult children with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9*(5), 573-590.

Camara, S. K., Katznelson, A., Hildebrandt-Sterling, J., & Parker, T. (2012). Heterosexism in context: Qualitativ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o-cultural respons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312-331.

Chen, Y. R., & Wang, P. (2010). Obstacles to LGBT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positions, 18*(2), 399-407.

Ching, Y. (Ed.). (2010). *As normal as possibl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oles, S. M., & Pasek, J. (2020). 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 revisited: How group prototypes lead to the erasure and exclusion of Black women.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4), 314-324.

Crenshaw, K.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241-1299.

Decena, C. U. (2008). Tacit subject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4*: 339-359.

Dixon, J., & Dougherty, D. S. (2014). A language convergence/meaning divergence analysis: Exploring how LGBTQ and single employees manage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1), 1-19.

Friedman, S. L., & Chen, Y. C. (2021). Will marriage rights bring family equality? Law, lesbian co-mothers, and strategies of recognition in Taiwan. *positions, 29*(3), 551-579.

Galvin, K. M. (2006). Diversity's impact on defining the family: Discourse-dependence and identity. In L. H. Turner & R. West (Eds.), *The family communication sourcebook* (pp. 3-19). Sage.

Gates, G.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LGBT individuals and same-sex couples.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5*(2), 67-87.

Giammattei, S. V., & Green, R. J. (2012). LGBTQ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History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J. J. Bigner & J. L. Wetchler (Eds.), *Handbook of LGBT-affirmative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pp. 1-22). Routledge.

Gianino, M., Goldberg, A., & Lewis, T. (2009). Family outings: Disclosure practices among adopted youth with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Adoption Quarterly, 12*, 205-228.

Goldberg, A. E. (2007). Talking about family: Disclosure practices of adults raised by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1), 100-131.

_____(2010).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Research on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Goldberg, A. E., & Smith, J. Z. (2011). Stigma, social context, and mental health: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optive parenthood.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8*(1), 139-150.

Haines, K. M., Boyer, C. R., Giovanazzi, C., & Galupo, M. P. (2018). "Not a Real Family": Microaggressions Directed toward LGBTQ Famil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9), 1138-1151.

Hopson, M. C., & Orbe, M. P. (2007). Playing the game: Recalling dialectical tensions for Black men in oppressiv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8*(1), 69-86.

Huisman, D. (2014). Telling a family culture: Storytelling, family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bership. *Interpersona*, *8*(2), 144-158.

Hull, A., Bell-Scott, P., & Smith, B. (Eds.). (1982).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Jun, J., Woo, B., Kim, J. K., Kim, P. D., & Zhang, N. (2021). Asian Americans'

communicative responses to COVID-19 discrimination in application of co-cultural theory.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32*(3), 309-327.

Kam, L. Y. L. (2013).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Kuvalanka, K. A., Leslie, L. A., & Radina, R. (2014). Coping with sexual stigma: Emerging adults with lesbian parents reflect on the impact of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during their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9*(2)*,* 241-270.

Lannutti, P. J. (2014). Families centered upon a same-sex relationship: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the context of legally recognized same-sex marriage. In L. A. Baxter (Ed.), *Remaking "family" communicatively* (pp. 51-68). Peter Lang.

_____(2018). Committed, Unmarried Same-Sex Couple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9), 1232-1248.

Lee, P. W. (2006). Teaching as a co-cultural instructor in a diverse classroom. *In Transit: The LaGuardia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1*(2), 25-28.

Liu, J. P., & Ding, N. (2005).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1): 30-55.

Moreira, L. (2018). Living lesbian relationships in Madrid: Queering life and families in times of straight living fossils. In M. Yarbrough, A. Jones, & J. DeFilippis (Eds.), *Quee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after marriage equality* (pp. 17-30). Routlege.

Orbe, M. P. (1998a). *Constructing co-cultural theory: An explication of culture,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Sage.

_____(1998b).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traditionally muted groups: Explicating a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 8*(1), 1-26.

Orbe, M. P., & Razzante, R. J. (2020). Communication is co-cultural. In A. Tyma, & A. Edwards (Eds.). *Communication is...* (pp. 3-12). Cognella.

Orbe, M. P., & Roberts, T. L. (2012). Co-cultural theorizing: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 extension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293-311.

Oswald, R. F., Blume, L. B., & Marks, S. R. (2005). Decentering heteronormativity: A model for family studies. In V. L. Bengtson, A. C. Acock, K. R. Allen, P. Dilworth-Anderson, & D. M. Klein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y & research* (pp. 143-165). Sage.

Purdie-Vaughns, V., & Eibach, R. P. (2008). 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 The distin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ultiple subordinate-group identities. *Sex Roles*, *59*, 377-391.

Razzante, R. J., & Orbe, M. P. (2018).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Conceptualizing dominant group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o-cultural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28*(3), 354-375.

Razzante, R. J., Boylorn, R. M., & Orbe, M. P. (2021). Embracing intersectionality in co-cultural and dominant group theorizing: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Communication Theory, 31*(2), 228-249.

Rostosky, S. S., & Riggle, E. D. (2017).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minority stre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29-38.

Shieh, W.-Y. (2010). Gay and lesbian couple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7*(10), 1334-1354.

Sue, D. W., Capodilupo, C. M., Torino, G. C., Bucceri, J. M., Holder, A. M. B., Nadal, K. L., & Esquilin, M. (2007).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4), 271-286.

Yep, G. A. (2002). From homophobia and heterosexism to heteronormativit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l of queer intervention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6*, 163-176.

_____(2010). Toward the de-subjugation of racially marked knowledges in communication.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75*(2), 171-175.

_____(2013). Queering/quaring/kauering/crippin’ /transing “other bodies” in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6*(2), 118-126.

_____(2016). Toward thick(er) intersectionalities: Theorizing, researching, and activ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ies. In K. Sorrells, & S. Sekimoto (Eds.), *Globaliz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86-94). Sage.

本文引用格式

李佩雯（2023）。〈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13（2）：263-301。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9

Lee, P. W. (2023). "Family" is a verb: A study on external negoti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among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263-301.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9 [Text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pp. 263-301, July 2023

"Family" Is a Verb: A Study on External Negoti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Among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LEE, Pei-W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adopts Mark Orbe's co-cultural theor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used by Taiwanese same-sex families to negotiate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fte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long-ter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in two years with five lesbian and three gay parents of same-sex familie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same-sex families tended to use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such as "assertive," "non-assertive," and "aggressive."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results of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negoti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cepts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typical prototype" of minority groups in order to become more solid and comprehensive.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ick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tersectional hierarchy invisibility" of the interviewed same-sex parents in shap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Key words: intersectionality, co-cultural theory, same-sex family, family identity, identity negotiation

* E-mail: pwlee@mail.shu.edu.tw
Received: 2023.01.07; Accepted: 2023.06.02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世新大學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